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 ,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 ,更为文化的创新 ,竭尽了他们的才智 ,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 ,元明清三代中 ,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 ,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 !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 ,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 ,岂不愧对先人 !

开辟鸿蒙 ,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 ,可知约在十万年前 ,“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 ,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 ,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 ,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 ,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 ,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 ,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 ,但是 ,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 ,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and 企业家 ,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期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顓、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

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 ,其中古代五十部 ,20 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 ,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 :(1)生在浙江 ,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 ;(2)卒年在 2000 年底前者 ;(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 ,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 ,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 ,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 ,若有不甚恰当者 ,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 ,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 ,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 ,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 ,更值得一提的是 ,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 ,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 ,埋头苦干 ,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 ,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

是为序。

2003 年春于杭州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医学世家 仪义行侠	(1)
人禽之义 千古传颂	(1)
书香门第 医学世家	(6)
童年少年 动荡不安	(16)
血气方刚 仗义行侠	(22)
第二章 科场失意 弃学就医	(29)
为治母病 初涉医学	(29)
追随名师 精研义理	(33)
连举两次 科场失意	(44)
弃学就医 疗师痼疾	(49)
第三章 拜投名师 援理入医	(61)
辗转他乡 千里寻访	(61)
矢志不渝 拜投名师	(70)
潜心学艺 反复体察	(73)
第四章 行医治病 济世救人	(83)
融会贯通 灵活机动	(83)
高朋满座 相与切磋	(94)

疑难杂症 所疗皆中	(104)
第五章 治痘修塘 情系乡民	(118)
降服痘疮 拯救幼儿	(118)
有感而发 幼人之幼	(130)
倡修墅塘 情系乡民	(134)
第六章 晚年岁月 孜孜不息	(139)
恪守孝道 奉养慈亲	(139)
著书立说 嘉惠医林	(144)
行医济世 孜孜不息	(154)
斯人虽去 风范永存	(161)
第七章 医学著作 杏林奇葩	(166)
《格致余论》	(167)
《局方发挥》	(170)
《本草衍义补遗》	(174)
《金匱钩玄》	(179)
《丹溪心法》	(184)
其他医学著作	(190)
第八章 医学思想 深入人心	(194)
阳有余而阴不足	(194)
相火论	(200)
重视日常的养生保健	(203)
治病必求于本	(209)
不泥成方 辨证施治	(213)
注重精神治疗	(217)
第九章 杂症治疗 成效显著	(223)
对气血类疾病的治疗	(223)
对痰症的治疗	(228)

对郁症的治疗	(233)
对火热症的治疗	(236)
对风类疾病的治疗	(240)
对妇科疾病的治疗	(248)
对儿科疾病的治疗	(254)
第十章 流风余韵 天地永存	(256)
援理入医 以医言理	(256)
薪火相传 源远流长	(268)
流风余韵 天地永存	(288)
朱震亨大事年表	(294)
参考文献	(306)
后 记	(311)

序

浙江地灵人杰,人文荟萃,历代名人辈出,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素有“文化之邦”的美誉。即就医学界而言,古往今来,涌现出不少颇有名望的医家,朱震亨即是其中之佼佼者。朱氏字彦修,号丹溪,元代婺州义乌人,早年追随许谦精研宋元理学,习举子业,无奈应试不第,更由于母病脾疼,众医束手;子患内伤,伯父患瞽闷病,叔父患鼻衄,弟患腿痛,妻患积痰病,均一一死于庸医之手,使他“心胆摧裂,痛不可追”(《格致余论·序》),遂弃举子业,发愤学医,并得名师罗知悌的传授,于是学业大进,不数年,声名鹊起。震亨生活于金元时期,正值医学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说纷呈,学术流派林立,其中最负盛名者有刘河间的“寒凉学派”、张子和的“攻下学派”、李东垣的“补土学派”。朱氏兼取各家之长,且能自出机杼,提出“阳有余阴不足”等理论,力倡“滋阴降火”治法,因而成为别具一格的“养阴学派”的代表人物,与上述三家齐名,并称为“金元四大家”。朱氏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由其门人和私淑者整理编写的《金匱钩玄》、《丹溪心法》等书,亦较全面地反映了朱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还远播海外,日本曾有“丹溪学社”专门研究和传播丹溪学说,这对该国汉医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时至今日,

丹溪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仍熠熠生辉,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朱氏不愧是我省历史上杰出的文化名人和名声显赫的一代医宗,被后人广为传颂,推崇备至。

有鉴于此,杭州师范学院教授马雪芹博士积极参与“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写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继完成并出版了《潘季驯传》后,又承担了《朱震亨传》的撰写任务。作者以其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洞察力,敏锐的思维和严谨的学风,焚膏继晷,殚精竭虑地为朱氏立传,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完成了《朱震亨传》这部力作。综观全书,具有史料发掘充分、学术研讨深透、内容切合实用、文句通俗易懂等特点,不失为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的上乘之作。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传记”,毕竟与小说、影视剧本等有所不同,它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内容真实可信。基于此,作者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进行了周密的调研,对文献资料予以广泛搜集和深入发掘,掌握了大量有关朱震亨的史料,内容涉及文、史、哲和医学诸多方面,堪称资料翔实、素材丰富,从而确保了书中能真实、准确地引用相关文献,做到了言而有据、信而有征。更可贵的是,作者在考证、分析和研讨有关史料时,能坚持以历史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认真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对传主的记述能注意把握分寸,特别是对其评价,务求客观中肯,符合实际,这应该说是本书撰写取得成功的关键。最使人钦佩的是,本书作者的专业是从事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并非中医专业人员,其对中医学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特别是对有关古医籍的版本、史料的真伪等问题,能在缜密考证的基础上,提出颇有新意的见解,使有些悬而未决的疑窦,涣然冰释;对朱氏的学术思想、诊治经验(包括理、法、方、药的运用)亦能了如指掌,洞悉其精髓,殊非易事,的确难能可贵,令人叹为观止,大有“不是中医胜似中医”之慨。本

书对历史人物朱震亨进行了如此全面、系统的记述,为我省乃至全国文化史特别是医学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增添了不少光彩,这还是首次,从而弥补了既往在这方面研究的欠缺,其有益于朱震亨学术的传承和发扬自不待言,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回眸我省的文化发展历史,像朱震亨这样能影响几代人的名家,何止百千!但作为历史人物,毕竟已成过去,唐代诗人孟浩然有诗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今天我们为前贤立传,目的在于激励人们认真继承和弘扬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努力营造我省文化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使新一代文化名人脱颖而出,深信他们的业绩和成就,定会高于过去,超越前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朱震亨传》即将付梓之际,马教授索序于余。余虽才疏学浅,但喜其学有建树,事业有成,更乐其是书之出版,对浙江建设文化强省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故欣然为之序。

盛增秀

丙戌年仲夏写于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第一章

医学世家 仗义行侠

青少年时期是人成长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所受的良好教育可以使人一生受用不尽;同样,这一时期所经受的挫折苦难,也可以转化为一种动力,使人奋发进取、拼搏不息。朱震亨青少年时期所禀受家乡山水的哺育和家族传统的熏陶,使他从小养成了孝顺、好学的良好品德;同时从小经受的社会动荡、战乱不息的苦难,又使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理解,为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朱丹溪像

资料来源:《丹溪医集》 李强拍摄

人禽之义 千古传颂

朱震亨,字彦修,人称丹溪先生,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

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婺州路义乌县赤岸村^①。他的出生,给他的父母和整个朱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希望,但当时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普通的小男孩,日后竟然会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成为中国中医药史上的一代宗师。

朱震亨的家乡义乌县的得名,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先秦时期,孝子颜乌的父亲颜凤为了逃避战乱,携带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颜乌从故乡鲁国(今山东曲阜)迁到江南,独居荒原,以耕作为生。生活虽然清苦,但合家团圆,生活安定,倒也自得其乐。但不久,颜乌的母亲去世,只剩下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随着年龄的增长,颜乌逐渐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父亲漂泊劳作的不易。所以从他能够下地干活的时候起,就不让父亲再干重活,只做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家里的家务也几乎由颜乌包揽,尽量让父亲多多休息。夏天,他替父亲驱赶蚊蝇,挥扇扇凉;冬天,他替父亲铺床叠被,温暖被窝。父亲看着越来越懂事的儿子,脸上经常露出欣慰的笑容。

勤劳孝顺的颜乌,不光是对父亲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小动物也充满了爱心。有一次,颜乌下地干活,发现一只小乌鸦因腿受伤而落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颜乌就将它抱回家,精心地治疗、喂养,直到小乌鸦的伤口痊愈,身体也长大了一些,颜乌才把它放回田野。当小乌鸦振翅飞向蓝天的时候,多次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向颜乌致意。从此以后,小鸟们和颜乌父子成了好朋

^① 关于朱震亨的出生时间,宋濂《文宪集》卷二四《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以下简称《石表辞》)云其出生年月为“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元辛巳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但辛巳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又是公元1282年的1月9日,所以如按公历计算,其出生年月当为公元1282年1月9日。为了叙述上的方便,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农历纪年和习惯说法,用“至元十八年(1281)十一月二十八日”。

友经常成群结队地在颜乌父子的房前屋后盘旋飞翔。颜乌父子也经常在地上撒一些食物,看着小鸟们一面唱歌,一面快乐地进食。

又是几年过去了,颜乌的父亲日渐衰老,终于在一场大病之后撒手人寰,从此再也不能和颜乌一起劳作,一起看着鸟儿快乐地进食和歌唱了。

对于父亲的死,颜乌悲痛万分,哭得死去活来,一连哭了三天三夜还不止息。那时候,颜乌父子居住的地方还很荒凉,父亲的后事只能由颜乌一人担当。颜乌为父亲选好了墓地,开始挖土,先是用工具挖,工具用坏了就用手挖,直挖得双手鲜血直流,最后因劳累过度而昏倒。就在颜乌千辛万苦为父亲挖墓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那只曾经被颜乌救过的乌鸦,如今已经长成一只健壮硕大的领头鸟。只见它领着无数的乌鸦,用爪子帮颜乌挖墓。然后又用嘴衔泥,为颜乌的父亲筑坟。颜乌看着父亲的坟墓逐渐被筑好,终于欣慰地闭上了眼睛。

乌鸦们为颜乌的父亲筑好坟墓,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又发现颜乌也死在父亲墓旁,它们又回过头来,继续挖土、衔土,掩埋好颜乌的尸体,让他在父亲的坟墓前安息。

颜乌以爱心和孝心感动乌鸦,乌鸦为了报恩,帮他掩埋父亲,又掩埋颜乌的事,很快为人所知,并且很快在各地流传开来。后来又变成了各种文字记载,如南朝宋刘叔敬《异苑》记云:“东阳颜乌以纯孝著闻,后有群乌衔鼓集颜所居之村,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至孝,故慈乌来萃。衔鼓之兴,欲令聋者远闻。即于鼓处置县,而名为乌伤。王莽改为乌孝,以彰其行迹云。”^①北朝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浙江又东径乌伤县北,王莽改曰‘乌孝’。

^① (南朝)刘叔敬:《异苑》卷一〇。

《郡国志》谓之‘乌伤’。《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①其后吴师道《敬乡录》、欧大任《百越先贤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祝穆《方輿胜览》、《明一统志》、《浙江通志》等对此都有记载。

由于有了颜乌和乌鸦的情谊和故事，秦始皇在平定六国之后，在颜乌墓所在的地方设县，起名“乌伤”，表彰乌鸦因为受伤而引出一段人禽之情的佳话。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又将乌伤改名为“乌孝”，旨在表彰孝道。十六年之后，刘秀建立东汉，又恢复了“乌伤”的县名，以示与王莽新朝的不同。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又改“乌伤”为“义乌”，把“孝”的含义和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义”结合起来，使受伤的乌鸦变成为“义”而献身的形象。自此以后，县名再无改动，“义乌”一名遂沿用至今。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右丞相乔行简上书朝廷，请求给颜乌立祠祭祀，得到理宗的许可，并赐庙额为“永慕”。淳祐元年（1241），乡人康植在颜乌的墓旁建造了几所房子，中间设立颜乌牌位，供人们祭祀。景定三年（1262），知县李补应乡人之请，正式建筑永慕庙，又名孝子祠。除满足百姓平时自发祭拜外，历代地方官员还把祭拜颜乌、弘扬孝道作为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虽然颜乌的事迹发生在先秦时期，但经过史籍的反复记载，历代政府的宣传弘扬，老百姓之间千百年的口耳相传，早已为人所熟知，而且也成为当地人的骄傲和他们为人的准则，这对以后

^①（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四〇《浙江水》（条下内容有“《山海经》谓之浙江也”）。

朱震亨成长过程中孝友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朱震亨家族居住的地方为婺州路义乌县双林乡蜀山里蒲墟村,北距义乌县城45里,是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从县城到蒲墟,有大小10多条河道,依次为洋滩江、潜溪、吴溪、前溪、岷溪、东溪、光明溪、环溪、丹溪、西溪、龙溪、声间溪、盘溪、铁溪等,条条河水,清澈美丽,宛如条条银链,在义乌和蒲墟之间闪闪发光。蒲墟村西南有东、西两条溪水,至村西合流而过,被称为丹溪,下流至光明溪、吴溪而汇入东阳江。蒲墟村里有朱、王两家大姓,相互通婚,经常送往迎来,花红鼓乐,连绵不断。鲜艳的车马服饰,映照于溪流,又辉映于两岸,使溪水为之变丹,两岸为之带赤,家乡人以此为荣,遂以溪名为丹,改村名蒲墟为赤岸。村北10里处,有一湖,名叫舟墟湖,面积70余亩,水面清澈如镜,湖光山色尽映其中,给赤岸平添了许多美丽。舟墟湖南5里处,有一塘,名蜀墅塘,面积53亩,为宋代大学士王槐所开凿,不唯美丽,且有灌溉之利,是赤岸村民们的衣食之源。赤岸村四周山环水绕,景色秀丽,是理想的居住之地。宋代著名学者徐侨也是义乌人,其住所就在丹溪旁边。徐侨极爱此地山水,曾为诗赞颂:“丹溪群山俱有情,颀首环列如逢迎。东出双秀高冲天,惟先两峰挡我前。二水南来炯相顾,合流于西疑欲住。成此溪山一段青,中有一围十亩平。著我翛然数间屋,绕屋俱栽竹与菊。扶杖行舒景物妍,开卷坐对圣贤读。嗟予苑焉天地间,居然分得此清闲。毋累浩然有以老,也应不负剡溪山。”^①

地理环境对人的成长和情操的陶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先秦到明清,有很多杰出的人才从义乌脱颖而出,当和这美丽宜人的山川景物有关。

^① 嘉庆《义乌县志》卷二《水》。

后来朱震亨名声大振，学者不敢直呼其名讳，因其家住在丹溪岸边，便尊称他为“丹溪先生”。

书香门第 医学世家

朱震亨的家族是当地望族，据《义乌赤岸朱氏宗谱》^①、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和戴良《丹溪翁传》记载，朱氏的祖先可追溯到西汉著名经学家朱云。据《汉书》记载，朱云字游，本为鲁（今山东曲阜）人，后徙居平陵（西汉昭帝刘弗陵的陵墓，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大王村附近，咸阳原西端）。朱云身長8尺，容貌伟壯，勇力过人，行侠仗义，年轻时曾借客报仇。年过40之后，开始师从博士白子友学《易》，又师从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均是学有所成，能传师业。再加上其急公仗义，“好侗佻大节”，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

西汉元帝时，朱云因“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而受到御史大夫贡禹和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市）丞的荐举，本应入朝为官，但由于太子少傅匡衡的阻遏而未能如愿。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社会上盛行经学。汉宣帝刘询崇尚《梁丘易》，其子汉元帝刘奭继之。当时在朝任少府官的五鹿充宗身尊位重，受到皇帝的宠幸。五鹿扬言自己精通《梁丘易》，无人能比，于是元帝召集诸儒与五鹿辩论。五鹿倚仗自己的尊贵身份，滔滔不绝，诸儒未有敢摧其锋者。这时，有人推荐朱云上殿，与之辩论。朱云闻诏，不慌不忙“摄衣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就五鹿的观点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使五鹿张口结舌，不能对答。在场的各位儒者人心大快，说道：“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

^① 《义乌赤岸朱氏宗谱》应为本书撰写最重要的史料，可惜遍索未得，故凡本书所引《宗谱》资料皆为转引。

于是朱云一举而成为经学博士。

以后朱云先后任杜陵(汉县名,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乡)县令和槐里(汉县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县令,其时朝中中书令石显与五鹿充宗掌权,两人相互勾结,为所欲为。百官畏其权势,不敢直言抗争,只是唯唯诺诺。只有朱云和御史中丞陈咸不卑不亢,多次上书,据理力争,遭到石显和五鹿的诬陷,被系于牢狱,一直到汉元帝驾崩。

汉成帝时,朱云上书说道:“现在朝廷的大臣,很多人都是上不能匡正主上的过失,下不能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尸位素餐,无所事事。我请求皇上赐我上方宝剑,断佞臣之首,以警其余。成帝问佞臣为谁?朱云大声说:“安昌侯张禹。”张禹当时身为丞相,以皇帝老师的身份进位特进,特受皇帝的宠爱。皇帝认为朱云在众人面前侮辱了自己的老师,是以下犯上,要当廷治朱云的死罪。就命御史将朱云拉出大殿斩首。朱云毫不屈服,死死攀住大殿的门槛,致使门槛被折断。朱云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喊道:“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龙逢和比干都是三代时的直臣,以劝谏主上过失而被杀。朱云的不屈精神使在场的官员为之动容,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替朱云求情,直至叩头流血。后来皇帝怒气平息,赦免了朱云的罪过,表彰了他的忠直。当皇宫的侍从们要换掉大殿的门槛时,皇帝说:“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不要换了,在这基础上修补一下行了,就以这折坏的门槛来表彰朱云这样忠诚正直的臣子吧),让其他大臣们看到大殿被折的门槛就想到朱云的忠直。

朱云不畏强权、刚直不阿的气节不仅为当时所敬仰,也受到后世的崇敬。1000多年后的南宋时期,进士任尽言在请求朝廷清算秦桧罪行时慷慨直言,仍以朱云的这种精神自励,其云“每

愧朱云之请剑，未闻林甫之斫棺”^①。促使朝廷对秦桧的罪行进行清算。

这件事发生之后，朱云就不再在朝廷为官，居住于长安城西面的鄠县乡间，以讲学为己任，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

朱云的学生有九江严望及其侄严元，两人都继承了朱云的学说，也都成了当时有名的经学博士。

朱云 70 多岁去世，临终的时候遗言薄葬，后人将他葬在平陵县的东郊，并为他造了 1 丈 5 尺高的坟墓^②。

朱云之后，朱氏家族情况不详。到西晋惠帝永兴年间（304—306），朱云 7 世孙朱汛（一作汎）任临海郡（三国吴郡，在今浙江省临海市东南）太守，因喜欢蒲墟的山川秀丽，就从平陵迁至义乌，定居于蒲墟，后朱氏一族被称为蒲墟古族。朱汛之孙朱恒曾任晋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市）太守，朱恒之孙朱礼为晋金威将军。到了朱礼的曾孙朱幼，又任南朝齐高辛（今地不详）、平昌（今安徽滁州市）、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三郡太守和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刺史兼度支使。因其治理扬州政绩卓著，当地人们歌颂说“朱幼治江东，人安盗贼空”^③。

可以说，自从迁居义乌之后，从朱汛到朱幼的几代朱氏家族，在仕途上一直是比较顺畅的，也因此而奠定了朱氏成为当地望族的基础。其后朱氏家族的人口不断增加，到朱幼的第 14 代孙（姓名无传）又生有 4 个儿子，18 个孙子，当时正值南北对峙，战争不断，这位朱氏传人恐怕子孙以后万一失散，无法团聚相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九九《苏氏蜀学略·司户家学·任先生尽言》。

② 以上朱云事迹具见《汉书》卷六七《朱云传》。

③ 嘉庆《义乌县志》卷一五《人物》。

认,于是在后周太祖郭威广顺年间(951—953),冶铸了18尊铁罗汉像,孙子每人一尊,作为日后相聚相认的凭证。18孙中有一人后来定居于义乌赤岸村,被称为赤岸朱氏,这就是朱震亨的家族在义乌赤岸的始祖。

赤岸朱氏7传之后,到了宋代末年,家族中出了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朱良佑,因博学多才而受乡人尊重。朱良佑曾“以六经为教,以弘其宗”^①,使朱氏家族在当地影响越来越大。

朱良佑有3个儿子:朱杞、朱杓、朱桂,是为朱震亨的曾祖一辈。

朱杞生有9个儿子,其中7个都在科举上有所成就:长子大任,漕贡进士;次梦魁,咸淳戊辰(1268)进士;次应魁,大学内舍正奏名;次紫翁,浙漕进士;次淳咸,庚午(1270)进士;次叔麟,也是戊辰(1268)进士;次夫天,广德判官。其他两个儿子嘉猷、寿孙虽然没有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也是以儒为业,文章著名。朱杞几个儿子在科举功名上的巨大成就,使朱家在当地盛极一时,遂有“九子七登科”之说^②。以后朱家的子孙又多有成就,被称为“江浙望族”^③。

朱良佑的另一个儿子朱杓,性格刚直,博学多才,曾师从朱熹的弟子徐侨精研理学,对理学中的一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著有《太极图说》、《经世补遗》等书。又由于朱杓从小身体孱弱,经常抱病,所以博览医书,精通岐黄(中医药)之术,著有《本草千金方》、《卫生普济方》等。

朱杓之子朱叔麟,是朱震亨的祖辈中和朱震亨关系最为密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四《石表辞》。

② 嘉庆《义乌县志》卷七《坛庙·二朱祠》。

③ (明)熊人霖:《赤岸朱姓贤达序》,转引自嘉庆《义乌县志》。

切、对朱震亨影响最大的一位。朱叔麒年轻时考中进士，曾任定海（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仙居（今浙江省仙居县）两县的县令和黄岩（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浮梁（今江西省浮梁县）二州的知州，以婺州路总管府治中身份致仕。朱叔麒才学出众，曾“以文辞驰骋于当时”，人读其文，“若窥古鼎钟云雷之文，不觉改容易视”。并且，朱叔麒亦精通医学，为官的时候，就乐于为人治病，就连监狱的犯人有病，他也是准备好药物，送到监狱，亲自看着他们服下。他的家中，有一间专门储备药品的房子，房门的匾额上题有“存恕”二字，以表示推己及人之意。致仕家居之后，每当乡邻以病相告时，他必定为之诊脉开方，又亲自督促指导熬药之法，还要眼看着病人服下才放心离去。他常说：药虽然是好药，但煎熬不得其法，服药不得其时，也得不到最好的疗效。病人希望治病，就像溺水的人希望得救一样，所以我一点也不能随意任之呀！有一次深秋的时候，朱叔麒将熬好的药盛在器皿里，一大早就带着童子前往病人家送药。走到半路，马突然受惊，将朱叔麒掀下马来，跌于路旁的水中。童子吓得抖抖索索，但朱叔麒毫不生气，一面安慰童子，一面赶快找来衣服换了，一点也没有耽搁，又上马到病人家去。这时朱叔麒年事已高，至于暮年，但急公济人的行为仍和年轻时一样。他的医术、医德，一直受到百姓的敬仰。应该说，朱杓和朱叔麒对医学的精通和爱好，使朱震亨日后的医学有了一定的家学渊源。而朱叔麒高尚的医德，也为朱震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①。

朱叔麒之子、朱震亨的从叔朱同善，字性与，从小以家学为师，长大后于八华山从许谦学习，“研究奥旨，上承文公五传之

^① 以上关于朱杓和朱叔麒的史料，见于《赤岸朱氏宗谱》的记载之中，转引自刘时觉等《丹溪学研究》之第一章《历史》。

绪味道之腴,尤为饕餮,质其异同,统宗会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礼乐行政之原,古今治乱得失之迹,莫不洞该”^①。“赋质迥拔,日涵濡过庭之训,学识所至,如春芽怒长,月异而岁不同。宿学之士皆让莫敢与为敌”^②。朱同善曾与朱震亨一起师事许谦,在族亲之外又有一层同学关系,且都和宋濂是忘年之交,后又一起被列入“北山四先生学案”,感情当是更加亲密了。

朱杓、朱叔麒、朱同善父子三代都在学术上有所造诣,所以宋濂称赞他们是“三世父子,递相传授,辨晰名理,密如牛毛”^③。

朱良佑的三子朱桂曾任迪功郎(宋代政府中的下级官吏)之职,朱桂养子朱环就是朱震亨的祖父。朱环生父不见史籍记载,情况不详。宋濂在给他写的传记中只是说朱环是朱云的第40代孙,“赤子时无儿啼声,仲父桂奇之,养为子”。按宋濂的记载,朱环的生父应该是朱桂的兄弟,朱环当属朱姓子孙无疑。朱桂开始抱养朱环,非常疼爱,如同己出。但后来朱桂又生了两个儿子朱璧和朱定周之后,对朱环就没有过去那么好了。而朱环对朱桂却一如既往的尊敬孝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侍奉养父母孝顺恭敬,毫不懈怠。当时社会环境还不太安定,经常有盗寇出没。朱桂家有300两银子,怕遭意外,就与儿子朱璧商量后埋在家里的地窖中。不想朱璧心怀叵测,后来私自将银子挖走,反而将罪名推到朱环头上。朱桂大怒,让朱环脱去衣服,立于大雪之中,百般叱骂,整整立了一夜才允许他穿衣回家。朱环明知是朱璧栽赃,但为了不惹养父生气,一句也不加辩解,受罚以后穿上衣服,还恭恭敬敬地向养父道谢。以后的五六年中,朱桂又多次

① 嘉庆《义乌县志》卷一四《理学》。

②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四《石表辞》、卷二三《故裕轩先生墓碣铭》(并序)。

③ 嘉庆《义乌县志》卷一四《理学》。

虐待朱环,手段都很残忍。有好几次朱环都被虐待得差点死去。但朱环始终恭恭敬敬地侍奉朱桂,没有半句怨言。朱桂死后,朱环对朱璧更加友爱。朱璧的儿子朱庆性格酷暴,引起众怒,被人诬以杀人罪,关入监牢。朱环为之忧愁得吃不下饭,竭尽家财多方营救,终于使朱庆转危为安。朱环这种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行为,受到了周围人们的普遍称赞,说他胸怀开阔,心地良善,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仅如此,朱环从小就喜欢读书,好学不倦,曾中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乡贡进士。

朱环的儿子朱元,是朱震亨的亲生父亲,性格聪敏警悟,勇敢果断。至元末年,有一股几千人的盗贼从缙云(今浙江省缙云县)经过永康(今浙江省永康市),直抵义乌,声言要劫持朱环和朱环的哥哥朱遇魁作为他们的军中谋士。朱元听到消息后,连忙赶回告知父亲和伯父,请他们赶快躲避,以免被盗贼劫持,他日有口难辩。怎奈两个老人根本不听,不管朱元如何流泪相劝,都不能使二老动心。朱元见老人不听劝告,自己又不能强迫,怕老人万一被劫持而去,将来定会获罪。不如先下手为强,杀了盗贼,以绝后患。主意一定,他就和一个仆人手执利刃,隐藏在大门后面。有人劝告说:强盗的势力那么大,你不怕被他们杀死吗?朱元说:只要能使父亲和伯父免于被劫持,我虽死而无憾。正说着,恰好强盗的两个侦察兵到了,朱元和仆人奋力搏斗,杀了两个强盗,然后浑身血迹入告老人,背着老人向北面逃去。最后大群强盗果然到来,朱环和朱遇魁因躲避及时而免于被劫持。^①除机警过人外,朱元受家庭影响,也是聪敏好学,卓有成就,只可惜英年早逝,让朱震亨过早地失去了父亲的呵护。

可以说,朱震亨能够从一个行侠仗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著

^① 以上朱环、朱元事迹见宋濂《文宪集》卷一一《朱环传》。

名的理学家,又能援理入医,进而成为我国古代的医学大家和滋阴学派的创始人,和家族成员对他潜移默化的熏陶和言传身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朱震亨的外家戚氏,也是当地有名的望族,和朱氏为世代之交。

据元代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的义乌人黄潘记载:朱震亨的外高祖名叫戚如琥,字少白,金华人,曾与他的两个从兄弟如圭、如玉共同师从东莱人吕祖谦学习,后三人在宋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1165—1189)先后考中进士。戚如琥进士及第后,曾任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市)教授、国子博士、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知州、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知州等,政绩卓著,卒后门人私谥为“贞白先生”。其弟戚如圭曾任嵊县(今浙江省嵊州市)尉,如玉曾入太学学习。戚氏兄弟能有这样的成就,和家庭的教育熏陶关系极大,他们的母亲周氏就是一位有才学、有涵养的女子,经常观看圣贤之书,读书即能明义,史籍记载她在读了谢良佐的《上蔡语录》之后,曾经对几个儿子说:“既不为禄利,复不求人知,斯所谓学问者邪!”^①由于学业出众,学有所成,戚如琥兄弟除考中进士、在仕途有所成就外,他们的学问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兄弟三人同时被列名于以金华叶邛为首的丽泽诸儒学案。父以子贵,朝廷又因此追赠其父戚约为奉议郎。

戚如琥的儿子、朱震亨的外曾祖名戚宋祥,以父亲的缘故补官为从政郎、广德军司法参军。到戚宋祥之子也就是朱震亨的外祖父戚绍时,南宋灭亡,元朝建立。戚绍坚持文士气节,隐而

^①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七三《丽泽诸儒学案》中《知州戚贞白先生如琥》、《县尉戚先生如圭》、《进士戚先生如玉》等条。

不仕,拒绝与元政府合作,被学者尊之为“贞孝先生”。戚绍之子戚象祖,后来成为朱震亨的岳父。戚象祖字性传,从小接受家庭教育的熏陶,长大以后又师从著名学者王元章学习性命义理之学,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学者。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戚象祖50余岁,被推举为东阳县学教谕,后出任绍兴和靖书院山长,专力从事讲学活动。年近70岁时,上书请求致仕,未获批准,又被任命为信州路道一书院山长^①。戚象祖有子2人,长子宗仁曾任象州阳寿县(今广西象州县)龙门巡检,英年早逝。次子戚崇僧,字仲咸,不喜仕进,专力治学,开始和朱震亨一样学习诗词文翰,27岁时尽弃前学,于东阳八华山师从东阳许谦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用意坚确,早夜弗懈,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尤潜心于儒先性理之说,探幽发微必极其根柢而后已”。被同门推为高第。学成归来后,陪同父亲居住于永康太平山中,曾在当地创立义塾,太康吕氏“聚族人之子弟使就学,诤君主其教事。君克谨师法,持规严,学者敬惮之。扁其室曰‘朝阳’,以表乡土之怀,人称之朝阳先生”。崇僧著述甚多,计有《春秋纂例原指》三卷、《四书仪对》二卷、《后复古编》一卷、《昭穆图》一卷、《历代指掌图》二卷等,可以说是尽得许谦之传,为戚氏家学的重要代表人物^②。

由于戚氏家族学者众多,前后相承,源远流长,所以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七三《丽泽诸儒学案》中特列《戚氏家学》条,继戚如琥、如圭、如玉之后,他们的子孙戚绍、戚象祖、戚崇僧

① 以上见(元)黄潘:《文献集》卷八下《道一书院山长戚君(戚象祖)墓志铭》。

② (元)黄潘:《文献集》卷九下《戚君(戚崇僧)墓志铭》。

三人也被列名其中^①。这样戚氏一家中见于《宋元学案》记载的学者就有四代六人。

戚氏家族和朱氏家族相交甚厚,从朱震亨的祖父朱环和外祖父戚绍开始,戚、朱两家就世代通婚:朱环之女嫁戚绍的儿子戚象祖,戚绍的女儿嫁朱环的儿子朱元。戚象祖的女儿又嫁朱元的儿子震亨,朱元的侄女又嫁象祖的儿子崇僧。这样,朱震亨的岳父同时也就是他的舅父,姑姑同时也是岳母,而妻子则是自己的姑表姐妹。用今天遗传科学的眼光看,近亲结婚确实不是什么好事,应在禁止之列。但在六七百年前的宋元时期,人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观念,只是以亲上加亲的形式来反映和巩固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和友谊。

戚氏家族崇尚儒学,深得东莱吕氏、考亭朱子和东阳许谦之学的真传,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可以说就理学渊源来讲,戚氏家族要比朱氏家族深厚,其成就也比朱氏家族显著。而朱氏家族不仅在儒学方面有很深造诣,而且多有精通医学者,前述朱氏家族中的朱杓、朱叔麒等均是儒医皆通。本家和外家良好的学习风气和传统,对朱震亨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朱震亨一生影响较大的还有他的另一家亲戚永康吕氏家族^②。该家族的吕汲,字仲修,以乐善好施著名,“族人贫者,月有廩,年当入学者,家有塾。邻里有急必周之,岁歉为粥以食饿者,所活千百计”。但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却非常严格,“自奉乃

^①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七三《丽泽诸儒学案·戚氏家学》中《隐君戚贞孝先生绍》、《教谕戚先生象祖》、《戚朝阳先生崇僧》三条。

^② 关于吕氏家族与朱震亨家的亲戚关系,《宋元学案》谓“先生(戚崇僧)之父访其婿吕汲于永康太平山中,爱之,先生遂奉父居焉”。以此,则吕汲当与朱震亨为连襟。而黄潜《吕君(吕权)墓志铭》却说吕权“父名汲,母朱氏”。吕权13岁丧母,以此推测,吕汲当与朱震亨先为郎舅亲,后吕汲又娶戚象祖女,便与朱震亨成为连襟。

极俭薄”。吕汲的大弟吕洙,字宗鲁,曾从许谦学习,态度刻苦认真,反应灵敏。著有《周易图说》、《太极图说》、《大学辩疑》等。小弟吕溥,字公甫,曾从许谦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讲究经旨,为文落落有奇气”,其诗作语言动荡激烈,令人喜爱。其行为举动,严格按照朱子所训,家里的冠、婚、丧、祭诸种礼仪,都是一丝不苟地按朱子家礼进行。著有《大学疑问》、《史论》、《竹溪集》等等。吕汲的儿子吕权(字子义)和吕机(字审言)也都是许谦的学生,在学习上极有造诣,被黄宗羲、全祖望列名于《宋元学案》的《北山四先生学案》之中^①。

朱氏家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戚氏家族、吕氏家族与朱氏家族的密切关系和他们之间浓郁的学习氛围,在青少年时期的朱震亨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对他以后的成长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至为重要的。

童年少年 动荡不安

朱震亨的童年和幼年时期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度过的。

朱震亨出生时,虽然南宋已经灭亡5年,元朝政权已经正式建立10年,全国大形势基本稳定,但各地的局部反抗并没有停止,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经常爆发小规模起义,元朝统治者对这些起义反抗的行为又予以坚决的镇压,所以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处于武装冲突不断的状态之中。

在朱震亨出生前5年,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蒙古兵占领南宋都城临安,虏宋恭帝北去。但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为首的反抗活动一直坚持到元至元十六年

^① 《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中《吕竹溪先生溥》、《吕先生洙》、《吕先生权》、《吕先生机》4条。

(1279)二月。其他各地如坚守常州的姚嵩、陈炤,保卫扬州的李芝庭、姜才,固守潭州的李芾,死守静江的马璠等等,都是和全城军民一起英勇抗击元军,一直坚持到壮烈牺牲。

朱震亨出生后,东南方面的局部武力冲突还没有完全止息,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如至元十九年(1282)六月,占城(又名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既降又叛,元政府在江浙等处征集大批军队进行镇压。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由于元政府对江南人民政治上的歧视和经济上的剥削,不时激起人民的反抗。出现“江南盗贼相继而起”的局面^①。八九月间,广东、广西百姓又起而反抗,元政府不得不动用上万军队镇压。十月,福建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率众几十万,自号头陀军,打着恢复宋室的旗号,进攻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等县,围建宁府(今福建省建瓯市),元政府命人带数万军队镇压。二十一年(1284)二月,广西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及其周围邕宁、武鸣、隆安、扶绥等县)、宾州(今广西宾阳、来宾、上林等地)百姓黄大成率众起义,梧州(今广西梧州市)、韶州(今广东省曲江县)、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等地百姓纷纷响应,形成一股燎原之势。不久,福建漳州(今福建省漳州市)又爆发起义,波及浙江,元政府急令江浙行省发兵征讨。二十二年(1285)二月,元政府还因“江南盗贼屡起”而在江南设置行御史台以施行镇压职能。二十四年(1287)十一月,元政府诏议弭盗时,仍有大臣奏言:“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因而朝廷下令命江南四省下大力气招捕“盗贼”。二十五年(1288)四月,广东董贤等7人又聚众造反,势力迅速扩展至福建、江西的部分地区,江浙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受

^①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世宗纪九》。

到影响^①。

如果说以上的战乱对浙江的影响还不是太大的话,那么发生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三月的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杨镇龙造反,则直接使浙东地区经受了战火的洗劫。

还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四月,广东人董贤起兵造反时,就与浙江台州人杨镇龙、柳世英、循州(今广东省龙川、五华、和平、连平等县和兴宁市等地)人钟明亮等遥相呼应,各自率领一万多人揭竿而起,势力迅速蔓延到江南数省,其中杨镇龙聚兵于宁海(今浙江省宁海县),自称大兴国,占领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市)、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市),浙东为之震荡。元政府先后命令时任江浙行省丞相的蒙固岱和行枢密使伊德默色发四省兵前往镇压,均无收效。无奈之下,于二十六年(1289)四月下令:“禁江南民挟弓矢,犯者籍而为兵”^②,但仍然不起作用,杨镇龙等人的反抗一直坚持到二十七年(1290)三月,整整历时两年。杨镇龙起兵前后,朱震亨在8—10岁之间。

朱震亨出生后,父母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很小就教他读书识字。震亨天资聪敏,悟性极强,“读书即了大义”,学习音律诗赋之时,往往是拿到题后,略加思索,“刻烛而成”^③,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器重。年纪稍大一些,就被家长送入学堂,师从先生研习科举课业。

可以想象,在江南局部武力冲突不断的情况下,朱震亨的学习条件肯定不会是很好的。当时在元政府的残酷剥削下,江南

① (明)宋濂等:《元史·世祖纪》及(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盗之平》。

②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

③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四《石表辞》。

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出现倒退现象,不时发生“民鬻妻女易食”的事件。这种生活环境使幼年朱震亨过早地目睹了人世间的悲惨情况,经常因恐惧和悲伤而痛哭流泣。尤其是杨镇龙造反的中心就在浙东,朱震亨的家乡又首当其冲。元政府对杨镇龙造反的镇压手段极其残酷,而杨镇龙们的反抗也非常顽强,双方相持了好长时间。这次战争,使朱震亨家的房屋被焚毁殆尽,家中财物也被劫掠一空,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之中。从此以后,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常常是朝不保夕。战乱、病痛、贫穷、饥饿,在幼小的朱震亨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场战乱不仅使朱震亨家陷入贫困,还差点遭到灭门之祸。

杨镇龙造反被镇压之后,元政府向浙东百姓进行清算,对凡是和杨镇龙有过某种关系的人一律从严惩办,对揭发者有不同数量的赏赐。负责平定这次造反的浙东宣慰使史弼对杨镇龙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凡狱辞所引,必尽杀乃止”。当时,朱环家有一个仆人也被抓审讯。朱环过去曾因事惩罚过这个仆人,他怀恨在心,就诬陷朱环家曾经资助过杨镇龙。朱环被抓入狱,眼看着就要被拉去斩首示众。这时朱元正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只能流着眼泪祈祷上苍。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朱震亨已经出嫁的姑姑朱寿义无反顾地回到娘家,慨然说道:昔日缙萦能舍身救父,清史留名。我也是女儿,难道就不能像古人那样舍身救父吗?于是她直接求见负责审讯的法官冯耿贤,向他诉说父亲的冤枉和被家奴诬陷的缘由,请求冯耿贤查明真相,为父伸冤,也免得一家人枉做刀下之鬼。冯耿贤非常生气,大声斥责说:如此大事,岂能听你几句话就行了。坚持要按勾结强盗律给朱环定罪。朱寿毫不退缩,求告愈加哀切,终于感动了冯耿贤,对朱环一案重新审问,查明了仆人诬陷的事实,朱环无罪释放,全家人

也免做了屈死鬼^①。事后,无论是戚氏家族还是朱氏家族,都对朱寿的行为赞叹不已。

朱寿先是朱震亨的姑姑,后来又成为他的岳母。她自从嫁与戚象祖之后,侍奉公婆,孝顺有加,相夫教子,不辞辛劳。更可贵的是她过人的胆识,为戚氏家族上下所叹服。戚象祖在形势不稳,战乱频仍的时候投奔外家,居住义乌赤岸朱震亨家。不久戚象祖有事出门,杨镇龙之乱起,朱寿又带着幼小的孩子返回戚家。朱家出事以后,朱寿义无反顾,舍身相救,事后闭口不提自己的功劳,又带着孩子返回戚家,在战乱之后又帮助戚象祖重整家门,努力恢复旧日景象。

朱寿不仅是女中豪杰,还是名副其实的贤妻慈母,戚象祖晚年致力于讲学,喜欢安静,难耐喧嚣,到永康去探望亲戚吕汲时,喜欢那里山清水秀,环境幽雅,朱寿就陪着他迁徙到永康的太平山中定居。当时他们的长子戚宗仁在广西象州阳寿县龙门巡检司任职,因不习惯那里的气候环境,不久得病身亡。噩耗传来,戚象祖夫妇悲恸欲绝,象祖日夜流泣,形销骨立。朱寿也因之卧床不起,不久身亡。朱寿死后,戚象祖在受到儿子、妻子接连死亡的打击后,更是痛不欲生,不久就在为朱寿做超度、祈求冥福时死去^②。

人常说“屋漏又逢连阴雨”,这话用在年幼的朱震亨身上,真是一点不错。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震亨还不满15岁,父亲朱元因久病不愈去世,这对于这个时常经受贫穷饥饿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父亲死后,家里只剩下年事已高的祖父朱环、母亲戚氏、15岁的朱震亨和震亨的两个弟弟巽亨、蒙正,全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一一《朱环传》、康熙《金华县志》卷五《卓行·贞烈》。

② (元)黄潘:《文献集》卷八下《道一书院山长戚君墓志铭》。

家的生活重担落在母亲一人肩上,她不但要保证让朱震亨的学业不能中断,还要照顾年迈的公公和两个小儿子的生活。

朱震亨的母亲戚氏是岳父戚象祖的姐妹,嫁到朱家之后,侍奉公婆,毕恭毕敬;相夫教子,贤德温柔;操持家务,任劳任怨。杨镇龙之乱时,公婆年迈,丈夫卧病,孩子幼小,她处变不惊,恪守妇职,把家里的事情照料得井井有条。家庭受家奴诬陷时,她镇静沉着,和小姑朱寿配合默契,终于使一家人幸免于难。丈夫死后,她强压悲痛,“艰勤悲悴”,“事舅姑无怠容,遇诸子有恩而严”。有一次,小儿子和人开玩笑,拿了别人家一个鸡蛋,被戚氏知道了。她十分生气,立即严厉斥责并施之以鞭笞,命令立即将鸡蛋送还。对孩子们在学习方面的管教比丈夫在世时更加严格,“督教愈于夫在时”。戚氏的父亲戚绍有病,她将父亲接到家中,熬药进食,衣不解带地侍候了3个月,一直将父亲留养了10年。父亲死后,她不愿给兄弟添麻烦,私自出资,为父亲办理丧事。她的姐姐也嫁给朱氏家族,英年早逝,留下3个孩子。戚氏抚养姐姐的3个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毫无分别,直到男婚女嫁,各自成家。族中有个年轻女子,因家庭贫穷不能如期出嫁,戚氏就对她进行资助,使她顺利成婚。村里有些穷人家生了孩子,经常因为无力抚养而有溺婴之举。戚氏知道之后,必定要资助粮食布帛,并以伦理道德循循善诱,使之打消溺子之念。戚氏与娣姒和睦,与邻居友善,左邻右舍视戚氏如慈母。戚氏待下人有恩,且以身为规范,所以仆婢对戚氏敬畏有加,只要听到戚氏的声音,“哗者止,惰者执业以俟”。戚氏幼读诗书,学识过人,“为人言,皆有词采可称”。一生勤劳节俭,自强不息,身体健康,精神爽朗。年过八十,“犹康强不衰”。最后在87岁的时候

无疾而终^①。

学习风气和氛围的熏陶,战乱贫穷的磨砺,亲人的榜样作用,使朱震亨从小就树立了做人的目标:长大以后要做像祖父、岳父那样知识渊博的人,要做像姑母、母亲那样自强不息的人。总而言之,是要做一个有利于百姓和社会、受人尊敬的人。

血气方刚 仗义行侠

因为是长子,所以母亲对朱震亨的婚事十分重视,年方弱冠,就为他迎娶了自己的嫡亲侄女戚象祖的长女为妻,妻子长震亨两岁,本应是他的表姐。这种表姐弟之间的婚姻,使原来的亲戚关系更加亲密,但也可能给他们以后的生活埋下苦果。朱震亨23岁时,长子嗣衍出生。成家立业,初为人夫、人父,使朱震亨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成为有家庭责任的青年。

青年时期的朱震亨,骨子里既继承了祖辈和外氏家的聪明睿智和好学之风,又继承了姑母和母亲的刚正不阿的性格,所以,刚直不阿、行侠仗义成了青年朱震亨性格中的主要特点。史籍记载说他“尚侠气,不肯出人下。乡之右族或凌之,必风怒电击,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轻犯”^②。

朱震亨22岁时,元政府向江南下达了征收“包银”的命令。所谓“包银”,是元政府针对汉民所征收的赋税项目。早在蒙古太宗八年(1236),蒙古政府就定下了对汉民的征税制度,具体办法是以地、户、丁为征收对象,地、丁收米粟,户收丝料。后来因为军饷的需要,又将一年的军需经费以银两的形式征派于真定路(辖今河北所属的井陘、元氏、藁城、阜平、新乐、定、深、南宫等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〇《故朱夫人戚氏墓铭》。

②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四《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县)所属的民户,名为“包银”。蒙古宪宗五年(1255)又将这一征收制度陆续推广至全国各地,按户征收。初定每户六两,后改为四两。但因各户的情况不一,各户征收的数量也参差不齐,一般是从当地富户中征收。但地方官吏在征收过程中,常常要从中上下其手,加倍多征,给一般民户都要摊派,使之成为汉族民户的一项沉重负担。地方官员接到征收包银的命令后,急如星火,挨户催征,又要额外多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元代征收赋役的方法,是以乡里为单位进行征收,当时县设坊正,乡设里正,都设主首,这些人的职责是“专以催输税粮、追会公事”为务,“凡民有田则有役,因田之多寡以为役之高下,故为政者必视其税之所入、田之多寡,知其贫富,以为赋役之差”^①。所以百姓家庭的贫富,就成为能否承担赋役、承担多少的一个重要依据。

包银令下达时,朱震亨正好任蜀山里的里长,他仅在自己负责的民户范围内报了两户可以承担赋役的“富户”,其余民家则因为家庭贫困均无力负担包银的征交。县官一看,十分生气,把朱震亨叫到县衙,厉声责问:这不是平常的一般征收,你竟敢这样抵制,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头颅吗?朱震亨微微一笑,不卑不亢地说:您是官,当然爱惜自己的头颅了,我做老百姓的却不敢因为爱惜自己的头颅就不顾百姓的死活。如果像你那样征收,今后成为制度,势必贻害子孙。你如果一定要多加征收摊派的话,我愿意用我家的财产加倍输纳,但不能向其他百姓多征。县官虽然被朱震亨一语道破天机,十分恼怒,但面对朱震亨不屈的态度,又看到他后面有广大民户的支持,只好收回成命,按额定的数字征收。

^① 嘉庆《义乌县志》卷六《田赋》。

抗“包银”之令中额外多征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对朱震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此后的日子里，他以乡民的利益为重，处处为民请命，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事情。

县里有一个县丞，性格酷暴，又迷信鬼神，想在县衙附近修一个祠庙，祈求鬼神降福。修建祠庙当然又得向百姓征收银两，自己也好从中得些实惠。但又因顾忌朱震亨不同意，不敢正式提出，只好先在其他人面前旁敲侧击地说：人之死生是要受岳神管制的，现在我想为岳神修庙，不会有人敢阻挡吧？此话传到朱震亨耳边，朱震亨说：人的祸福生死受命于天，怎么能掌握于鬼神呢？岳神本来无知，不足为敬。即使岳神有知，那么现在收成如此不好，百姓食糠菜尚不得饱，谁能赈济百姓，使百姓得到温饱，岳神就应该降福给谁了，何必一定要从百姓手中夺钱来修庙呢？县丞一听这话，只好放下不提，百姓们又少了一笔额外的负担。

江南的各种赋税本来就重于其他地方，加之地方胥吏从中作梗，百姓往往要在原额之外，多交许多。面对这一情况，朱震亨对蜀山里的乡亲们说：大家的赋税本来就很重了，地方上的胥吏们还要上下其手，从中渔利。我们都成了胥吏们的食饵，如果大家各顾自己，就会为他们所欺，这实在不是上策啊！大家应该齐心协力，使胥吏再不敢胡作非为。大家对朱震亨的话纷纷响应。以后每当征收赋税的文书下来，众人皆“相依如父子，议事必先集”。若官府硬要横征暴敛，另外加收，朱震亨即挺身向前，据理力争，或是婉言恳求，直到官府不再额外征收为止。

县里的大员经常在春天的时候到农村“劝耕”，每次都要骚扰村民，村民对之十分气愤却又无可奈何。有一次，县里又派出大员到蜀山里“劝耕”，朱震亨知道了，就早早地来到村口，毕恭毕敬地“迎接”——实际上是把劝耕者堵在了村外。“劝耕”的官

员一见朱震亨这样,惊异地问他:劝耕本是好事,先生为什么不让进村呢?朱震亨回答说:老百姓的私田都会自己好好耕种的,不烦官府督促劝诫,倒是官府所属的公田应该好好地耕种了。原来当时公田赋重,种户大多逃亡,公田荒芜甚于私田,所以朱震亨以此相讽。劝耕的官员于是再也不好意思进村了,村民们也少了很多的干扰。

由于朱震亨勇于为民请命,在百姓中有很高的威信。慢慢地地方上的长官也对他另眼相看,有时有了大的案件也和他商讨判案的轻重或服刑的方式。每逢这时,震亨总是尽心尽力,为之剖析、开导。如东阳县有一家父子三人虐待一个百姓,差点把人打死。又将缝衣针穿在泥鳅肚子,逼那人吞下去。案发之后,交叉乌县审问。县官经过审问,判定那一户人家父子都是死罪。朱震亨认为,按照故意杀人的罪名来判,有一个人抵命就行了。两个儿子是听命于父亲的,算是胁从作案,应该从轻判处,不应该父子三人都判死罪。县官听从了朱震亨的建议,只把其父亲判了死刑,两个儿子均判监禁,给他们以自新的机会。

又有一次,张甲和李乙在一条小径上狭路相逢,李乙扛着一个利器,差点刺中张甲的眼睛。张甲非常生气,举拳直向李乙的耳朵打去,不想竟将李乙打死。按照杀人偿命的原则,张甲必须抵命。但张甲和李乙都是贫民,张甲家里还有九十老母需要赡养。如果原谅张甲的过失杀人罪,不加判罪,就有因情废法的嫌疑。但如果按照法律判了张甲的死刑,立即处决,张甲的母亲将会因无人赡养而死,李乙的尸体也将暴露于野,得不到及时埋葬。经过反复考虑,朱震亨认为张甲是过失杀人,可以死罪改判活罪,改为缓刑。先让他埋葬李乙的尸体,使死者入土为安。然后再让他回家奉养老母,等老母百年之后,再来服刑。有人说,如果这样,张甲逃走了怎么办?朱震亨说:不会的,你如果对他

以诚相待,他肯定不会逃走的。于是知县采纳了朱震亨的建议,以张甲过失杀人为理由,将斩首改判为监禁。责令他先埋葬李乙的尸体,再奉养老母,然后回来服刑。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像朱震亨所说的那样。张甲在埋葬了李乙、侍奉母亲百年之后,如期来到监狱服刑。使这起“情”和“法”冲突的案子得到很好的解决。后来遇到大赦,张甲因认罪服刑态度诚恳而得到赦免。

朱震亨不但善于分析案件,帮助知县作出合理的判决,同时也善于调停,尽量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一次,有个村民偷伐了朱震亨祖坟上的树木,朱震亨询问情由,村民抵赖不服。朱震亨十分生气,要报告官府按偷盗罪处理。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责备这个村民,说朱先生是仁人君子,你为什么要侵犯他呢?那个村民也很懊悔,就请教大家现在该怎么办?有人告诉他,朱先生是宽宏大量之人,你赶快把木头送到他家,说明情况,他一定会原谅你的。那个村民按此人说的做了,朱震亨果然原谅了他,以后再没有提起这事。

还有一次,朱震亨客居外地的一个寺院中,院中老尼用木头刻成小人,以为厌蛊(古代的一种巫术,诅咒别人或压制、制止其他人或物对自己的侵害),被另一个借宿的客人陈庚发现,陈庚非常生气,要向官府举报老尼。按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这种做法有诅咒当局之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老尼非常害怕,就去恳求朱震亨相助。朱震亨安慰老尼不要害怕,然后想出了一个方法:他先找借口约陈庚出去,让老尼趁机将木人打碎焚毁,不留痕迹。陈庚回来一看没有了小木人,非常生气,破口大骂。朱震亨解劝说:你我都是在外之人,先生又是士人出身,在吴楚之间落下这个名声,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你如果缺乏资财的话,我所带的钱财你尽可以拿去用,就不要为这点小事生气了。陈庚一听,顿时释然,同意不去官府举报了。事后老尼要以金帛感

谢朱震亨，震亨力辞而去。

朱震亨仗义执言、与人为善的事迹在地方上广为流传，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地方官员和上司派到义乌办事的官员，听到朱震亨的名字，都想和他结交，而且都有荐举他出仕的想法。每逢这时，他总是极力推辞，婉言谢绝。只有在说到百姓疾苦的时候，他才会皱着眉头，把老百姓的苦处一一向官员陈述，希望他们能为民请命，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

一次一个姓郑的官员来到浙东，尤其敬重朱震亨的为人，就以接待贵宾的礼节相见。不料这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跑到这位官员面前说朱震亨的坏话。这位官员听了后笑着说：朱先生在我面前盛赞你们的好处，而你们却跑来说他的坏话，为什么人的度量大小如此悬殊呢？那些人听了这话，都惭愧得说不出话来^①。

可以说青年时期的朱震亨，不但在学习经学、辞赋音律方面卓有成就，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满腔热诚，一身正气。但以后的人生道路到底怎么走，他还没有做更深层次的考虑。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朱震亨 27 岁，江浙行省所辖范围之内，频频遭受水旱灾害的袭击，到了第二年灾情更加严重。

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正月开始，绍兴（今浙江省绍兴市）、台州、庆元（今浙江省宁波市）、广德（今安徽省广德县）、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镇江（今江苏省镇江市）等六路饥荒相交，有很多老百姓开始因饥饿而死，据地方官府的不完全统计，当时遭受饥饿威胁的百姓有 40 多万户。由于饥饿而盗贼横生，有很多百姓被迫下海求食，沦为“海盗”，被元政府捕杀。而“海盗”人数的不断增多也使得江浙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

^① 以上事迹皆见宋濂：《石表辞》。

坏 经常处于一种混乱骚动的状态之中。到了六月 ,灾情不断扩大 终于蔓延到全省范围 ,因饥饿致死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九月 随着饥荒程度的加重 ,瘟疫也跟着流行起来 ,死亡的人数更多了。出现了“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 ,夫鬻其妻 ,哭声震野”的情况^① ,其悲惨之状令人不堪睹闻。

虽然幼年时期经受过战乱的折磨 ,但这样大的灾情和灾民如此大规模的死亡 ,朱震亨还是第一次面对 ,内心产生的震撼不言而喻 ,他深感光靠行侠仗义、替百姓说说话 ,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但并不能对百姓有更多的帮助。面对着一个个熟悉的人的死亡 ,他悲痛而又自责 ,他恨不得以自己的生命去代替他们。于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开始进行比较深刻的思考 ,这就是怎么样才能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切切实实地减轻他们的痛苦 ,使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① (明)宋濂等 :《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

第二章

科场失意 弃学就医

理学和医学,看似两个不同的领域,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精研理学走仕进之路,可以治理国家,造福黎民;而高超的医术则可以治人疾病,解救危难,同样可以造福苍生。自从范仲淹“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宏愿被人传颂后,宋元时期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把良相和良医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很多人良相的愿望破灭之后,即把目标转移到医学上来,为成为一名良医而努力,最后在医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朱震亨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突出的一个。

为治母病 初涉医学

经受了连岁的饥荒疫病之后,朱震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行为。他感到过去的急公好义、行侠助人的生活,虽然为乡民们做了一些好事,受到乡民的推崇,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法。自己的人生应有一个更大的抱负。这时,他听说金华有名的儒学大师许谦在东阳县的八华山讲学,慕名从学者不啻千百,于是也萌生了奔赴八华山师从许谦学习的想法。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得到祖父和母亲、妻子的同意。就在他整顿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健康的母亲突然患

病，朱震亨不得不放下已经打点好的行李，在家侍奉母亲，这年朱震亨刚到而立之年。

震亨的母亲戚氏，自从嫁到朱家，可以说饱经忧患，而身体却一直硬朗康健，没有什么疾病。但在51岁之时，突觉身体不适，接下来是手足关节疼痛异常，行动不便，呻吟之声，不忍于闻。虽然请了许多医生，但都解除不了母亲的病痛。有时吃了药暂时见轻，但没过几天，疼痛依旧，而且是白天稍轻，晚上加重。致使母亲常常晚上席不安寐，辗转反侧，疼痛难忍。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听着母亲痛苦的呻吟，朱震亨夫妇焦急万分，恨不得以自己的身子代替母亲。对于朱震亨母亲的疾病，后世的医家持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朱震亨《格致余论序》有“震亨三十岁时，因母之患脾疼”和戴良《九灵山房集》中“翁以母病脾，于医亦粗习”的记载，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震亨母亲患的是“脾”疼或是脾胃疼。但根据江南的气候状况、朱震亨以后对风痺症状的精辟见解和治疗经验，结合何永生对朱震亨母亲疾病的考证，以及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教授李戎主编的《中医药通假字字典》中“脾”通“痺”的解释，似可认为当时朱震亨母亲所患之病为江南易发的风痺病而不是脾胃病^①。

因为风痺病和流行于江南的另一种疾病——痿病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有的医生就用治痿病的方法来治疗震亨母亲的病。由于治不对症，尽管请了许多医生，都没能对朱母的病作出准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时间一天天过去，母亲的病痛并没有好

^① 何永生文章《丹溪母病考》，发表于《医古文研究》2005年第1期。李戎编著的《中医药通假字词典》中对“脾”的解释全文是：“‘脾’通‘痺’，‘心脾’即‘心痺’，病名。《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太素·阴阳杂说》‘脾’作‘痺’，杨上善注‘阳明所发，心痺等病也’。‘脾’通‘痺’”。转引自何永生文。

转,尽管医生们还是进进出出,来往反复,但母亲的病情依然没有丝毫的减轻。

朱震亨作为儿子,侍奉病中的母亲自然是尽心尽力,几乎是衣不解带,食不甘味,但却无法解除母亲的痛苦。看着母亲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的内心既痛苦又自责。回想起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独立支撑家业,侍奉公婆、哺育孤幼,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他们兄弟抚养成人。如今母亲有难,自己却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经受病痛的折磨,还讲什么恪守孝道呢?这时他又想起金代著名医生张子和所著的《儒门事亲》一书,这是一本医学著作,是张子和平时诊治病人的经验总结和对医学理论的阐释,之所以叫做《儒门事亲》,其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只有儒者能明白事亲的重要,其二是事亲者应当具备医学知识,这样才可以及时解除亲人的病痛。自己虽然孝心可鉴,但不懂医学,不能亲手解除母亲的病痛,其孝心又如何体现呢?于是他想,既然医生们解除不了母亲的病痛,那何不自己钻研医书,亲自为母亲诊断治疗呢?于是,不知不觉间,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朱震亨心中形成了:那就是抛弃以前所学的音律之学,专心向医,解除母亲的痛苦。

中国古代的医学主要是中医,一般学医的经典读物就是《黄帝内经》和《难经》两书。《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典籍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文献。它存世久远,内容丰富,理论完备,并全面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成功地运用我国古典哲学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合理内核作为思想指导,广泛汲取古代天文、地理、气象、物候以及社会伦理学各方面的知识,开创并建立了中国医药学自然与人事相参同的医学科学体系,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内容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各9卷81篇。其中《素问》以论天地阴阳,脏腑诊治,病因症证,运气摄生

为主；《灵枢》以经络灸刺、谈天象合人事见长。

《黄帝内经》约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相传是黄帝所作。其实是假托黄帝与岐伯的问答形式写成，非一人一时之作。书中以人与自然的统一观、阴阳学说、五行说、脏腑经络学为主线，具体论述摄生、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治则、药物以及养生防病等各方面的关系，集医理、医论、医方于一体，涉及了《五色》、《脉变》、《上经》、《下经》、《太始天元册》等 20 多种古代医籍，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医书的集大成者。

从春秋战国到宋元时期，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余年的时间，《黄帝内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曾经几次散佚，然后又被整理成帙。到朱震亨时，社会上流传最好的版本，当推北宋仁宗时期校正医书局主要校正者林亿所整理的本子。

从林亿整理注释《黄帝内经·素问》到朱震亨时，又是 250 余年过去了，该书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散佚。由于该书语言简练，意义深远，再加上流传日久，错简衍文迭出，所以读起来很不容易。朱震亨虽然从小学习音韵训诂和声律之学，具有良好的古文基础，但对医学却是初次接触，所以初学之际，难度很大，似通非通，茫然懵懂。但他为了能治好母亲的疾病，毫不懈怠，反复诵读，精心揣摩，从祖朱叔麒也不时对之进行指点。这样刻苦钻研 3 年之后，终于有所收获，对医学方面的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基本上掌握了。

朱震亨 33 岁的时候，从祖朱叔麒因病逝世。前面已经说过，朱叔麒不仅精通理学，同时也精通医学，并且医德高尚。在朱震亨开始学医时，他曾给予很多的启迪和指导，使朱震亨对医学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朱叔麒的去世，使朱震亨在思想上和学习上都不同程度受到一些影响，但也更加坚定了他继承叔祖遗志，从医学医、济世救人的决心。

朱叔麒去世后,朱震亨仍然埋头钻研医学典籍。这时候,他不光是精研医书,而且也敢于不断探索,慢慢地开方治病了。对母亲的病情,他一直予以密切的关注,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都不放过,方剂换了一个又一个,每次都有一定的进展。苍天不负有心人,在经过两年时间的细心观察、精心照料和反复治疗之后,终于在朱震亨 35 岁的时候,母亲的病痊愈了,母亲的身体健康了。这对朱震亨来讲,不啻是天大的喜事。虽然他的医术还处于探索和学习阶段,但这一成就足可激励他一生了。

追随名师 精研义理

母亲病好之后,朱震亨又萌生了去八华山师从许谦学习理学的愿望。

理学是两宋学者所创建的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它的最本质特征是思想体系上以“理”作为宇宙的最高本体,同时又以“理”作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学说的特征突出一个“理”字,所以称为“理学”。

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道学”、“宋学”等,也和学说的形成、发展和特征有关。说它是“新儒学”,是因为理学虽然是从先秦秦汉时期的儒学脱胎而来,是以儒家所倡导的礼法和理论为其学术的核心,但先秦秦汉时期的儒学所张扬的孔孟之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过去的儒学相比,面貌已焕然一新,所以被称之为“新”儒学。称之为“道学”,是因为宋儒自己认为他们的学说继承了自古到今圣人的“道统”,并宣称他们的学说是以“明道”为目标,所以称为“道学”。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及他们的门人的传记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中。称为“宋学”则是相对于汉代儒学而言,清代学者推重汉儒,攻击宋儒,所以以“汉学”、“宋学”称之,

以示区别。

宋代理学是在两汉儒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衰落之后,在晚唐士人提倡儒学文化复兴的潮流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历了“开创”与“奠基”两个时期,终于创建而成的。其创始者为北宋湖南营道(今湖南省道县)濂溪人周敦颐,他在其代表作《太极图说》中建立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并从中推导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在另一本著作中,周敦颐依据《易》与《中庸》的理论,突出了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信”,以“诚信”作为道德伦理的最高境界。周敦颐的思想理论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他以后的理学各家尽管在思想认识上有所不同,但在修养论上从未离开过“主静”、“节欲”和“诚信”这条途径。

继周敦颐之后,洛阳的邵雍、程颢、程颐,关中的张载等人,又对理学有了不同程度的发挥。

邵雍长于象数之学,但又不专讲象数,其代表作《皇极经世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表面上看,这应是一部象数卦命之书,但其实含义深刻。所以他自己也说本书“亦不专于象数,如云天下之事,始过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又云“学以人事为大”。又云“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又云“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所以《四库全书》的作者说它“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

之言,固非讖纬术数家所可同日而语也”^①。邵雍在通过象数总结历代兴亡的过程中将人的欲望和周敦颐所说的性、理对立起来,为后世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理论开辟了道路。

程颐、程颢兄弟为周敦颐的学生,邵雍的晚辈,是理学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建立论理体系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天理”观念的提出,虽然“天理”一词的提出最早并不是程氏兄弟,但正如程颢所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②“天理”一词经二程提出,朱熹推演发扬,就成为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精神本体,也成为理学的核心,也是宋明儒学被称为“理学”的重要原因。由于程氏兄弟是洛阳人,所以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洛学”。

张载是陕西关中人,后人称他的学派为“关学”,张载的理论核心是“气一元论”,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自然形成、万千变化、动静聚散、生死存亡的本体,舍此以外,别无其他。同时,他也十分关注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的孔孟之道的重新构建。张载在其代表性著作《西铭》中反复论证天地、乾坤、父母的关系,论证天地之性和人性的一体和区别,也为朱熹“格物致知”理论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以上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在北宋理学的创建和发展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后人称之为“北宋五子”。

北宋以后,南北分治,北方学术式微,理学的传承也由北而南,浙东便成为南方理学的重镇。

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为朱熹,他与张栻、吕祖谦二人,共同对北宋理学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开创了南宋理学的新局面。这

① (清)纪晓岚:《皇极经世书提要》,见《四库全书》子部七《术数类一》。

② (宋)朱熹:《二程外书》卷一二《传闻杂记》。

三人都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学者，被称之为“东南三贤”。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南宋安徽新安郡(今安徽省歙县)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曾任职泉州同安县主簿、枢密院编修官、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等。在任期间，恪尽职守，关心民瘼，“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利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被当朝皇帝称为“政事却有可观”之人。朱熹登进士第50年，但为官时间并不很长，“仕于外者仅九考(每考三年，九考二十七年)，立朝才四十日”。又因其为官清廉，所以家庭贫困，曾先后徙家于福建之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南)、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市)之考亭(今福建省建阳市西考亭村)等地讲学，虽贫而为学不辍。“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朱熹理学学说的核心是“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朱熹死后，朝廷将他对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的注释训说立于学宫。又将其未脱稿的《仪礼经传通解》也置之于学宫，供师生研读。朱熹一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①。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四川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市)人，南宋贤相张浚之长子。以父荫补右承郎，先后任严州(今浙江省建德市)、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静江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传三·朱熹传》。

(今广西桂林市)知府和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区)知府,曾在朝任侍讲官。绍兴三十一年(1161)于碧泉书院从胡宏受业,曾创建善化(今湖南省长沙市)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张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为学以宋代理义之学为基础,提出了完整的德治思想。他以理义之学作为治理天下的理论根据,主张君王实行德治,要正君心,要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权利,要以德为本,以刑为辅。著有《南轩易说》、《孟子说》、《论语解》、《南轩文集》等^①。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金华(今浙江省金华市)人,出生于世代诗礼簪缨之家。八世祖吕蒙正,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吕公著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五世祖吕希哲、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弼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且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吕祖谦先以荫入仕,后登进士第,曾任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其为学主要以关学、洛学为宗,而又旁稽载籍。继承了吕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在理学钻研上出类拔萃。为人心平气和,不立崖异,曾为了缓和朱熹与陆九渊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导致的紧张关系而主持召集了有名的“鹅湖之会”,成为当时学术上的盛事。吕祖谦一生著述众多,有《古周易》、《增修东莱书说》、《吕氏家塾读诗记》、《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续说》、《大事记》、《大事记——大事记通释》、《大事记——大事记解题》、《近思录》、《少仪外传》、《历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传三·张栻传》。

代制度详说》、《东莱集》、《宋文鉴》、《古文关键》等^①。

继“东南三先生”之后，东南理学的传承，主要得力于被学界誉为“北山四先生”的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

何基（1188—1269），字子恭，婺州金华（今浙江省金华市）人。在四先生中年岁最长，因其直接受业于朱熹的高足弟子黄榦，故全祖望《宋元学案》列其名于“勉斋之学”条下，是朱熹的最忠实的信徒。其门人王柏在《启蒙发挥后序》中说他“晚年纂辑朱子之绪论，羽翼朱子之成书，不敢自加一字，而条理灿然，群疑尽释。至于引本义之彖辞，参于变占之后，使千百年离而未合者，两无遗憾。真有所得于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深旨”^②。何基一生，曾多次被征召，均辞而不就，晚年曾任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赐谥文定，学者尊称为“北山先生”。所著有《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等^③。

王柏（1197—1274），字会之，婺州金华人。理学世家，其祖父为宋代著名学者杨时的学生，师从杨时研读《易》、《论语》，后又从朱熹、张栻、吕祖谦等学习。父亲官为朝奉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兄弟几人都曾师从朱熹和吕祖谦学习。王柏曾跟随朱熹的门人学习理学，有人告诉他何基曾师从黄榦得到朱熹学说的真传，于是投奔何基门下为徒，何基为之授受立志居敬之旨，并为之作《鲁斋箴》以勉励之。王柏学习，十分刻苦，凡有疑义，一定要问清楚。对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等书的标注点校，尤其谨慎精密。王柏事何基，为朱熹的再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三四《儒林传四·吕祖谦传》。

②（宋）王柏：《鲁斋集》卷五《序》。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三八《儒林传八·何基传》。

传门人，是考亭之学的忠实信奉者，但却不拘成规，有所发明。所著有《读易记》、《涵古易说》、《大象衍义》、《涵古图书》、《读书记》、《书疑》、《诗辨说》、《读春秋记》、《论语衍义》、《太极衍义》、《伊洛精义》、《研几图》、《鲁经章句》、《论语通旨》、《孟子通旨》、《书附传》、《左氏正传》、《续国语》、《闾学之书》、《文章复古》、《文章续古》、《濂洛文统》、《拟道学志》、《朱子指要》、《诗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尔雅》、《六义字原》等^①。

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婺州兰溪人。本姓刘，后因避讳改姓为金。履祥聪敏好学，知识面宽，“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师从何基门人王柏专攻理学，首先问之以为学之道。王柏告诉他学习一定要先立志向，并转告他先辈在这方面的教诲：“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后来又见到王柏的老师何基，何基又对他进行为学之方的教育。当时人们评价何基是清介纯实，王柏是高明刚正，金履祥同时得到二人的教诲，也同时具备了二人的长处。且具有大胆的怀疑和创新精神，是北山四先生中成就最著的一位。因履祥居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为仁山先生。大德(1297—1307)中卒，元统(1333—1335)初祠于乡学，至正(1314—1368)中赐谥文安。著述有《尚书表注》、《大学疏义》、《论孟集注考证》、《论孟集注考证——论语集注考证》、《论孟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资治通鉴前编》、《资治通鉴前编——资治通鉴前编举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仁山文集》等^②。

许谦是金履祥的门人，和元代北方著名的学者许衡齐名，号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三八《儒林传八·王柏传》。

② (元)脱脱等：《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一·金履祥传》。

称“南北二许”。在继承和弘扬理学传统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是金履祥以后宋元时期东南地区理学最重要的传人,被学者尊称为“白云先生”。

许谦(1269—1337),字益之,祖先为京兆兴平(今陕西省兴平市)人。后因家族中有人在南方做官,迁居于吴之平江(今江苏苏州市)。9世祖许延寿,为宋刑部尚书。8世祖许仲容,为太子洗马。许仲容有两个儿子许洸、许洞,许洞进士出身,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时。许洸之子许寔,师从宋代著名教育家胡瑗为学,始由平江徙居浙江婺州金华县,到许谦时已经在金华传了5世。许谦的父亲许觥,为南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进士,任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许觥经学传家,才华过人,可惜还没来得及在仕途上展示才干,就英年早逝了。许谦是许觥从兄许暄的次子,因许觥逝世时尚无子嗣,于是就以许谦作为许觥的继嗣。

许谦天资聪敏,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母亲陶氏就给他讲解《论语》、《孝经》中的内容,入耳不忘。5岁开始从师学习,态度庄重如同成人。年龄稍大,即自己规定学习内容,“取四部书分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后来又受业于兰溪金履祥,尽得金履祥之学。

许谦读书面广,又善于钻研,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穷探圣微,虽残文美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许谦读书,往往有感而发,将读书所得付诸笔墨,如他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就著有《读四书丛说》20卷,论述研读《四书》的要义。读朱熹《诗集传》之后,著有《诗集传名物钞》8卷,纠正书中的音义注释,考证书中的名物制度,以补充先儒著述的不足之处。读蔡沈《书集传》之后,著有《读书丛说》6卷。阅读史书之后,著有《治忽几微》,以

编年体的形式,总结从上古到北宋司马光去世时期历史的治乱得失。许谦治学极其认真,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元代赵仁举、吴师道先后对唐樊宗师的《绉守居园池记》进行注释,但许谦认为两家的注释都还有其未能尽善尽美之处,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番注释,直到满意为止。

不光是精通理学,著述丰富,许谦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除理学著作外,还著有《自省编》,“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者,则不为也”。除上述外,许谦在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等方面,也是无不贯通。甚至对于佛、道典籍,也是洞其底蕴、探其幽微,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为了便于人们阅读,许谦还对《九经》、《仪礼》及《春秋三传》等儒家典籍进行断句,“于其宏纲要领,错简衍文,悉别以铅黄朱墨,意有所明,则表而见之”。后来许谦的学生吴师道购得南宋婺学的开创者、著名理学家吕祖谦所点校的《仪礼》和许谦标点后的本子进行比较,只有13条不同之处,可见许谦和吕祖谦对经义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许谦虽才学出众,但态度谦虚不事张扬,他写诗文,如果不是和解释经典、弘扬经义、宣扬教化有关的,就不肯轻易动笔。

许谦31岁的时候,听说金履祥在兰溪开门讲学,前去投奔,受到金履祥的器重,遂不拘常规,让他跻身于弟子之列。金履祥曾告诉许谦说:“儒家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也就是说理学的基本原则不变,但在具体运用上则各不相同。于是许谦特别注重理学在实际中的不同运用,然后再统一到理学的根本原则之下。金履祥还告诉许谦说:“所谓的圣人之道,就是不偏不倚,取中而已。于是许谦无论是在探究理学真谛和为人处世方面都是事事求中,无不及也无过当之举。

金履祥去世以后,许谦在学问上更加刻苦钻研,将老师的学

说发扬光大。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做学问“不胶于古,不流于俗,介而不骄,通而不随,身在草莱,而心存当世”。把学问和社会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吴越之间普遍遭灾,庄稼无收,百姓饥馑于道。许谦家是当地大户,虽岁歉,也还不至于有饥饿之忧。但许谦却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而形容憔悴。有人问他:“先生难道也没有粮食吃吗?”许谦说:“虽然家中尚有粮食,但目前公私匮竭,道殣相望,我能一个人安心吃饱吗?”地方官员知道了许谦的名声,曾多次推荐他出来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后来,为了避开尘世的喧嚣,他隐居于东阳县的八华山中,授徒讲学^①。朱震亨就是在许谦讲学八华山之后不久去拜其为师的。

一年以后,许谦兄长许璟的儿子去世,全家悲痛不已。为了安慰兄长,许谦离开八华山,回到家中继续讲学。四面八方前来求学的人更多了,“远者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都是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受业,风气之盛,轰动一时。朱震亨自从八华山拜许谦为师以后,就一直追随在老师身边。

许谦的教学内容,“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以为己为立心之要,以分辨义利为处事之制,至诚淳悉内外殚尽”。他把授徒讲学看成最大的乐事,曾经对人说:自己已经知道了所学的道理,让别人也知道,不是很快乐的事吗?他对学生尽心尽力,有的学生在请教的时候,由于心情紧张或表达能力差,说话往往词不达意,许谦就用自己的话将他想讲的话讲出来,并且为他解释疑惑。每天和学生探讨经义,终日不显疲倦之容。在讲学中,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且又平实易懂,往往能取

^① (元)黄潘:《文献集》卷八下《白云许先生墓志铭》、《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一·许谦传》。

得良好的效果。听了他的教诲之后,学生们的精神面貌和行为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情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约之”,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许谦开门讲学40余年,见于著录的学生有1000多个,“随其材分,咸有所得”。就连那些达官富人之子,在许谦面前,也是“骄气自消,践庭而礼容自饬”。

许谦不但将知识无私地传授给学生,并且身体力行,为学生作出榜样。他事父母至孝,事兄长至恭,事亲戚至友。他由于从小过继,亲生父母又过早去世,未能在他们面前竭尽孝道,就在侍奉养父母时尽心尽力,无微不至。哥哥许璟性格刚严,不苟言笑,儿子去世以后性格变得更加孤僻,一般人很难接近,但许谦侍奉他一直是毕恭毕敬,使得兄弟情谊怡然和煦。他的姐姐家庭贫困,有两个孩子但却无力抚养,许谦就将他们接到自己家中,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抚养教育他们,终身钟爱,绝无二致,直至他们成家立业。其实许谦的家境也并不富裕,尤其在他晚年生活更加拮据,以至于“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①,但他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能够师从这样的老师进行学习,是朱震亨最大的愿望。所以在母亲病愈之后,他一刻也不停留,迫不及待地“抠衣”前往,直奔许谦讲学的东阳八华山而去。这一行动对于已近不惑之年的朱震亨来说,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朱震亨师从许谦学习的时候,许谦48岁,而震亨已36岁,但他从来不以自己年龄和许谦接近而有丝毫的懈怠和不恭之意,当他聆听了许谦关于“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等方面内容的讲解之后,回忆起以前的一些做法和亲身经历,不觉汗如雨下。从此他一改过去的年轻气盛行侠仗义的浮躁作风,专心

^① (元)黄潘:《文献集》卷八下《白云许先生墓志铭》。

致志地精研理学典籍。自从到了八华山之后,朱震亨每天昼夜苦读,废寝忘食,读后又认真思索,领会其中深刻含义,并在行动上身体力行。对于书中所讲的天理、人欲的界限,诚实、虚伪的区别,一定要分辨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在自身行为上更是严格实行,不允许有一点与书中教诲不符的地方。后来宋濂在记述他这一段学习生活的时候,说他经常是“每宵挟册坐至四鼓,潜验默察,必欲见诸实践。抑其疏豪,归于粹夷。理欲之关,诚伪之限,严辨确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①,确实是非常符合当时实际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觉得自己心胸洞开,融会贯通。当时,一起师从许谦学习的亲友还有戚象祖的儿子即朱震亨的妻弟兼姑表兄弟戚崇僧,永康吕氏家族中的吕权、吕机以及他们的叔父吕洙、吕溥,这些人后来都在理学上有所成就,但却公推朱震亨为许谦的高足弟子。

连举两次 科场失意

还在朱震亨潜心攻读《素问》,深究医学、立志为母亲治病的时候,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元朝政府颁布了一项令汉族知识分子心情振奋的诏令:这就是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开始,恢复隋、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比较客观相对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从隋朝开始设立进士科到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至宋代达到成熟完善的地步。科举制度从兴起到完善,打破了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给广大知识分子走上政坛开辟了一条通道,也是士人入仕的最直接、最主要的途径。

元朝政府自建立之后,由于整个民族本身的文化素质比较

^① (明)宋濂:《石表辞》。

低下,所以一直没有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一直依靠世袭和荐举。这样世袭和荐举出来的官员多是蒙古贵族的后裔,普遍文化程度较低,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有时还闹出了许多笑话,影响了元政府对地方的有效统治。虽然一些官员一再提出恢复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但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如蒙古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八月,中书令耶律楚材曾经建议朝廷“请用儒术选士”,得到窝阔台的首肯。九月,朝廷下诏命断事官术忽剌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主持各路考试。考试内容为论、经义、辞赋三科,分三天考完。对被选中的人实行优惠政策,“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这次考试选中的东平路(今山东东平、东阿、汶上、阳谷、平阴等地区)杨英等人,都是当时才俊之士。这是蒙古政府自建立以来第一次以儒学取士。但由于只是在地方上进行,没有经过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考试,所以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举考试。这次以儒学取士的结果,可能是对蒙古人不利,所以不久就因为“当世或以为非便”而作罢。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曾命丞相史天泽分条具奏当前急需实行的重大事,史天泽的奏疏中曾言及科举之事,没有实行。到了至元四年(1267)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人又提出实行科举制,得到了皇帝的认可,立即命令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讨论订立考试程式,又决定设立国学选拔蒙古贵族后裔入校学习,以备应考。并于至元十一年(1274)十一月把所定的程式呈于太子审批,太子命令“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但又因故未得到实行。又过了10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又请求实行科举取士之制,继而国子祭酒许衡也提出开办学校和实行科举之事,朝廷决定“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虽然这几次都没有完全实行科

举考试,但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又提出实行科举之事,仁宗遂于十一月正式下诏,命从第二年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并颁布了科举考试的有关规定:

其一,考生来源:参加考试人员从一般民户中推举,只要是年龄25岁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都可以参加考试。如有在推举过程中徇私舞弊者,或是已经推荐却不参加考试者,都要责成监察御史和肃政廉访司严肃处理。

其二,考试内容:在考试内容上,实行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区别对待的方法。考虑到文化程度的差异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在考试内容和录取要求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同等标准,汉人和南人同等标准。

其三,录用程序:首先从全国各地的乡试中选300名合格者(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75名)由地方政府发给相关凭据,并上报礼部备案,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京城参加会试。通过会试选取100名合格者(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25名)参加殿试,全部录取选用: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

其四,考试时间:每三年一次考试,乡试于八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六日结束。共三场,分别于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举行。会试于乡试次年的二月初一日到初五日举行,也是三场,分别于二月初一、初三、初五日举行。殿试于三月初七日举行,决定考生最终的命运。

其五,考官人选:乡试由行省与宣慰司及腹里各路的行台与廉宪官,与台宪官一同商议考官人选。从省部选差在内监察御史、在外廉访司官一员监试。每处差考试官、同考试官各一员,

并于现任并在闲有德望文学常选官内选差。封弥官一员、誊录官一员,选清廉干练的文职官员充任。誊录试卷并行移文字,均用红色,严防营私作弊。会试考官由中书省推荐选拔知贡举、同知贡举官各一员,考试官四员,监察御史二员,弥封、誊录、对读官、监门等官各一员。

另外,还规定了有关的考试纪律^①。

延祐元年(1314)八月,朝廷如期进行了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延祐二年(1315)春二月到三月,经过会试和殿试,选取了护都答儿、张起岩等56人进士及第,并分别授予官职。

对于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皇庆二年(1313)的这道诏令及延祐元年(1314)、二年(1315)两年所进行的乡试和会试、殿试,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和巨大的鼓舞,这意味着他们在异族统治下长期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利和话语权又要恢复了,又可以通过努力步入政坛,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就在朱震亨从许谦学习的第二年,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第二次科场考试开始了。37岁的朱震亨在祖父和家人的期望下,也报名并被推荐参加了乡试。按朱震亨的品德和才学,通过乡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八月份参加完乡试之后,朱震亨就开始做下一步参加会试的准备。谁知等待的结果,竟是希望的破灭:朱震亨在乡试中落选,自然也就失去了进京会试的资格。

朱震亨的祖父朱环亦为当时有名学者,曾中宋宝祐六年(1258)乡贡进士,当时他考虑自己已年近六十,感到再继续走仕进之途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朱元身上。朱元虽然身体多病,但学识不凡,在当时也称得上是饱学之士。谁

^① 以上见《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序》。

知天不假年，朱元竟在父亲 65 岁的时候先他而去。老人只好强忍悲痛，将希望寄托在长孙的身上。希望他能继承并发扬朱氏家族的传统，在科举上有所成就，以光其祖，以耀其宗。但元朝建立之后，并没有像宋朝那样举行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而是采用举荐和世袭的办法，广大汉族知识分子，自然失去了仕进的门路，所以老人也就心灰意冷了。恢复科举考试之后，老人心中的希望之火重新燃起，希望长孙能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使朱家在几十年的衰落之后重新崛起。对于长孙的人品学问，老人心中有数，认为他中第应当不会有多大问题。谁知参加乡试，就出师不利，遭受挫折。老人受不了这种打击，在消息传来后不久即含恨去世。

朱环的去世，对朱震亨的打击很大，虽然他也明白祖父已经 86 岁高龄，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高寿了，这时去世也没有什么遗憾。但令他伤心的是祖父恰好是在自己乡试不利的消息传来之后走的，心里肯定留下了许多遗憾。虽然祖父什么也没有说，但他从祖父临终的眼光中还是读懂了一些。于是在第一次乡试失利后他并没有灰心，而是继续努力，希望这一科的遗憾能在下一科得到弥补。

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在潜心攻读 3 年之后，第三次科举考试又如期进行了。朱震亨自以为自己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苦读了 3 年，步入科场、金榜题名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于是他踌躇满志，又参加了这次考试，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也许老天是在刻意和朱震亨开玩笑，也许是上天早就对他的人生做了安排，朱震亨的第二次乡试，又以失败告终。消息传来，朱震亨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也不相信自己这次又遭落第的事实。但现实是无情的，不容他有过多的幻想，也不可能再有奇迹发生，他确实是被黜退了，乡试入选的名单上真的没有他的名字。这一

年朱震亨 40 岁 , 进入不惑之年 , 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路程。

弃学就医 疗师痼疾

朱震亨两次科场失意的过程 , 都被老师许谦看在眼里 , 记在心里。

许谦是一个矢志为学、淡泊名利的人 , 在他的为学和从教生涯中 , 元政府曾多次征召 , 都没有使他动心。

一次是在大德十一年(1307)之后 , 许谦在乡间声名鹊起 , 浙东地区的长官不了解许谦的生平志向 , 贸然以他为府掾 , 许谦婉言谢绝没有赴任。不久 , 浙东廉访肃政司使臣刘庭直又以茂采异等的名义举荐许谦入朝任职 , 副使赵宏伟也以遗逸之名进行举荐 , 许谦仍然都是坚辞不就。后来赵宏伟回到大都 , 又精心准备馆舍 , 诚心欢迎许谦到大都去 , 目的是为了众多的朝廷官员和士人以许谦为榜样 , 不断精研理学 , 提高文化水平 , 加强道德修养。许谦听了赵宏伟的目的之后 , “欣然为之而起”。到了大都以后 , 他按照赵宏伟的安排先后和一些官员、学者见面 , 并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 ,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很多人又要求许谦就在京城任职 , 不要再回到江南。许谦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挽留 , 没有逗留多长时间 , 很快就回到家乡。为了绝意仕进 , 就以眼睛有病、疲于应付为由到八华山开门讲学。

第二次是许谦从八华山回到家中讲学以后 , 名声更大 , “四方之士 , 无贤不肖以不及门为耻。缙绅先生至于是邦 , 必即其家存问焉。或访以典礼政事 , 先生观其会通而为之折衷 , 闻者无不厌服”^①。当时江浙行省的各位官员如王士熙、耿焕、王克敬、郑允中、李端、吴焘、赵天纲、陈思谦、赵仲仁等先后将他的行为声

^① (元)黄潘 :《文献集》卷八下《白云许先生墓志铭》。

望上报朝廷，曾经主持乡试的官员曹鉴、杨刚中也将许谦的名字报到行省，行省再行荐举，许谦终不为所动。后至元元年（1335），元政府举行第七次科举考试，朝廷欲请许谦担任主考官，也被他婉言谢绝了。

许谦自己平时“素志冲淡，以道自乐”，对学生则尊重他们的意愿，他的学生中进士出身的不在少数，所以朱震亨两次参加乡试，他都没有从中阻拦。但当看到他两次失意后痛苦的样子，却不由得心疼起来。对于朱震亨的人品和学问，许谦是十分了解的，他知道如果朱震亨科场得意、进入仕途的话，将来必定会成为良吏，造福百姓。如遇盛世明主，甚至可以位至三公，造福天下。但毕竟天下读书人多，而能进入仕途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大多数还是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展现自己的才能，流惠于民。作为老师，许谦一方面不忍心看着爱徒因科场失意而痛苦，更重要的是觉得不能使朱震亨过人的才能就此湮没无闻。于是就萌生了说服朱震亨放弃科举、从事医学的想法。他相信如果朱震亨能够专心学医，将来肯定会在医学上大有造诣，同样能够实现其造福百姓的抱负。

许谦的这一思想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中国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熏陶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熟读经书，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毫无保留地奉献于社会和人民。而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观点又使很多儒者把忠君和孝亲放在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地位，忠君是辅佐国君治理国家，使国家繁荣昌盛，强大无比。这就要求从政者不但有忠心，还要有一定的为政能力，孝亲则要使父母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同样也要求为人子者不但要有孝心，还要有使父母健康的本领，不懂一点医术当然是不行的。懂得医道，不

仅可以孝顺父母,还可以济世救人,造福苍生。渐渐地,人们就把为政和为医作为人生的两大目标之一。宋代名臣范仲淹曾在年轻微贱时立了宏愿:此生不做良相,便要成为良医。后来范仲淹果然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愿望,一生政绩卓著,天下尊崇。

范仲淹是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榜样,他的“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思想为他以后的广大知识分子所认同,成为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

在范仲淹思想和行为的感召下,宋元时期,在仕途上失意的儒生们纷纷弃科举从医道,以另一种方式来报效社会和黎民。

还有一些饱学之士,虽然没有仕途失意的经历,但父母身体多病则是促使他们学医的重要动力。如金元时期的名医刘素素和李东垣都是因为母亲有病为庸医所误而立志学医的。和刘素素、李东垣同时期的张子和也是当时名医,不但主张儒者要学习医道,还特别撰写《儒门事亲》来阐明儒者事亲必须要懂得医术的道理。

到了元代,良医可比之于良相的思想更加为人看重,甚至连皇帝也懂得这样的道理。如元明宗就曾对御史台的官员们说过:“天下国家,譬犹一人之身,中书则右手也,枢密则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医,省、院阙失,不以御史台治之,可乎?”^①

在这种社会风气和思想认识的共同作用下,宋元时期,医生之业虽属“士、农、工、商”之外的末流,但并不受人轻贱,相反还受到人们的欢迎,甚至真正的良医还可以和朝廷的良相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如元代王旭就曾说过:“良医之权与宰相等,而宰相所以治天下者,即良医之术所以治一人之身者也。盖病者

^① (元)脱脱等:《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之死生安危系乎医，而天下之戚休治乱系乎相。医之良，则能回死以为生，易危以为安，而利及乎一身。相之良，则能化戚以为休，革乱以为治，而利及乎天下。虽所处有高下，所施有广狭，而权之所寄，实无以大相异也。”他还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道理所在。^①

人们将良医和良相相提并论，除了受范仲淹思想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作为良相，必须要具备高尚的人品和行政能力，以国家为己任。而要做一名良医，也首先必须要有高尚的人品和高超的医术，必须切实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解危救难为己任。当然，做良相必须是饱学之士，做良医也必须学富五车，因为“宰相须用读书人，读书则良相矣；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医之格物穷理，有不由读书乎”^②？所以良相和良医看起来地位悬殊，但其实在人们的心目中两者是一致的。

由良医和良相之说，许谦又想到自己自从患目疾之后，身体一直有病，经多年治疗不愈，几至成为废人，疾病给人带来的痛苦是难以言状的。由己推人，所有身体有病痛和残疾的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能解除病人的痛苦，不是一样造福社会吗？

想到这里，许谦的目光又转到爱徒朱震亨身上，他想到朱震亨的刻苦颖悟，理学功底扎实，出身于医学世家，本人也曾因为母亲治病而学习医学，治好了母亲多年不治的疾病，有一定的医学基础，这些都是成为良医的有利条件。如果让朱震亨继续从事医学钻研，为百姓做实事，结果可能要比走科举仕进之路还要

① (元)王旭：《兰轩集》卷一一《送韩子新序》。

② (元)王礼：《麟原后集》卷三《赠萧同礼序》。

理想。于是他决定让自己的爱徒放弃科举之业,投身医道,以自己的本领造福亲人和百姓,这也和做官是一样的道理。

有一天,他将朱震亨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我得病已经很久了,一直没有治好。看来我的病不是一般为医者所能治好的。你的天资聪颖,超过常人,又有一定的医学基础,你如果以后精研医学,将我的病治好,也可济世救人,为天下苍生做些实事,不是比你走仕进之路更有意义吗?正在苦闷中的朱震亨听老师这样一说,顿时有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不假思索地说:老师说得对,我如果能够精通一门技艺,时刻以黎民百姓为念,为他们做些实事,也和仕于科举,为百姓办事是一样的了。于是他断然抛弃过去所学的士子应举考试的一套东西,重新精研理学,并以之作为学习医学的理论指导,专心致志地钻研起医学来。许谦看到朱震亨学医的专注态度,心中十分高兴,他逢人就说:我的病有了治愈的希望了^①。

许谦患病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开始是因饮食不适,形成积食痰郁,感觉心痛(按朱震亨在其所著《金匱钩玄》中言“心痛即胃脘痛”,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胃痛),后来老师金履祥去世时,许谦以有病之身,在大雪寒湿中徒步往返于金华与杭州之间,又患上风湿症,双腿疼痛,行走不便。再后来许谦的兄长许璟去世,他又徒步奔波于金华与广信之间,为兄长处理后事。连续多次的长途奔波使许谦的病情不断加重。经医生多次诊治,都认为是寒气所致,一直用的是黄牙等药,治疗了10多年,服药不计其数,艾灸数万。都是吃药时稍微见效,药一停又犯。反反复复,一直没有彻底痊愈。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冬天,许谦又因事冒雪乘船,使得旧病复发。到第二年夏天,病情骤然加剧,

^① (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〇《丹溪翁传》。

以至于发展到“坐则不能起，扶起亦不能行，两胯骨不能开合。若脾疼作时，则两胯骨痛处似觉稍轻，若饮食甘美脾疼不作，则胯骨重疼增”^①。医生诊断之后仍以为是受凉所致，给他用的是燥热香辛如丁香、附子、桂枝、生姜等等的药物，治了一段时间，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增加了新病，双足痠挛，疼痛不已，一遇寒冷就呕吐不止。这时给许谦看病的医生还以为是受寒，用的药物更加燥热，如灵砂、黑锡、黄牙、岁丹等，接着又用艾草灸，仍不见效果。后来医生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而病却始终没有好转，搞得许多医生都没了主意，最后连许谦自己也丧失了信心，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了^②。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许谦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爱徒朱震亨的身上，他示意朱震亨运用所学知识，大胆治疗，即使万一治不好，他也不会抱有抱怨和遗憾。朱震亨面对卧床不起、气息奄奄的老师，心急如焚，日夜钻研医学典籍，对照老师的病史、病情，仔细分析，沉着应对。经过反复的分析，他认为许谦的病最初起因是积食所致，因为胃气寒湿抑制了经络的畅通，导致“津液不行，痰饮注入骨节，往来如潮。其涌而上则为脾疼，降而下则为胯痛。非涌泄之法不足以治”。当时正是七月下旬，于是朱震亨于七月二十四日“以甘遂末一钱，入猪腰子内，煨以食之”，当晚许谦连泻了7次，到第二天双脚就能下地走路，许谦当时很高兴。但朱震亨却丝毫不敢大意，继续仔细观察，一刻也不敢离开。八月初三，许谦病情复发，呕吐大作，以致又卧床不起，颗粒不能入口。性格烦躁，气息微弱，口不能言。其他医生见状，纷纷指责朱震亨，说是不该在七月下旬服用泻药。但他们也知道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二—《痰》。

②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倒仓论》。

他们几年来用补药的结果,一时又缄口不言,使治疗陷入停顿之中。这时朱震亨记起张仲景《金匱要略》中有云:“病人无寒热而短气不足以息者,此实也。其病多年郁结,一旦以刀圭之剂泄之,徒动猖狂之势。”在目前还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情况下,“只能以吐剂达其上焦,以次第治及其中下二焦”,所以在八月初三呕吐之后,又用瓜蒂熬汤服用,没有吐完。初六又用栀子,还没有吐完。初九用附子尖三枚和浆水服用,才大吐不止。前后一共吐了一大桶痰液唾沫。初十再以朴硝、滑石、黄芩、石膏、连翘等凉药一斤,咀嚼成末后蒸煎成为浓汁,放在井水中,使之极冷,然后让许谦饮用。从十一日到十四日,每日按照此方饮用一斤,到十五日腹微满,出现了大小便皆秘的现象。朱震亨想使用大承气汤使之排泄,其他医生均持反对态度。又过了一天至十六日,六脉皆无。朱震亨诊脉的时候发现这种情况只是出现在一天的卯时(早晨5—7时)和酉时(下午5—7时),其余时刻则比较正常。他认为卯时和酉时为手足阴阳对应的时间,这是大肠与胃里有积滞而导致的,所以还是应该用泻的方法。朱震亨的意见又一次遭到其他医生的反对,没有实施。十八日尝试用紫雪治疗,十九日早,紫雪做成,每次取一汤匙,用新汲井水冲化服用。到二十日天明,已经服用紫雪五两左右。病人情况稳定,腹胀稍有好转,遂停用紫雪。二十一日,病人又出现了小便闭塞,痛苦不堪。服用萝卜汁半盅,小便通,腹痛立止。二十二日,病人小腹又疼痛不止,手不能摸,神志也开始昏迷。于是朱震亨又用大黄、牵牛两种药物制成丸药,分多次共服用了300丸。到二十三日中午,大小便均通,其排泄物如烂鱼肠,恶臭至极。病人情况出现好转,神思清楚,脉象正常。朱震亨和其他医生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到二十四日情况又出现反复,病人腹内绞痛不已,难以忍受。约一个小时以后,病人腰胯沉重如坠,约两小时

后情况更加严重,病人“不出声,不能言,泻下秽物如柏油条者,一尺余。腹中如烧,片时方定”。到二十五日,病人神思渐安,夜间也睡得比较安稳。二十六日渐渐可以出声说话。自初二日到二十六日,病人颗粒未曾入口,至二十七日才可以吃半碗稀粥,一共吃了四次。至此,许谦的病情终于慢慢有些转机了。又过了几天,到九月初四,病情才基本稳定下来^①。

这次给许谦治病,朱震亨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他知道,万一自己用药不慎,出现意外,将会留下终身的遗憾。虽然大家都认为病人是不会有希望了,许谦自己也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让朱震亨大胆治疗。但朱震亨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一点都不敢马虎。他知道自己医术还远远达不到有把握给老师治病的水平,但他又不忍看着他所敬重的老师就这样眼睁睁地等死,所以才尝试着用了以上方法。也许是诚心感动上苍,老师的病情终于稳定了,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了。但他深知,老师的疾病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还存在着隐患,一不小心,还会再次发作。于是在病情稳定之后,他又一边精心护理,一边寻求新的治疗方法,决心从根本上治好老师多年不治的痼疾。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思考、翻阅医学典籍,朱震亨发现了一个来自西域异人传授的方法——就是朱震亨后来名之为“倒仓法”的治疗方法。所谓“倒仓法”,就是把胃里积滞的东西全部清理干净。朱震亨认为,人体之内,只有肠胃中无所不有,其中数谷物最多,真像粮仓一样。尤其是胃,接受能力强而自运能力差,容易形成积滞。当人们遇到可口的食物,往往食之过量,来不及消化,形成积食现象。胃里的积滞物多了,就会使“停痰淤血互相纠缠,日积月深,郁结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诸般奇形之虫,

^① 皆见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二—《痰》。

中宫不清矣。……诚于中，形于外，发为痲疾、为劳瘵、为鼓胀、为癩疾、为无名奇病”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只有把肠胃中的东西全部倒出来，使之清理干净，病人才会感到轻松，各种疾病也才能得到痊愈。朱震亨觉得许谦的病根正是积食所致，一直没有彻底清除。这个方法很适合老师的病情，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考并和老师反复磋商之后，决定在老师身上施行。

至治二年(1322)三月，许谦的病情又有反复，饮食无味，四肢倦怠，情绪烦躁。在做好了周密的准备之后，朱震亨着手用“倒仓法”治疗老师的疾病。其具体做法是“以黄牡牛择肥者买一二十斤，长流水煮糜烂，融入汤中为液。以布滤出渣滓，取净汁，再入锅中，文火熬成琥珀色则成矣。每饮一盅，少时又饮，如此者积数十盅。寒月则重汤，温而饮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为之缓急多寡也。须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风者，以安病人。视所出之物可尽，病根则止。吐利后或渴，不得与汤，其小便必长。取以饮病者，名曰轮回酒。与一二碗，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涤濯余垢。睡一二日，觉饥甚，乃与粥淡食之，待三日后始与少菜羹。自养半月，觉精神焕发，形体轻健，沉痾悉安矣。其后须五年忌牛肉”^①。如果把这段话用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选择一二十斤母黄牛肉，取溪涧中的长流水煮得糜烂，融入汤中成为汁液。然后用布滤出渣滓，将过滤后的干净汁水再倒在锅里，用文火煎熬成琥珀色就好了。每次给病人饮一盅，过一会再饮一盅，一共饮几十盅。天气寒冷的时候，汤要熬得更浓些，趁热喝下去。如果病在上体，就让病人多吐些；如果病在下体，就让病人多排泄；病在身体的中部，就让病人吐、泻都多一些。具体做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倒仓论》。

法,饮的缓急多少,要根据病人的情况灵活运用。实施治疗时事先要安排一间采光好但不通风的房子以安置病人,看着病人把肠胃里的东西吐尽,病根也就除了。病人呕吐排泄之后,必然口渴想要饮水,这时一定不要给他,等渴极了,再将其小便拿给病人喝,名叫“轮回酒”。这种“轮回酒”喝上一二碗,不但可以止渴,而且还可以洗涤肠胃中残留的余垢。以上程序结束以后,让病人睡一到两天,感觉十分饥饿,再给白粥淡食,三天之后才可以给一些菜羹之类的食物。这样休养恢复半个月左右,病人就会觉得精神焕发,身体轻捷,多年的病根就会根除了。

朱震亨的“倒仓法”在许谦身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许谦的身体很快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了,第二年还得了个儿子,直到14年以后寿终正寝。

朱震亨用这种方法还治好了其他几个病人:有一个妇女得了好几年的脚气,不能痊愈,朱震亨用此法,使她上吐下泻,除尽肠胃中的积滞,最后脚气痊愈。镇海一个姓萧的人,患小便浑浊,遗精不止,朱震亨在他身上以“倒仓法”试之,效果明显。临海一个姓林的人,咳嗽日久,不时吐血,身体发热,形容消瘦,其他医生以为他患的是“瘵”(zhài,即肺结核),用各种方法治疗都没有效果,最后请朱震亨前去诊断,朱震亨也是用了这个方法,使林姓病人转危为安。

由于朱震亨有深厚的理学功底,所以在学医时将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譬如,他认为在人身体的五脏六腑中,胃地位居中,性属土,而牛色黄,亦土色,用黄牛肉治胃病,是顺着胃的土德。将黄牛肉熬成汁液,成为无形之物,然后可以深入于经络肌肉之中,由肠胃渗透到肌肤、毛孔、指甲等身体的各个部位,“肉液之散溢,肠胃受之,其厚皆倍于前,有似乎肿。其回薄曲折处,非复向时之旧。肉液充满流行,有如洪水泛涨,其浮莖陈朽,皆

推逐荡漾，顺流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涌，浊道者自泄而去。凡属滞碍，一洗而空”。而牛肉又有“全厚重和顺之性，盎然涣然，润泽枯槁，补益虚损，宁无精神焕发之乐乎”^①？待肠胃中积滞物完全被清除干净后，再有次序地对病人进行补养，身体就会慢慢恢复起来的。

把人的五脏六腑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列，使之与其相互对应，这里边难免会有牵强之处，但对肠胃病的分析却是合情合理的，因而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当然任何医疗方法在运用上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可千篇一律，如对过于虚弱的病人用此方法，就有可能使其元气大伤，出现更加危险的症状。

朱震亨弃举子业转而钻研医学，一方面是老师许谦的指点，另一方面也是对理学的核心——“格物致知”思想的实践。当他胸怀“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的信念^②，兢兢业业地把对理学精微的理解用医学的实践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理学和医学在朱震亨的身上就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以后长期的医学生涯中，朱震亨一直把理学看做是医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同时又把医学看成是理学的具体实践和延伸。使理、医结合的路子越走越宽，最后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许谦身体的康复，对朱震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正当他准备进一步在医学上精心研读、有所进取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结发妻子戚氏在至治三年（1323）六月十二日去世了，这年朱震亨43岁。

朱震亨的妻子戚氏是朱震亨姑姑兼岳母朱寿的女儿，长朱震亨两岁，在辈分上是他的表姐，去世时45岁。由于深受戚、朱

①（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倒仓论》。

②（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〇《丹溪翁传》。

两家家学渊源和传统道德的熏陶,戚氏从小知书识礼,贤惠异常,和朱震亨结婚20多年来,敬上爱下,温柔贤德。对朱震亨的所作所为非常理解,全力支持,自觉承担起家庭照料的重担,敬奉祖父、婆婆,抚养有病的长子和其他几个孩子,没有一句怨言,深得朱氏家族的敬爱。她和朱震亨感情深厚,生有二子四女,长子朱嗣衍,已经21岁,但从小身体多病,尚未成家。次子朱玉汝,出生年月不详,亦从震亨学医,是朱震亨的入室弟子。四个女儿分别嫁于傅似翁、蒋长源、吕文忠、张思忠,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朱震亨几个女儿和女婿的具体情况都不清楚。按说朱震亨已经有了治疗母亲和老师痼疾的经验,应该会对妻子的病症有所把握的,可惜的是妻子的病情和母亲、老师的都不一样,既不是像母亲那样四肢疼痛难忍,行动不便,也不是像老师那样四肢无力,不思饮食。而是气喘不止,胸部憋闷,严重时甚至不能躺下。气喘发作时脸色铁青,眼球突出,痛苦之状,难于言表。朱震亨怕自己给亲人用药时顾忌太多,特意请了其他医生为妻子诊治,但也是一个个都不奏效,朱震亨将为母亲和老师医治的方法都在妻子身上用了,但仍然没有效果,最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痛苦中离去。

妻子的去世,带给朱震亨的除无尽的悲痛之外,还有更多的悔恨和自责。他后悔自己学医的时间太短,把许多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浪费在科举上面。他自责自己医术太浅,无法把妻子从死神的手中抢救回来。同时,妻子的去世对他也是一种激励,他决心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医学上狠下工夫,不断学习精进,使自己的医术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使更多的家庭免遭死别之苦。

第三章

拜投名师 援理入医

治好了老师多年不治的痼疾,标志着朱震亨的医学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知道要达到更高的境界,必须不断开阔自己的眼界,扩大医学方面的知识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良医。于是在老师的疾病治疗告一段落之后,他强忍丧妻之痛,又走上了漫漫的求师之路。

辗转他乡 千里寻访

朱震亨在二次学医时,除了精心研读《黄帝内经·素问》、《难经》等医学经典外,还用心揣摩当时在医学界盛行的《局方》。此书原名《太医局方》,共10卷,是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诏令天下名医各自将所得医方呈报太医局,由太医局依方制成成药出卖,并注意观察效果。然后对所上的药方进行筛选,将经过试验,疗效比较明显的药方编辑整理成书。到了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北宋太医局御医陈师文、裴宗元等人又对《太医局方》进行了校正,改名为《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收集药方297个。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二十三日,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和剂局方》由国子监正式刻版印刷,于二十一年(1151)十二月十七日颁行于各路(宋代一级政区

的名称),更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由于《局方》一书是政府颁发,书中所载方剂又都是名医所献,经太医局试验,又经名医校正,所以在社会上影响极大,风行一时,被医学界奉为金科玉律和千古不变之准绳。再加之《局方》“可以据证验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现成药”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百姓有病,不要求医,只要对照《局方》去买药丸,就可治病。所以受到广大百姓的欢迎。正像朱震亨所说的,自从《局方》颁布以来,“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①。凡学医者,无不对其精心研读,反复揣摩。朱震亨在开始学医的时候,除熟读古人医学典籍外,其余时间就是对《局方》的学习,他先将《局方》抄录下来,然后反复阅读、认真揣摩,力求弄懂其中的精微。

毋庸讳言,对《局方》的学习,使得朱震亨获益匪浅,医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研习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疑问,这就是《局方》一般不分析生病的原因和病情的变化,只列举一些病症的现象,一个药方往往要治好多种症状的病,如龙脑天麻煎“治一切风及瘫痪风,半身不遂、口眼喎斜、语涩涎盛、精神昏愤,或筋脉拘挛、遍身麻痹、百节疼痛、手足颤抖,及肾藏风毒上攻、头面虚肿、耳鸣重听、鼻塞口干、痰涎不利、下注腰脚、脚膝缓弱、肿痛生疮。又治妇人血风攻疰,身体疼痛、面浮肌瘦、口苦舌干、头旋目眩、昏困多睡,或皮肤瘙痒、瘾疹生疮,暗风、夹脑风、偏正头疼、并皆治之”。排风汤“治男子、妇人风虚冷湿、邪气入脏、狂言妄语、精神错乱。肝风发则面青心闷,吐逆呕沫,胁满头眩,耳重不闻人声,偏枯筋急,曲拳而卧。心风发则面赤,翕然而热,悲伤瞋怒,目张呼唤。脾风发则面黄身体不仁,不能行步,饮食失

^① (元)朱震亨:《局方发挥》。

味 梦寐倒错 与亡人相随。肺风发则面白、咳逆、唾脓血，上气奄然而极。肾风发则面黑，手足不遂，腰痛难以俯仰，痹冷骨疼。若有此候，令人心惊志意不定，恍惚多忘”^①。嘉禾丸“治中满下虚、五噎五膈、脾胃不和、胸膈痞闷、胁肋胀满、心腹刺痛、不思饮食、口多痰逆、口苦吞酸、胸满短气、肢体怠惰、面色萎黄。如中焦虚痞，不任攻击，藏气虚寒，不受峻补，或因病气衰，食不复常；禀受怯弱，不能多食，尤宜服之。常服育神养气、和补脾胃、进美饮食”。人参丁香散“治大人、小儿呕吐不已，粥饮汤药不下。凡呕吐之病，皆因三焦不调、脾胃虚弱、冷热失和、邪正相干、清浊不分、阴阳错乱、停痰留饮、不能运化、胸膈痞满、呕逆恶心、腹胁胀痛、短气噎闷、咳呕痰水、噫醋吞酸、不思饮食、渐至羸瘦。及疗女人妊娠阻病、心中烦愤、头目眩重、憎闻食气、呕吐烦闷、颠倒不安、四肢困弱、不自胜持、多卧少起。又治久病羸弱、脾胃虚极、中满呕逆、全不入食、并宜服之”等等^②。他感到不解的是，一个由几味、十几味中药制成的成药，怎么能治疗那么多的疾病呢？这些病与病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又各有其不同的原因和特点，只是服用这一种成药就能解决问题吗？

朱震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局方》中的药方都是在北宋时期形成的，那时到现在已经 200 年左右，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素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仍以 200 年前的方子治疗今人的疾病，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吗？再还有生病的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不仅有年龄、性别方面的差异，还有“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时月有久近，形志有苦乐，资禀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标本有先后，年有老弱，治

①（宋）陈师文：《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一《治诸风》。

②（宋）陈师文：《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三《治诸气》。

有“五方，令有四时”等方面的区别，医生在治疗的时候，要根据“某药治某病，某经用某药，孰为正治反治，孰为君臣佐使”，然后将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再考虑开药，这样开出的药方也才会符合病人的情况，起到治病救人的效果。由于《局方》对这些一概不提，只是列举现象，并言以某药可治某病，所以许多人在使用《局方》治病的时候，不加分析，只是照搬使用，结果就会出现误诊，这怎么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呢？

由对《局方》的疑问，朱震亨又回忆起自己家族中早死的亲人，很多就是受庸医的贻误而失去性命的，如父亲的咳嗽咯血，伯父的眼花眩晕，叔父的鼻子出血，小弟的双腿疼痛，妻子的痰积气喘，按说都不是绝症，却都死于庸医用药之误，而这些庸医当时治病的时候都是以《局方》为准，根据病人的情况按照《局方》用药，使得一个个亲人在不该去世的时候过早地离开。想到这里，朱震亨不禁肝胆俱摧，悲痛不已。但在当时《局方》在南方医界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深感自己的医术有限，还不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圆满的解释。而家乡附近的医生也都医术平平，看病时完全根据《局方》用药，不敢有半点的违误。他们根本不能对一些病例作出合理的解释，更不能也不愿意回答朱震亨心中的疑窦。

朱震亨在研读金代名医张子和的医学著作《儒门事亲》时，看到张子和的主要理论是说人身体内的正气本身是不会致病的，只有邪气入侵，方能致病。所以祛除邪气，身体自安。他又把致人身体生病的“邪气”分为天、地、人三类，即“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这三类致病的“邪气”又反应在人身上的不同部位：“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所以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发病部位和症状的不同，分别采用出汗、呕

吐、排泄三种方法,也就是张子和所谓的汗、吐、下三法。用张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①。为此,张子和还专门写了《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等三篇文章来论述汗、下、吐三法在治疗中的重要性^②。

对于张子和的医学成就,朱震亨是毫不怀疑的,但他觉得张子和的这些论述和《内经》中所言又有一定的出入,《内经》对人身中的正气和邪气进行了反复的论证。认为“谓之实者,邪气实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气之虚,然后邪得而客之。苟正气实,邪无自入之理”。《内经》还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之语^③,这就是说不仅要祛除邪气,也要保护正气不受侵袭,如果一味用汗、吐、下之法,万一有伤元气怎么办呢?这就使朱震亨不能不对张子和的说法产生疑问。他又想起张仲景关于“病当汗解,诊其尺脉满,当与黄芪建中汤补之,然后汗之”的说法^④,其中也说到了“补”和“汗”的辩证关系,不是只讲“汗”而不讲“补”,这些和张子和的说法也是有一定意义上的差别。但张子和的医书和理论驰名中原,也必定有其过人之处。为什么书中所言和《内经》及张仲景的说法有如此差别呢?对此,朱震亨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他想到自己在理学方面师从许谦后所取得的成就和感悟,于是就萌发了在医学上也拜师学艺,发其茅塞,解其疑窦,以期有所建树的想法。

① (金)张子和:《儒门事亲》卷二《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论十三》。

② (金)张子和:《儒门事亲》卷二。

③ 《黄帝内经·素问》卷一《生气通天论》。

④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

主意打定之后，朱震亨安排好家事，于泰定二年（1325）春从家里出发，决心不辞辛苦，访寻名师，拜师学艺，以期使自己的医术有所突破。朱震亨访求名师的路线是“渡浙河（古浙江，泛指今浙江省境内的富春江、钱塘江河段），走吴中（今江苏省苏州市），出宛陵（今安徽省宣城市），抵南徐（今江苏省镇江市），达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①，也就是从义乌渡过富春江或钱塘江，来到今江苏省苏州一带，再从苏州到安徽宣城，由宣城到江苏的镇江、南京，后回到杭州。实际上朱震亨这次外出访求名师，范围不仅仅限于南方，还到过北方的定城（今河南省潢川县），而且最大的收获也是在定城。朱震亨最初出行的时候，也没有确定一定的路线，听说哪里有名医，他就到哪个地方，结果都是无所收获。但在定城，他偶然看到了金代名医刘完素所著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和李杲治疗伤寒病的药方，只觉得大开眼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刘完素（约1110—1200），字守真，金代河北肃宁（今河北省肃宁县）人，自幼家庭贫困，3岁时家乡遭遇水灾，遂举家迁徙到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市），从此在河间定居。刘完素的母亲早年患病，因无钱看病而死亡。刘完素对此痛心疾首，萌发了学医的愿望。目标确定之后，他也是开始云游四方，寻师学医，后遇异人陈先生（有人认为是陈师夷，待考）授以医术，成为一代名医。长期居住乡间，为老百姓治病。金朝统治者曾多次征召，他都坚辞不就，被世人尊称为“高尚先生”。

刘完素在学医过程中，曾对《黄帝内经》反复研读，他认为

^①（元）戴良：《丹溪翁传》。文中所说“浙河”，即古浙江，郦道元《水经注集释订讹》卷四十四云浙江从安徽歙县经浙江淳安、建德、寿昌、新城、桐庐、富阳、钱塘等地然后入于海。本文之“浙江”定义即以此为据。

《内经》将前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以归纳总结,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中蕴藏了许多哲学原理和对生命活动规律的理解。如其中讲到患病的原因、各种不同病症的表现形式、治疗的原则和方法等等。但又因《内经》的文字简练,内容就显得十分晦涩,不容易一下子搞清楚,于是他反复研读,废寝忘食,将它作为自己终身必读之书。他经常是边读书,边思考,努力探讨,终于领悟到其中的一些奥妙,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病治病一定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可拘泥于成规。比如刘完素所在的北方地区,气候寒冷干旱,人们的体质相对强健,也因而喜欢饮酒。所以北方人的疾病大多以燥热为主,但很多医生不对病人的情况具体分析,往往也是根据《局方》开药,使病人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因为《局方》的最大特点是多用芳香温燥之药,这就直接造成药物与病情不相适应的不良后果:本来病人患的就是热病,再服用温燥药,不但不能减轻病情,还会使病情有所加重,甚至使一些人死于非命。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完素决心将自己的看法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当前医学界存在的问题。于是他提起笔来,以《素问》为理论基础,“详言五运六气盛衰胜复之理,而以病机一十九条附于篇末,乃于十九条中采一百七十六字,演为二百七十六字以为纲领,而反复辩论以申之”^①。全书共2万多字,基本内容认为北方人之疾病大多是火热病,而治疗的方法则主张以寒凉攻之。这就是朱震亨这次所看到的奠定刘完素火热病医学思想的专著《素问玄机原病式》。

刘完素不光是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提出了“火热病”的医学理念,而且在治疗上也突出了这一特点。如他治病过程中发现有的病人周身发冷、怕风,有时甚至一遇冷就全身发抖,看起

^① (清)纪晓岚:《素问玄机原病式提要》,见《四库全书·子部五·医家类》。

来好像是受了风寒的侵袭,应该用一些温热发汗的药物来治疗。但刘完素经过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认为这些病人大多是内有火热,所以一遇风寒就容易感冒。如果仅用温热发汗的药物,使表面的病症得到缓解,而身体内部的火热得不到散发,还是容易发病的。于是他一改以往只解表不解里的做法,采用表里双解的方法,使疾病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这样就使得他的用药从实际到理论都打破了以往的常规,实现了对《局方》的突破,也因此而受到医学界一些同行的责难。他对此毫不回避,而是直面以对。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社会环境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体素质都在发生变化,而过去的规矩却没有变化,如果不打破旧的规矩,创立新的方法,就会贻误病情的诊断和治疗。

刘完素的这部著作和理论,虽非鸿篇巨帙,但对朱震亨却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刘完素的话也说出了他久久为之迷茫的问题的答案。仅此一点,他这次外出求师也就不虚此行了。

李杲(1180—1251),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金代河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出身富豪之家,但没有丝毫的纨绔习气,从小稳重好学,深受家长喜爱。李杲20多岁时,母亲患病,经许多医生治疗无效而死。这件事对李杲触动很大,于是他立志学医,拜当代名医、河北易州(今河北省易县)人张元素为师。由于他从小学习,具有深厚的古文基础,所以学习效果很好,很快就得到医学界的认可。

李杲生活的时代,瘟疫时有流行,得了这种病的人,有的头部肿胀,大如西瓜,十分痛苦。为了解除他们的痛苦,李杲潜心钻研《黄帝内经》和张仲景的《伤寒论》,终于研究出治这种病的一张药方,几乎是药到病除,十分灵验。于是他将这张药方刻在木板上,插在人们来往的必经之地和通都大邑的热闹地方,病人

得到他的药方,用以治疗伤寒病,非常奏效。有的人在治好病之后,还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便流传更广,保存更加久远。

李杲不光是在治疗伤寒病上成就卓著,对脾胃病的治疗也有其独到之处。因为他是富家子弟,平时所结交的也多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家境富裕的人。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养尊处优,吃的是膏粱厚味,而又怠于活动,所以很容易使脾胃受伤。另一方面,当时又是元兵南下、战乱频仍,广大百姓则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且生活没有规律,也很容易伤脾胃。有鉴于此,他认为只读古方是不行的,必须面对现实,对病人的特点做具体的分析,建立全新的脾胃学说。

李杲所创立的脾胃学说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的说法完全吻合,都是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他认为患脾胃病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饮食不节;二是劳逸不均;三为精神不畅。他还认为,在人的五脏中,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一处脏器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胃。而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胃来调养和恢复。所以他提倡根据四时不同的季节,对侵入脾胃的邪气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治疗,要坚持“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的治疗原则,千万不可不加分析,千篇一律。

李杲的学术思想,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通过实践,对内伤病的致病因素、发病机理等作了深入细致的阐发,给后人治疗脾胃病指出了新的途径。朱震亨在定州读到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的同时所看到的李杲的方稿,就是关于诊治伤寒和脾胃病的药方。

刘完素和李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看病和治疗的时候,都要根据时间和对象的不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从不墨守成规,按一成不变的方子诊治。这点和朱震亨的想法不谋而合,

虽然他至此尚未访寻到心目中的名医,但仅在定城的收获,也使他的思想有了一个飞跃和升华。另外,在研读了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和李杲方稿之后,对张子和的汗、吐、下三法也有了新的认识,后来他在所著《格致余论》中将这种心得写了进去^①。

矢志不渝 拜投名师

朱震亨出门数月,求师未获,该年夏天辗转来到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杭州,想在这里停留几天,领略一下省府城市和南宋古都的风采,然后再回义乌。谁知在这里,他却从一个叫陈芝岩的口中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代名医罗知悌近日刚从燕京返回武林,已经定居杭州。于是他顾不上欣赏杭州的古都气象和西湖的秀丽景色,迫不及待地找到罗知悌的住处,决心投拜罗知悌为师,希望从他那里学到医学的真谛,使自己的医术有一个突破性的提高。

罗知悌,字子敬,号太无,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约生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约卒于元泰定四年(1327)。自幼研习医学,曾得到过金代名医刘完素的徒弟荆山浮屠的真传,品德高尚,医术超群。南宋末年入宫为宦官,因医术高明而受到皇帝的宠信。南宋灭亡以后,和南宋宫廷眷属一起被虏至元都燕京。数十年间,坚持不入内宫,后因病被赐外居。此后他“闭门绝人事,好读书,善识天文、地理、艺术”。罗知悌寓居燕京期间,他的侄子曾在朝中官居司徒,权势炙手可热,朝中公卿大夫人人趋之若鹜,独罗知悌对此十分平淡。泰定二年(1325)正月初一,罗知悌的司徒侄子前来拜谒叔父,罗知悌闭门不纳。侄子在外面大声呼叫,并以头触门。罗知悌在里面直呼侄子的名字,说道:“人

^① 见朱震亨:《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

道汝是太(泰)山,我道汝是冰山。我老且病,愿乞骸骨,若奏我归杭州,即是敬我。”他侄子没有办法,只好奏明朝廷,并设法让皇帝同意了罗知悌返回杭州的请求。罗知悌得到消息,将身边的珠宝珍玩全部散给街坊邻居,自己只留了几十部书籍,放在车后。临走时他再三告诫侄子说:“我不依汝,汝亦不可依势。”^①然后于泰定二年(1325)夏天回到杭州定居。可惜罗知悌的侄子没有遵从叔父的教诲,一直仗势弄权,终因无理侵占浙江湖州百姓的田产,被人揭发后判罪流放远方,最后死于贬所。

罗知悌在精心学习刘完素和荆山浮屠医术的同时,又悉心钻研金元时期另外两大名医张从正、李杲的学术思想,对各家的医学宗旨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回到杭州以后,他仍是闭门谢客,潜心研究医学,将北方刘完素、张从正、李杲等人的医学思想及实践传至江南,在南北医学的交会融合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罗知悌以南人而被拘于北方,在异乡居住了几十年,心情郁郁不畅。所以性格孤僻倨傲,愤世嫉俗,南归后即隐居于杭州附近的山林之中,除治病外,很少与人接触。他选徒弟的标准又很严格,使一般人难以忍受,所以一直没有收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徒弟。

朱震亨通过别人的指点,很快找到罗知悌居住的地方,他满以为会受到欢迎或是接待,哪知不但没有受到礼遇,还被拒之门外,骂了回来。但朱震亨没有灰心,第二天照样前往,结果仍是一样。此后接连好几天,朱震亨每天都去拜谒,但情况却不见好转,总是在被叱骂之后还要吃闭门羹。面对这种情况,朱震亨毫不气馁,仍是每天坚持去罗知悌住处,恭恭敬敬地侍立在门口,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骄阳当头,从不间断。朱震亨的态度使周围

^① 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八〇《杂记》。

的人深受感动,于是有知情人告诉他说罗知悌是一个怪人,对前来求医的人态度很好,总是耐心地诊断治疗,尤其是对那些拿不出钱的穷人,不但热情治病,还不收药钱。但对投奔他学艺的人态度却十分冷淡、反感,经常都是不但不理会,还常常恶语相伤,已经有好几个都被他骂回去了。所以他们好心劝告朱震亨不要再来了,以免受到更大的羞辱。

朱震亨本来就是决心拜师学艺,可惜一直未遇良师,现在知道有这样医术高超、贯通南北的老师,哪能轻易放弃!尤其是他对罗知悌的医德、对他的人品,更是肃然起敬。在多次受到叱骂之后,他不但没有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投拜罗知悌的决心和勇气。他想到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和宋代杨时、游酢“程门立雪”的故事,态度更加坚决,认为只要立心虔诚、意志坚定,就一定能得到罗知悌的接纳。于是他风雨不避、炎热不顾,坚持天天到罗门拜谒。虽然后来还被骂了好几次,但他不管不顾,依旧拜谒如故。这样过了3个月左右,罗知悌的门人终于无法保持沉默了,就进去对罗知悌说:天天来拜见您的这个人,是浙东著名大儒许谦的高足弟子朱彦修,在医学上已有很深的造诣,他能如此虔诚地要拜您为师,确实是很难得呀,您应该以礼相见才是。其实罗知悌也早知道朱震亨的名字,也确实被朱震亨的精神所感动,只是他还想再观察观察,看看他到底是真正拜师学艺还是只图虚名。听了门人的话以后,罗知悌终于改变态度,整顿衣冠,亲自出门迎接。两人相见,谈医论道,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罗知悌对朱震亨十分满意,欣然答应收他为弟子。于是朱震亨在45岁的那年秋天,终于成了当代名医罗知悌的正式入室弟子,也成了金代医学大家河间派刘完素的三传弟子。

朱震亨投拜罗知悌的过程极其艰难,确实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所以他本人和宋濂、戴良都对之有所记载。朱震亨在

《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中云：“泰定乙丑夏，始得闻罗太无于陈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骂者五七次，趑趄三阅月，始得降接。”宋濂《石表辞》云：“知悌，字子敬，宋宝祐中寺人。精于医，得金士刘完素之学，而旁参于李杲、张从正二家。然性倨甚，先生谒焉，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坚，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或告罗曰：‘此朱彦修也，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将议君后矣。’罗遽修容见之。”戴良《丹溪翁传》云：“（震亨）及还武林，忽有以其郡罗氏告者。罗名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学精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然性褊甚，特能厌事，难得意。翁往谒焉，凡数往返不与接，已而求见愈笃。罗乃进之曰：‘子非朱彦修乎？’时翁已有医名，罗故知之。翁既得见，遂北面再拜以谒，受其所教。”虽然拜师的过程坎坷艰难，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朱震亨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以自己的诚心赢得了罗知悌的接纳，达到了自己访求名医、精研医术的目的。

人说“名师出高徒”，如果说当年朱震亨拜许谦为师，奠定了他深厚的理学功底，那么这次拜罗知悌为师，也为他以后在医学上取得巨大成就而夯实了基础。

潜心学艺 反复体察

罗知悌在教授朱震亨学医的方法上，和许谦教授其理学经典的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他和朱震亨谈论医学，总是从根本上谈起，“为言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张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李杲）之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这就告诉朱震亨，学医必须要从根本学起，基础一定要坚实。在学习《素问》、《难经》等医学经

典的基础上,罗知悌又对朱震亨讲解刘完素、张子和、李杲等几家医学流派的特点,要求他对各家医学流派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当朱震亨谈起他对《局方》的困惑时,罗知悌说的竟和朱震亨原先想的一模一样。陈师文和裴宗元仅是把前人的医方汇总起来,没有自己的发明。且时间过去了200多年,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如果还拘泥于《局方》,岂不是要贻误病人吗?听了老师的话,朱震亨心中豁然开朗,从此树立了自信,再不曾因《局方》的问题而苦恼了。

在师从罗知悌学医的时候,朱震亨最大的收获就是根据病人的患病情况,随时调整用药计划,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绝不拘泥于成规。当时,罗知悌年事已高,有病人前来求诊,总是让朱震亨诊脉询问,再将详细情况汇报给罗知悌,罗知悌则卧床静听,然后口授用药之法,并详细地给朱震亨讲明什么药治什么病,这种药服用之后将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病情发生变化时用药该怎么调整。在所用药物中,什么药为经,什么药为引;什么药为君,起主导作用;什么药为臣,起辅助作用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丝毫的含糊之处。朱震亨师从罗知悌学医两年左右时间,从没见过他给病人使用过相同的处方,总是变化无穷。就是在用药相同的处方中,药的用量、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有攻补兼用者,亦有先攻后补者,有先补后攻者”,灵活多变,不一而已。由此,朱震亨更加体会到“古方治今病”的不可行性。又悟出理学的核心是不偏不倚,随时取中。中医治病也是这样,要随时掌握病人的情况,对症下药,过和不及都是不行的。当谈到《局方》在当时盛行的情况时,罗知悌说:用古方治今病,就好像用拆了旧屋的材料去盖新屋一样,房屋的结构和大小都和过去不一样了,材料不经过匠作之手重新加工,肯定是不能用的了。由此,朱震亨又想起他曾经读过的北宋名医许叔微所写

的《释微论》中的话：我读仲景之书，用仲景之法，然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许叔微对仲景之学多有研究，可以说是张仲景医学思想的崇拜者和实践者，但他却不拘泥于仲景之方，而是在实践中有所损益。过去读这段话的时候，因为跳不出《同方》的桎梏，所以理解不深。现在经过罗知悌的点拨和追随其学医的实践，再回过头来想这段话的含义，才理解了其中的精深含义。于是，朱震亨拿出李杲的药方文稿，重新抄录，仔细体味，逐渐悟出罗知悌所说的治病和治国的道理其实相通的奥妙。罗知悌曾对朱震亨说过：救治病人的过程就像“汉高祖踪暴秦、周武王踪商之后”一样，他们都是在打败了对手、建立了新的政权以后，或约法三章、或发财散粟，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让他们慢慢恢复战争的创伤，开始正常的生活。否则，受伤疲惫之人再不给休养生息的机会，怎么能够恢复元气呢？同样，治病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病人的元气，使身体有恢复的条件。如果不注意保护元气，身体中的邪气虽然被祛除了，但元气也丧失殆尽，病人想要恢复也是不可能的了。

给朱震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罗知悌救治四川僧人的案例。有一次一个僧人来求罗知悌治病，只见这个病人年龄大约20来岁，面色萎黄，形容消瘦，全身倦怠无力。罗知悌在仔细询问了他的病情之后，知道他是四川人，25岁，从小出家，云游多年，仅在浙江已经有7年多了。他说他离开家乡时母亲尚在，最近突然非常思念母亲，归心似箭，但却因囊中羞涩，没有盘费而不能动身，整天望着家乡的方向，痛苦流泣，不久就成了这个样子。问清楚病情以后，罗知悌先不急着重给病人开药治疗，而是让他在隔壁的房间休息几天，每天命人将牛肉、猪肚等食物煮得软软烂烂的拿给他吃，再经常给他说些安慰劝解的话。并许诺说，你安心养病吧，回家的路费我负责给你，我也不求你的回报，只是

为了救你一命而已。过了半个月,僧人的脸色有了红光,身体也眼看着壮实了,于是开了一副桃仁承气汤方剂,一日三次,当晚病人即开始排泄,排下来的都是血块和痰积,一晚上接连排泄了几次,直至肚内排泄干净为止。到了第二天,不再给他吃肉,只给他素菜和稀饭吃。这样又过了半月,僧人的身体完全恢复了,罗知悌给了他足够的路费,僧人接过路费,谢过罗知悌,便高高兴兴地回家探望母亲去了^①。

事后朱震亨就此事请教老师,提出自己心中的疑惑:既然知道是忧思所致,为什么不直接用承气汤使之排泄,而开始还要吃那么多的营养物呢?罗知悌说道:此病确实是忧思所致,身体血虚痰积,从治疗方法上来说应该是应该用攻击之法。但病人来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经不起任何折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用攻击之法,必然排泄不已,就会使之元气大伤,小病酿成大病,大病成不治之症。不但起不到救治的作用,反而会断送了他的性命。所以必须使他心情舒畅,能够进食滋补。使其身体壮实,经得起攻击,这时再以承气汤泻之。既能使腹内郁积之物排泄干净,也不会有伤身体。

还有一次,楚地(今湖北境内)有一人患痞症,腹中积块难消,“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纳”,腹胀难忍,水米不得进,难受异常。医生说他的病非泻药不可,就给他开了腹泻的方子,病人回去照医生的方剂服药之后,果然见效,“暴下不终日”,腹内的积滞完全消除,病人的状态一下子恢复,“焦膈通达,呼吸开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感到非常畅快。于是他对医生的话深信不疑,感激万分。谁知过了不长时间旧病复发,又是积块不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一四《郁症》。

消，水米不能入口。于是又用上次的方剂服用，结果仍然是立刻见效，恢复如初。但过不了几天又犯，如此反复了好几次，每次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5次反复之后，病人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体不劳而汗，股不步而栗”，几乎要到卧床不起的地步。原来给他诊病的医生对此感到十分不解，觉得治疗积痞用泻药，没有一点问题，为什么病情会反复发作、恶化至此呢？就不敢给他再服泻药。病人自己也觉得医生的思路和治法没有错误，但也不明白为什么服药后病情要反复发作。后来他慕罗知悌之名，就不辞遥远，前往杭州求医。罗知悌听他诉说了得病的经过和他心中的疑问后，笑着说道：道理很简单，这就是眼前如果有什么事给我快乐，以后这件事也就会给我带来伤害，而且带来的快乐和所受伤害的程度会是一样的。如果想要以后不受到伤害，那么目前也就不要要求过分的快乐。人的身体内，阴阳平衡，气血才能畅通，就不会发生积滞。反之，阴阳失调，气血不畅，就会形成积滞，使得胸腹胀满，饮食难进，这种情况下治疗用泻药是对的。但身体内还有一种元气，即和平之气。如果不考虑保护和平之气，为了贪图一时痛快，一味地用泻药，就会在清除积痞的同时伤了和平之气。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因大量服用泻药，5次清除了腹中的积痞，同时身体中的和平之气也被伤害了5次，这就导致病情不断加重，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在治疗积痞的过程中，既要去掉腹中积痞，还不能有伤身体中的和平之气。于是他让病人回家食用营养滋补之物，静养3个月，再来讨论治疗积痞的事。病人对罗知悌的做法很不理解，但看到他满有把握的样子，就不得已地回去了。3个月后，病人又来请求治疗，罗知悌看了病人的情况后说：你的身体恢复了不少呀。然后给他开药，让其按方服用，3个月以后再来看。又过了3个月，病人又来复诊。罗知悌说病人身体基本恢复健康了，但还没有完

全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估计到了年底就可以完全恢复了。然后给他开了泻药,再三嘱咐他要按照方剂的数量服用,不可性急。由于病人的身体一次比一次恢复得好,而且没有反复,所以对罗知悌的话也慢慢信服了,回家以后,严格按照要求服药,果然到了年底,病情完全消除,身体恢复如初,一次也没有反复。

后来病人前来向罗知悌道谢,并询问其中的奥妙。罗知悌说:治病和治国一样,比如秦国,起初是百姓“悍而不听令,惰而不勤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听,治之不变”,所以国家教化不行,政令不通,就和一个人得了痞症一样,积滞成病,危及健康与生命。商鞅看到了国内的这种情况,就“厉以刑法,威以斩伐,悍厉猛鸷不毫发少贷,痛划而力锄之”,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方法。于是秦国政令通达,无人敢再抗拒。在商鞅的严刑酷法中,秦国存在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就像人身体中的积痞暂时被铲除了一样,让秦国的统治者大为快意。但秦国在制裁的时候,没有注意保护百姓的利益,使百姓元气大伤,国家也因而元气大伤了。所以说这种严刑峻法可以一时解决问题,但后遗症多,就很容易反复。秦朝从秦孝公到二世胡亥,国家的积痞几次反复,最后使秦民无欢笑之日,秦国的和平之气大伤,就导致了“猛政一快者,欢心一亡,积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愕然,徒具其物而已。民心日离,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终日而百姓皆起,秦欲运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应。故秦之亡也,是好为快者之过也”。接着,他又举了三代先王治国之例:三代时先王也看到了国家的积痞,但没有采取“善然击去之以为速也”的办法,唯恐伤了国家的和平之气,所以不敢用酷暴的统治方法。而是以仁义道德去感化百姓,以礼乐去教化百姓,通过“月计之,岁察之,前岁之俗非今岁之俗也。不击不搏,无所忤逆”的方法循序渐进地实施其政治主张,慢慢化解百姓中的戾气,使国家的统治趋于稳定,出

现“政成教达，安乐久而后患除”的局面。所以三代之治“更数圣人，历数百年而后俗成”。你的病和秦国的情况一样，过去没有考虑保护元气，只想着如何尽快除去积滞，所以积痞去得快，发作得也快。现在是在保护元气的基础上清除积滞，就需要假以时日。因为你的身体经过几次大泻，元气大伤，恢复起来就很慢，所以需要近一年时间。这样一直等到身体中的元气恢复了，五脏六腑都能正常运行，抵抗力增强，疾病就不会再反复了^①。

罗知悌的这两个医疗案例，使朱震亨受到很大的启发，更深刻地理解罗知悌经常说的治病犹如“汉高祖踪暴秦、周武王踪商”一样的道理了。同时朱震亨也深感罗知悌诊病、治病的高明所在，对自己的老师也更加敬佩和爱戴了。在罗知悌的言传身教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朱震亨已经掌握基本的医学真谛，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治疗特点：那就是在攻击病气邪气的时候一定首先要注意人体中元气、正气的培养和保护。

罗知悌的好多病例都是在前人诊治失败的情况下重新治疗的，所以他总是对前人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从中吸取教训，形成自己的治疗特点。如有一次他为一个叫许鲁斋的人治病，所遇的情况就是这样。许鲁斋年58岁，面目肿胀，四肢浮肿，大便稀而次数多，不时腹胀肠鸣，饮食减少，脉弦而细。平时听医生之言，一直服用牵牛、大黄两味药物，病情时有减轻，但总不能根治，四肢还是不时浮肿。其他症状也没有完全消失，遇到阴雨天就会严重发作。罗知悌对他进行诊断之后，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病人胃气太弱，“不能布散水谷之气，营养脏腑，经络皮毛。故气行而濡，为浮肿，大便溏多而腹胀肠鸣”，主要原因还是湿气太盛的缘故。他告诉病人：人的五脏以胃气为本，“五

^①（明）孙一奎：《医旨绪余》卷下《罗太无药戒》。

脏有胃气则和平而安,若胃气虚弱,不能运动滋养五脏,则五脏脉不和平,出现这种情况,后果将十分严重,“轻则病,过甚则病死”。所以《内经》上说“真脏之脉弦,无胃气则死”,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有的医生不仔细分析病人的实际情况,只知道服用大黄、牵牛,图一时之快,而不知这样将会使病人终生受害。幸好许鲁斋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严重,还有补调的余地。于是以平胃散加白术、茯苓、草豆蔻仁等服之,许鲁斋服用几次以后各种症状消除,可进一些饮食,只有四肢浮肿还未解除。再用导滞通经汤治之,很快痊愈^①。

罗知悌曾给朱震亨讲过他看过的一个病例,又使朱震亨增长了见识:罗知悌在北方居住的时候,曾给真定路总管治病,这位总管因被别人勉强饮用了过多的酸酒,得了腹痛病,接着腹泻10多天,再接着是便后出血,有时色红,有时色紫,经常肠鸣腹泻。其他医生都以为是热病,给他服用芍药、柏皮汤之类的药物,一点都没有见效。仍然是不思饮食,稍微吃一点东西就发呕,“形体愈瘦,面青黄不泽,心下痞,恶冷物,口干,时有烦躁不得安卧”。后来这位总管请罗知悌诊治,罗知悌诊脉以后,感到他的脉弦细微弱,手足发冷,他想起《内经》上讲的结阴症就是这样,“结阴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内经》又说“邪至五脏,则阴脉不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所谓结阴病,就是阴气内结不得外行,血无所禀,渗入肠间,所以就有了便血的症状。于是罗知悌给他用了平胃地榆汤进行治疗,具体用的是苍术一钱,厚朴、陈皮、茯苓、白术、干葛、甘草(炙)各五分,干姜、当归、炒曲、白芍、人参、益智仁各三分,地榆七分,升麻、黑附子(炮)各一钱,生姜三片,枣二枚,水煎食前温服。这个方剂的功能是温

^① (明)孙一奎:《赤水元珠》卷五《论生死脉法》。

中散寒除湿和胃,服用了几次以后,病情大减。在此基础上又实施了针灸疗法,分别对中脘、气海等穴位进行针灸,主要是治脾健胃,然后嘱咐病人尽量少讲话,节制饮食,过了一段时间,病人就彻底康复了^①。

罗知悌在治病过程中对病症的仔细观察和反复分析,使得朱震亨在学习的过程中获益匪浅,不仅在医术上深受其教诲,而且在方法上给他以启迪。

罗知悌在未收朱震亨为徒的时候,虽曾使他难堪,但一旦接纳,就以诚相待。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见他医术高明而又谦虚谨慎,诚心向学,心中十分欢喜。对他的人品道德更是赞赏有加,他对他的信任和爱护如同对自己的儿子一样,他曾欣慰地对朱震亨说道:“吾道赖子不灭。”(我的为医之道能够得以流传不被泯灭,完全有赖于你的缘故呀)^②在晚年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为医之道和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朱震亨,为朱震亨以后成为医学大家打下了基础。而朱震亨在师从罗知悌学医的两年中,医学思想和理论都有了空前的突破,尤其是丰富的临床实践活动,更使他的医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罗知悌在收朱震亨为徒的时候,已是接近90岁的高龄,身体羸弱,行动不便。在朱震亨从其学医期间,很多时候都是由朱震亨直接给病人诊断,然后将诊断结果汇报给罗知悌,罗知悌只是卧床指点,详细讲明用药之要。朱震亨在治疗病人的同时,竭尽全力侍奉老师,对老师的身体也是多方保护补养,使罗知悌在晚年免受身旁寂寞之苦。尽管朱震亨对罗知悌的身体状况非常

^① (明)孙一奎:《赤水元珠》卷九《治寒之剂》。

^② (明)戴思恭:《罗太无先生口授三法·序》,转引自冯汉龙、方春阳《朱震亨年谱》。

关注，照顾得无微不至，但罗知悌毕竟年事已高，难逃自然法则，终于在泰定四年（1327）夏秋之交寿终正寝。这距他回杭定居刚好有两年时间，而收朱震亨为徒也仅仅两年。

罗知悌无儿无女，身后之事全靠朱震亨操办。朱震亨满怀悲痛，精心料理了老师的后事，极尽哀痛悲悼之情。处理完老师的后事之后，他又想起3年未曾见面的老母，不觉归心似箭，立即打点行装，踏上归途。

元泰定四年（1327）秋天，朱震亨离开杭州返回义乌，途经绍兴的时候，又会见了当地年轻的医生项昕，两人谈医论道，相交甚欢。朱震亨的医学思想使项昕获益匪浅，两人遂成了莫逆之交的同道好友。后来项昕也成了一代名医，受到当时人们的敬重。

第四章

行医治病 济世救人

疗疾治病,解人危难,是医生的天职,也是朱震亨的人生目标。自从拜师学艺归来之后,朱震亨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诊病治病、解除病人痛苦的活动之中,拉开了30多年行医生涯的帷幕。在此期间,他不顾别人的怀疑、讪笑和排斥,坚定不移地实施自己的医学主张,运用所学的医学知识,结合每一个病人的情况,灵活机动地进行治疗。治愈了无数例疑难病症,使很多濒危病人转危为安。铁的事实使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心服口服,并转而以他为师。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形成了自己的医疗风格,在医学领域中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融会贯通 灵活机动

告别项昕之后,朱震亨脚步匆匆,赶回家乡。从泰定二年(1325)春离家求师到泰定四年(1327)秋,一晃3年过去了。在这3年中,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医术也得到了提高和突破,可以说是基本掌握了医学的真谛。但他回到家乡以后,却发现这里的医学氛围还和过去一样,仍是《局方》占据统治地位。百姓有病求医,医生照例是对照病情,按《局方》开药,

结果有许多百姓只见用药,不见效果,白白贻误了病情。面对这种情况,朱震亨感到十分痛心,出于医生的责任感和对病人负责的态度,朱震亨一有机会就向乡间的医生们指出《局方》的局限,阐述自己的医学主张,并诚恳地要求他们在诊病的时候能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灵活用药,不要总是抱住《局方》不放。乡间的医生们听说朱震亨千里拜师学医回来,纷纷跑来打听他外出学医的经过,想着他一定会有十分高明的医术和见解,谁知听到的却是他对《局方》的怀疑和责难,不禁觉得好笑。于是不但没有人仔细听取和考虑他的意见,还纷纷讪笑和排斥他。只有他的老师许谦对他非常赞赏,鼓励他按照自己的主张办事。

众人的讪笑、排斥并没有使朱震亨灰心,反而使他越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他知道要改变家乡的医疗状况,提高整个家乡的医疗水平,让大家接受他的意见,得有一个过程,自己也必须拿出行动,让事实来说话。而他一向尊敬的老师对他的鼓励则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他不管众人怎么看待,怎么议论,毫不动摇,一如既往地按自己的医学主张开始了为病人解除疾苦、为乡民造福的行动。从此,他的行医生涯正式开始。在以后许多年的岁月里,他以自己精湛的医术,治好了很多病人,以实际行动向那些讪笑和排斥他的人作出了回答。

由于朱震亨的医学主张一时还得不到乡间医生的认可,所以当地人们对他的医术也怀有疑虑。一般人生病之后都不敢找朱震亨诊治,而是先让乡间医生治疗,在乡间医生实在无法治好,的情况下,才不得已地去找朱震亨。而朱震亨对此毫不在意,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来诊治的病人,他都会尽心竭力地为之诊断治疗,直至病人痊愈为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朱震亨的医术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取得了乡间医生和当地百姓的信任。

专门记载朱震亨治病案例的《丹溪医按》^①,记载了300多例朱震亨治病的案例,其中有很多就是这一时期的医学实践的真实记录。

66岁的吕仲修,曾在正月间忍饥冒寒外出劳作,风寒所侵,“头疼恶寒发热,骨节皆疼,无汗”,到第二天神志有点昏乱,口中不时妄语。病人以为是受了风寒,发发汗退热就会痊愈。于是就自己服用了两剂参苏饮,但没有出汗。又接着服用了一剂,并用衣服被子覆盖促使出汗。结果浑身大汗,但热仍不退。到第四天,请朱震亨诊脉。朱震亨诊脉以后,发现他两手的脉象均是洪而数,认为他的病表面上看起来是受了寒气,实际上是胃虚过劳所致。所以不能简单地施以攻击疗法(汗法),而是应该用大补之剂,等胃气充实了,体中的寒气自然就排除出来了。于是朱震亨给他用了黄芪、人参、白术、当归身、陈皮、炙甘草等药物,每一帖加附子一片,一昼夜服用5帖。3天以后,病人神志清楚,不再妄语。但热仍未退,而且感到口渴。朱震亨就去掉附子,又加上川芎、芍药,让其继续服用。又过了两天,病人开始想吃饭,朱震亨让家人做了肉羹给他吃。又过了两天,病人精神恢复。再3天以后,身上汗出热退。虽然脉还不散,但洪脉尚存。朱震亨告诉病人,这种脉象属于大脉,是年纪大又误用出汗法的缘故,以后身体肯定要出现虚症。所以又让他按原来的方剂服用10日。病人告诉说自从生病以来,大便即不通畅,而且便道疼痛、腹胀,想用巴豆等泻药治之。朱震亨说:大便不通并不是真

^① 《丹溪医按》原为朱震亨弟子戴原礼所集录,后为其友王宾所窃,王宾又传之于盛寅,其后便不知所之。本世纪初,温州医学院附属二院刘时觉先生检索到苏州医学院图书馆藏有一卷抄本《丹溪医按》,设法抄录整理,收入其正在研究整理的《丹溪逸书》中,于2005年12月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闭,是因为气虚无力的缘故。继续用补药,等身体强健了,大便自然就畅通了。如果用巴豆等药物排泄,使本来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后果就很严重了。于是朱震亨让他继续服用补药,并用葱、椒等熬水浸泡下体,病人开始有大便,但仍不畅通,而且又出现小便不通的情况。于是继续服用补药,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了人参、黄芪的剂量。服用两日之后,小便通利。又服用半月之后,病人能下地行走。再服用半月,身体彻底恢复^①。

还有一个36岁的男子,患心痛病18年,是因为酒后饮牛乳所致,但最初发病时饮食没有任何妨碍。得病8年以后,病人身体无汗,即使是盛夏或是洗澡、吃饭时都没有一点汗,身体感到很不舒服。其间换了好多医生,都是用丁香、附子及各种丹药治疗,没有一点效果,病人身体越来越衰弱,饮食减退,口中吞酸,大便时秘时泄,身体黄瘦,未风先寒,连衣服都撑不起来了。疼痛发作时要用东西压住疼处,方能勉强忍受。七月的时候请朱震亨诊治,朱震亨根据病情,给他用了二陈汤加白术、黄连、桃李仁、泽泻等药物,病人每天早上服药后就开始呕吐,吐出的都是味道酸苦的黑水,中间夹杂一些像浸泡发烂的木耳一样的东西。过了两个月,病人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脉象也逐渐接近正常。朱震亨以为如果坚持治疗,病人的身体就能恢复。谁知立冬以后,病情又有所反复。有一天,病人的脉象忽然“绝弱微有充满之状”,朱震亨认为当时天气温暖,病人可能会出汗,考虑到病人的气血还不够充实,汗难以发出,于是就给他用了人参、黄芪、当归、芍药、陈皮、半夏、甘草等药物。服用了两天之后,病人疼痛大减,每昼夜只发作1次。到第3天,又让其服用麻黄、苍术、当归、川芎等药,没想到药刚下咽,病人忽然目光下视、口噤不能

^① 见《丹溪医按·风寒二》。

言、面无神色、四肢不收。朱震亨连呼几声,病人都没有回应。于是他连忙用手抱住病人的头,用右手大拇指掐病人的人中,过了一会,病人苏醒,浑身大汗如雨。从此以后,疼痛不再发作,只是身体困倦、饮食量少,继续有吞酸现象。且有时感觉酸块从膈间一直反到咽喉,十分难受。于是朱震亨将其他药物全部停用,只用黄连煎成浓汤放冷,等酸块快到咽喉时将冷黄连汤饮下,酸块一遇冷黄连汤即回,如此不断反复,半日之内大约有六七次之后,病人症状消除,于是停药所有药物,只用淡粥调养。又过了3个月,至立春季节,病人又觉中脘处稍有胀急之感,面色发青,气喘急促。当时天气尚寒,朱震亨分析他是脾胃因久病衰弱,肝气凌脾的缘故,就给他用了索矩三和汤,4天以后,症状消失,以后再未复发。^① 18年之久的心痛病在朱震亨的精心治疗下彻底康复了。

明代名医江瓘在其所编撰的《名医类案》中记载了100多例朱震亨治病的案例,此略述数例。

有一次,有一个人因腊月素斋,腹中饥饿,导致胃寒病发作。再加上准备过年,劳累过度,遂发热头疼。乡间医生给他服用小柴胡汤,服后不断地出汗,神志昏迷,视听不明。脉大如指,发热不退。后来实在没办法,就请朱震亨诊治。朱震亨在诊断之后认为:冬天发热头疼是因为太阳中风,应该用桂枝汤而不能用小柴胡汤。现在病人脉大如指,视听不明,是内伤重而外感轻的症状。而脉大如指、视听不明则是由于误服小柴胡汤的缘故。于是朱震亨又给病人开了参、术、黄芪、熟附、炙甘草等药物,让他加大剂量服用。服用一天后出汗减少,两天后热退,视听基本恢复。第四天再在原来的药中加了苍术,再服用两剂,出汗、发热

^① 《丹溪医按·心脾痛十三》。

彻底消除。然后去掉苍术、附子,减少药量,服用了3天,彻底痊愈^①。又有一次,朱震亨给一个少年治病,病人先是痘疮,痊愈之后,忽然口不能张开,四肢伸直,不能弯曲。伴之以阵发性的腹痛,痛时冷汗如雨。脉极弦紧而急,好像真弦的样子。朱震亨经过仔细观察、详细诊断,认为他是因为勤苦过劳而导致血虚。在痘疮痊愈以后,身体尚未恢复、血更虚的时候,又中了风寒才成这样的。应当用辛温养血、辛凉散风的方剂,于是他“以芍药、当归为君,川芎、青皮、钩钩藤为臣,白术、甘草、陈皮为佐,桂枝、木香、黄连为使”,再加少量红花,煎服了12帖,病人身体痊愈,一切恢复正常^②。

还有一个50多岁的人,咳嗽严重,畏风惧寒,胸膈痞满,经常口干,心口疼痛。脉浮紧而数,左脉大于右脉,是表盛里虚的症状。朱震亨询问了他的饮食情况,知道他平时喜欢喝酒吃肉。有次在受风寒饥饿之后,饱食酒肉,接着就发病了。朱震亨诊脉之后,又听他叙说了病情,觉得治他的病不能着急,得一步一步来。于是先给他开了人参四钱、麻黄连根节一钱半的方剂,让他服用3帖。止嗽除寒之后,再改用厚朴、枳实、青陈皮、瓜蒌、半夏等制成丸药,用参汤冲服,服用20帖之后,胸中积痞全除,此病痊愈。这则病例在用药先后轻重的安排上,极为得当,受到很多医生的称赞^③。

清代魏之琇在其《续名医类案》中也记载了许多朱震亨治病的案例。

有一个男子,年龄79岁,头晕目眩,手足无力,口中吐痰不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二《内伤》。

②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痘》。

③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咳嗽》。

断。朱震亨经过诊脉,发现他“左手脉散大而缓,右手缓而脉大,不及于左,重按皆无力”,饮食略减,口中发渴,腹泻三四日。其他医生都以为病人是春季中风,开的都是治风的药。朱震亨看了以后,认为照这样的治法,病人恐怕只能活到春末时候。他说病人患的是虚症,需要服用一些补药,方能奏效。其他医生听了,十分生气,置病人于不顾,纷纷拂袖离去。于是朱震亨“乃教用人参、黄芪、当归、白芍、白术、陈皮”等煎成浓汤服用,每次用此汤冲服连藜丸30粒,一连服用了1年半时间,老人体力恢复,如同少壮。服用的时候春、夏、秋三季都是用上述药物熬成浓汤冲服连藜丸,只有冬季加少量的干姜。魏之琇记录这例医案时加了按语,他说:“此症大补而佐以连藜妙不可言矣。”原因是朱震亨一眼看出了老人是肝、肾之火,所以以连清肝火藜清肾火,又怕这两味药药性太寒,所以在冬季加上干姜,真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①。

离义乌不远的缙云县(今浙江省缙云县)有一个姓胡的人,年龄31岁,身体高大伟岸,家庭富足,喜食厚味。两年前得了消渴病(类似今西医所说的糖尿病),医生给他服用了寒凉类的药,得以痊愈。又有医生告诉他病后体虚,需要滋补,让他多食用黄色的母鸡。这正好符合他的口味,就持续吃了1000多只,渐渐地觉得脾胃胀满,不时有呕吐现象。医生以为是胃寒,就给他服用了附子、沉香之类的汤药,一连服了100多帖,结果病情更加严重。过了一个多月,全身发热,惧怕受风寒冷,两足也害怕着地,于是家人用糠在地上铺了一尺多厚,上面盖上垫子,方敢坐卧。两手无执笔之力,口鼻气息十分微弱,欲言无力,行10余步便困倦卧地,病情十分严重,其他医生都不愿再冒险诊治,病人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五《头晕》。

及家属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此时,有人告诉病人家属,说义乌朱震亨善治各种疑难杂症,于是家人特请朱震亨为之诊治。朱震亨诊脉以后,初步认定病人是因为内有湿痰,再服燥热类的药物,导致气耗血散,又时逢夏季酷热,对病情非常不利,但根据病人的体质情况,还有救治的希望。就以人参、黄芪、白术三种药物熬膏,煎淡五味子汤,以竹沥调和后给病人服用。3天以后,各种病症都基本消失。然后让病人素食一月,不闻肉味。一个月后,病人完全恢复健康,这时才允许喝点鸡汤之类的滋补品。再过了一个月,病人胸腹膨胀,非常难受,再以二陈汤加附子、豆蔻,煎熬饮之,立即恢复。再后来朱震亨叫病人不要吃药,也不要吃肉,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病人就彻底恢复健康了^①。

赤岸村有个姓冯的人,平时饮食不知饥饱,只要一吃肉,必定腹泻。有一天,忽然全身肿胀,头大如斗,连眼睛也睁不开。而且胸膈胀满,两足麻木,膝盖以下部分没有感觉,又十分畏寒怕风。朱震亨诊脉之后,让只用白术煮汤,早晨空腹饮用。饭后再用白术二钱、麻黄五分、川芎半钱、防风三分作汤,冲服保和丸50丸。两天之后,病人开始呕吐,身体通畅,肿胀消减,双目睁开,气顺思食。然后在原来的处方中再加白术一钱,木通、通草各半钱,冲服保和丸50丸,5日之后,病体痊愈^②。

对于病症相似的病人,朱震亨总是予以特别的关注,仔细分清疾病的异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东阳县有一个姓陈的人,个子较高,身瘦,筋骨外露。因体虚过劳而患上头疼症,发作的时候,异常难受,简直就是要和家人诀别的样子。朱震亨给他诊断以后,觉得他的脉弦而大,还有些数,就以人参、白术为君,川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九《恶寒》。

②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一八《肿》。

芎、陈皮为佐，一连服了五六天症状未见减轻。其他人非常惊讶，以为是用药有误。朱震亨说：药力有急慢，再等一两天，自然好转。谁知当晚他的弟弟来问朱震亨为什么不在药中加上黄芪，朱震亨笑而不答。过了一个晚上，病人忽然自言病已痊愈。朱震亨诊断以后，觉得他的脉还没有恢复正常，就告诉他不要大意，继续服药。又过了半天，病人说感觉胸膈胀满，不觉饥饿，也不想吃东西。朱震亨一看病状，就知道是他的弟弟在药中加了黄芪。就问他：昨天晚上是不是在药中加了黄芪，病人说是的，但是只服了3帖。朱震亨赶紧给他以二陈汤加厚朴、枳壳、黄连，以泻其卫，病人服用了3帖，彻底痊愈。

浦江义门郑氏家一个年纪20多岁的年轻人，在秋季的时候大发热，口渴、神志不清、眼睛昏花、口吐谵语，像中了邪一样。七八天之后，来请朱震亨诊治，朱震亨看了以后，觉其两手之脉洪数而实，又见他虽然体形肥胖，面色红中带白，但却筋脉外露。就分析他不是实症，是服用凉药所致。这是因为过劳成病，服用温补药自然痊愈。于是“以黄芪附子汤，冷与之饮”，服用3帖以后，病人困倦鼾睡，又出了少量的汗，感觉舒服很多。朱震亨又给他继续服用黄芪白术汤，一直服用了10天，病人的脉渐收敛而小，又服用了半月彻底痊愈^①。

从表面上看，上面这两个病人的情况基本一样，都是过劳困倦，筋骨外露。一般人可能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治疗，而朱震亨在对病人的情况仔细观察分析以后，却开出了不同的方剂，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一个一直用黄芪，一个一点不用。连他家人偷偷地加了一点，也要赶紧用其他药物化解。很多人对此甚为不解，就问朱震亨为什么要这样做？朱震亨说：这是因为黄芪是补气

^① 以上两例皆见朱震亨《格致余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

的药,而这两个病人一个气虚需要补,就一定要用黄芪;另外一个气实,不仅不需要补,还需要适当地泻,当然不能用黄芪了,如果用了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就是朱震亨听说东阳县陈姓病人家给他服用了黄芪之后,赶快用其他药化解的原因。听了他这番入情入理的分析,人们对他看病的细致和用药的精到就十分佩服了。

朱震亨有一个族叔,形体和脸色看起来都很健康,但却身患数病:痰疔、痢疾并发。但这位族叔自恃身体强健能食,在饮食行为上没有一点顾忌。一天他对朱震亨说:我虽然有病,但身体强健且食量不减,就是苦于出汗太多,你能想法给我把出汗止住吗?朱震亨说:痰疔一定要出汗才能痊愈,现在你的病的可虑之处就在于身体强健能食,这不是痢疾,是胃热能消化,而脾又很虚弱,不能消化,食积与病势已经很严重了。现在一定要“节择饮食以养胃气,省出入以避风寒”,等汗出透了,病情自然会好转。谁知这位族叔不但不听朱震亨的劝告,还说:人常说世上没有饱死的痢疾,我现在身体强健,又能吃饭,怎么能说有忧虑呢?朱震亨耐心地解释说:正因为痢疾而能食,所以知道胃气没有受到伤害,但如果不加节制,伤了胃气,病情的发展就很让人忧虑了。这位族叔没有听从朱震亨的告诫,依旧是大吃不止,毫不节制。有次吃完饭后感到口渴,又吃了很多水果。胃里开始难受,但仍不醒悟,依旧是大吃不止。这样又过了一个月,逐渐不思饮食,身体困倦、委顿,病情越来越严重。虽这时后悔,已经晚了,最后终于奄奄不起,一月后去世。

还有一个姓周的人,和朱震亨族叔的病情一样,“形色俱实,患痢善食而易饥”,也是大吃大嚼,毫不节制。等请朱震亨诊治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是5天了。朱震亨听说之后,眉头紧皱,责备他说:身在病中,就当调补保养,怎么可以恣意饮食,自我戕

贼呢？然后要他严格按照要求进食，每日只能吃熟萝卜和少量的粥，同时用药物治疗，这样治疗、调养了半个月以后，这个病人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①。

同样的病情，不同的保养，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所以朱震亨每次给病人诊治结束后，都要谆谆告诫病人要严遵医嘱、谨守禁忌，这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治疗效果。为了让病人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对严守禁忌的原因和重要性还作了特别的说明：人体中的胃气是清纯冲和之气，是人赖以生的根本。如果有人有过思、过劳、过忧或嗜欲无度，都会引起饮食失常，都会使胃气受到伤害。胃气受到伤害之后，就须要用调补之药，使胃气慢慢恢复。如果在胃气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又恣意犯禁，就会导致旧伤未愈，新伤又生，情况严重可使胃气完全败坏。这样尽管医药不断，但败坏的胃气却无法恢复，病人也就没有治好的希望了。

以上病例在过去都算疑难之症，医生往往按照《局方》开药，结果导致误诊，让病人多受痛苦，甚至一命呜呼。而朱震亨在治疗过程中坚定不移地以《内经》为主要依据，广泛吸取张仲景、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等人之长，再根据病人的实际，运用从罗知悌那里学来的方法进行诊治，对各种方剂融会贯通、酌情加减，治疗方法灵活多变，使病人能在短时期内解除病痛。

朱震亨从罗知悌处归来正式开始以医术造福百姓，一直到30年以后去世。其间经他诊治的病人无数，被他治愈的病人不啻千百，很多疑难杂症在他手里得到治疗。仅医书记载的有关他治病的病例就有几百个之多，以上仅是其中极少的几例。就从这极少的几个病例中，也可以看出朱震亨在医学上的造诣和不拘一格、灵活机动的治疗方法。可以说，在拜师学医回来后的

^① 以上两例均见朱震亨《格致余论·大病不守禁忌论》。

日子里,朱震亨在诊断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也是令人心服口服的。正如戴良在《丹溪翁传》中所说的那样,朱震亨在治病过程中向来都是“不胶于古方,而所疗皆中。然于诸家方论,则靡所不通。他人靳靳守古,翁则操纵取舍,而卒与古合”^①。他的同乡后人,著名的藏书家吴之器在其所著《婺书》中也说他自从学成而归后,“每治疾,往往以意为之,巧发奇中,按之书,无有也。诸医皆惊,已而讪且排之,卒乃大服,愿为弟子。其名藉甚,遍浙河东西,以至吴中,罕不知有丹溪生者”^②。他的再传弟子卢和也说他“得罗知悌传,取《素问》而下诸书读之,研精覃思,融会贯通,于是而折其衷,若仲景之外感、东垣之内伤、戴人之攻击,与夫擅业一家者,咸均有而时出之”^③。

朱震亨高超的医术,灵活多变的治疗方法,卓越的医疗成就,也使得那些原先对他讪笑排斥的人彻底改变了态度。当有了他们难以治好的大病或者是疑难病症时,就会主动和他商讨治疗方案,向他请教。有的人还诚心诚意地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全新的医学理论和疗法,使义乌一带的医学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

高朋满座 相与切磋

朱震亨学成回乡的第三年,也就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事情是这年八月,他的亲戚兼同学吕权的去世。吕权小震亨11岁,去世时仅38岁。黄潜说他从小就“习于礼度,以

① (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〇《丹溪翁传》。

② (明)吴之器:《婺书·朱聘君传》,转引自冯汉龙、方春阳《朱丹溪年谱》。

③ (明)卢和:《丹溪先生医书纂要·序》,转引自冯汉龙、方春阳《朱丹溪年谱》。

简静自持,不妄言笑。服用无华饰,然其立志果锐,遇事机警”。不到13岁母亲去世,他就能帮着父亲料理家务,照顾弟妹。年长以后,曾和朱震亨一起到八华山师从许谦学习,学习极其刻苦认真,“考质玩覃思,或竟夕不寐”^①,其精勤刻苦为同学所推崇。吕权的病是在年轻时候因为长子吕炳的天亡,过度悲伤而落下的病根,当时庸医胡乱开药,吃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效果。到泰定三年(1326)秋天,病情刚有点好转,地方政府又催促他去省城杭州参加乡试,结果因疾病发作未去。后来身体情况越来越衰弱,又熬了10多年,终于去世。吕家是太康大族,吕权和朱震亨曾有同窗之谊,吕权的去世,使朱震亨更加感到庸医误人的可怕,也更加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吕权的死使朱震亨少了一个集同学、亲戚身份于一体的朋友,是他生活中的一大憾事,但另一方面,在回家乡行医的这段时间里,他也结交了许多儒学和医学上的知己,后来都成了终生不渝的朋友。这就是当时浙东有名的大儒宋濂、胡翰、戴良、叶仪、黄溍和当时著名的医生杜本和葛乾孙。

宋濂(1310—1381),字景濂,祖先为金华潜溪人,后迁至浦江(今浙江省浦江县)。宋濂从小师从同乡人闻人梦吉学习“五经”,后来又师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学习。闻人梦吉的父亲闻人诜曾从王柏学习理学,造诣颇深。梦吉从小受教于家庭,父子自为师友,朝夕探讨,相互切磋。梦吉10年足不出户,潜心精研,对六经义理无不精通。10年以后开门讲学“学者争趋之,……前后学徒著录者无虑二千人,随其资质而裁之,多为成材”^②,宋濂就是在他开门讲学后随他学习的。吴莱也是浦

① (元)黄溍:《文献集》卷八下《吕君墓志铭》。

② 康熙《金华县志》卷五《卓行》。

江人，父吴直方，曾为元集贤殿大学士。吴莱7岁就能写文章，后因举进士不利，隐居深山，潜心学习，深究诸书之奥义。著述众多，深得为文旨要。他说作文和用兵是一样的。用兵有正有奇，正就是法度，一定要号令严明，听从指挥，队伍严整。奇就是灵活运用，不受法度的约束。千变万化，运用自如，“坐作击刺，一时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还其队，元不曾乱”^①，在文章方面卓有造诣。柳贯，浦江人，曾受学于金履祥门下，和许谦有同门之谊。柳贯也是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算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他的文章“沉郁舂容，涵肆演迤，人多传诵之”^②。黄潛是义乌人，聪敏好学，精读群书，曾师从长山县（今浙江省金华市长山乡）教谕王炎泽学习，以文章称著于当时。其品格高尚，在朝为官时“莅官清白，升朝挺立，无所附”；其操守品格“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其学识极博，“博极天下之书，而约之于至精，多先儒所未发”，著述众多，与浦江柳贯、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齐名，人号为“儒林四杰”^③。宋濂师从这些人学习，真可谓既有根底，又有源流。

宋濂师从吴莱和柳贯学习时，经常往来于潜溪和浦江之间，后来干脆举家迁徙浦江定居，和义乌相距很近。再后来师从义乌黄潛学习，更是经常在义乌居住，自然要去拜见朱震亨，二人言谈极为投机，竟有相见恨晚之意，以后遂成忘年之交。宋濂自己说他自从“加布于首，辄相亲于几杖间，订义质疑，而求古人精神心术之所寓。先生不以濂为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极言而无

①（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四《吴莱传》。

②（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四《柳贯传》。

③（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四《黄潛传》。

所隐，故知先生之深者，无逾于濂也”^①。宋濂这里所说的“加布”，就是加冠的意思。古代男子到了成年，老百姓用布把头发束起来，叫做“加布”，达官贵人的子弟则用冠把头发束起来，叫做“加冠”。加冠的年龄一般是20岁左右，表示男子已经到了成年。朱震亨大宋濂30岁，宋濂加冠时，朱震亨已经50左右，而且是声名卓著、受人尊敬的学问家和医生。但他不以宋濂晚出就稍有轻慢之意，而是满腔热情地和他交往。这一方面说明宋濂当时确实是少负才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朱震亨有知人之鉴。元惠宗至元初年（1335）经地方政府的举荐，元政府曾征召宋濂到朝中担任翰林院编修，宋濂以父母年龄大为理由，谢绝未去，隐居于龙门山中读书著述。到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也就是朱震亨去世后的半年，明太祖朱元璋攻克东南，召见宋濂。改元婺州路为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创办郡学，聘请宋濂为《五经》教授。洪武二年（1369）明政府准备修撰《元史》，以宋濂为总裁，八月份《元史》修成以后，又以宋濂为翰林学士，以后又迁为侍讲学士，并担任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教导太子，总是以礼法为标准，要求他以《四书》、《五经》为行为规范。讲到历代兴亡之事，总是明确地指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毫不含糊。宋濂担任太子老师有10多年时间，一直受到当朝皇帝朱元璋、皇后马氏和太子朱标的敬重。

不管宋濂以后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他和朱震亨及其家族一直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友谊，朱震亨生前，他曾先后为朱震亨的祖父、父亲和姑姑都写了传记，给朱震亨的母亲写了墓志铭。他虽然是以儒出名，不事医学，但对朱震亨在医学上的成就却极为关注，朱震亨的第一本医学著作《格致余论》就是宋濂为

^①（明）宋濂：《文宪集》卷二四《石表辞》。

他写的序。朱震亨去世以后，宋濂又为他写了好多文字，尤其是几千字的《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对他的一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热情的称赞，成为今天研究朱震亨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胡翰也是金华人，字仲申，从小就聪明好学，品德高尚。他7岁的时候，曾在路上捡到别人遗失的金钱，当时路上没有一个人，一时找不到失主。于是他就坐在路边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从原路返回寻找财物的失主。胡翰向来人仔细地问清情况后，就将捡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归还于失主。长大以后，胡翰师从兰溪（今浙江省兰溪市）吴师道、浦江吴莱学习古文，然后师从许谦精研理学，是朱震亨的同门好友。胡翰的文章出类拔萃，受到黄潛、柳贯的称赞。宋濂曾说胡翰在少年的时候就精读六经，能背诵几十万字，在诸生中引起震动，连那些宿学老儒都为之敬佩，“同郡大儒若吴贞文公立夫先生尝师事之矣，吴公亟称其才不置。黄文献公晋卿以文学名天下，见先生辄延致共语，所以期待者甚隆”。成年之后，更是“奇迈卓越，务师古人。出言简奥，不烦而动中绳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①。清人朱彝尊称他的诗作是金华文人诗作中的巨擘^②。

胡翰年轻的时候，曾去元朝大都游览，受到许多达官贵人的赞誉，不少人劝他出仕元廷，都被他婉言谢绝。元末天下大乱，他隐居南华山以著书为事，文章与宋濂齐名。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克金华，召见胡翰，让他与许元等十几名文士一起会食于中书省，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后又将胡翰召至国都南京。当时明政府准备下令把金华的百姓编为军籍，让他们练兵作战。胡翰很从容地对太祖说道：“金华人多业

①（明）宋濂：《文宪集》卷七《胡仲子文集序》。

②（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转引自纪晓岚《胡仲子集提要》。

儒 鲜习兵 籍之 ,徒糜饷耳”^① ,他的意思是说金华地方的百姓大多以儒为业 ,很少有懂得军事的。如果让他们去当兵 ,战斗力肯定不强 ,很可能是白白地浪费军饷。明太祖听从了胡翰的意见 ,中止了这道命令 ,使金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后来朝廷授胡翰为衢州教授 ,负责整个衢州地区的创办学校、教育生徒之事。洪武初年 ,胡翰和宋濂一起参与修撰《元史》。在修史过程中 ,胡翰以非凡的才华受到人们的称赞 ,到了清代初年 ,徐乾学还称赞他“以布衣预修国史 ,名烂天壤”^②。《元史》修成之后 ,他谢绝了朝廷的挽留 ,仍旧回到家乡 ,隐居于附近的长山 ,继续以读书著书为乐趣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后来学者尊称他为“长山先生”。胡翰和朱震亨不仅是同学 ,还是儿女亲家 ,胡翰的女儿嫁与朱震亨次子朱玉汝 ,两家关系非常亲近 ,胡翰和朱震亨的关系当然也非常亲密了。朱震亨在家乡行医时 ,经常客居金华 ,一般都是住在姻亲胡翰家里。朱震亨去世后 ,胡翰为他写了《忆丹溪先生哀辞》 ,回忆了他和朱震亨的交往及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 ,情真意切 ,感人肺腑。这同样是研究朱震亨的宝贵资料 ,也是他们之间友谊的见证。

戴良是浦江人 ,字叔能 ,曾师从黄潘、柳贯、吴莱等人学习古文 ,学识渊博 ,“通经、史百家暨医、卜、释、老之说”^③。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克东南 ,戴良和胡翰等人一起被召见 ,会食于中书省 ,让他们轮流给朱元璋讲解经书。第二年 ,王宗显创办郡学 ,任用戴良为学正^④ ,但戴良不久即弃官回家。至正二十一年

①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列传一·胡翰传》。

②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所纂之《词林典故》卷五 徐乾学《翰林院题名碑记》。

③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列传一·戴良传》。

④ 明代设置于国子监和府、州(郡)学的官员 ,职责是教诲所属的生员 ,品阶为从八品或正九品。

(1361)元政府又征召他为江北行省儒学提举。戴良仍然采取了逃避态度,并避居到吴地,投奔了张士诚。张士诚即将战败,戴良又带领全家渡海到达山东,欲投奔元军将领扩廓帖木儿,因道路不通而寓居昌乐(今山东省昌乐县)。洪武六年(1373),戴良回到家乡,改名埋姓,隐居于浙江东部的四明山。十五年(1382)明太祖朱元璋将戴良征召至南京,准备授以官职,遭到戴良的拒绝,第二年自杀而死。由于戴良祖辈居住于金华九灵山下,所以又被学者尊称为“九灵山人”。

戴良和朱震亨的友谊也是源远流长,戴良的哥哥戴仲积和次子戴思乐、侄子戴思恭、戴思温都是朱震亨的入室弟子,师从朱震亨学医,后来都卓卓有名。所以戴良和朱震亨的关系也不同寻常。朱震亨死后,戴良为之写了著名的《丹溪翁传》,不仅是今天研究朱震亨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医院校的通用教材和学生的必读之书。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曾师从许谦学习,和朱震亨有同门之谊。叶仪在从许谦学习的过程中,对许谦关于“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的教诲,朝夕揣摩,精研其深奥的旨意,终于尽得其中精妙。后来,叶仪也开门讲学,周围的士子们纷至沓来,争相投奔到他的门下^①。叶仪在元至正十八年(1358)和宋濂、胡翰、戴良等人一同受到朱元璋的召见,会食于中书省。后来王宗显受命创办郡学,叶仪和宋濂一起被聘任为《五经》教授。当时郡学初创,担任教师职务者都是一时才俊,时人甚感欣慰。清代谷应泰在其所著《明史纪事本末》中对这一盛事进行了记载,他说至正十九年(1359)王宗显知宁越府事,受命“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

^①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列传一·叶仪传》。

沉、徐原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声,无不举手加额”^①。后叶仪以老疾为由,辞去教职,隐居乡中,以奉养双亲著书立说为事。他的好朋友吴沉对他的品格极为赞赏,说他“理明识精,一介不苟,安贫乐道,死而不变”^②。

以上诸人在当时都是一时文学之士,虽然以后各人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不同,但和朱震亨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朱震亨在世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入朝做官,均是隐逸林泉之中,以学经求道、著书立说为务。朱震亨在行医之余,也经常利用闲暇和他们欢聚一起,谈经论道,探讨理学的真谛。而朱震亨又把儒学和医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终于成为中国中医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儒医。

除此以外,朱震亨和浙东大族萧山楼氏、浦江郑氏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和这两个家族中的许多人都是莫逆之交。

萧山楼氏家族中的楼友贤和朱震亨关系非常友善,常有诗歌往来。楼友贤的儿子楼英曾和戴原礼一起师从朱震亨学医,是朱震亨的得意弟子。他曾编辑有《仙岩漫录》,其中收有朱震亨赠其父的律诗一首,名为《柬信斋教谕》,诗云:“一卧丹溪相见稀,小园日日掩柴扉。学农未便妨书课,观物时常识佛机。帘卷午风花力懒,畦经新雨药苗肥。晚来不惜尘双屐,扫榻殷勤话夕晖。”^③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数量极少的朱震亨的诗作之一,所以就显得格外珍贵。《仙岩漫录》还收有楼友贤赠朱震亨的诗篇,楼友贤在其中极力称赞朱震亨的医术和医德,足见对朱震亨的敬佩。朱震亨去世后,楼英奉父命到义乌吊唁,表达了两代人

①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 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七六《人物五·儒林》。

③ 转引自刘时觉《丹溪九族师友考》(《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2期)。

之间的友谊。

浦江郑氏家族中的郑太和对朱震亨佩服之至，郑氏是当地大族，10世同居，受到朝廷的表彰。朱震亨认为郑氏家族之所以能做到10世而同居，是严格按照礼法行事的结果，对他们的做法十分赞赏，每谈及浦江郑氏，总是“为之喜动颜面”，而郑太也和羡慕朱震亨大儒兼名医的声望，对朱震亨非常尊重，“其家所讲冠昏丧祭之礼，每咨于先生而后定”^①。郑氏家人有病，也乐于请朱震亨前去诊断，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就有关于给浦江郑氏看病的记载。

此外，朱震亨的朋友还有和他同道的杜本、项昕和葛乾孙。

杜本，字伯原，号清碧先生，祖先为京兆杜陵人，后徙天台县（今浙江省天台县），又徙清江县（今江西省樟树市），至杜本时为清江县人。杜本刻苦好学，知识广博，于“天文、地理、律历、度数，靡不通究”。江浙行省丞相忽刺术看到他所上的《救荒策》，十分赏识，后竭力推荐他入朝为官，杜本因此被召入宫中，但他很快又辞去官职，隐居武夷山中学道。至正三年（1343）因丞相脱脱的荐举，朝廷下令赐予他金织文币、御酒，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在使者催促下，杜本不得已动身入朝。行至杭州，又称自己身体有病而坚决辞谢。并致书于丞相说：“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则可言制礼作乐，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在杭州居住多时，后仍回武夷山修道^②。杜本曾就罗知悌学医，与朱震亨有同门之谊。但因其志不专在医，所以医术逊于朱震亨。有次杜本自己患了脑疽病，自治不能痊愈，朱震亨前去探视，问他为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四《石表辞》。

② 《元史》卷一九九《隐逸列传·杜本传》。

何不服用防风通圣散。杜本回答说:已经服用好几帖了。朱震亨说:何不用酒制之?杜本一听,心中醒悟,就按照朱震亨的话用酒制药,“服不尽剂而愈”^①。从此杜本对朱震亨的医术十分佩服,一有机会就和他切磋。

项昕自从泰定四年(1327)与朱震亨谈医论道之后,听朱震亨讲了师从罗知悌学医的收获,感到十分振奋,后来他又到钱塘拜访名家,对“古方治今病”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项昕还去拜访了葛乾孙,探讨刘、张、李三家之学,基本是接受和继承了朱震亨的医学主张,后来也一直和朱震亨保持联系,时时和他就医学上的问题进行切磋。项昕所著《脾胃后论》,弥补了李东垣《脾胃论》之不足,时人予以很高的评价,谓其“凡内外伤之有关于脾胃而为病者,莫不条举而缕述之。仍以对病之方,与夫临时加减之法系于后,信有以补东垣之未备”^②。

葛乾孙,字可久,江苏长洲人(今江苏省吴县),其父葛应雷,是江南著名的医生,著有《医学会同》20卷,“推五运六气之标本,察阴阳升降之左右”,以此确定“五脏六腑之虚实,合经络气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③。其医学主张与北方的刘完素、张子和等人十分吻合,是早期在江南传播刘、张之医学主张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是北方一个姓李的名医在吴地为官,有次与葛应雷谈论医事,深为葛应雷的医学见识所折服,于是向他介绍了北方医学的情况,并赠给他张子和、刘完素等人的医书,从此北方的医学就开始传入南方^④。葛乾孙继承了父亲的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四九《脑疽》。

② (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一《脾胃后论序》。

③ (清)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一七《方技传·葛应雷》。

④ 《明史》卷二九九《方技列传·葛乾孙列传》。

医学传统,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了医学的真谛,治病得心应手,奇思奇中,人服其神妙。并著有《十药神书》、《医学启蒙》等书,曾和朱震亨有过治疗上的合作,且推崇朱震亨的医术和为人,两人相互推崇、相互信赖,私交很好。

这些朋友经常到义乌和朱震亨谈经论道,探究医术。还有当时凡是往来于金华的士大夫,也都要到朱震亨的居所拜访。所以朱震亨的住所中经常是高朋满座,堪称一时之盛。

朱震亨于儒于医都很精通,性格刚毅严正而又清明坦荡,为人光明磊落,所以人们都乐于和他往来。他也乐于用儒家的道德理念来教化众人,使“老者则爱慈祥,幼者则乐恭顺,莫不皆知忠信之为美”。朱震亨不光用儒家的道德礼仪来教化别人,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他处处“以躬行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为礼乐之原。积养之久,内外一致。夜寐即平昼之为,暗室即康衢之见。汲汲孜孜,毫而弥笃”。平时生活非常简朴,“服御唯大布宽衣,仅取蔽体,藜羹糗饭,安之如八珍。……其清修苦节,能为人之所不能为。而于世上所悦者,淡然无所嗜”。如果听到别人的嘉言善行,总是“如恐失之,随闻随录,用为世劝”。遇有不行操守者“必诲其改,事有难处者,又导之以其方”。所以有的人有了一点过错,唯恐朱震亨知道,总是自觉改正。朱震亨不仅用高超的技艺治疗了人们身体中的病痛,还以其高尚的情操感化和教育了周围的人,真正做到了“凡先生杖履所临,人随而化”^①。

疑难杂症 所疗皆中

通过几年来的医疗实践,朱震亨的医术日臻精湛,名声远播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四《石表辞》。

浙江东西,但朱震亨并不以此而自满,在看病之余,对刘完素、张从正、李杲等各家的宗旨不断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研究,分别找出他们的长处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创立全新的医学理念。他认为刘完素和张从正的学说主要是“其论脏腑气化有六,而于湿热相火三气致病为最多”,于是推陈出新,以泻火之法疗之。但是如果遇有阴虚火动或阴阳两虚、湿热自盛的病人,那又得根据情况随时增减,不可一概而论。又认为李杲所说的饮食劳累内伤脾胃,则使得胃脘中的阳气不能升举,并使心肺之气陷入中焦,这种情形不该用泻法,而应该用补中益气之剂治之,才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些都是前人所没有看到、说到的。他又说,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从自然现象看,“天不足于西北,地不满于东南。天阳也,地阴也”。所以“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什么都用补中益气剂治之,对于西北之人可以有效,而对于东南之人恐怕就是不能治病,反而要增加新的疾病了。所以他对刘、张、李三家的学说既不是奉为圭臬,一点也不敢有违,同时也看到他们学说中的精华,“去其短而用其长,又复参之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①。正是有了这种不泥于成规,勇于创新,且又能将儒学精华贯通于医学之中的态度和做法,朱震亨的名声和事业才能够如日中天,愈来愈显,一般病症只要是经过他的治疗,都能够手到病除。就是许多别人难以医治的疑难杂症,到了他的手中,也都会收到转危为安、起死回生的效果。

元统元年(1333)八月,朱震亨53岁。这年,他的好朋友叶仪身体患病,先是胸膈胀满,接着又痢下不止,腹中剧烈疼痛,四

^① (元)《九灵山房集》卷一〇《丹溪翁传》。

肢困倦无力,卧床不起。实在没有办法,就给他躺在床上铺上东西,让他随意方便。这时朱震亨正好在金华,听说了叶仪的病情,立即过去诊治。叶仪吃了朱震亨开的药以后,不但没有见好,反而病情加重,引起了朋友们的非议。但一向谦虚谨慎的朱震亨这次却一反常态,好像没有听见朋友们的议论一样。过了几天,叶仪的病情更加严重,痰堵于咽喉,如同败絮,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昼夜呻吟,难受异常。朋友和家人都为叶仪捏了一把汗,叶仪自己也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在晚上与两个儿子诀别。两个儿子看着父亲痛不欲生的状况,伤心得大声痛哭。外边的人听见了,以为是叶仪死了,于是消息很快传了开去。朱震亨听到消息后,非常肯定地说:肯定有人在误传消息,叶仪不会死的。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朱震亨就来到叶家,给叶仪诊脉之后,开了一帖小承气汤的方剂让叶仪服下。叶仪服药之后,不一会就觉得肚内有声,下泻不止。第二天又服了一帖,再泻,然后神志逐渐清爽。再过了一天,居然能喝稀粥了。以后就按照朱震亨的嘱咐,慢慢调养,病情竟逐渐痊愈了。

对于叶仪的病情变化,朋友们大为惊异,纷纷向朱震亨询问其中的奥妙。朱震亨说:我第一次诊病的时候,发现病人的脉虚,形体虽然还称壮实但面色黄中发白,知道这是平时和人说话太多的缘故。说话太多的人容易伤中气,再加上他平时生活无规律,有时失之于太饿,有时伤之于过饱。太饿则伤胃,使胃气虚弱,过饱则一时不能消化,容易形成积滞。一般像这种病,用的都是泻法,先要清理干净肠胃中的积滞物。但当时病人由于中气大伤,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如果先用小承气汤行泻,就会伤了元气,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而不能一开始就用泻药,要用丹参、白术、陈皮、芍药等药进补。本来病人就是实症,还要进补,病情怎么会不加重呢?但如果如果没有这10多天的补养,就不能经

受这两帖小承气汤的攻击。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先滋补胃气,使之能经受住攻击,然后再用攻击之法,就可以使病情彻底消除了^①。朋友们听后连连称道,佩服朱震亨对病情的分析和正确的治疗方法。

朱震亨治疗叶仪的方法,和当初罗知悌给那位四川籍僧人治病的方法一模一样。叶仪的病情虽然不是忧思所致,但身体虚弱、腹内积滞的情况却和那位僧人的情况是一样的。一开始如果先用小承气汤,使之下泻,必然要大伤元气,甚至会断送了叶仪的性命。所以朱震亨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先滋补使之充实,经得起攻击,然后再行排泄,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有一个妇女,年近四十,为人做婢,性格沉郁而多忧。一连3个月没有来月经,小腹中间有一个气块,开始时像板栗大小,后来逐渐大得如同烧饼,且有疼痛之感。朱震亨给她诊脉以后,发现她两脉皆涩,用手一按腹中的肿块,她就感到疼痛异常,难以忍受。朱震亨根据病情,先给她开了千金消石丸,吃了四五帖以后,她说自己的乳头忽然发黑,而且有少量乳汁,恐怕是怀孕了。朱震亨很肯定地说:根据你的脉象,绝对不是怀孕。又让她继续服用了几帖千金消石丸,服用以后再次诊脉,觉得脉象虚弱无力。朱震亨一下子意识到前面的药力太过,伤了胃气。于是赶快停用千金消石丸,改用四物汤,加白术、陈皮两药,不间断地服用了30帖。候脉象完全恢复,再接着服用千金消石丸。服用了四五次以后,病人说肿块消了一圈,朱震亨就停止用药。半个月之后,月经来潮,流下很多黑血,并有一些小小的血块。腹中的肿块小了一半之后,病人很高兴,又来求药,希望继续服用千金消石丸,彻底消除剩下的肿块。朱震亨告诉她,现在不要忙着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

服药了,等下次行经时肿块就会彻底消除的。下个月月经来潮之时,果然又流了许多黑血,下了一些血块,肿块又消除了很多,只剩下板栗大的一块。这时病人又来求药,想尽快使肿块彻底消除,朱震亨诊脉之后说用不着再服药了,只要按照医嘱,严守禁忌,下次行经,即可消尽。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和朱震亨所说的一样^①。

通过对这位婢女和叶仪病情的治疗,朱震亨一方面在不断借鉴罗知悌的治疗思想及方法,一方面对张子和的攻击论理论和治疗方法进行了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把攻击疗法和胃气的虚实紧密结合,胃气实者攻击可行,而胃气虚弱者非唯不能实施攻击疗法,反而要先行滋补,使之廩实,然后再实施攻击疗法,就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否则,不问病情如何,一概使用攻击疗法,就会使病人元气大伤,不但不能恢复,严重者还会使病人失去生命。正是朱震亨这种实事求是、灵活多变的医疗方法,才使得张子和攻击疗法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臻于完美。保护正气,在此基础上祛除邪气也成了朱震亨治病的一个特点,也是后来温补派形成的实践基础。

对于其他疑难杂症,朱震亨也都能够根据实际,对症下药,使病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得到康复。

有一位女子,年龄十七八岁,饮食起居都很正常,但忽然头发全部脱落,痛苦不堪。经朱震亨诊治后,发现她的脉微弦而濡,轻重皆同,分析是因为平时吃饭口味太重,导致湿热痰积。再加上她喜欢食用酸梅,致使湿热之痰随着上升之气到了头部,熏蒸发根,使得发根之血渐渐枯槁。头发失去滋养,就会脱落。应该服用补血升散之药。朱震亨给她用了防风通圣散方剂加减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

兼以四物汤,用酒合成小剂量,用灰汤煎服。两月之后,湿热渐解,于是停药食疗,饮食坚持淡味,两年以后,头发生长如初^①。

还有一个人年龄50岁,形体肥实,饮食口味很重,而且性格忧郁。双手脉常沉涩。春天一开始就患上痰症。其他医生认为是虚寒症,让他服用了许多燥热香窜之类的方剂。到了四月份,病情加重,双足软弱无力,难以行走,饮食大减,后来又找朱震亨诊治。朱震亨诊断之后说道:这是热症导致脾虚,进而引发了痿厥之症。因为病人形体肥实、脉沉,所以还不是绝症。但由于服用了过多的燥热香窜之药,恐怕是难以医治了。暂且先用竹沥冲服白朮膏,服用二斤之后,如果气降进食,或许还有希望。然因为时过晚,已无回天之力,病人还是在一月后大汗而死^②。这一病人的死虽与朱震亨无关,但他对病症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中得出很多教训。

有一农人,由于家贫,终日勤劳不辍,不得休息。到了深秋时节,浑身发热,手足剧痛,昼轻夜重。医生先是给他按照风病治疗,服药以后疼痛更剧。又给他按照气病治疗,也没有效果。后来到朱震亨那里求治。朱震亨诊脉以后,感到他的脉象濡而数,右边比左边严重。脉濡是血少而淤,数则是热病的表象。病人饮食如常,但形容消瘦。这是因为疼痛过度而导致的消瘦,不是病的缘故。于是朱震亨给他开了苍朮和酒黄柏各一钱半,生附子一片、甘草三分、麻黄五分、桃仁九个,用姜汁煎煮,趁热辣时喝下。4帖之后,去附子加牛膝一钱,又服用8帖之后,疼痛大减,但又出现了气喘。朱震亨认为这是血虚的症状,也是由于服用麻黄过多,阳虚被发动而上奔的原因。于是又给病人服用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二《显》。

②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痰》。

了四物汤,其中川芎、芍药加倍,再加人参二钱、五味子12粒,服用2帖以后,气喘止息。3天后脉象基本恢复正常,但疼痛时仍有发生。又用四物汤加牛膝、参、术、桃仁、陈皮、甘草、槟榔、生姜等药物,服用50帖以后痊愈^①。

朱震亨治病,只要有一点希望,决不轻易放弃,总是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诊治,直到病人康复为止。

有一个40多岁的妇女,因为生子多触胎,所以经常腹痛。平时夜里还喜欢喝酒,3杯下肚后即睡。她的丈夫性格暴躁又喜欢谐谑,也经常借酒解怒。有一次,妇女在九月中旬腹内疼痛发作,眼睛上视,扬手掷足,一动全身大筋皆动,喉咙发出的声音有如拉锯,口吐涎沫,样子十分吓人。发作一个时辰以后又归于安静,好像睡熟了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再过半个时辰,小腹发胀,疼痛减轻。过一会儿又心痛大作,大汗淋漓,从头到乳而止。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半个时辰左右,疼痛渐止,汗也慢慢收了。病人疼痛的时候,能说自己哪里痛,其余的话却都是些荒唐之言。疼痛发作时不认识人,别人问话也不回答;过后却又像睡熟一样。痛症和癫痫在病人身上反复发作,昼夜不息,不仅是病人痛苦,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夜不能眠。折腾了两个晚上之后,家人请朱震亨前来诊视,朱震亨发现病人疼痛时脉有四指半,似弦非弦,左弱于右。由于病人一直是痛、痫交替发作,所以朱震亨没有轻易用药,等病症发作时再进行观察。过了一会儿,果然癫痫发作,朱震亨诊其脉象,觉得病人“六脉皆隐,但自大筋转于指下,眼白青而面不青,手之动三倍于足”。朱震亨问家人是不是病人疼痛时一定要重按,癫痫发作时汗必然不出,家人说是这样的。朱震亨说,妇女得的并不是死症,只要能咽下药就能治,要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喘》。

家人在妇女能下咽的时候给她灌些附子末。他们说话的时候，正好女人的癫痫不作，于是家人趁机给她灌了半杯附子末，然后朱震亨又急催人烧竹沥，还未等烧好，病人的疼痛就发作了。朱震亨认为病人“肝有怒邪，因血少而气独行，所以脾受，则肺之间旧有酒痰，为肝气所侮，郁而为痛”，又因为酒性喜动，可以出入升降，所以“入内则痛，除外则痢”。朱震亨根据病情，对症施治，“乘其入内之时，急为点大敦、行间、中腕三处，令分头同时下火灸之，足上艾火少，灸先了，腹上之痛渐下至腰而止”，治疗之后，病人熟睡了一会，症状有所减轻。又趁病人痢症没有发作的时候用竹沥加少量姜汁灌下大半盅，病人熟睡如故。

但从此之后，病人一天两夜不省人事，众人都说不可救了，表示放弃。朱震亨说：病人身不发热，痛则出汗，五六天时间大便不通，而且自从朱震亨来治病之后也没有见病人小便，一直熟睡不醒，应该是血少无神的缘故。于是朱震亨用手使劲掐病人的人中穴，几乎要掐断的时候，病人忽然呻吟了几声，赶快给灌下人参汤和竹沥，病人咽了几口又昏睡过去。朱震亨就让其家人做了人参白术膏，用竹沥调和服下。过了两个昼夜，大约用了一斤人参、二斤白术，病人眼睛睁开，手也能举起来了。只是胸膈闷满，问话不答，不认识人，朱震亨让仍然以竹沥调人参膏服用。又过了一昼夜，病人忽然自己说胸膈闷满，一动全身疼痛，耳目仍然不听使唤。而且小便不禁，自溺于床甚多。朱震亨听说病人有了小便，非常高兴，让以陈皮、芍药、甘草、川芎汤调人参白术膏加竹沥服用。这时朱震亨要到别处去出诊，就让其家人给病人一些粗粥，与竹沥一起食用，用心调养。经过朱震亨的细心治疗，病人的情况暂时稳定，疼痛和癫痫都没有再发作。

过了几天，气候变化，大风不止，朱震亨估计这位妇女的癫痫病会发作，于是赶了20里路来到病人家里，看到病人痢症未

作,但疼痛病又发作了。于是给她灸了然谷、太冲、巨阙等穴位,病人疼痛止住,并要粥喝。朱震亨让其家人仍然给她以药汤调人参白术膏,用竹沥调服,不要间断。交代清楚后又到别处治病。

到了第四天晚上的半夜时分,病人的家属又来相请,朱震亨不顾夜深难行,立即前去,只见病人痲病大作,手足乱动,无法诊脉。就让两人将病人的手用力按住,强行诊脉。病人又口中妄言,语无伦次,一会骂人,一会又要打人,一会又使劲挣扎,好像要出去的样子。朱震亨以灸与药物互用,使病人逐渐安静下来,又复昏睡。又过了一个昼夜,病人食粥数量略有增加,小便量亦增加,朱震亨让其家人仍然给病人服用原来的药物和粥,然后又到别处诊病去了。

此后的一天晚上,病人家属又来相请,朱震亨急忙赶去,病人的神志已经清楚了,说是浑身疼痛。朱震亨诊脉后觉得病人左右手的脉象都均而且和,于是让其家人在上次开的药方中加参术煎,荆沥加香附末,病人服了一帖,感觉甚好,就让继续服用。次日半夜,病人疼痛又作,朱震亨一看,病人坐在便桶上,呼痛之声甚高。就考虑到病人连日病痛,体虚多汗,肠内干燥,大便困难,肯定是小腹与腰部疼痛,就烘了一大片琥珀膏贴在她的小腹上,将双手搓热,在病人腰肾部位按摩,病人大便渐出,疼痛减轻。这样反复了五六次,每次便下,病人的疼痛便有所减轻。这时有个医生看朱震亨这样非常辛苦,就建议用下利之药。朱震亨说,便不通只是疼痛,而用下利药可能置病人于死地。如果坚忍至半夜,疼痛就会慢慢消失的。说完,朱震亨又到别处诊病。大约四更天的时候,病人家属又来相请,说病人疼痛又大作。朱震亨赶到病人家,让病人坐在温汤之中,并不停地换汤,使保持一定的温度,疼痛慢慢缓解。到换第二桶水的时候,病人

便出干粪两块,并且安然熟睡了。

后来,病人的病情还反复了几次,朱震亨坚持每天白天出诊,晚上守候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这个妇女终于转危为安,疼痛和痢症都没有再发作^①。

从朱震亨对这位妇女的治疗过程,可以看出朱震亨医术的高超,更可贵的是他对病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放弃的负责精神。另外,在诊治过程中,确实是不辞辛劳,随叫随到,一切以病人的需要为重,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表现了一名职业医生的高尚医德。

朱震亨出名以后,找他治病的人很多,“四方迎候者无虚日”,他只要听到有病人需要治疗,总是不分昼夜,不畏风霜雨雪,立即前往。有一次天降雨雪,又有人请他出门看病。因连续不断地出诊,连仆人也受不了了,请求他稍微休息一下,等天气转晴再去。他说:病人受病痛折磨,度日如年,作为医生,怎么可以有丝毫的拖延呢?一边说,一边做出诊的准备,然后一刻也不停留,立即出发给病人诊治,“虽百里之远弗惮也”。他为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一律同等看待,对于那些因家庭贫困而无力出资看病的,他只要听到消息,不等病家来请,就带上药物,主动上门,免费诊病、治疗,直到病人痊愈为止。而对于那些依恃富贵、骄傲蛮横的求医者,他却往往不卑不亢,假以辞色,打掉他们的骄娇之气。一次,有个有权势的人患病,命人请朱震亨到家里诊治。朱震亨到了他家,此人端坐于堂中,左右列着三品仪卫。对于朱震亨的到来,他傲然无视,只催着赶快诊病。朱震亨不动声色,给他诊完脉,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侍从追到门口,向朱震亨询问病情,朱震亨说:大概只能活3个月左右了,此人气盛,到

^① 《丹溪医按·腹痛十七》。

了阴间当鬼 还会有骄气的。后来这个人果然只活了 3 个月左右 ,侍从对朱震亨的话深为信服。

朱震亨不光是以医显 ,他的为人同样得到人们的敬重。义乌一带的人家有了大事 ,都以能得到朱震亨的题字为荣 ,朱震亨也不辞辛劳 ,只要是朋友相求 ,也来而不拒。元统元年(1333)八月为叶仪治病之后 ,朱震亨还应邀为义乌竹山里楼氏家族的始祖竹山公的画像题写了 16 个字的像赞 :“天福有德 ,克巩克昌。子子子孙 ,勿替引长。”像赞的落款为“丹溪朱震亨题” ,字迹飘逸潇洒 ,遒劲有力 ,现镌刻于义乌市赤岸镇东朱山朱丹溪陵园 ,是今天所见唯一的朱震亨手迹。

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 ,朱震亨应邀到浦江麟溪 ,为郑太和家纂定家范。

浦江郑氏以孝义传家 ,自南宋以来即合族同居共食 ,至此已经有 240 余年。男女长幼 ,各执其业 ,一切听从家长调遣 ,各人所入 ,其“一钱尺帛无敢私” ,兄弟妯娌和睦相处 ,毫无间言。郑氏家族的主持者郑太和 ,治理家族严而有恩 ,功过分明。族中子弟如果犯有过错 ,定当众责罚 ,毫不姑息。表现优秀者 ,也当众褒奖 ,树为楷模。郑太和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 ,平时行为端正 ,勤劳好学 ,生活节俭。族中婚丧嫁娶一定要参照朱子家礼而行。长辈中有去世的 ,必定按照古礼守丧 3 年 ,极尽哀痛。对在外做官的子弟 ,也制订了严格的家规 ,绝对不许贪赃枉法 ,一经发现 ,生者除去族籍 ,不能再进郑氏祠堂半步 ;死者不能入祖坟安葬。所以郑氏子弟在外做官者颇多 ,未闻有贪赃枉法者。从宋至元 ,人们对浦江郑氏家族都是十分敬重的。至元元年(1335) ,太常博士柳贵向朝廷上表 ,请求免除郑氏家族的赋税 ,以树立榜样 ,教化乡人。朝廷派了使者余阙到江南进行调查表彰 ,余阙为之

书写了“浙东第一家”的门匾,以示褒奖^①。之后,郑氏家族开始制订“家范”(家规),作为族中子弟行为的准则。朱震亨对浦江郑氏家族的做法十分赞赏,和家族主持者郑太和关系甚好,而郑氏也很推崇朱震亨的为人和医德、医术,把他当做座上宾。朱震亨虽然以医名世,但其乃浙东大儒,对朱子家礼十分熟悉,所以当郑氏家范初稿写出之后,遂请朱震亨进行指导修改,最后定稿。经朱震亨修订的郑氏家范一共有3卷,一直流传于世。到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庶吉士解缙还上言朝廷,希望朝廷参照蓝田吕氏(北宋吕大防)家族的《吕氏乡约》和浦江郑氏家族的《郑氏家范》的内容,制订相应的行为规则,让百姓学习遵守,使儒家的思想和行为道德规范为普通百姓所接受^②。

除了出诊和一些不可推卸的社会活动外,朱震亨这段时间还是来往于义乌和金华之间,分别在母亲面前尽孝和在许谦面前尽师生之谊。

许谦自从至治二年(1322)被朱震亨以“倒仓法”彻底治好多年的痼疾以后,身体情况一直很好。继续在金华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直至临终前几天方才停笔。其著述除已经刊刻印行外,还有《三传义例》、《读书记》等书稿没有付梓,学生整理的一些言论也还没有最后定稿,此外还有一些文稿和诗稿,也都在整理和编订之中。除了他自己的著述以外,金履祥所著的《论语孟子考证》和《资治通鉴前编》生前没有来得及编订刊刻,临终时也托付给许谦,后来金履祥的这些著作得以问世并流传,也都得之于许谦的努力。

许谦在中年以后,对于儒家阴阳往来升降消长阖辟的关系

^① 乾隆《浙江通志》卷一八九《人物》。

^②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开国规模》。

更有见地,他常说:伏羲氏的八卦意义深远,涵盖广大,文王、周公、孔子等人只是对伏羲的经义进行了解释,六爻之义不过是发凡举例罢了。后来各个儒家对象辞各有自己的理解,互有长短。作为后学,应该潜心钻研,领会其实质,取长补短,不可厚此而薄彼。

许谦不仅在学术上继承了朱子学说,使其更加发扬光大,而且在尊师敬道方面也给学生作出了榜样。许谦的六世祖曾受教于北宋著名的教育家胡瑗,能尊师敬道于始终。许谦又是金履祥的高足,在弘扬师道上丝毫不亚于自己的祖先。许谦从金履祥学习时,充满敬仰之情,金履祥生病,许谦亲身侍奉,金履祥逝世,许谦全力为之料理后事,在弘扬师道上给学生们作出了榜样。所以许谦生前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去世后也得到了学生们深切的怀念和沉痛的哀悼。

许谦晚年非常注重自身的涵养,喜欢安静,除讲学和著书外,很多时候都是凝然静坐,闭目养神,恬静淡然自适。虽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谢绝一切资助,泰然处之。至元三年(1337)十月,许谦旧病复发,他感到自己年老体衰,难以医治,就十分平静地对儿子许元说:我的兄长是十月二十三日去世的,我可能要和他同日去世吧。然后嘱咐许元要孝敬母亲,友爱兄弟,说完就不再说话。许元问他还有什么要嘱咐的,他说:我平时已经说得很多了,现在还问什么呢?朱震亨在许谦病重以后,一直守在身边,他知道老师已经年老衰竭,不可回天,于是尽心侍奉,整日不离左右,使老师在病重期间不受任何痛苦,临终时安心离去。许谦在和许元说完话后,正衣而坐,但视力稍微有点偏斜。朱震亨最了解自己的老师,为了使老师死后能保持良好的形象和姿态,于是上前对许谦说:先生视力稍微有点偏。许谦听了,遂“肃容端视”,过了一会儿,眼光渐渐暗淡,从容而逝。

许谦是对朱震亨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从学习举子业到弃之而从医,从做学问到做人,朱震亨无时无刻不以许谦的教诲为鉴,可以说朱震亨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将儒家理论融入医学,创立新的医学理论,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卓卓大家,青史留名,和许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许谦之死,朱震亨是十分悲痛的。许谦去世后,朱震亨和当年对待罗知悌一样,帮助许谦的家人共同料理许谦的后事。许谦因为晚年生活比较困窘,所以其丧葬费用都是由朱震亨和其他学生一起资助。许谦被安葬于金华县西北婺女乡安期里,墓碑上刻着“白云先生许公之墓”。第二年,学者们又纷纷上书地方政府,要求在郡学给许谦修建祠堂,让学生们春秋祭奠。

第五章

治痘修塘 情系乡民

年轻时候行侠仗义、为民请命的做法，使朱震亨在乡间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行医治病以来，他的这种做法仍然没有改变，在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同时，对乡亲们的疾苦也时时予以关注。痘疮流行使很多幼儿失去了生命，山洪暴发使村民的生存受到威胁，这使他时时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在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他全力以赴地救治病儿，总结出一套治疗痘疮的经验，并根据儿童的生理特点，提出一些有关幼儿保健和医疗的方案。他不顾 65 岁的高龄，率领乡亲修复被洪水冲毁的蜀墅塘堤堰，使乡亲们重新获得灌溉之利。

降服痘疮 拯救幼儿

元惠宗至正四年(1344)正月，本来应是人们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之中休闲娱乐的时间，但义乌一带却陷入紧张与悲痛之中，原来这年的春天阳气早动，从正月开始，气温就不断升高，乡间很多小孩都患了痘疮。因为这是一种儿童常见病，所以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开始看到小孩发烧时，大家并未意识到是痘疮，而是按一般的发热看待，基本都是按照《局方》上治疗发热的方子吃药。后来知道是痘疮时，也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仍

是按照《局方》中的治小儿痘疹的方子，用升麻葛根汤和惺惺散，然后用消毒犀角饮降火解毒。病人一旦开始泄泻，就停止服用其他药物，只服用惺惺散一种^①。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认清病情，就根据病人的症状对照《局方》服用木香散和异功散，结果有的小孩服药以后，确实见效，但更多的孩子却不仅没有收效，反而枉送了性命，不长时间就有 100 多名小儿因此而死。朱震亨作为医生，目睹此情此景，心中万分焦灼、悲愤，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和弟子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痘疮的治疗和研究中去，通过他们的努力使许多患者转危为安。例如一个名叫亚玉的孩子，痘已经出了两日，病人“食稍进，汗微出，热略减，但食物口不好，有恶味”，朱震亨认为这是痘迟发未透的缘故，就给他用了升麻、炙草、紫草、白术、陈皮、白芍（炒）等药，用酒调服。一个叫勉奴的人痘已经出了三天，仍是色淡不肯发，朱震亨认为这是气血两虚，就给他用了“归身浸酒、白术炒二钱，酒炙芪、人参、陈皮、煨诃子、煨豆蔻各一钱，炙甘草些少”的处方，煎好以后，加入少量的好酒服用。经过治疗，勉奴的痘出了，但又出现了“口渴，肚急，小便少，发热”等症状，于是又给他用了白术、白芍、川芎、陈皮、炙葛、木通、炙草等药物，勉奴服用以后上述症状消失，身体彻底康复。一个叫坦儿的人，痘出以后，余毒尚未散尽的时候，过早地食用板栗，使毒气缔于体内，无法发出，朱震亨给他用了白术、枳壳、犀角各三钱，鼠粘子六钱，防风、甘草各半钱，服用以后，效果良好。一个叫吴店的人感染痘疮，腹痛不止，朱震亨给他用了桂枝、芍药各一钱，白术、当归各半钱，丁香三枚，服用一次后见效。吴店的儿子才周岁，也感染了痘疮，色白发痒，朱震亨给他用了炙黄芪、人参、归身、白芍、桂枝、丁香等药，服后立即

^①（宋）陈师文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下·论小儿疹痘症》。

见效。^① 这些病例被跟随朱震亨学习的戴原礼收集记录,保存在失而复得的《丹溪医按》一书中。

明人江瓘在其所编撰的《名医类案》中也保留了许多朱震亨对幼儿痘疮的救治案例,此亦略举数例以说明之。

有一个10多岁的男孩,因出痘而发热,身上痘疮密密麻麻,孩子已有半月多时间呕吐不食,腰背骨节及喉咙疼痛不已,口渴难忍。父母焦急惊慌,束手无策,连忙请了朱震亨师徒诊治。朱震亨根据症状,先给他用了参、芪、归、术、炙草、陈皮、茯苓、黄芩等药,服用5日以后痘疮颜色稍淡,又在原药中加了少量的桂、当归、黄芪3种,以酒制之。到第七天,身上奇痒。又加了几粒丁香和一点附子,服后痒止。到第八、九天的时候,口唇干渴,腹泻,并伴以寒战。再以人参、白术为君,黄芪、当归、陈皮、茯苓、炙草、黄芩为臣,至第十一天,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情况比较稳定。以后就按照这个方子,服用了好几帖,病人吐了好多痰以后,症状好转。

有一个5岁的男孩,出痘之后腹泻不止,生命垂危。朱震亨给他以“白术一钱,陈皮、木通各五分,犀角、川芎、苏梗、白芷、炙草各三分”的方剂,服用后转危为安。

一个10余岁的女孩出痘后骨节疼痛,不思饮食,夜间发热不止。朱震亨认为这是体内的余毒尚未完全发出的缘故,但小孩体质孱弱、内虚,又不能直接用疏导之药,只能用补中有泻的治法。于是他根据小女孩的体质情况,给她用了“归、术、陈皮各一钱,牛膝五分,通草、苏梗各三分,犀角、炙甘草各二分,姜三片”的方剂,家人照方让其服用之后,孩子的身体不长时间就恢复了。

^① 以上皆见《丹溪医按·小儿痘疹三十六》。

还有一个7岁的男孩,痘疮初出不透,毒气内攻,骨节疼痛,两足不直,瘢痕不显,小便量少,颜色赤黄。朱震亨以归身、白术各一钱,陈皮、木通、犀角、人参、茯苓各五分,再加少量的炙草,分2帖服下,仅服了数次,痘疮大出,以后一切情况正常,孩子的身体也很快恢复了。^①

中国的痘疮据说是东汉初期由南阳的征虜中传来,所以最初被称为“虜疮”,在汉魏以前的医学典籍中未见记载。历两晋、南北朝、隋、唐,人们对痘疮的认识还不是十分深刻。到了宋代,痘疮作为儿科的重要疾病,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一些文献开始对痘疮有了记载。如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之女澶娘6岁时患痘疮,由于当时医生用泻药太剧,且又过量,致小澶娘死于非命。后程颢在女儿的墓志铭中,对其进行了深切的怀念和痛悼,同时谴责医生用药之过。他说:“痘疮之初,诚欲利者也。然当视其气之强弱、为药之可否、疾之重轻、为剂之大小,今概以大药下之,宜其死也。”^②

这是宋代见于记载的儿童患痘疮而死的比较确切的事例。诸如此类的情况,定然还有很多,所以引起当时一些医生对痘疮的重视。庞安时和钱乙就是其中的两个。

庞安时,字安常,宋蕲州蕲水县(今湖北省浠水县)人,世代行医。庞安时幼时聪明好学,认为家传的医学远远不能满足他求学的需要,就精心阅读钻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书,等到成年,已经是“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其治病效果突出,医德高尚,“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饘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

① 皆见《名医类案》卷一四《痘疮》。

② (宋)程颢:《澶娘墓志铭》,见《二程文集》卷四《明道文集四·墓志铭》。

复为治。活人无数。”^① 其著作主要有《难经解义》、《难经解》、《伤寒总病论》3种,其中《伤寒总病论》又以专门的章节对儿童痘疮进行了论述。他说:“痘疮又叫‘天行豌豆疮’,是儿童在‘发汗吐下后,热毒不散,表虚里实,热气燥于外’所导致的。一般的治疗应该用‘下利’之药。这种病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病好后落下斑痕,人们称之为‘麻子’,这是症状较轻的一种。另一种情况比较严重的就像豌豆一样,里面毒气很大,治疗不当往往会危及生命。庞安时认为:儿童患痘疮一般和气候有关,冬季气温过高,病毒没有死掉,就容易在春季或夏季感染痘疮。这疾病其实很早就有,但得病原因、症状和治疗方法很不完备,也很少见于记载,他怀疑这是由于‘当时毒热未甚,鲜有死者’的缘故,到了宋代,痘疮已经成了儿童的一种常见病,可以说是‘岁岁未尝无’,且死亡率很高,有时竟达到‘夭枉十有五、六’的程度。庞安时指出:由于这种病是毒气内盛、毒攻腰肋,病人心腹胀满、大便久秘,所以要用泻利之药,但用药一定要分清具体情况,过于寒凉之药一般不可用,温热之药增加毒性,更不能用,一般的凉性之药因为‘不阻表里气’,亦可通用;如果病人寒气阻碍,脉候浮迟,则温性之药‘不阻表里气者’,用之病人则有望痊愈。最后,庞安时又特别强调,因为患痘疮的一般都是小儿,所以要‘专用小汤剂’;至于大人,则可‘倍用之’^②。

庞安时对治疗儿童痘疮病的论述,应该是医学典籍中有关痘疮病比较早也比较全面的记载。

和庞安时同时代的钱乙,是著名的儿科专家,他在稍后成书的《小儿药证直诀》中,对儿童痘疮病的分析记载,在庞安时的基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传下·庞安时传》。

② (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卷四《斑痘疮论》。

础上又有所发展。

钱乙首先列举了儿童痘疮病的种种症状,诸如“面燥腮赤,目胞亦赤,呵欠顿闷,乍凉乍热,咳嗽嚏喷,手足梢冷,夜卧惊悸多睡”等,都是痘疮病的特征,治疗的方法“惟用温凉药治之,不可妄下及妄攻发、受风冷”。接着他又论述了痘疮毒气和五脏的关系,“肝脏水,肺脏脓,心脏斑,脾脏疹,归肾变黑”。一般痘疮出时,其他各脏体的症状都会显现,只有肾脏症候不显,这是还不严重的缘故。如果颜色变黑,说明毒气侵入肾脏,就已经很严重了。医生在治疗痘疮时,一定要先观察病情的轻重,“若一发便出尽者,必重也;疮夹疹者,半轻半重也;出稀者轻稀,里陷,昏睡,汗出不止,烦躁热渴,腹胀,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大抵疹属阳,出则为顺,故春夏病为顺,秋冬病为逆。冬月肾旺又盛寒,病多归肾变黑。又当辨春脓、夏黑陷、秋斑子、冬疹子,亦不顺也,虽重病犹十活四五。黑者无问何时,十难救一”。治疗的时候,要分清不同情况,“有大热者,当利小便;有小热者,宜解毒。若黑紫干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慎勿下”。“治之宜解毒,不可妄下,妄下则内虚多归于肾。若能食而痂头焦起,或未黑而喘实者,可下之。身热、烦渴、腹满而喘、大小便涩、面赤、闷乱、大吐,此当利小便;不差者,宜宣风散下之。若五七日痂不焦,是内发热,热气蒸于皮中,故疮不得焦痂也。宜宣风散导之,用生犀磨汁解之,使热不生,必着痂矣”^①。

以上钱乙对小儿痘疮的记载,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医学思想的结晶,全面细致,分析精到,应该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资料。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关于治疗儿童痘疮的思想和方法并没有得到《局方》编撰者的重视,在整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

^① (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疹疹候》。

并没有关于痘疮治疗的论述,只是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中有一段简单的论述:“小儿患澹疹,其证乍热乍凉,呵欠、烦闷、咳嗽、喷嚏、耳鼻冷及脚冷,但只恶热不恶风。浑身热甚者,或发搐或不搐,一向发热者,此乃痘疹证也。可与升麻葛根汤、惺惺散、消毒犀角饮,已泻者不可与他药,只服惺惺散。”^①按说,这里面用于治疗痘疮的方药还是基本对症的。但过于简单,而且只列举现象和两三个方剂,远远不能满足治疗痘疮的需要。因为痘疮的发病原因和症状各种各样,一定要在反复观察、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用药,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况一般人并不对病症做全面的分析,只是对照《局方》所列的病症,对号用药,所以有人就误用了书中的木香散和异功散,而《局方》中的木香散和异功散则是治疗“气”类疾病的,如木香散治“脾胃虚弱,内挟风冷,泄泻注下,水故不化,脐下疔痛,腹中雷鸣,胸膈痞闷,肋肋虚胀及积寒久利,肠滑不禁,肢体羸困,不进饮食”^②。异功散则治疗“小儿吐泻症,吐乳泻青者”和“小儿痢疾症赤白痢或泄泻者”^③。这些病有和痘疮相似的地方,但绝不是痘疮,药不对症,当然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了。

宋代以后,儿童痘疮发病率不断增高,死亡率也不断上升,成为威胁儿童生存的一种重要疾病。到了金代,这种情况并无多大改观,大多数人家见孩子患此病往往不救,且有传染性,所以在孩子感染痘疮之后还忍痛弃之,以免再传染他人。当时名医张子和就曾遇到一起因痘疮弃儿的事例。

有一次,张子和所乘的船只泊在开封附近的蔡河,突然看见

① (宋)陈师文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下《论小儿疹痘症》。

② (宋)陈师文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六《治积热》。

③ (宋)陈师文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下《论小儿疹痘症》。

一束蒲草顺流而下，漂到船的近旁，其中传来小孩的哭声。子和赶紧让船家把蒲草捞上船来，看到草中间裹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浑身上下是遍布痘疮，但两眼清澈明亮，一见人就张口要吃的。子和一看就知道孩子患的是痘疮，赶快让船家给孩子喝一些稀粥，又给他服用了一些随身携带的药物，孩子的情况很快稳定下来，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他们又分析孩子是从蔡河顺流而来，当时蔡河流速缓慢，估计孩子的家人所居之地必不甚远。于是逆流而上20余里后，来到一个村落，就让船家拿着孩子的一只鞋子上岸，在村里大声宣扬孩子的情况，并说孩子得的是痘疮，现在已经好了，不会再有性命之忧了，希望孩子的父母赶快将孩子抱回。喊到一个酒店时，酒店的老板出来，一看船家手中的鞋子，哭着说，这正是我家孩子的鞋呀。然后随船家到船，见孩子安然无恙，不觉放声大哭，反复向船家和张子和致谢，然后欢天喜地地将孩子抱了回去。^①

元代，痘疮仍然是威胁幼儿生存的大敌。如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杭州地区痘疮流行，情况非常严重，“家家儿女病痘疮，十家之中九家死”^②。当时居住于杭州的官员段天祐4岁的女儿丑哥也因感染痘疮而死。段天祐视此女如掌上明珠，唯恐有失，特取名丑哥以贱养之。对女儿的死，段天祐痛不欲生，特写了一篇长长的七言古诗以纪其事。洋洋数百言，情真意切，哀痛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使人泪下。但因为杭州和义乌相距较远，所以此次痘疮感染，对义乌似影响不大，至少没有看到义乌有关痘疮传染的记载。

在杭州痘疮流行6年以后，元至正四年（1344）春，义乌一带

^①（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一二《痘疮》。

^②（元）段天祐：《哭女丑（哥）行》，见明偶桓编《乾坤清气》卷五《七言古诗》。

的痘疮大量传染,很多幼儿或是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或是因为家长对照《局方》服用木香散和异功散而死于非命。

朱震亨和他的弟子们一边致力于痘疮的治疗,极力挽救儿童的生命,另一方面针对人们不作思考、不求医诊治、滥用《局方》的现象,对《局方》中关于痘疮的治疗内容进行了分析评价,希望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他说:人们读前人的书,首先应该知道前人著书立言的意义,如果只读前人之书而不知道前人立言的意义,就不可能正确运用前人的书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认为关于儿童痘疮的诊断与治疗,钱乙的论述是十分权威的,其“历举源流,经络明分,表里虚实,开陈其施治之法;而又证以论辩之言,深得著书垂教之体”。后人学习并应用钱乙的书,就好像“求方圆于规矩,较平直于准绳,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可为无穷之应用也”。可惜现在的人不问清楚致病的原因,不了解清楚当初立方的本意,在仓促之间,根据病症对照方书,自己买药服用,如果没有应验,就认为是书的问题,这实在是没有认真思考的结果。后来《局方》盛行,其主导思想正好与一些人“喜温而恶寒,喜补而恶解利”的思想吻合,于是便以《局方》为圭臬,对钱氏的书弃置不用,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局方》在治疗方面,大多是用温热辛燥之药,比如用丁香、官桂治肺寒,用附、术、半夏治脾湿,如果确实是肺寒脾湿再兼有虚症,酌量用之,或者可以起到作用。但如果不是,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了。在这次痘疮流行中,很多人只要看到“疮之出迟者、身热者、泄泻者、惊悸者、气急者、渴思饮者”等症状,不管寒热、虚实,都是给病人服用木香散和异功散,中间也有对症而收到效果的,但如果不对症,马上就大祸临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没有掌握好药物的应用。古人在用药的时候是十分讲究的,“有向导、有监制、有反佐、有因用”,对每种药的用量要求非常严格。比如钱仲阳在用

药时,也不是对细辛、丁香、白术、参、芪等药完全不用,而是在搭配上非常讲究,不是专门用于温补,而是用寒凉的时候更多一些。在治疗儿童痘疮方面,《同方》所谓的“渴者用温药,痒塌者用补药”的说法,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过多使用桂、附、丁香等燥热的药物,恐怕就未必妥当了。如果病人确有虚寒等症,用这些药当然是对的。但虚者未必就一定寒,这样就不能过多使用这些药物了。朱震亨还推测陈师文他们在立方的时候,肯定是有因受寒而痘疮塌陷的情况,所以用燥热之剂进补,这是比较恰当的。而至正四年(1344)义乌的痘疮传染则是因冬天气温过高所致,和陈师文制定《局方》时的情况正好相反,所以一定不能用燥热之药。如果一定要用原来燥热的方子,病人服用后肯定要出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朱震亨说他在这次治疗痘疮的过程中,吸取了各家的长处,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而用药,实在是不能按照成方对号用药的。^①

在这段论述中,朱震亨首先指出了治疗痘疮应遵照钱乙的方法,分清表里虚实,弄清楚感染的原因及发展的程度,然后再确定用何药,如何治疗。批评了有些人乱用《局方》中的燥热补剂的方子,不问寒热虚实,盲目使用木香散、异功散,导致幼儿死亡的做法。

为了说明问题,他又列举了几个治疗痘疮的病例。一个是他的侄子在六七岁时感染了痘疮,身体发热、口中微渴,伴有腹泻症状。家人自己照方配药,让其服用。朱震亨闻讯,连忙来到家里,一看方剂主要是用木香散,外加十几粒丁香,当时就感觉怀疑。及至诊脉和看了病人的症状之后,分析病人痘疮迟迟不发的原因是因为腹泻而导致气虚。而病人排泄的东西都是臭滞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痘疮陈氏方论》。

陈积之物,这是因为肠胃热蒸而腹泻所致,并不是寒而虚的缘故。就连忙让停止使用原来的方剂,但这时病人已经服用过一帖了。于是朱震亨又给他用了黄连解毒汤加白术,先让服用10帖,以解丁香之热。服用之后,腹泻停止,痘疮也很快出来了。后来身体常常微热,手足也经常生痈疔,又给他开了些清凉的汤剂,进行调补,过了一个月,彻底痊愈。

另外一例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子,身体发热而昏晕,“目无视,耳无闻,两手脉皆豁大而略数”,医生以为他是劳伤所致,就给他服用热补之药,希望他能早日康复。但事与愿违,病人越是服用补药,病情就越发沉重,后来又请朱震亨诊治。朱震亨仔细观察了病人的情况,又询问了发病的过程,诊脉之后发现并非劳伤,而是痘疮作怪。因为这个男子所居之处,痘疮的传染十分严重,他也是感染痘疮之后才成为这样的。但当时病人并没有知觉,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病,只是给药就饮,给粥就吃,结果就导致成了现在的样子。诊断清楚以后,朱震亨给他用了参、芪、白术、当归、陈皮等药,大料(用药量大,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大剂量”)煎成浓汤,服用30帖,痘疮才发出来。接着又服用了20余帖,痘疮全成脓泡,身无完肤。有的人一看这样,就沉不住气了,说病势如此严重,非常可怕,赶快用陈氏的方子治疗。朱震亨说这只是身体虚弱,并没有寒症,还是用原来的方子就行了。坚持让按照原方又服用了10多帖,病人情况稳定,病体很快痊愈。后来朱震亨再询问他致病的原因,病人说,开始四五天发热,他也怀疑是痘疮,于是就尽力干活,尽量让身体多出汗。后来医生又给他服了一些补药,结果就成了朱震亨诊断时的那个样子。朱震亨听了,暗暗庆幸,幸亏没有继续用燥热补剂的方子,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鉴于以上情形,朱震亨认为,至正四年(1344)正月乡民们感

染痘疮是由于春天气温过高的原因。结果人们不分析实际情况,盲目滥用陈氏之方,导致了100多幼童的死亡。此“虽由天数,吾恐人事亦或未之尽也”^①。也就是说:春天气温过高固然是自然的原因,但这么多儿童的无辜死亡却和人们的盲目妄信是脱不开干系的。

在朱震亨师徒的努力下,正在蔓延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很多幼儿从死神的手中抢救回来。朱震亨的医术、医德使乡亲们深受感动,也使那些照搬陈氏之方致很多儿童死于非命的人心服口服。经过这次对乡间痘疮的治疗,朱震亨对痘疮的认识和治疗水平也有了一个新的升华。在治疗过程中,他对痘疮的发作、发展和治疗作了系统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痘疮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这就是首先要搞清楚发病的原因,观察发展的情况,然后再根据实际,对症下药。

譬如补、下法的施用,首先就要分清虚、实两类症状,虚则补,实则下。而补也要分清是气虚还是血虚,按照气虚、血虚的不同要求进行施治,气虚者用人参白术加解毒药,血虚者用四物汤加解毒药。如果发现有红点,就千万不能再升麻葛根汤。

病人有呕吐、腹泻、不思饮食等症状为里虚,可用适量的补药,没有呕吐、腹泻且又能吃饭为实。这时如果服用补药,病人就会有痈肿现象。

痘疮初出或者未出之时,可以用丝瓜近蒂三寸、连瓜子皮烧灰,存性为末,用砂糖拌吃,或加点朱砂末也行。服用以后痘多者可以少,重的可以变轻。

解痘疮毒的药物可以用丝瓜、升麻、酒芍药、甘草(生用)、糖

^① 皆见朱震亨:《格致余论·痘疮陈氏方论》。

球、黑豆、犀角、赤小豆等。

解痘疮的方法,已经出来和没有出来的都可以用朱砂为末,以蜜水调服,这样痘疮多的可以减少,少的可以变得没有。^①

朱震亨关于治疗痘疮的理论和方法广受人们关注和认可,成为治疗痘疮的圭臬。明代名医薛己在全面考察、分析、总结了儿童痘疮的感染及治疗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丹溪痘疮治法最为明备”^②,确实可以概括朱震亨在治疗痘疮上的成就。

薛己以后的明代名医喻昌和清代名医魏之琇对小儿痘疮都进行过全面的探索和论述,对朱震亨关于治疗痘疮的理论和主张都是推崇备至,认为他在小儿痘疮预防和治疗上的贡献是非常突出、无与伦比的。

有感而发 幼人之幼

通过此次对小儿痘疮的治疗,朱震亨深深感到诊治小儿疾病的重要。一般来说,治疗小儿疾病的难度要比治疗成人疾病的难度大得多。正如宋代闫季忠所说的那样,行医治病本来就是一件难事,要给小孩治病就更加难了,所以《黄帝内经》中没有关于治疗6岁以下小儿疾病的记载,唐以前的典籍中也没有关于儿科疾病治疗的医术,到《宋史·艺文志》才出现了专门论述小儿疾病的《颅凶经》,撰者为巫师,具体情况不详。宋代的钱乙就是因为研习此书而精通儿科,而被后人誉为“儿科之圣”的。钱乙之后,几乎再没有专门的儿科医生,所以有些人当儿童有病之时,也参照成人的方剂用药,贻误病情。为了说明治疗儿童疾病之难,闫季忠还列举了几条原因:一是《内经》中没有关于这方面

① (元)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三《痘疮》。

② (明)薛己:《薛氏医案》卷二四《序次丹溪小儿痘疮治法》。

的记载,无以为宗。二是医生看病,一般都要诊脉,而小儿脉微难以诊断,而且大多数小儿在医生诊脉的时候都哭叫不止,使医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三是既然无法准确地判断脉象,就要根据小儿的体型和情绪来推断,而小儿发育未全,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让医生无法把握。四是医生看病,还要询问病情,而小儿不会详细诉说自己的病情,即使说了也不可全信,只能根据大人的描述去做判断。而大人的描述又往往是不准确的。五是小儿的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一般医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①。正因为以上种种困难,所以小儿疾病容易受到忽视。由此朱震亨想到自己作为医生,应对儿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作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这一年春天的痘疮疫情平息之后,朱震亨回忆起在治疗痘疮的过程中听到看到的一些关于幼儿在医疗保健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小儿的饮食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不及时纠正,对小孩的身体健康和发育状况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经过反复思考,他又把自己对幼儿保健治疗方面的一些心得写了出来,希望引起众人的注意,使之在儿童的防病治病方面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文章的名字就叫《慈幼论》,后来被收在他的医学专著《格致余论》中。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讲到人在16岁之前,“血气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将圆,唯阴长不足,肠胃尚脆”,所以在饮食生活方面不可不慎。古人曾经讲过,说是“童子不衣裘帛”,这是因为“裘”是下体所服,一般说来,绢帛比布柔软温暖,裘皮类又比绢帛柔软温暖。而从人体角度来说,下体是主阴的,“得寒凉则阴易长,得温暖则阴暗消”。所以下体不要穿得过于温暖柔软,是

^① (宋)闫季忠:《小儿药证直诀序》,载钱乙《小儿药证直诀》。

恐怕有妨阴气。血气俱盛,食物就容易消化,所以吃饭没有固定的时间,大都是随饿随吃。但这时肠胃尚脆而窄,若经常吃稠、黏、干、硬、酸、咸、甜、辣以及鱼肉、木果、湿面、烧、炙、煨等发难化的食物,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平时最好吃一些干柿、熟菜、白粥之类的食物,不但可以杜绝和减少儿童疾病的发生,而且还可以养德。此外,生栗味咸、干柿性凉,都可以作为养阴的辅助药物。但栗子大补、柿子大涩,都比较难消化,也应该少吃一些。有些做母亲的,不懂保养常识,对孩子只知道姑息迁就,只要孩子一哭,马上就无所不给。结果积食成疳,后悔晚矣。所以富贵人家的孩子多是娇养溺爱,反而体弱多病。长大成人以后,也是筋骨柔软不坚,有了疾病,又不调养忌口。就连居丧期间,也不能食素,不尽礼节。实在是“小节不谨,大义亦亏”。

至于正在哺乳期间的妇女,饮食上尤其应该注意,因为母亲的饮食下咽之后,就会转化为乳汁,“情欲动中,乳脉便应。病气到乳,汁必凝滞”。小儿吃了这样的乳汁,立刻就会生病。这种因母乳而得的疾病,症状是“不吐则泻,不痞则热,或为口糜,或为惊搐,或为夜啼,或为腹痛”,病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小便必然减少,这时就要赶快寻找原因,对症治疗,方能母子俱安,“可消患于未形也”。^①

朱震亨关于母乳健康的理论,在明后期名医王肯堂的医学著作中得到了印证。

王肯堂先是引用《颅囟经》中的话说“夏不去热乳,令儿呕吐;冬不去寒乳,令儿泄泻复痢,尤不可不谨”。然后又总结了一些母乳对儿童身体的影响,诸如“喜乳涎喘生惊,怒乳疝气腹胀,热乳面黄不食,病乳能生诸疾,壅乳吐逆生痰,魅乳腹急脏冷,醉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慈幼论》。

乳恍惚多惊，淫乳必发惊痫”^①。所以哺乳期间的妇女，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愉快的心情，才会使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除饮食之外，母亲的身体对小孩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母亲身体之强弱，性情之急慢，骨骼之坚脆，德行之善恶，这些对孩子的影响极大，所以古人认为胎教对怀孕期间的妇女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胎儿在母腹之中，与母亲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安则俱安”，所以母亲的饮食起居，尤其应当慎重对待。很多婴幼儿的疾病其实都是在胎里得下的，但这点却没有引起一些家长和医生的注意。

为了说明问题，朱震亨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东阳县张进士的次子，2岁的时候，头上长满了疮，没有医治忽然又平息不见，接着孩子就患上了痰疾，气喘不止。有人主张先用解利药行痰，平息气喘。张进士考虑再三，未敢妄用，还是请朱震亨前去诊治，朱震亨仔细观察了孩子的情况，认为这是胎毒所致，就叮嘱他们不要乱用解利药物。其他人听了惊愕不已，还不大相信。朱震亨就问他们，小孩的母亲平时喜欢吃什么，他们说喜欢食用辛辣热物。于是朱震亨就让用人参、连翘、黄连、生甘草、陈皮、芍药、木通等药，煎成浓汤，趁沸腾之时加入竹沥而饮，不几日孩子的病情就痊愈了。后来有人问朱震亨怎么能看出小孩是胎毒，他说，小孩精神昏倦，病得不轻，又不是外感症状，那就肯定是胎毒了。

朱震亨还举了一个自己女儿的例子，朱震亨的次女形瘦性急，体内有热，怀孕3个月的时候，正是暑天，口渴思水，还不时发着小热。朱震亨就让她多服用几帖四物汤加黄芩、陈皮、生甘

^①（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卷七一《幼科》。

草、木通等，结果她因懒于煎煮，只服用了几帖就停了。后来孩子2岁时也是遍身疮痍，不治而愈；再过了几天就发展成疟疾。但当时朱震亨并没有以疟疾治之，而是从治疗胎毒入手，结果小孩很快痊愈。朱震亨说如果女儿在怀孕时按照他的吩咐，坚持多服用几帖药，怎么会有胎毒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情况呢？

还有一个陈姓人家的女儿，8岁时得了癫痫病，一遇阴雨或一受惊吓就会发作。发作的时候口吐白沫，声如羊叫。朱震亨给她诊断以后，说小孩是在胎里受的惊吓。病已经很深了，但调治半年还是可以好的。就让她饮食淡味，再加上药物调护，以四物汤加上黄连，根据病情发展随时加减，按照朱震亨的方法调制了半年以后，果然痊愈。^①

朱震亨对儿科方面的防病治病常识反复述说，谆谆告诫，目的就是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使儿童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把一些疾病消灭于萌芽之中。

倡修墅塘 情系乡民

距赤岸村5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湖叫蜀墅塘。这里原来是一片洼地，东、西、北三面环山，山中之水汇成70多条小溪，注入洼地，再从南边流出。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大学士王槐致仕以后，看到这里的水源可资利用，就因地制宜，利用这片洼地开凿了一个面积约80亩的水塘，用以存蓄山水，灌溉周围近千亩的土地。但由于塘周围田地甚多，还有很多土地不能收灌溉之利。到淳熙十三年（1186），义乌大旱，粮食歉收，百姓无以为食。虽然王槐拿出自己家的储蓄尽力救济，怎奈饥饿之人太多，一家的粮食怎么也解决不了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于是王槐又

^① 以上见《格致余论·慈幼论》。

仔细考察了水塘周围的地理环境,觉得此塘“不特能蓄,且有建瓴势”,开凿的潜力还很大。就倡导附近百姓根据各家情况,出力出钱相助,准备将水塘再扩而大之,以求灌溉更多的土地。这时,正好有一个老人从永康来到这里,自称名叫康侯。对王槐的做法极为赞赏,就主动留下来,和王槐一起“相度地势,筑塘设窦,凿门驾梁”,所说无不中的。王槐对康侯的每一项建议都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就连蜀墅塘的名字也是康侯提议的,他说水塘之堤,赖蜀山而坚固,故应以山为名。这次蜀墅塘开凿之后,周长 3600 余步,“四山七十二涧水咸蓄焉,溉田三万余亩,泽被十余里”^①,灌溉面积是过去的 3 倍还多,附近的百姓均受其惠。蜀墅塘中储蓄的山水,是乡民们维持正常生活的保证。

至正四年(1344)对义乌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春天的疫情刚刚过去,夏天又是大雨连绵,山洪暴发,蜀墅塘东、西、北三面山上的洪水,奔腾咆哮,倾泻而下,乡民赖以灌溉的蜀墅塘堤岸被冲毁殆尽,湖堤冲毁,湖中无法蓄水,乡民们的灌溉失去水源,收成也没有了保证,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之中。于是很多人到朱震亨面前求诉,请他想想办法。本来朱震亨是以医为业,家中并没有需要灌溉的田地,蜀墅塘水源情况如何,对他家没有什么影响。但乡民们的焦虑和忧愁之状,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他连忙找到义乌县衙门,把乡民们的苦衷如实向县官汇报。由于朱震亨的医名远扬,德高望重,所以县令周自强对他的话十分重视,委派双林乡的巡检张某专门负责此事。工程开始之前,朱震亨召集了乡里有田地的人家,对修堤之事作了十分具体的安排:根据各家灌溉田亩的多少,核定劳动力和应出的钱财,公平合理,公开透明,人人乐而为之。朱震亨又率先拿出

^① 嘉庆《义乌县志》卷二《湖》。

钱财一千,作为工程的启动费。乡民们听了朱震亨的安排,无不欢欣鼓舞,跃跃欲试。然后朱震亨对工程规划又作了进一步的设计,“补其阙遗,增以崇高,筑其址,加辟而渐杀其上。堤之西垂凿石为斗门,视水溢干而时蓄泄之。门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木窦易坏,则易以坚石。且定为高下之穴,使欲水者先后有程而不紊。复惧历岁之久而堤弗固也,请于掌堂事者,中析粥鱼之利,而嗣葺之”^①。也就是说这次修筑要在原来的基础之上进行补充、增高,并在大堤西边修筑斗门,根据水量情况进行蓄泄,再在斗门上铺架坚石以利行人。然后修筑几个高低不同的水口,以便人们有次序地用水。工程完成之后,再推举几个德高望重的人进行管理,负责平时的用水和日后的修葺。朱震亨的这些规划得到巡检张某的认可和乡民们的一致拥护,于是,围绕这个规划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就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规划,到至正五年(1345)八月,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修筑蜀墅塘堤堰的工程开始。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完备,所以工程进度十分顺利,到十一月份就彻底竣工了。整个工程历时3月,耗资4000余缗,出动力1万人次。在施工过程中,朱震亨一直亲临现场巡查督促,帮助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同时充当工地医生的职务,对参与施工人员的健康给予密切的关注。在整个蜀墅塘工程施工的前前后后,乡民们被朱震亨的行为深深感动。修筑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争先恐后,使工程在短时间内收到良好的成效。蜀墅塘堤堰修好后,乡民朱仁杰等找到宋濂,请他为蜀墅塘的工程写一篇记,表彰朱震亨的义行。他们说朱震亨家没有一弓之田可以受到塘水的灌溉,但朱震亨在这次工程中却夙夜辛劳、鞠躬尽瘁、锲而不舍,都是为了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四《蜀墅塘记》。

我们大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敢忘记他的恩惠,请用你的笔将他的作为记下来,让后人知晓。宋濂听了这话,深为感慨,他想起宋代的胡瑗在湖州办学的时候,除了教授儒家经义外,还教给学生各方面的技能,所以他的学生都是于世有用的人才。现在朱先生受教于许谦,许谦的6世祖曾经师从胡瑗学习,所以朱震亨的学问知识是具有家学渊源的,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值得记载。宋濂又想到当今世上有很多人,平时高谈阔论,大讲义理性命之学,但遇到一点小事,都要斤斤计较,不知所措。哪里有朱震亨这样以65岁的高龄,还为百姓利益而舍身忘己的呢?他觉得能以手中之笔记下朱震亨的行事,既是乡亲们的心愿,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一种荣幸。于是奋笔疾书,一篇《蜀墅塘记》顷刻而成,使朱震亨的这一义举至今为人所传颂。

这次修建的工程一直维持了10年,到至正十五年(1355)朱震亨75岁的时候,蜀墅塘的堤岸又一次遭到洪水的袭击,这时的朱震亨年事已高,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事事躬亲,于是就命家族中的一个侄子朱漳再次主持修筑,使蜀墅塘的灌溉之利不受影响。

蜀墅塘不仅有灌溉之利,也是一处美丽的游览之地。这次堤堰工程竣工以后,许谦的另一个学生金涓曾驾舟在蜀墅塘游览,并留下了一首《蜀墅塘诗》:“溪头自舒散,天淡夕阳微。拂石松边出,看云水上飞。旧矶双鹭下,小棹一渔归。不觉吟哦久,苔痕湿上衣。”^①宋濂的《蜀墅塘记》和金涓的《蜀墅塘诗》都是今天所见不多的关于蜀墅塘的记载,所以显得格外珍贵。

经朱震亨叔侄两代人主持维修的蜀墅塘堤堰,一直维持了200年左右,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蜀墅塘的堤堰又被水冲

^① 嘉庆《义乌县志》卷二《湖》。

毁,当地政府又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维修,直至嘉庆年间,当地百姓还在享受着蜀墅塘的灌溉之利。

第六章

晚年岁月 孜孜不息

朱震亨 66 岁那年 , 母亲去世 , 此时的朱震亨也即将进入古稀之年 , 应该是安享天伦的时候了。但他探索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下 , 医事活动也没有就此结束。他回忆着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 , 思索着自己的医学生涯 , 不愿使自己一生的心血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于是 , 在深思熟虑之后 , 他奋笔疾书 , 把几十年的医学思想和实践所得付诸纸笔 , 成为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晚年 , 他仍然倾心于自己心爱的医学事业 , 继续行医不辍 ,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恪守孝道 奉养慈亲

蜀墅塘工程竣工的第二年 , 即至正六年 (1346) , 朱震亨母亲戚氏去世 , 享年 87 岁 , 作为长子的朱震亨 , 这时也已经是 66 岁的耆老之人了。

朱震亨的母亲出身儒学世家 , 知书达理 , 聪明能干。丈夫朱元去世之后 , 她含辛茹苦 50 多年 , 独立支撑着朱家的门户。丈夫去世的时候 , 公公朱环已经 65 岁 , 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 , 需要细心的侍奉和安慰。3 个儿子年少 , 尚不完全明白人生的艰辛 , 需要有人精心地扶持和呵护。但

她没有被悲痛压倒,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屈服。而是毅然决然地担负起家庭的重担,硬是把一个快要支离破碎的家庭从困境中拖了出来。好不容易熬到年过花甲,儿子成家立业,子孙满堂,谁知幼子蒙正和长媳兼内侄女的戚氏又于20多年前先后去世,长孙又一直患病,长子此后再未婚娶。家中的一切内务又落到她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身上。但戚氏毕竟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性,几次的打击和家庭变故都没有使她屈服,相反使她变得更加坚强,性格也更加沉稳刚毅。她不因儿子们缺少父爱就对他们溺爱放纵,而是严加教养,使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朱震亨在妻子去世后不久,自己又外出求医,一走就是几年,学成归来后又时常往返于义乌和金华之间,家里的一切全凭老母操持。戚氏不辞辛劳,一如既往。平时与妯娌和睦,待下人宽厚,与邻里友好,敬老慈幼,在乡里享有很高的威信。戚氏年老以后,每次生日,场面都很感人,儿子们“冠裳翼然,须发颁白,升堂奉觞,以次为寿”,媳妇和孙子、孙女们“数十人列侍左右,欢愉竟日”。80岁生日的时候,宾客庆贺慰问者“以千计”^①。80岁以后,身体犹刚强不已,神清气爽,不显衰老之象,最后无疾而终。说起戚氏的去世,也是很少见的,据宋濂的记载,在戚氏87岁的某一天早晨,戚氏起床盥洗之后,将家人全部召到跟前,平静地告诉他们自己可能要死了,要别人不要打扰她。说完就熟睡于床,再未醒来,至黄昏时安然去世。

对于母亲的去世,朱震亨当然十分悲痛。但由于母亲是寿终正寝,而自己也是将近七十的人了,能在自己生前为母亲营办丧事,使母亲入土为安,也算是心中的一个安慰吧。

朱震亨的母亲之所以能活到如此高寿还身体健康、神思清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〇《故朱夫人戚氏墓志铭》。

爽,固然和自己的身体素质有关,但还应归功于朱震亨的精心奉养。

由于熟读儒家经典,所以朱震亨对母亲一向是恪守孝道的,他学医的初衷就是为了解除母亲的病痛。后来他学成归来后,虽然有时候客居于金华,但对母亲的身体一直十分关注。特别是在养生和饮食调养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由此总结出了一套如何加强老年人身体保健的心得和方法。这具体体现在他的第一部医学著作《格致余论·养老论》篇中。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列举了人到老年身体所出现的种种变化,驳斥了一些人在老年饮食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他说人的年龄一旦过了60、70以后,就会精血俱耗,平时安居无事,也会出现热症。比如“头昏目眩,肌痒溺数,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聩,健忘眩晕,肠燥面垢,发脱眼花,久坐兀睡,未风先寒,食则易饥,笑则有泪”,这是老年人常有的普遍现象,任何人也不可避免。有些人以为是老人年老体弱,就对照《局方》买来乌附丹剂等补药要老人多加服用,以为这就是对老人尽了孝心。他说我一旦知道了这种情况,就会加以阻止,告诉他们乌附丹剂之类的补药,千万不可对老人乱用,这样恐怕尽不了孝,还会对老人的身体有害。至于那些“好酒、膩肉、湿面、油汁、烧炙、煨炒、辛辣、甜滑”等等的食物,也都在禁忌之列,老人一定要控制食用。有些人不理解我的话,反而说我愚蠢。他们说:作为人子人妇,好东西不给老人食用,就是有亏孝道。你的理论能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吗?我听了他们的话,心里很难过,就对他们说,我这样说正是为了不悖于孝道呀。古时候社会风气淳朴,“井田之法行,乡闾之教兴,人知礼让,比屋可封”,应该说生活是比较富裕的了。但那时又有一条规定,就是“肉食不及幼壮”,人到五十才可以食肉。这个规定看似敬老,实则有违人的身体发育规律。

少年弱冠之前身体发育,弱冠之后劳作辛苦,均应食用肉食,以滋补养。而五十以后,“疾已蜂起,气耗血竭,筋柔骨痿,肠胃壅淤,涎沫充溢”,消化功能远不如以前。况且人到这个年龄,大多都是阴血亏,阳气盛,阴血不足以匹配阳气,使得身体阴阳失衡,疾病横生。只是因为天生的胃气尚存,再加上水谷的滋养,才勉强维持。前面所说的老人的种种症状,都是因为阴血不足而导致的。《内经》上有“肾恶燥”的记载,而乌附丹剂都是燥热之药,对于一般阴血不足的人,连防风、半夏、苍术这样稍有燥性的药都要慎用,更何况乌附丹剂之类的燥热药物呢。

还有人说,一部《局方》,都是温热养阳之方,而你却说这些药要慎用、少用,这不是很荒谬吗?我就回答说:《局方》用燥热之药是为了祛湿寒之症呀,湿寒之症用了燥热之药,肯定会豁然痊愈。而《局方》用暖剂,则是为了祛虚呀。人常说“补肾不如补脾,脾得温则易化,而食味进,下虽暂虚,亦可少回”。《内经》的治法也有用温补之法祛虚,就是这个道理。但这是一般是对那些平时身体强壮偶然患病的人而言,而老人一般身体衰弱,有时虽然没有什么疾病发生,但疾病已经在潜伏了。这时千万不可乱用燥热之药以求速效。如果滥用燥热之药,偶尔也可能收到效果,但一朝失手,悔之何益?所以我对老人的病症宁可慢些稳些,而不敢轻易滥用乌附丹剂之类的燥热之药,以求速效。至于对老人的饮食,更应该谨慎节制。因为老人一般都是“内虚脾弱,阴亏性急”,内虚胃热就容易饥饿思食,而脾虚则难于消化。这样“食已而再饱,阴虚难降,则气郁而成痰”,一患痰病,则“视听言动,皆成废懒,百不如意,怒火易炽”。即使是子孙孝顺,也常常扼腕叹息,更何况那些不孝的子孙呢?所以说“物性之热者,炭火制作者,气之香辣者,味之甘膩者,其不可食也”,道理就是很明显的了。虽然有一些老人肠胃功能良好,身体健康,一般

人就认为何妨食用一些甘旨之物,其实这样只可以使老人感到短暂的快乐,时间长了,必积久成病,所以还是尽量少食为好。

还有的人说,照你的说法,就什么好东西都不要给老人吃了,心中能安宁吗?我回答说,这是爱人的角度不一样,人常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何况是面对自己的长辈呢。其他当然都可以给予,就是在饮食方面要有节制,但也不是很生硬地不给,而是要针对老人“好生恶死,好安恶病”的心理状态,进行委婉的开导,“以义理晓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陈说利害”,如果能做到“意诚辞确,一切以敬慎行之,又次以身先之”,老人肯定会明白晚辈的一片苦心而不会生气的。当然所谓不给也不是说绝对一点不给,而是根据情况,在老人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时候,酌情给予,也是可以的。对一些平时不能吃的东西,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使老人不致受口腹之缺,又怎么会有亏孝道呢?当然如果做晚辈的,平时没有开导劝慰之语,老人饥肠辘辘,馋涎已动,而这时偏偏“饮食在前,馨香扑鼻”,此时如果不给,难道可以制止吗?所以古人说对老人要“忠养”,恐怕要好好体会一下这个“忠”字的含义呀。

接着,朱震亨又以自己的母亲为例,他说,我奉养老母,固然不如古人,但在饮食调养上还是有自己的原则的。我母亲年过七十以后,就曾经患有痰疾,究其原因也是饮食之过。只因母亲有段时间大便干燥便秘,我用了新鲜牛乳、猪油和粥熬在一起,让母亲食用。食用之后,当时虽然大便暂时通利,但终究是油腻之物积之过多,第二年夏天就患了痰症,发而成为胁疮,连日疼痛,寝食不安。我作为人子,真是无地自容。所以才冥思苦想节养之法,不时用一些参术等补胃补血之药,随着天气时令进行加减,于是母亲的症状有了很大的改善,“大腑不燥,面色莹洁,虽觉瘦弱,终是无病”。母亲之所以老境如此,完全是节养得当啊!

我也因此形成了一个奉养老人的方剂,这就是“用参朮为君,牛膝、芍药为臣,陈皮、茯苓为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黄芩、麦门冬,冬加当归身,倍生姜,一日或一帖,或二帖”,听到老人小水刚觉短少,就用这个方剂,使小水之长如旧,这确实是老人祛病的良法。

后来朱震亨到邻县东阳诊病,听说有一个姓何的老安人,性格聪敏,身体刚健。她自从70岁以后,稍觉身体不舒服,就停止进食几天,只用人参汤调补,几帖之后,身体就会恢复如初,最后年过九十,无疾而终。这位老安人的情况和朱震亨母亲大致相同,他便以此为例,来说明奉养老人的一些道理^①。

朱震亨关于老人养生保健的思想和实践,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今天仍受到人们的关注。当代许多年老而善于养生者,都对朱震亨的养生保健方法反复研究并付诸实践,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著书立说 嘉惠医林

办完母亲的丧事以后,朱震亨在为母亲感到庆幸的同时,又回想起自己身边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亲人朋友,深感人生无常,生命之舟随时会有倾覆的可能。虽然他是医生,曾经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无数的生命,但他却不知自己的生命还能走多远,因为66岁在那个时候也可以算是高寿了。在此之前,他的弟子们曾多次请求他能对自己的医学经验进行一番总结,写成文字,流传后世,嘉惠医林,但他都因忙于行医而未能着手。母亲丧事办完之后,弟子张翼又郑重地向老师提出请求,他感到是到了动笔的时候了。于是,在行医之余,他抓住点滴时间,将自己在多年行

^① 以上见朱震亨:《格致余论·养老论》。

医中的所见所闻、心得体会、医学主张和指导思想,写成若干篇文章,最后,又结集成书,取儒家“格物致知”之意,定书名为《格致余论》,这是朱震亨的第一部医学著作,也是他医学理论和思想的全面总结。

《格致余论》成书于“至正丁亥十月望日”^①,也就是至正七年(1347)十月十五日。书成之后,朱震亨将书稿送宋濂过目,并请之为序。当时宋濂正隐居于浦江县的东明山中著书立说,读了《格致余论》的全文之后,深为朱震亨的独到而深刻的医学见解所折服,欣然提笔为序,于同年十一月写成书序一篇,高度评价了《格致余论》一书的价值。其云:

金之以善医名者凡三人,曰刘守真氏、曰张子和氏、曰李明之氏,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攻补,至于惟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则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有异也。张一再传,其后无所闻。李虽多门弟子,又在中州,人有罕知之者。独刘之学,授之荆山浮屠师,师江南始传太无罗知悌于杭。太无宋宝祐中人,受幸穆陵,得给事禁中。性倨甚,无有能承其学者。又独至乌伤朱君,始能传之。初君之未从太无也,手抄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有七方,昼夜而习焉。既而悟曰:故方新病,安有能相值者,泥是且杀人。乃尽弃去,渡浙河,走吴中,寻师而求其说。久之不能得,复走宛陵、走南徐、走建业,皆无。吴中时累累道途间,方不知所适,忽有以太无为告者。遂还杭,拜之,凡十往返,不得通。君乃立其门,终日不动。太无怜其志,为敷畅三家之旨,而一折以经。越数年,悉受其学以归。乡之群医

^① 《义乌赤岸朱氏宗谱》,转引自冯汉龙、方春阳《朱震亨年谱》。

方泥陈裴学，闻君言皆大惊，已而又皆大服，翕然共尊事之。君年既高，所见益粹精，其自得者类多前人所未发。乃徇门人张翼等请，著为书若干篇，名之曰《格致余论》。持以示金华宋濂，濂窃受而读之，见其立言深、察证详，未尝不叹君用志之勤也。盖当大观之方盛行，世之人乌知有所谓《内经》之学，君独能崎岖数十百里，必欲求师而受其说，虽险阻艰难、更婴迭挫，曾不为之少动，所以卒能成其学，向使君之志稍变焉，乌有今日哉？传曰：“用志不分，其道乃成。”殆君之谓矣。此书其有功于生民者甚大，宜与三家所著并传于世……^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金代有名的医生有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三个，这三个人虽然年龄大小不同，医学指导思想不同，但在对“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的认识上，都是以《黄帝内经》为宗旨的。其后张子和的学术传了两代以后就不闻声息。李东垣虽然有很多弟子，但都在中州，很少为外界所知。只有刘完素的学说传给了荆山浮屠，荆山浮屠又传给杭州的罗知悌，而朱震亨又是罗知悌的徒弟，通过他的努力使刘完素的医学思想在南方普遍传播。宋濂尤其对朱震亨在南方纠正《局方》之偏、弘扬《内经》之教的做法进行了称赞，他说在南方《局方》盛行的时候，人们很少知道有《内经》之学，只有朱震亨能够不畏艰辛，“崎岖数十百里，必欲求师而受其说，虽险阻艰难、更婴迭挫，曾不为之少动”，所以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说《格致余论》中对民生有用的东西太多了，应该与刘、张、李三家的著作并行于世。

宋濂的评价对朱震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决定在今后的

^①（明）宋濂：《格致余论原序》。

时间里,将自己几十年的实践做进一步的总结和整理,编撰成书,流传后代。

朱震亨的第二部医学著述还在构思的时候,又传来一个令他心痛的消息:最早师从朱震亨学医的戴士尧病逝。戴士尧是朱震亨最早的弟子之一,天性纯孝,因了母亲为庸医所误而死,一直自责不已,身体也一直衰弱。朱震亨曾多次劝慰,并让他多注意身体。朱震亨知道戴士尧身体不好,但没想到他这么早去世,心中一阵阵难受。戴士尧的死对朱震亨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更加感到时间的紧迫,加快了写作的步伐,在行医之余抓紧点滴时间进行著述。《格致余论》之后,他又针对当时《局方》盛行,给医界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的情况,写了《局方发挥》一书,以纠其谬。针对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中的缺略撰写了《本草衍义补遗》等。在补订《本草衍义》的同时,朱震亨又发现宋代陈自明所著的《外科精要》和《本草衍义》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一些错误和不足,于是在《本草衍义补遗》完稿之后,又紧接着纂著了《外科精要发挥》,使这部关于外科治疗的著作更加完善。这几部著作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中医药学方面的宝贵文献。这一时期,他还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撰写了许多关于临床实践和应用方面的医学著作,可惜后来大多散佚,只能靠后人重新辑录整理。后来他的门人后学及私淑者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他们在朱震亨去世以后对他的医疗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和总结,辑录和编纂了多部弘扬和发展朱震亨医学思想和理论的书籍,使之成为中国医林中的宝贵文献。

除撰写医学书籍外,朱震亨还撰写了一部关于破除风水迷信方面的书。

在当时的江南,除了医学界《局方》盛行,给人们造成疾病上的痛苦外,在思想方面,风水学说的盛行也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

大误区。中国从古代起,奉行聚族而葬的做法,如曲阜的孔墓就是很好的一例,几千年来无所变更。但风水之说的兴起,使古代的这一葬法受到了冲击。很多人听信巫师的言论,认为今世的荣华富贵、个人命运的好坏、子孙后辈的造化都和祖先葬地的风水有关。所以在家里人去世之后,不是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择地而葬,而是完全听命于巫师之言,千方百计地选择那些“风水”好的地方埋葬,这样就给人们正常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本来在近处就可以安葬的,巫师非要说远处的地方风水好,必须舍近求远而葬,否则就要受到舆论的谴责。本来东边已经选好了墓地,巫师非说西边的风水上佳,不得已又得重新确定墓地的位置,不然就是对死者的不敬。明明自己家的地里可以埋葬,巫师偏说别人家的地里风水比这里强,于是又得和别人家磋商,请求将祖宗埋葬于他人之地。为此往往引起纠纷,有的人甚至因了巫师之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墓地,致使家人去世好长时间还不能入土为安。

朱震亨虽然非常尊重儒家的礼仪规范,为好多家族订过家礼,自己在平时也是严格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去做,但他在思想上却毫不迷信。他认为做人要正直坦诚,养成良好的德行,活着无愧于天地祖宗,死了葬到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只要是感觉到方便、合情合理就行。为了纠正人们在丧葬问题上的思想偏差,朱震亨在撰写医学著作的同时,又以设问的形式,撰写了一部专论风水之说的著述《风水问答》,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答疑辩论,阐明人的生死祸福、福禄寿夭和祖先的葬地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所以在祖先葬地的选择上不要过于拘泥于巫师之说,应因地制宜才是。但同时朱震亨对活人的住宅却非常讲究,在驳斥葬地风水迷信的同时又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居室风水与人的吉凶祸福的关系,提出选择住宅时一定要对

风水进行考察,认为“人之居室,其要有七,一曰形局,众水会同,众沙攒聚之地是也;二曰向首,如甲丙庚壬、乙辛丁癸是也;三曰门,四曰路,皆协入吉是也;五曰水,洋洋悠悠,顾我欲留是也;六曰沙,左右进退强弱,各当其可是也;七曰景,无形声之杀是也”^①。反对葬地迷信是朱震亨思想解放的表现,但同时对于居室风水的迷信则可看出朱震亨思想上的局限。

《风水问答》写成之后,首先得到亲家胡翰的认可,胡翰在阅读全文之后十分赞赏朱震亨的勇气和观点,立即写序表示支持。他说:

乌伤朱君彦修,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读书,从先生游最久,尝有志当世。充赋有司,不合,退而业医,犹幸其濡沫及人也。著书数万言,曰《格致余论》,人多传之,而君之医遂名海右。又以阴阳家多忌讳,不知稽诸古也。复著书数千言,曰《风水问答》。书成,示余双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谓至矣。易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确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观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圣人孰与焉。而汉魏以来言地理者,往往溺于形法之末,则既失矣。至其为书,若《宅经》、《葬经》之属,又多秘而亡逸不传,则失之愈远矣。朱君力辨之,以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为宫室以处,审曲面势,得则吉,不得则凶,其理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参于天,举而葬者,枯骨耳。积岁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福祸于人、贵贱于人、寿夭于人哉?故葬不择地,而居必度室。

^① 朱震亨:《风水问答》,收录于刘时觉编校之《丹溪逸书》中,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据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诗书之间，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为都邑宫室设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职，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择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为得也，惜其书不见于二百年之前。绍兴山陵改卜之议，晦庵朱子以忠贾祸，夫以一世豪杰之才，千古圣贤之学，萃乎其人，观于天下之义理多矣，而笃惟蔡元定之说，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学于勉斋，四传而为文懿。君受业先生之门，计其平日之所讨论，亦尝有及于斯乎？不然则是书成于先生未易箠之日，必能是正其说，传信于人，而顾使翰得而读之，岂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将命而不暇择，尝惕然于先儒土厚水深之言。于是得君之书，欣然如获拱璧。昔里有余祯者，以是术游江湖间，邵庵虞公深敬信之。其著书曰《地理十准》，虞公称其有得于管、轲王吉之传，力诋曾、杨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轲所作，则与翰同一惑也。书之于篇，朱君其幸，有以教之。^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朱震亨是许谦的高第弟子，跟随许谦的时间最久，曾经有志于当世，但因为几次科举不成，就退而学医，要以一己之长而惠及他人。他曾经写了著名的《格致余论》，被人们广为传诵，也因之而医名卓著。现在他又因阴阳家多忌讳而写了《风水问答》，专门与之论辩，使人们破除对风水之说的迷信，死人的葬地根据自己家中的实际情况选择，再不要为了能给祖先找一块好的墓地而劳神费力了。同时，朱震亨的著作还使

^①（明）胡翰：《胡仲子集》卷四《风水问答序》。

胡翰去掉了多年的一块心病,原来胡翰的父亲去世已经10年多了,当时因为过度悲哀,没有听从巫师之言远葬,而将父亲葬在近处,便于经常在墓前洒扫祭奠。虽然事情过去了10多年,但胡翰经常为此事心中忐忑,生怕于后代有所妨碍。现在读了朱震亨的著作,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有“欣然如获拱璧”之感。

后来姑苏人王行看了《风水问答》之后,又为之写了跋,其全文为:

君子之所谓趋吉避凶,亦向善背恶、修人事以顺天理而已。天理平易而正直,人事亦惟平易正直为可以顺之,顺天理矣。果吉若凶,所不计也。公刘之迁邠,择地利以便民居;周公之宅洛,承先志以服土中耳。民居既奠,先志既成,人事至矣。顺夫天理,孰过于此?若曰定形局而必于是,而期后胤之有天下;立方向而必于是,而期祚致八百年之永者,岂足以为公刘、周公也哉?丹溪之为是书,深斥卜葬之非,可谓不溺于流俗矣!而于居室乃拘拘焉。为是委曲烦碎之说,旁引曲证,谓必尔而吉,不尔而凶,若无毫末之可违者,固平易正直之所为耶?且夫阴阳五行有自然之运,或为菑咎,良非偶然,惟德足以消弭。今乃以力胜之,非理矣!此又见其不能笃于自信也。孔子曰:‘致远恐泥。’丹溪其泥者哉。①

意思是说君子所说的“趋吉避凶”,一般都是要人们多做善事,修人事而顺天理而已。至于到底吉凶之事,谁也难以预料,

① (明)王行:《半轩集》卷八《题朱彦修 风水问答 后》。

更不会取决于葬地的好坏。他说朱震亨在《风水问答》中对葬地风水的批判,是不溺于流俗的表现。但对居室卜宅的迷信,则是不自信的表现。

朱震亨的《风水问答》在当时引起了宋濂的共鸣,宋濂在读了朱震亨的《风水问答》之后,也写了一篇《慈孝庵记》,阐述了自己对风水问题的看法。宋濂说古代的百姓葬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国家设了“墓大夫”这个官职,专门“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数,分其地,使各有区域而得以族葬之”。自从风水之说兴起后,凡遇了丧事,欲对亲人进行安葬时,往往要“敛容屏气,伺候巫之颜色。巫曰‘此可葬’,虽踰都越邑亦匍匐而从事,巫曰‘不可葬’,虽近在居室之旁、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违去之”。致使本为同根相连的父子、兄弟,死后的葬地却“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让生者看了心中不忍。宋濂也早就对当时盛行的风水之说有所质疑,但又囿于当时世风而不敢明言,朱震亨的著作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说如果世上像这样的人再多一些,“推而至于四海之广、九州之众”的话,那么巫师之言就没有什么市场了,人们在墓葬方面也不会再面临那么多的困惑了,古代的族葬之法也可以渐渐恢复的。^①

宋濂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人对风水问题的态度,也说明了朱震亨《风水问答》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破除迷信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朱震亨《风水问答》所反映出的思想,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另外,根据宋濂《石表辞》记载,朱震亨在这一时期还写了一部名为《宋论》的书,而戴良《丹溪翁传》却无《宋论》而有《新论》,各持一说,未知孰是。《浙江通志·经籍》亦著录有《宋论》一卷,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三《慈孝庵记》。

朱震亨著,其来源亦是《石表辞》。中国史籍中,以《宋论》著名者,有刘定之《宋论》3卷,王夫子《宋论》15卷,均是论史之作,似与朱震亨无涉。只有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卷八《地理》篇亦专言丧葬风水之事,引《宋论》之文甚多,且与朱震亨《风水问答》中的语言十分吻合,推测张志淳文中所说的《宋论》可能是朱震亨所著。其内容当和《风水问答》同源,都是朱震亨反对风水迷信思想的反映。

为了以事实服人,朱震亨在写了《风水问答》之后,还为自己 在东朱山的原上选择了墓地,并对儿子玉汝说:我死了之后,要和你母亲一同葬在这里,你们将来也可以附葬于左右。后来朱震亨去世之后,朱玉汝奉命将父亲葬于东山,与母亲葬在一起,将早于父亲而死的兄长朱嗣衍葬在父亲之右。又预先为自己和妻子各修一墓,位于父母亲、兄长坟墓的左右^①。这样生前亲密无间的一家人,死后仍能团聚在一起,也便于后世子孙的祭奠,于后代又有什么不好呢?

朱震亨的破除迷信、聚族而葬的丧葬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篇幅较小,难于保存,《风水问答》在社会上流传不久,即告亡佚,难以见到。2004年,温州医学院附属二院刘时觉先生在校正《丹溪治痘要法》时,意外发现了收录于《奚囊广要》中的《风水问答》,如获至宝,于是立即抄录校正,并收入其所整理编校的《丹溪逸书》之中,使散佚多年的典籍得以重新问世。

这一时期,是朱震亨撰述十分丰富的时期,他将自己一生的医学思想、主张和实践以及对人生的感悟用文字作了全面的总结,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①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七《孝友庵记》。

行医济世 孜孜不息

朱震亨在乡间行医治病期间,由于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品格过人,所以一直在地方上享有很高威信,地方官员每逢遇到大事,或疑而不决的案情,都喜欢找朱震亨商量探讨。而朱震亨对前来求教的官员,也是毫无保留,总是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一般都能得到地方官员的采纳,而且事后也证明朱震亨所谈大多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们对朱震亨也总是另眼相看,每逢有荐举之事,总是把他列入荐举的名单。但朱震亨认为自己行医就是在解除百姓的痛苦,不一定非要当官,所以对地方官员的荐举,每次都是婉言谢绝,一直全心全意为百姓治病,解除他们身体上的痛苦。当地百姓对朱震亨的高风亮节交口称赞,并称他为“聘君”。他的同乡后学吴之器说朱震亨曾多次被“廉访使者荐之于朝,震亨辞之不受。郡邑咸尊遇之,号之曰‘聘君’”^①。但是对于百姓的疾苦,他却无时无刻不放在心上,一有机会,就向地方官员倾诉,希望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百姓的负担,使百姓不至于衣食无着。官员们对朱震亨的提议每次都能予以重视,并尽量付诸实施,前述蜀墅塘堤岸的修筑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可以说,朱震亨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加强了地方上官、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使两者的矛盾趋于缓和,也使百姓尽量少受一些额外的痛苦。

至正十二年(1352)秋天,72岁的朱震亨又应邀至金华为张君治病。张君,姓名不详,与宋濂同里,关系亲密。据宋濂所言,张君之病,实因操劳过度而致,病情十分沉重,自思无望。闻朱震亨之高名,遂相邀为自己诊治。朱震亨到金华,仔细为之诊断

^① (明)吴之器:《婺书·朱聘君传》,转引自《朱丹溪年谱》。

以后,认为其病是劳累过度,内外皆伤,除药物治疗之外,重要的是好好休养,万不可轻动。然后在离开的时候让自己的弟子贾思诚留下照顾观察,以免病人在休养时不注意导致反复。贾思诚遵师命留下后,除按老师的方法继续治疗外,还耐心关照病人的起居生活,历经数年,张君方彻底痊愈。张君有感于自己的生命为朱震亨和贾思诚所救,痊愈后特请宋濂为文以记,这就是保存在宋濂文集的《赠贾思诚序》。

朱震亨一生以自己高超的医术挽救了许多濒死的病人,然而却无法挽救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的生命。就在为张君治病的第二年,也就是朱震亨73岁那年,连续传来了两个令他感到黯然的消息:一个是他的医林好友葛乾孙的去世,一个是和他有着同窗之谊的妻弟兼姑表兄弟戚崇僧的去世。

葛乾孙和朱震亨的关系一直很好,两人互相尊重,互相推崇,在医学上有过多次合作。

有一次,一名身患伤寒的士人,因为无法发汗而烦躁,葛乾孙去诊断的时候,看到这位士人烦躁异常,沿着河道狂奔不止。葛乾孙干脆将他一把抓起扔到水中,不让他上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让他出水上岸。然后让家里人给他裹上厚厚的棉被,此人大汗淋漓,伤寒痊愈。^①

还有一次,葛乾孙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富家女治病,只见病人四肢痿痹,生活不能自理,只是大瞪双眼,无法动弹。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有办法。葛乾孙看了以后,笑着说道:要治好病不难,但一定要听我的。他先让将女子房中所有的香料、流苏之类的东西全部拿掉,再拆开地板,掘土为坑,将女子放入其中,然后锁上门。告诫家人不要乱动,一定等女子手足活动再说。过了好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一《伤寒》。

长时间,女子果然手足活动,于是就给她服用一丸成药,又过了一宿,女子即能行动,自己从坑中走了出来^①。原来这个女子平时嗜香如命,闺房之中整日浓香不散,导致脾胃被香气所蚀,所以出现了那样的症状。

有个人因误食水银而僵死,四肢僵硬冰冷,只有鼻子还有些喘息。医生和家人束手无策,听说葛乾孙善于治疗疑难病症,就延请他前来治病。葛乾孙看了病人的情况,让家里人拿出200两白银,家人很为难,说家中贫穷,实在没有这么多的银子作为报酬。葛乾孙笑着说,要那么多银子是为了煮汤治病,并不是要报酬。于是就向富人开口借银,将借来的银子放在锅里煮沸,让病者在里面热浴。等到病人手足活动,睁眼视物,又能坐起的时候,就取二斤川椒放在便桶中,让病人坐在上边。半天以后,病人恢复如平时^②。

葛乾孙还长于针灸,往往取得奇效。

一次,葛乾孙和另一名医生沈以潜给一个患有黄疸病的老妇人治病,病人先是找沈以潜,沈又向病人推荐了葛乾孙,葛乾孙用针刺病人左右乳房下部,留针片时,一会拔左针,“左半身肉色莹然”,拔右针,“右半身肉色如左”。^③

还有一次,葛乾孙为一个长期患腹痛的病人诊治,说是病人腹中有一肉龟,告诉家人不要让病人知道病因,等病人熟睡之后施用针刺。病人向家人询问诊断结果时,家人骗他说是寒气凝结,须饮酒解之,患者非常高兴,“引觞剧饮,沉酣而卧”。葛乾孙见患者沉睡不起,就以针刺其痛处,病人一惊而起。葛乾孙连忙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九《四肢病》。

②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二九《中毒》。

③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一二《黄疸》。

让给病人服下药饵,一会儿病人就排下一肉块,形如龟,龟首部位有一个针眼,就是刚才刺中的地方,病人腹痛立即痊愈。^①

在针灸方面,葛乾孙和朱震亨也有过几次愉快的合作,一次是江浙行省的一个高级官员在赴任的路上突然中风,四肢不能活动,就请了朱震亨和葛乾孙诊治,葛乾孙到达病人住所的时候,朱震亨已经到达。两人都是医名远播,也相互知道,但从来没见过面,初次相遇,“见之甚欢”,然后一起诊病。朱震亨看完以后,认为病人病势沉重,已非药物所能救。葛乾孙说:我也知道病人是不可救药了,但还可以用针法试试,延缓一下死亡的时间。朱震亨说:你的针只能使他的两肢活动,但挽救不了生命。官员的左右让乾孙立即进针,针扎进去以后,果然和朱震亨所说相同。朱震亨又问了这位官员家乡的远近,说抓紧一点还可以回到家。手下的人听了,急如星火,日夜兼程,果然官员在刚刚到达家中的时候去世。^②

初次相遇,朱震亨对疾病的准确诊断和直言不讳的性格,给葛乾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视朱震亨为知己和老师,和朱震亨不时有往来。

还有一次,朱震亨为浙江的一个女子诊治痲病,病人已经痊愈,但脸上有两处红色斑点,怎么也下不去,朱震亨没有办法,告诉主人说现在只有请姑苏的葛可久才能治好。但这个人生性豪迈不羁,一般人这么远请他恐怕不一定来,我给他写封信,他只要见到我的信,肯定是会来的。主人听了十分高兴,立即准备好船只,派人去姑苏相请。船只到达的时候,葛乾孙正在与人博戏,大呼小叫,根本不予理睬。后来使者奉上朱震亨的书信,葛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二九《诸虫》。

② (元)都穆:《都公谭纂》,转引自《朱丹溪年谱》。

乾孙一看,也不和众人辞行,立即动身前往。到了之后,朱震亨说明病人的情况,葛乾孙说只要在双乳上施行针刺之法就可解决问题,主人听说后,面有难色。朱震亨让给女子胸上覆盖衣物,隔衣而刺,斑点果真“应手而灭”,主人给葛乾孙的酬谢十分丰厚。葛乾孙大笑道:“吾为朱先生来,岂责尔报也。”对病家的酬谢一无所受。^①

从以上两则记载中,即可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现在这样一个比自己年轻好多的同行知己却先自己而去世,朱震亨怎么能不为之感伤呢?

其实就葛乾孙的特长来说,应该是对虚癆、肺癆病症的治疗,他的著作《十药神书》就记载了许多关于治疗虚癆症的方剂,所以后人称他为癆病专家。

除了医术高超之外,和朱震亨一样,葛乾孙的医德也非常高尚,穷苦人看病无钱,他往往施以善药。倒是那些富贵人家,如果不以礼相待,他是决意不会去为之诊治的,所以他的生活一直不太宽裕,但他却一直不改初衷。

就是这样一个人,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人,却对自己的生命毫无办法,

葛乾孙是因伤力过度出血而死的,据江瓘记载,葛乾孙平时好习武艺,一日看见了一把莫徕桑弓,即上前挽之,并使足了劲,拉之如满月。回来后即排泄血水,命儿子煎大黄四两服用。儿子觉得药量太大,就减半煎熬。他服用以后,觉得效果不对,盘问儿子,儿子如实相告。葛乾孙叹道:“少了也无妨,看来我是必死无疑了。”^② 第二年果然去世,年龄只有48岁。

^① (明)徐祯卿:《异林·艺术》,转引自《朱丹溪年谱》。

^②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一〇《撇扑损伤》。

73岁的朱震亨听到48岁的葛乾孙的死讯,内心突然泛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感觉。虽然在长期的行医生涯中,生老病死之事所历甚多,对死人已不足为奇,但葛乾孙的去世,对朱震亨还是有所震动,他似乎更加感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因而加快了撰述和医学研究的步伐。

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话也许真有一些道理,就在朱震亨还没有从葛乾孙去世的失落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十一月中旬,他又接到了戚崇僧的死讯,使其刚刚趋于平静的心理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戚崇僧字仲咸,是朱震亨姑姑朱寿的次子,是戚氏家学的重要传承者。戚崇僧小朱震亨10岁左右,当年在八华山师从许谦学习的时候,朱震亨37岁,戚崇僧27岁,年龄的差别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戚崇僧和朱震亨一样,赴八华山之前也学的是诗赋文章,他写的文章,因为“积丽绵密”、构思新奇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后来也是听说许谦在八华山讲究理学,就将原先所学的东西全部抛弃,专心致力于儒家经典。其学习态度坚定,废寝忘食,不仅“博通经史”,而且还“旁及诸子百家”,尤其潜心于“儒先性理”之说,对学习遇到的问题,总是要“探幽发微,必极其根柢而后已”。^①由于戚崇僧的兄长远在广西为官,后来又死于任上,给父母带来极大的伤痛。所以戚崇僧决定远离仕途,以奉养双亲为念。父亲喜欢永康太平山中的幽静,侨居已久,戚崇僧为之卜宅而居,并奉养父亲于太平。从许谦学习结束后,戚崇僧就在太平教授亲戚吕氏家族的子弟研习儒家经典,后又扩大规模,使附近乡民的子弟都能随同学习。崇僧恪守师道,教授有方,被乡人尊称为“朝阳先生”。崇僧在生活上和朱震亨一样,也

^① (元)黄潘《文献集》卷九(下)《戚君墓志铭》。

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生活极为简朴,“克己厉行,为人所难能”。平时衣粗食淡,就是招待亲朋也是一样,从不徇情。性格恬静,经常“默坐一室,环以书数百卷,非有故不妄出”。教学之外,著述亦颇丰,有《春秋纂例原指》3卷、《四书仪对》2卷、《后复古编》1卷、《昭穆图》1卷、《历代指掌图》2卷,等等,可惜这些著作大多都没有流传下来。

戚崇僧去世的时候,只有六十出头,作为至亲的朱震亨十分难受,就连为他写墓志铭的黄潛也觉得于心不忍,因为20年前戚崇僧父亲戚象祖的墓志铭就是他写的,黄潛说也许是他年纪大的缘故吧,实在不忍心一人连写父子二人的墓志,但由于崇僧的儿子戚莞的再三请求,才不得已为之作铭。

戚崇僧家虽然是金华人,但因和朱家是姻亲关系,所以从父亲戚象祖起,就经常居住于义乌,和朱震亨家族在一起。出于对乡土亲情的怀恋,戚象祖夫妻和戚崇僧死后都葬在义乌,象祖夫妻之墓在义乌明义乡竹泽原,而崇僧则在义乌双林乡附近的原上。

元至正十五年(1355),朱震亨的长子朱嗣衍因病去世,时年52岁,这对年过古稀的朱震亨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嗣衍少年时即身患疾病,一直无法治愈,又过早地失去了慈母的怜爱。虽有祖母的关爱,父亲的护持,但生活毕竟不是那么快乐的。他的死也许是朱震亨意料中事,但一旦事实如此,他又觉得难以接受。身为名医,儿子却终生受病痛折磨,这对朱震亨来说,确实是件十分残酷的事情。其实朱震亨并不知道,嗣衍的病很可能和父母的近亲结婚有关,朱家和戚家几代相互通婚,固然加深了两家的情谊,但近亲结婚对于血脉传承却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可惜那个时候人们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即使连朱震亨这样的名医也无法逃脱这一劫难,其他人就更想象不到了。

晚年的朱震亨,不光是医学见解独到,医疗技术炉火纯青,对社会问题也很敏感,看法也很尖锐。有一次,他从括苍(今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一带)回来,路过永康县(今浙江省永康市),和朋友谈起此行的见闻,说道青田地区的民风剽悍,在目前社会秩序不稳、法律松弛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依仗险阻,啸聚为乱,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证实了他的看法。他又根据自己行医所至的见闻,清楚地感觉到当时社会中所隐藏的危机,意识到不久可能要发生大的社会动乱。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社会形势还算太平,所以人们听了他的话,都认为他是迂腐之见,一笑了之。但没过多久,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就在北方拉开了帷幕,以后又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南方,最终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后来很多人回想起朱震亨说过的话,这才佩服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敏锐性。

斯人虽去 风范永存

元惠宗至正十八年(1358)六月二十四日,78岁的朱震亨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里程。

朱震亨一生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去世3天前还不顾炎热,以78岁的高龄外出行医,回来后稍觉困倦,连寐3日而卒。也许是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也许是感受到了亲人们的呼唤,朱震亨去世的时候,态度十分从容安详,正如宋濂《石表辞》所记的那样,“濒卒,无他言,独呼嗣汜谓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訖,端坐而逝”。

嗣汜是朱震亨的侄子,和朱震亨的次子朱玉汝一同从朱震亨学医,后来二人亦均以医名著称于世。朱震亨给后世遗言中“医学亦难”的“难”字,可以说是对其一生医学生涯的总结。医学之难不仅是对医术的要求,而且在医德上特别重要,它要求有

志于从事医学活动的人一定要刻苦认真、锲而不舍，诊病治病上迅速准确，精益求精，治病救人上讲究医德，急人危难。一丝一毫也迟缓不得，马虎不得。朱震亨的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无愧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无愧于自己名医的称号，无愧于自己在医林中的地位，他以一生的实践实现了自己当初“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的承诺。但他又唯恐自己死后后代律己不严，所以留下了如是遗言，实在是给后人的鞭策和激励，也值得后人时时警惕之。

由于多年来朱震亨在朱氏家族和整个蜀山里都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既是朱氏家族的支撑，也是所在乡里人的主心骨，他的去世，使“宗属失其所倚藉，并邑失其所依凭，嗜学之士失其所承事”，人们悲痛不已，莫不“彷徨遥慕，至于洒涕”。尤其是和他为忘年之交的宋濂，更是“摧咽不自胜”，他回想起自己年方弱冠，就被朱震亨看重，往来密切，“相亲于几杖间，订义质疑，而求古人精神心术之所寓”，那时朱震亨对自己的年轻无知毫无轻视之态，两人结为忘年之交，每逢在一起，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宋濂认为他对朱震亨了解得比较清楚。听到朱震亨去世的消息，宋濂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写一篇文章，将朱震亨的生平事迹记载下来，以免后人不知道这位古人的事迹。宋濂正在构思、尚未动笔的时候，朱震亨的次子朱玉汝、侄子朱嗣汜又前来请求宋濂为朱震亨撰写墓志铭，于是宋濂一挥而就，写下了资料详细具体、感情真挚的《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对朱震亨的为人做了如实的记述，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自从学术不为天下人看重以后，古代圣贤防范人心、维持世道的书籍往往散逸，后人将零碎的东西重新组合，编撰成章，作为哗众取宠的工具。其中也有一些有志于经学的人，但又泥于训诂之学，中间异同纷争，形如聚讼。而个人的修养和行为反而不被看重了，这种

情况持续了好长时间,一直到宋代濂洛之学兴起之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学术从过去那种哗众取宠和脱离实际的误区中走了出来,“流者遏而止之,胶者释而通之。一期闾廓其昏翳,挽回其精明”。良好的学术风气代代相传,一直到了考亭(朱熹)成为集大成之人。后来考亭又传至金华四贤,使金华成为理学的重镇。朱震亨是金华四贤的传人,他早年生性豪爽,仗义任侠,及至学习了道德性命之学以后,性格大变,从浮躁变为刚毅,昼夜悟先哲之教诲,更念百姓之疾苦,如果有一点能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他都要“委蛇周旋,求尽其心”,由此又推及到施仁义于百姓,以医为终身之业,“搜隐抉秘,倡明南方之绝学”,多少贫苦之家,仗先生全其性命。宋濂说朱震亨仅仅是一介布衣,能以一己之身施惠于百姓。如果他能够像一些达官贵人一样“得位于朝,以行其道”的话,那又将会作出如何样的业绩,真是不可限量了。^①

朱震亨的高第弟子戴思乐的父亲戴良为朱震亨写了传记,从儒医结合的角度对朱震亨的医术作了高度的评价,在历数了朱震亨在医学方面的卓著成就后,又从其行事和品格上进行了追述,说他的品格“简恣贞良,刚严介特,执心以正,立身以诚”,说他的忠厚孝友是天生的品德,对于天地自然,他一贯持敬畏的态度,“奉时祀也,订其礼文而敬莅之”;对于长辈,他一贯以孝道为先,“事母夫人也,时其节宣以忠养之”。平时在生活上,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宁歉于己,而必致丰于兄弟;宁薄于己子,而必施厚于兄弟之子”。在交友言谈上,他都有自己一定的原则,“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平时喜欢谈论一些古今得失之事,“慨然有天下之忧”。当时的一些公卿名士仰慕他的名声,很多人折节求见,他都是和他们直言治理之道,毫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如

^① 以上见宋濂:《文宪集》卷二四《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果有人言及名利之事,他就会立即“拂衣而起”。与人交谈,也是以儒家道德为标准,重视人的行动而不是言论。他认为朝廷政治和人们的行为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行是本,言从行而起。如果有的人有言无行,他就会怒容满面,拒绝与之交谈。从儒家道德观念来衡量朱震亨,戴良认为他无疑是完全具备的。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只不过是他的诸种美德中的一种罢了。

为了表彰朱震亨的品格之美,戴良还将朱震亨与古代的贤哲相比,他说汉代的严君平非常博学,在成都以卖卜为生,有些邪恶之人来求他一卜,他总是以蓍龟为由,陈说利害,规劝他们改邪归正。一般对来问卜的人,他也是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人们称赞严君平,说他的风声气节足以激贪而厉俗。朱震亨和严君平一样,在浙东学习精通了道学(理学)的原委,后又以医著名,凡是来求他诊治的,他都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去开导,“以葆精毓神开其心,至于一语一默一出一处,凡有关于伦理者,尤谆谆训诲,使人奋迅感慨,激厉之不暇”。左丘明曾经说过:“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这是千真万确的。朱震亨这样的高尚之人,就是古人所谓的“直谅多闻之益友”,不可以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医生看待。^①

戴良的话,可以说是对朱震亨比较全面的评价。

朱震亨死后,他的姻亲兼好友胡翰为他写了一篇哀辞,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此辞被保留在《义乌赤岸朱氏宗谱》中,可惜遍找不见,所以无法看到全文了。

朱震亨的丧事期间,他的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

^① 见戴良:《仇灵山房集》卷一〇《丹溪翁传》。

到他灵前祭奠，其入室弟子楼厘的孙子楼英也奉父亲楼仁之命，到义乌奔丧。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朱震亨的追念和敬意。朱震亨所居住的赤岸村有一条溪流，叫做丹溪，人们出于对朱震亨的尊敬和仰慕，不敢也不愿在谈到他的时候直呼其名，就将这条朱震亨生前十分喜欢的溪流名字作为对朱震亨的敬称，于是“丹溪先生”就成了后来人们对朱震亨的称谓。

朱震亨逝世 5 个月之后，人们把他安葬在东朱山的原上。这里有早于他 35 年去世的妻子戚氏和早他 3 年去世的长子朱嗣衍，久违了的一家又终于团聚在一起。

第七章

医学著作 杏林奇葩

朱震亨在理学方面有精深的造诣,但他在这些方面的著述却付诸阙如。今见朱震亨著作,除《风水问答》外,其余均为医家类著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方面的情况呢?用朱震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关于“义理精微、礼乐制度”方面的东西,他的同门师友已经写得很多了,他已经无话可说了,所以就只是把在医学和其他方面的心得和见解写了出来。

朱震亨的医学著作,有如杏林奇葩,异彩纷呈,千古流传。

关于朱震亨的著作,宋濂说有《宋论》、《格致余论》若干卷,《局方发挥》若干卷,《伤寒论辨》若干卷,《外科精要发挥》若干卷,《本草衍义补遗》若干卷,《风水问答》若干卷。^①戴良云朱震亨所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②李时珍云朱震亨及有关朱震亨的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卢和《丹溪心法》、《丹溪医案》(无著者)杨珣《丹溪心法》;方广《丹溪心法附余》、《丹溪活套》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二四《石表辞》。

② (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〇《丹溪翁传》。

(无著者)程充《丹溪心法》等8种。^① 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黄虞稷所编的《千顷堂书目》中著录朱震亨著作为《风水问答》(无卷数)^②、《格致余论》1卷、《金匱钩玄》3卷、《伤寒论辨》(卷数缺)、《本草衍义补遗》(卷数缺)、《局方发挥》1卷、《平治荟萃方》3卷、《外科精要发挥》(卷数缺)、《丹溪治痘要法》1卷、《活幼便览》2卷、《丹溪医按》1卷、《丹溪治法语录》3卷等^③,共12种。几种说法之间各有差异,互有出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推测宋濂、戴良固然对朱震亨非常熟悉,对他的著作也应该知道得比较清楚,二人所言应是比较可靠的。但他们毕竟是为之写传记、墓铭一类的东西,不是考证作者的著述,所以写上他们认为具有代表意义的就行了。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列举诸家本草,所以将朱震亨和其门人、私淑者整理的关于朱震亨的医学著述全部列出,也在情理之中。而黄虞稷是编撰书目,自然要搜罗殆尽,力求全面,所以更应该相信书目所著录。只可惜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些已经散逸失落,至今未被发现,有些虽已经被发现,但又很不完全,只能是留下很多遗憾了。

《格致余论》

《格致余论》是朱震亨的第一部医学著作,由45篇单篇文章组成,不分章节,浑然一体,可以看做是朱震亨的医学论文集。具体篇目有《饮食食欲箴序》、《饮食箴》、《食欲箴》、《阳有余阴不足论》、《治病必求其本论》、《涩脉论》、《养老论》、《慈幼论》、《夏月伏阴在内论》、《痘疮陈氏方论》、《痛风论》、《疟症论》、《病邪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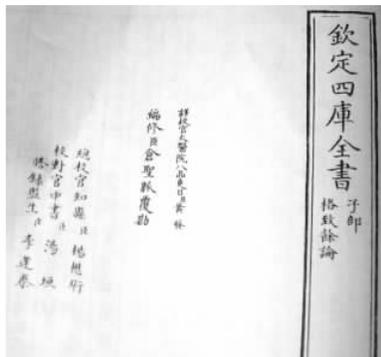
①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上)《历代诸家本草》。

②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三《五行类》。

③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四《医家类》。

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诊论》、《大病不守禁忌论》、《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面鼻得冷则黑论》、《胎自堕论》、《难产论》、《难产胞损淋漓论》、《胎妇转胞病论》、《乳硬论》、《受胎论》、《人迎气口论》、《春宣论》、《醇酒宜冷饮论》、《痲疽当分经络论》、《脾约丸论》、《鼓胀论》、《疝气论》、《秦桂丸论》、《恶寒非寒病恶热非热病论》、《经水或紫或黑论》、《石膏论》、《脉大必病论》、《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辩》、《太仆章句》、《新定章句》、《倒仓论》、《相火论》、《左大顺男右大顺女论》、《茹淡论》、《呃逆论》、《房中补益论》、《天气属金说》、《张子和攻击注论》。

朱震亨在全书之前写有一篇自序，述说写书的初衷和命名的依据。正文的具体内容又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养生方面的主张，如节制饮食和色欲等，主要篇目有《饮食箴》、《色欲箴》、《养老论》、《慈幼论》、《茹淡论》等，在这些篇目中，朱震亨谆谆告诫人们在养生保健方面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注意节制饮食和色欲，千万不可在美味和美色面前不加节制，最后贻害于身体；二是关于火热病发生原因、预防方法和治疗方面的内容，如阳有余阴不足、君火相火等，突出其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三是关于疑难杂症的讨论，如痘疮、痛风、咳嗽、疟疾、虚病、痰症、疝气等等，并提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四是关于妇科方面的疾病论述，如流产、难产、转胎、乳硬等，根据妇女的生理特点分



《格致余论》书影

资料来源：《四库全书》 胡森拍摄

析病症的形成和治疗原则；五是辩论、考证方面的内容，如天气时令对疾病的影响，治病的程序、方法，吃药与禁忌。还有对一些药物性能的考证、前人疗法的领悟、《内经》章句的理解等。主要条目有《人迎气口论》、《大病不守禁忌论》、《脾约丸论》、《秦桂丸论》、《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辩》、《张子和攻击注论》等。全书内容丰富、全面，条分缕析，说理清楚，语言通畅明白，易于阅读。是朱震亨医学思想的结晶，也是中医学著作中的优秀作品。

《格致余论》问世以后，受到医学界的普遍关注，书中一些观点的提出，给当时迷茫于《局方》的医学界指出了一条全新的途径，揭开了医学史上新的一页。400多年后的清朝乾隆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纪晓岚对《格致余论》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朱震亨“受业于罗知悌，得刘守真之传，其说谓‘阳易动，阴易亏’，独重滋阴降火，创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张介宾等攻之不遗余力。然震亨意主补益，故谆谆以饮食色欲为箴，所立补阴诸丸亦多奇效，孙一奎《医旨绪余》云：‘丹溪生当承平，见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复用刚剂，以至于毙。因此救时之说，后人不察，遂以寒凉杀人，此不善学丹溪者也。’其说可谓平允矣”。^①

《格致余论》中记录了朱震亨很多的医学实践，其中很多看法的形成都是来自于医学实践的总结，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敢言。作为朱震亨医学生涯中的第一部著作，其意义不可低估。书中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医学观点，更值得以后的人们反复钻研，深刻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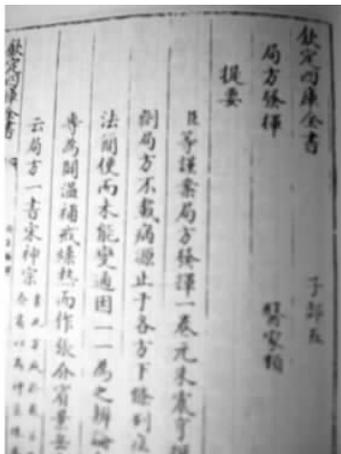
^①（清）纪晓岚：《格致余论提要》，见《四库全书·子部五·医家类·格致余论》。

《同方发挥》

《同方发挥》是朱震亨继《格致余论》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医学著作。全书不分卷,以问答形式对盛行于宋元时期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进行了质疑,旗帜鲜明、论点明确、论据充足、语言流畅、褒贬得当,刊行之后,在当时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是研究朱震亨医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局方》是裴宗元、陈师文奉命整顿北宋“官药局”的同时,收集各种医方和民间的有效验方整理编辑而成的,共 297 方,大多是丸、散之类的现成药物。朱

震亨认为,医生的职责是十分重要的,医生的工作也是十分细致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和大意。他说:“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曰‘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取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①他的意思是说:古人用“神圣工巧”四个字形容医生的工作,又说“医”就是“意”的意思,因为医道的传授虽然有一定的渊源,医术虽然有很深的造诣,但在治疗过程中的随机应变却是不可缺少的,这就如同是面对敌人的将军、航行中的操舵手一样,一定要



《同方发挥》书影

资料来源:《四库全书》 胡森拍摄

^① (元)朱震亨:《同方发挥》。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多变,才可以打败敌人或是使航船保持正确的航向,最后胜利达到终点。如果不能曲尽医疗过程中的奥妙,不是有愧于医者的称呼吗?现在要用前人已经应用过的方子,来治疗今天千变万化的疾病,和古人所说的“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因为如此,朱震亨对《局方》产生了怀疑,并毫不隐瞒地把自己的怀疑表达出来。

《局方发挥》共设31问,都是以“或曰”(有人说)的口吻把很多人心中的疑问表达出来,然后朱震亨再针对这些疑问进行解答,剖析精微,鞭辟入里,使人们对《局方》的偏差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并能接受自己对《局方》的纠正和批判。

如第一问:“或曰:仲景治伤寒,著三百一十三方,治杂病著《金匱要略》二十有三门,历代名方,汗牛充栋,流传至今,明效大验,显然耳目。今吾子致疑于《局方》,无乃失之谬妄乎?”意思是张仲景治疗伤寒病症,有313个方子,治疗杂病的《金匱要略》也有23个门类。历代有名的方子,有如汗牛充栋,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效果明显,这都是人们所耳闻目睹的事实。现在你却对《局方》如此怀疑,不是很荒谬的吗?

针对这个问题,朱震亨进行了详细的回答。他说医生治病时通过看病询问就可以知道病人的情况。但因为不同的病人“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时月有久近,形志有苦乐,资禀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标本有先后,年有老弱,治有五方,令有四时”,因为有了如此多的区别,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一定要反复斟酌“某药治某病,某经用某药,孰为正治、反治,孰为君臣佐使”。只有将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才可以“计较分毫,议方治疗”,开出最适合病人的方子。

说完了治疗的原则之外,朱震亨话锋一转,指出《局方》在这方面的欠缺。他说《局方》没有对病源的议论探讨,只是在各个

方子的下面列举病症情况和药物的数量及制作方法,让病人多服、久服。不知这“一方通治诸病”的方法,看起来简单,实际是“广络原野,冀获一兔”,则难免遭到后人的讥笑。汉代张仲景治疗伤寒的方子,被后人认为是“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后人“欲为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这就要在临床应用的时候,反复斟酌,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药,怎么用。宋代名医许叔微对张仲景的《伤寒论》研究颇深,可以称得上是宋代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他对张仲景是十分推崇的,但推崇并不等于泥古,许叔微曾经说过:我读了张仲景的书,懂得了书中的意思,但并没有完全用他的方子,而是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病症灵活运用。所以我们今天对《局方》更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照用了。

接着他以“风”病为例,剖析《局方》的失误之处。他说现在人们普遍将“风病”和各种“痿症”混同在一起,不加区分地进行治疗。这就是因为《局方》将治风病的药物和治疗痿症混同在一起。本来古人的医书中,风病和痿症是分开论述的,各有不同的篇目,“源流不同,治法亦异”,不能不加以辨别。风是百病滋生的根源,又因其变化多端,容易转化成其他病症,所以《黄帝内经素问》卷十二《风论》篇中反复陈述了风病的种类和变化,“曰善行数变、曰因于露风、曰先受邪、曰在腠理、曰客、曰入、曰伤、曰中”,凡是五脏和胃的疾病都是多汗而恶风,所以说风邪是外感之病,有“脏腑、内外、虚实、寒热”之不同,这里说得已经非常明确了,在“风”类疾病症状的描述中并没有“瘫痪、痿弱、卒中不省、僵仆、喎斜、挛缩、眩晕、语涩、不语”之类的文字,明确将风病和痿症分开,而《局方》却将两者混同一起。如其卷一《诸风》中所列至宝丹治疗“卒中、急风不语、中恶气绝、中诸物毒、暗风、中热疫毒、阴阳二毒、山岚瘴气毒、蛊毒、水毒、产后血晕、口鼻血出、恶血攻心、烦躁气喘、吐逆、难产、闷乱、死胎不下”。对于以

上病症可以“并用童子小便一合,生姜自然汁三五滴,入于小便内,温过,化下三圆(丸)至五圆(丸),神效”。又对“心肺积热、伏热呕吐、邪气攻心、大肠风秘、神魂恍惚、头目昏眩、眠睡不安、唇口干燥、伤寒狂语”等疾病“并皆疗之”^①。一种成药同时可以治疗那么多不同性质的疾病,显然是不可能的。还有灵宝丹(有三名:一名归命丹、一名返魂丹,入芒硝者名破棺丹)对于“中风、手足不仁、言语蹇涩,或痛连骨髓,或痹袭皮肤、瘙痒如虫行、顽痹如铁石,或多痰好睡,或健忘多嗔、血脉不行、肉色干瘦,或久在床枕、起便须人、语涩面浮、惟觉不健,或偶萦疾苦,卒暴而终”等等的病症,也是“并皆治之”^②,这种说法其实也是很不可靠的。

朱震亨所举《同方》中的例子,意在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他说至宝丹和灵宝丹所说的“治中风不语、治中风语涩”,不语和语涩是不能一例看待的,不语有各种原因,有“失音不语、舌强不语、神昏不语、口禁不语”,语涩有“舌纵语涩、舌麻语涩”等等的区别,所以治疗时也应该区别对待。

除至宝丹、灵宝丹之外的润体丸等30多个方子,都是“治诸风、治一切风、治一应风、治男子三十六种风”等等,主治的内容十分浩博,病症的寒热虚实,区别很大,用一个方子通治如此多的病症,真的符合《内经》的旨意吗?真的能治好这些疾病吗?

后面,他还对龙虎丹、排风汤、骨碎补丸、乳香宣经丸、七圣散、活血应痛丸等方剂中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辩驳,说“治外感以发散”,是张仲景的治疗原则;“治内伤以补养”,是李东垣的治疗原则。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诊病的时候,脉象的沉、伏、浮、盛,寒热、表里、虚实的差别,如同水火般的互不相容,根本不能

① (宋)陈师文等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一《至宝丹》。

② (宋)陈师文等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一《灵宝丹》。

用同一种药物治疗。

在这篇答疑的最后,他说,以上我只是举了几个主要的例子,如果要条分缕析的话,那就更多了,所以其他就不说了。^①

以上仅是 31 问答中关于“风病”的一些辨证,后面他还从气、脾胃、痢疾等方面指出《局方》最根本的弊端在于病理与方药脱节,教条死板,忽视了辩证法的治疗原则。从中不难看出朱震亨对《局方》批判的态度之坚决、语气之严肃、质问之尖锐、说理之有力,确实击中了《局方》的要害。

朱震亨的思想和理论犹如以石击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给沉寂的医坛增添了活力。之后,各种医学流派纷纷出现,争相阐明自己的医学主张,《局方》统一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所以《四库全书》的编撰者说“此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于宋元之间,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②,后人也把朱震亨《局方发挥》的出现作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朱震亨的《局方发挥》在中国医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本草衍义补遗》

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是他唯一的一部医药学著作,是在长期实践、掌握了大量医药学知识以后,对宋代寇宗奭所撰的《本草衍义》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本草衍义》是北宋医学家寇宗奭所撰。全书 20 卷,目录 1 卷,序例 3 卷。正文内容有玉石部上、中、下三品六卷,草部三品

^① 以上皆见朱震亨:《局方发挥》。

^② (清)纪晓岚:《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提要》,见《四库全书·子部五·医家类·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六卷,木部三品三卷,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各一卷,著录药品473种。所记药物都是自己亲眼所见,如卷六菊花水,卷十五白杨,卷十六鸬鹚,卷十七乌蛇各条。寇宗奭在书中曾有“耳目传闻者不说,今直取目见”之说,可见其所记是十分可信的。寇宗奭于北宋崇宁至政和年间(1102—1118)曾先后在杭州、澧州(今湖南澧县)、陕西、顺安军(今河北省高阳县)等地任职,撰写《本草衍义》的时候,任承直郎(宋代文散官,官阶为正六品)和澧州司户(主管地方户籍之类的官员),在为政的同时,他对医药学有浓厚的兴趣,他认为疾病要凭借医生的治疗,医生要有对症的处方,而处方的凭借则是药物了。鉴于当时的一些医药学著作中失误不少,所以他撰著《本草衍义》对北宋之前的医药学著作如《嘉祐补注本草》及《本草图经》中出现的差错和失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疏通、论证,对中国中医药学有一定的贡献。宋代陈振孙说其“援引辨证,颇可观采”^①。明代李时珍也说它“参考事实,核其精理,援引辨证,发明良多”^②,朱震亨、李东垣等人对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也都是非常推崇的。但正如任何事物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样,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仍然有一些失误,如李时珍就指出书中以“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也会给用药者造成一定的误区。《本草衍义》脱稿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当时寇宗奭正任职于湖南,他将书稿呈报给当时提举荆湖北路常平等事的刘亚夫,请他申报尚书省,再由尚书省转送太医院,得到了博士李康等人的肯定。认为寇宗奭所献《本草衍义》确实是用心研究,意义可采,故申报尚书省,上达天庭。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下旨,给寇宗奭转一官以示褒奖,并让其到收买药材所

①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三《医术类》。

② (明)李时珍:《本草綱目》卷一(上)《历代諸家本草》。

辨验药材。寇宗奭和《本草衍义》的际遇,可以说是历代本草家所绝无仅有的。而朱震亨正是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又发现了《本草衍义》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之处,于是撰述了这部《补遗》,使其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完善。

《本草衍义补遗》1卷,记载药物154种,新增补42种,共196种^①,不分门类,也没有一定的叙述格式,而是根据每种药的不同情况进行论述。完全是针对《本草衍义》的欠缺和失误而发,是对前人研究本草的一种发挥。《补遗》的内容包括条目和内容两个方面,书中增补《衍义》没有的条目47种,与《本草衍义》对药物解释有不同意见的15种,除9种和《衍义》内容全同或者不如《衍义》内容精审外,其余都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其增补的内容,大约可分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纠正《本草衍义》的说法,主要有以下条目:

石钟乳:石钟乳是一种强悍之剂,但是从唐宋以来,因受方士“服之可以致长生”之说,就成为膏粱之家经常服食的一种方剂,《本草》也言其有延年之功效。朱震亨对此说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石钟乳性燥热气悍,用之一时治病则可,长期服用则会伤人。因而提醒人们:不可轻易服用,服用过多不仅伤身,还会引发消渴和淋症。

硝:硝即硝石类药物,性亦属阳,有消化驱逐之功。但毒性也大,用来治病,病退则不能继续服用,以免酿成大祸。有人说这一类药物性温,可以多服、久服,这样可以“轻身固胎,驻颜益

^① 关于《本草衍义补遗》所记药物数量有几种说法: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整理的《丹溪医集》为补遗154种,新增42种,共196种。刘时觉《丹溪学研究》云记载药物161种,新增35种,共计196种。《丹溪心法类集》云“补遗一百四十九种,新增补四十五种。”实际记载154种,增补43种,共197种。今据《丹溪医集·本草衍义补遗》。

寿 大能补益”这种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朱震亨有的朋友就是不听朱震亨的劝告,长期服用硝石类药物而导致死亡的。所以朱震亨特别强调,千万不要长期服食硝石类药物。

铅丹:又叫做“黄丹”,以铅炼化而成。《衍义》说丹出于铅而无毒,性凉。朱震亨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他曾亲眼见到一位妇女因为多子,在一月内服用铅丹二两,结果四肢冰冷强直,食物不能入口。当时正是仲冬时节,赶快给她服用理中汤加附子,几帖以后方转危为安。

自然铜:属接骨类药,一般骨折之后,要对患者采取补气、补血、补胃等措施,而一般医生为了贪图速效,迎合病人的心意,多用自然铜治之。但铜不锻不能用,因为容易有火毒,如果其“火毒、金毒相扇,挟香热药毒,虽有接骨之功,燥散之祸甚于刀剑”,所以一定要引以为戒。

二术:指苍术和白术,但《本草衍义》记载无苍术、白术之分,一概而论,言其气味辛烈,发汗尤速。实际苍、白二术的药性是不同的,苍术为古方平胃散的主药。白术味微辛苦而不烈,除湿之功最胜。

荪:《衍义》以为荪就是菖蒲,而朱震亨认为荪和菖蒲根本不是一回事,荪形如韭叶,无脊。而菖蒲有脊,形如剑刃,比韭菜粗。

桂:桂是补虚之药。而《衍义》认为张仲景用桂是解表虚。朱震亨认为《衍义》没有完全领会张仲景的用意。他说张仲景用桂的目的是补虚,不是解表。因为卫有风寒,所以有自汗现象,以桂发体内的邪气,“卫和则表密”,汗自然就止了,并非是桂能收汗的缘故。所以《衍义》说桂解表是错误的。

另一种是对《本草衍义》进行补充的,这种情况在书中比较普遍,与《补遗》内容相吻合。如《本草衍义》中记载了很多药物,只是讲了药物的产地、形状、色味,而没有讲其性味功能,于是朱

震亨对之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以弥补其记载的不足。如“决明子”,《衍义》只云其“苗高四五尺,春亦为蔬,秋深结角,其子生角中,如羊肾。今湖北人家圃所种甚多,或在村野成段种”。绝口不提其药用功能,朱震亨在此基础上,言其“能解蛇毒,贴脑止鼻洪,做枕胜黑豆,治头痛,明目也”^①,使其记载全面而具体。“肉苁蓉”可以“峻补精血,骤用反致动火便滑。……以酒洗净去黑汁作羹,黑汁既去,气味皆尽”。但只有嫩的才可以做羹,老的味苦难以食用。同时药用要求稍微量大一些,“入药少则不效”^②。“菟丝子”与女萝不相干涉,更无相缠之事。作为药物,菟丝子可以“续绝伤,补不足,强阴坚骨,主茎中寒,精自出,溺有余沥,鬼(梦)交泄精”^③。“威灵仙”,《衍义》云“治肠风,根性快”,多服可以疏通人的五脏之气。朱震亨补充云其还是“治痛之要药”,不光是可以通五脏之气,还可以“通十二经脉,朝服暮效”^④。“芎”可以“大补肺金而行滞血”,根还可以安胎,汁液可以疗渴。^⑤“诃子”《衍义》云“气虚人亦宜缓缓煨熟,少服。此物虽涩肠而又泄气,盖其味苦涩”。而朱震亨在《补遗》中具论其“味苦、性而急喜降……气实者宜之,若其气虚者似难轻服”,其品质是“六路黑色肉厚者良”,其功效除《衍义》所云外,还有“其子未熟时,风落堕者,谓之‘随风子’,尤珍贵,小者益佳。治痰嗽、咽喉不利,含三五枚,殊胜。……治肺气因火极伤,遂郁遏胀满,盖其味酸苦,有收敛降火之功也”^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本草衍义

① (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决明子》。

② (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肉苁蓉》。

③ (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菟丝子》。

④ (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威灵仙》。

⑤ (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芎》。

⑥ (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诃子》。

补遗》比之原来的《本草衍义》除极少条目外,大多都有增补纠正之功,且内容非常丰富。

当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朱震亨对《本草衍义》补遗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如他将很多药都和五行属性联系在一起,就明显有些牵强。另外一些药物的补充也并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如朱震亨认为夏枯草和茺蔚是两种不同的药物,“夏枯草先枯而无子,茺蔚草后枯而结黑子”^①,而清代康熙年间庶吉士陈大章在其所撰《诗传名物集览》中说“夏枯草亦有细子四粒,丹溪云‘无子’误”^②。还有《衍义》以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均误。朱震亨对此亦没有纠正,表示默认,受到后世医家的责难。明代李时珍之子李建元奏请明神宗颁行《本草纲目》的疏中就明确指出寇宗奭“以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之误^③。虽然李建元并没有指出这和朱震亨有什么关系,但没有进行纠正就是朱震亨的失误了。到了清初,王夫之就直接指出朱震亨在《本草衍义补遗》中的失误了,他说:“自宋以后……天下无人识兰,而寇宗奭、朱震亨竟以兰花为兰草,误人服食”^④。这个失误直到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才得到了纠正。

《金匱钩玄》

《金匱钩玄》又名《平治荟萃》,是朱震亨的医学思想的结晶,但又并非成书于朱震亨之手。为其门人所辑录整理而成。而辑录整理《金匱钩玄》的到底是谁,在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说法。关

-
- ① (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夏枯草》。
 ② (清)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卷八《草》。
 ③ (明)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
 ④ (清)王夫之:《诗经稗疏》卷一《郑风》。

于此书,宋濂《石表辞》与戴良《丹溪翁传》对《金匱钩玄》均无著录。按说此二人对朱震亨都是非常熟悉的,对他的著作也是十分清楚的,为何两个人都没有著录《金匱钩玄》一书,这恐怕不能看作是无意间的疏忽,而应该看作是书不成于朱震亨之手的一个依据。《千顷堂书目》分别题此书于朱震亨与戴原礼名下,但明李濂《医史》及清代的《明史》、《四库全书》都认为此书最初出于朱震亨,但未成书,后经其门人戴原礼辑录整理而成,此说得到今人刘时觉的认可。他说朱震亨去世以后,作为朱震亨得意门生的戴原礼手中持有记载朱震亨医疗实践的《丹溪医按》一部,后此书被其同道好友王宾所窃取,王宾遂因有此书而医名满吴中。对于戴原礼辑录《丹溪医按》一事,刘时觉认为“戴原礼自至正三年(1343)二十岁时随朱丹溪习医,至至正十八年(1358)朱丹溪逝世,十余年间每天十余次往返,聆受朱丹溪教诲,因此手头积累有大量朱丹溪医按是很自然的事”。他又根据明代人俞弁《续医说》中的《戴氏行状》中所记戴原礼“尝编朱丹溪医论,已镌梓”的记载,认为“这部《丹溪医论》就是《金匱钩玄》”。刘时觉还认为之所以《戴氏行状》中没有提及《丹溪医按》,就是因为该书被王宾所窃而流于他人之手,未及镌梓,算不得戴原礼的正式著作。但戴原礼又不忍乃师的心血就这样湮没无闻,于是又据医按重辑整理成《金匱钩玄》,并付梓刊刻,所以他认为“无此医按就没有《金匱钩玄》之作”^①。根据刘时觉的以上论证,似可认定《金匱钩玄》为戴原礼所辑录整理无疑。

但辽宁省中医研究院的史常永却认为现在所见的《金匱钩玄》就是原来的《丹溪药要或问》一书,其辑录整理者为朱震亨的另一个弟子赵良仁。史常永的根据是赵良仁为《丹溪药要或问》

^① 刘时觉:《丹溪医按的流传和考证》,载《中华医史杂志》2005年第5期。

所作的序,其云:朱震亨去世后不久,赵良仁见到了一部名叫《语录》的书,是关于朱震亨治疗疾病的言论记载。又过了10多年,大约是洪武五年(1372)的时候又出现了题名为《丹溪药要》的书,赵良仁感到此书选择不精,语句不详,断定不是朱震亨手著,怕有累老师英名,所以以设问的形式对之重新整理,一是为老师申辩,二是借以阐发老师的医学思想,并为之题名为《丹溪药要或问》。而经赵良仁重新整理的这部《丹溪药要或问》竟和今天见到的《金匱钩玄》完全一样,所以史常永认为,《丹溪药要或问》就是《金匱钩玄》^①。

以上刘时觉和史常永对《金匱钩玄》一书订正者的论证,似乎都缺乏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但从今见《金匱钩玄》中“戴云”字样来看,似乎戴原礼作为整理校正者更为合适些。

《金匱钩玄》分3卷137条,其中第一、二卷100条,各种杂症。第三卷妇科16条、儿科21条。第一、二卷杂症中朱震亨言论61条,戴原礼16条,朱震亨与戴原礼合论23条。妇科朱震亨13条,朱震亨、戴原礼合论3条。儿科朱震亨15条,戴原礼5条,合论1条。从中既可见朱震亨对某些疾病的治疗主张,又可见戴原礼对老师治疗主张的补充和发挥。书中全用语体式,阐述对病症的诊法与治疗。如卷一《伤寒》条,朱震亨云:“伤寒,必须身犯寒气,口食寒物者,从补中益气汤中加发散药,属内伤者十居八九。其法邪所凑,其气必虚,只用补中益气汤中,从所见之证,出入加减。气虚热甚者,少用附子,以行参芪之剂。如果气虚者,方可用此法。已上伤寒治法,可用于南,不宜北。”在这里朱震亨强调对伤寒的治疗要分不同的症状、地域进行治疗,不

^① 史常永:《赵良仁〈丹溪药要或问〉的新发现及其他》,载《中国医药学报》1996年第5期。

可一律看待。而戴原礼在卷一《湿》条云：“湿有自外入者，有自内入者，必审其方土之致病源。东南地下，多阴雨地湿，凡受必从外入，多自下起，以重腿气者多，治当汗散，久者宜疏通渗泄。西北地高，人多食生冷湿面，或饮酒后，寒气怫郁，湿不能越，做腹胀痛，甚则水鼓胀满，或通身浮肿如泥，按之不起，此皆自内而出也。辨其元气多少，而通利其二便，责其根在内也。此方土内外，亦互相有之，但多少不同，须对症施治，不可执一。”其治疗思想和理论与朱震亨完全相同。又如在卷一《寒》条，朱震亨云：“主乎温散，有卒中天地之寒气，有口伤生冷之物。”戴原礼补充道：“此伤寒，谓身受肃杀之气，口食冰水瓜果冷物之类，病者必脉沉细，手足冷，息微身倦，虽身热亦不渴，倦言语。或遇热病，误用此法，轻者至重，重者至死。凡脉数者，或饮水者，或烦躁动摇者，皆是热病。寒、热二症若水火也，不可得而同治，误即杀人，学者慎之。”诸如此类的补充，在全书中还有很多。

书后附论文6篇，前3篇分别就人体中“火”、“气”、“血”对人体的重要性及其发病时的症状和治疗方法。如第一篇《火岂君相五志俱有论》，主要论述“火”对人体的危害。文章先讲“火”之危害，次讲其症状，再次讲治疗，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二篇《气属阳动作火论》，主要论述人体中“气”和“火”的关系，如何抑制体内之火，保证气的冲和流畅，是保证身体健康的根本。第三篇《血属阴难成易亏论》，“血者，神气也，恃之则存，失之则亡。是知血盛则形盛，血弱则形衰”。全篇主要讲养血的道理及方法。

后3篇分别是《滞下辨论》、《三消之疾燥热胜阴》、《泻泄从湿治有多法》，分别对“滞下”、“三消之热”、“泻泄”之类病症的病因、症状及预防治疗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如《滞下辨论》主要指出在治疗积滞和痢疾方面的误区：或见痢疾不分赤白，“妄用兜涩燥剂止之”，或见积滞，“而行巴硃丸药攻之”，或指湿热，“而与

淡渗之剂利之”。这些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正确的做法是分清寒热,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三消之疾燥热胜阴》主要论述对“渴”症及“三消”症的辨析和治疗,“渴”症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心肺气厥而渴者,有肾热而渴者,有言胃与大肠结热而渴者,有因脾痹而渴者,有因小肠痹热而渴者,有因伤饱肥甘而食渴者,有因醉饱入房而渴者,有因远行劳倦遇天热而渴者,有因伤害胃干而渴者,有因肾(疑为胃)热而渴者,有因痛风而渴者”等等,治疗时当区别病因,不可不加分辨,滥用治渴之药。同样,三消病的情况却与之相反,“若饮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饮食多而不甚渴,小便数而消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饮水不绝,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肾消”,三消虽然名称不同,但其病因却都是燥热所致,所以在治疗中都要“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这样疾病也就治好了。《泻泄从湿治有多法》主要对“泄泻”病症的原因进行探析,“或因于内伤,或感于外邪”,因而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施治。书中没有写明6篇论文的作者,但却体现了朱震亨一贯的医学思想。

《四库提要》的作者对《金匱钩玄》给予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其云:“《金匱钩玄》三卷,元朱震亨撰,明戴原礼校补。中称‘戴云’者,原礼说也。未附论六篇,不列于卷第中。一曰《火岂君相五志俱有论》,一曰《气属阳动作火论》,一曰《血属阴难成易亏论》,一曰《滞下辨论》,一曰《三焦之疾燥热胜阴论》,一曰《泄泻经湿治有多方论》,皆不题谁作。观其《滞下辨论》引震亨之言,则亦原礼所加也。震亨以补阴为宗,实开直补真水之先。其以郁治病,亦妙阐《内经》之旨,开诸家无穷之悟,虽所用黄柏、知母,不如后人之用六味圆(丸)直达本原;所制越鞠丸,亦不及后人之用逍遥散和平无弊。然莘路蓝缕,究以震亨为首。庸是书

词旨简明,不愧钩玄之目,原礼所补亦多精确。《明史·方技传》载此书于原礼传中,卷数与今本同。称其附以己意,人谓不愧其师,其为医家善本可知矣。”

综上所述,《金匱钩玄》虽非朱震亨亲手编撰,但以朱震亨平时语言思想为基础补充订正而成,集中反映了朱震亨的医学思想,确实如《提要》所言是当之无愧的“医家善本”。

《丹溪心法》

《丹溪心法》亦为丹溪弟子和私淑者收集丹溪医事活动及言论编辑而成。该书最初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明景泰年间(1450—1456)杨楚玉根据已有的反映朱震亨医学实践及其思想理论的书籍辑录整理而成的《丹溪心法类集》,最初刊刻于西安,被称之为“陕版”,后在流传中散佚。1983年6月,刘时觉先生于福建中医学院的刘绍华女士处得知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孤本,于2004年5月设法觅得,并逐字逐句抄录以归,后又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理校勘,现收入其编校的《丹溪逸书》之中,已于2005年12月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录于《丹溪逸书》中的《丹溪心法类集》正文前有正德三年(1508)监察御史、广西右布政使卢翊写于桂林官邸的序言,从序言中可知,卢翊于正德二年(1507)秋天任职广西,因其地处偏僻,气候不和,瘴疠之气严重,外地来此任职的官员因不习惯于此间的气候,死亡率很高,普通百姓人家不懂预防和治疗方法,也经常因此而死于非命。于是卢翊就搜求《丹溪心法》的西安刻本,重新编校刊刻,大量散发,使当地百姓“家阅户诵,知所摄调,或赖以全活”。因此,卢翊极力称赞朱震亨说:“丹溪朱氏子,业儒而医,深入肯綮,其所论述通天人,贯阳阴,斡五行之运,合四方之宜;钩六气七情之隐,正诸家百方之缪;取舍有据,增减得法。其于

金石草木虫鱼纤洪状万皆有以根其性而适其用,盖与轩轾《素问》相出入而发其所未发者多,断案所载当时起死者,班班其有,所试也不诬。持是而讲,求之而剂,药之元气克固,客邪莫干,挽其偏而反之全,融其疴而纳之和,引其关而归之寿。虽不求免于瘴,瘴固无能为也。”^①从卢翊的《序》中可知,正德二年(1507)之前,西安版本的《丹溪心法类集》还是很流行的,而且在治疗两广地区的瘴气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新整理出版的《丹溪心法类集》正文分春、夏、秋、冬4集,春集为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149种和新增补的45种药物。夏、秋、冬3集记载各种病症的治疗106种,后有丹溪秘方18种。

成化初年(1465),四川王季璠又在杨楚玉《丹溪心法类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附方,重新刊刻,称为“蜀版”。因目前未见到王季璠刊刻的本子,所以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成化十七年(1481)休宁(今安徽省休宁县)人程充因对杨、王二家的版本都不甚满意,认为杨楚玉集录的本子篇目和原书多有重复,有些又有遗漏,再附上其他人的议论,有鱼龙混杂、玉石不分之嫌。王季璠在杨楚玉的基础上再增添内容,更加失去了原书的本旨。于是程充就以朱震亨的《平治荟萃》、徐用诚、刘纯的《玉机微义》、罗天益《卫生宝鉴》、杜思敬《济生拔萃》等书以及李东垣、刘河间等人的医书为校本,对原书进行了认真的校勘整理,“究尾会首,因证求方”。后来他又在义乌人王允达的帮助下,得到了朱震亨的曾孙朱贤的家藏本,与以上各书合而参考,“其或文理乖讹、意不相贯者,详求原论以证其误;篇目错综、前后重叠者,芟去繁冗以存其要;此有遗而彼有载者,采之以广其

^① (明)卢翊:《重刊丹溪心法序》,载刘时觉、薛轶燕编校之《丹溪逸书·丹溪心法类集》之前。

法,论既详而方未备者,增之以便检阅”。程充在校勘整理《丹溪心法》的过程中,态度是十分严谨的,真是“一言去取,不敢妄有损益”。其目的就是要让朱震亨的医学实践及思想理论和其他人的区别开来,“犹泾渭合流,清浊自别,乌鹭同栖,皂白攸分。学者免惑于他岐,疾疢得归于正治”^①。

经程充校订整理过的《丹溪心法》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受到了有志于医者的广泛欢迎,曾先后于弘治(1488—1505)、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年间多次刊刻印刷,以满足学者的需求。正如他的族人程敏政所说的那样,程充对《丹溪心法》校订和整理,是一件“正误芟繁、拾遗举要,尤有益于学者”的事情。^②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了启动“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又将《丹溪心法》作为研修班成员必读的20种重要医学典籍之一,由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王英、竹剑平、江凌圳等人校勘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以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学习研究及在临床应用上引为借鉴。

《丹溪心法》在正文之前有《十二经见证》,分别对膀胱、胃、胆、小肠、大肠、脾、肾、肝、肺、心等人体10部位的经络及手厥阴别脉、手足阴阳合生等疾病的病症表象进行了状述,使读者对人体疾病的发生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接着附有5篇论文,阐述了朱震亨的部分医学思想。如《不治已病治未病》是要人们平时注意养生保健,把防病放在首位,不要等到生病或是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再去求医治病,这样往往会贻误病情,造成严重后果。《亢则害承乃制》运用阴阳和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论述为

^① 皆见程充校订《丹溪先生心法序》,引自王英、竹剑平、江凌圳等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版之《丹溪心法》。

^②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五《程用光墓志铭》。

医之道，“亢则害”就是说阴阳寒热是人们生存不可缺少的内外环境，但无论阴阳寒热中的任何一种，超过了它所应有的“度”达到极端，都会形成对人体有害的疾病。“承则制”是说只要根据病发的原因对症治疗，疾病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痊愈。《审察病机无失气宜》主要强调“气”对人体的重要性，所以在观察病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气”之所属，也就是“病气”的由来。清楚了患病的原因，然后再反复斟酌，对症下药，就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否则，对“病气”的来源不清楚，怎么能取得好的疗效呢？《能合色脉可以万全》是对《素问》“能合色脉，可以万全”之说的进一步阐述。中医诊病有望、闻、问、切之说，即观其色、听其声、问其情、切其脉，其中“色”和“脉”有密切的对应关系，色主要有青、黄、赤、白、黑 5 种，脉主要有急、大、缓、涩、沉 5 种，“五色”和“五脉”又都和人的五脏相对应，医生在诊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色”和“脉”的顺应关系，顺则说明诊断准确，否则就是诊断还有偏差，一定要小心谨慎而为之。所以说色和脉的顺与不顺是诊治的重要环节，如果在诊病的时候既能仔细观察病人的颜色，又能准确诊断病人的脉搏，内外相互参照进行治疗，就能收到万举万全之功。最后一篇《治病必求于本》意思更加明确，就是无论治什么病，一定要穷尽患病之根源，才能施其治疗之法，也才能收到好的医疗效果。文中形象地把疾病比喻成树木和河流，说是尽管树木在成长的过程中发出了无数的枝条，但树根只有一个，树根死了，无论多么茂盛的枝条也无法成活。河流在奔流的过程中也会汇合其他的河流，漫延出许多的支流，但源头只有一个，如果源头枯竭，无论多大的支流也会随之干涸。疾病也是这样，无论病情发展得多么严重，但致病的根源只有一个，弄清楚了致病的根源，对症下药，病情很快就会得到控制的。以上 5 篇论文的观点，都反映了朱震亨的医学观点，在几百年后的今天，

也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除上述外,《丹溪心法》正文分为5卷,共100条。有60多个条目与《金匱钩玄》相重合,缺《金匱钩玄》中的《癩》、《脾泄》、《干霍乱》、《头风》、《血块》、《吐虫》、《症瘕》、《茶癖》、《喉咽生疮并痛》、《口疮》、《酒渣鼻》、《天疱疮》及《妇人科》和《小儿科》中的绝大多数条目。比《金匱钩玄》多《燥结》、《补损》、《积聚痞块》、《癫狂》、《鼻病》、《眼目》、《口齿》、《破滞气》、《破伤风》、《诸疮痛》、《痈疽》条下的《乳痈》、《附骨痛》、《骑马痛》等条,《疔疔》、《金汤疔癖诸疮》条下的《金疮》、《金疮狗咬》、《火烧》、《汤浇》、《臙疮》、《杖疮疼》、《癣疮》、《下疳疮》等条。《妇人》条《金匱钩玄》有16条,而《丹溪心法》只有《崩漏》、《带下》、《产前》、《产后》、《子嗣》5条。《小儿科》条《金匱钩玄》有21条,《丹溪心法》只有《痘疮》1条。又比《金匱钩玄》多出《论倒仓法》、《论吐法》、《救急诸方》、《拾遗杂论》等条目,最后附有秘方100个。

成化二十年(1484),程充重新辑录整理的《丹溪心法》刚刚正式刊行3年,东阳人卢和就认为此书仍然是“遗漏尚多”,于是在其叔父卢安泽搜求到的丹溪遗稿的基础上,又对《丹溪心法》一书进行了整理,“删正裁取,更加润色,以归于一”,对其中的附会之言、谬误议论及窜入的杂方,毫不留情地予以删削,又以朱震亨的其他著作及其门人所记录的方论,“重予修订,整理编纂而成”^①,名为《丹溪先生纂要》。该书有明成化甲辰(成化二十年)本,一般不易见到。为了方便读者,《浙江中医杂志》于2002年第1—6期及11、12期等刊登了《丹溪纂要》的全文,给读者提供了阅读上的方便。

到了嘉靖十五年(1536),程充的同乡休宁人方广因程充所

^① (明)卢和:《丹溪纂要凡例》,转引自刘时觉《丹溪学研究》第三章《著作》。

辑录整理的《丹溪心法》“赘列附录,与震亨本法或相矛盾”,于是对其重新进行了整理,“削其附录,独存一家之言,别以诸家方论与震亨相发明者,分缀各门之末”^①。经方广辑录整理后的《丹溪心法》被重新命名为《丹溪心法附余》,共24卷,内容大大超过了程充原来的数量,但这时全书的内容中属于朱震亨原创的已经不是很多了。

综上可知,《丹溪心法》最初的依据应是杨楚玉的《丹溪心法类集》,后经王季璠的增加和程充的修订整理达到相对完善的地步。程充之后,卢和与方广又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形成《丹溪心法》的系列刊本。《丹溪心法》在流传刊刻的过程中书名数变,内容越来越多,但都是根据编纂整理者本人对朱震亨思想



《丹溪心法》照片

资料来源:(王英等整理)《丹溪心法》 李强拍摄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五《子部十五·医家类存目·丹溪心法附余(方广)》。

的理解发挥而来,算不上是朱震亨的原著,只能看做是朱震亨医学思想发展的结果。

其他医学著作

除上述外,朱震亨医学著作还有已佚复得的《丹溪医按》和《丹溪治痘要法》,

《丹溪医按》自王宾传之盛寅以后就不再见到记载,故一直以为已经散佚。2004年3月,刘时觉在苏州医学院图书馆搜索到馆藏多年的《丹溪医按》,全部抄录以归,编校整理,收录于他所编校的《丹溪逸书》中。《医按》共记载各种病症38例,完全是朱震亨医疗实践的记录和总结,有些案例的记载非常详细,有如今日的临床日记,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资料。

《丹溪治痘要法》和朱震亨的另一部非医学著作《风水问答》共同收录于《奚囊广要》之中,也是刘时觉发现并整理编校,一并收录于新出版的《丹溪逸书》中。《丹溪治痘要法》系统叙述了痘疮从发生到痊愈整个过程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是朱震亨治疗痘疮最全面的记录和总结。

朱震亨医学著作中至今散佚未集之书见于宋濂记载的还有《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见于《千顷堂书目》著录的还有《活幼便览》、《丹溪治法语录》等。

《伤寒论辨》仅见记载于宋濂《石表辞》和戴良《丹溪翁传》中,两者的名字还各不相同,宋濂谓《伤寒论辨》,而戴良则云《伤寒辨疑》,不知孰是。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也是根据宋濂的《石表辞》而著录,其他没有任何说明。此书的流传情况与散佚时间,均没有任何资料。从书名推测,当是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疑点辨析,具体内容已经是无可查寻了。

《外科精要发挥》亦见于宋濂《石表辞》、戴良《丹溪翁传》和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同样,《书目》著录的依据也是宋濂的《石表辞》。朱震亨后学徐用诚、刘纯在其所著《玉机微义》中,曾先后两次提到朱震亨的《外科精要发挥》,一次是徐用诚在《论疮疡攻补法》篇中,其云:“按此辨疮疡,因热因寒及气血郁而成,当攻补之法不同,宜与前后诸篇兼看,殆无余蕴矣。但世俗昧此理,而云‘是疮不是疮,且服五香连翘汤’。然或中或否,致误者多。盖不审形气虚实、疮毒浅深、发表攻里、所因不同故也。今以丹溪先生《外科精要发挥》诸法之义附于后,方例之下,庶学者幸有所鉴焉。”第二次是刘纯在《疮疡治法》篇中,其云:“纯早年居淮南,于陈复初契家斋堂得东原郭文才甫家传《疮科心要》二卷,持行四方,按法每择用之,多获奇效。故不敢湮没其道,因取东垣先生诸试效法,杂以古今名方于下,每附丹溪先生《外科精要发挥》之旨以为通变之义,亦学者之一助云。”^①这至少说明在明代中前期《外科精要发挥》还保存完好,可资引用,散佚可能是明代以后的事。

《活幼便览》是关于幼儿疾病治疗的医书,今虽散佚,但其内容在朱震亨其他医学著作和现存其他医学著作中仍有反映,如《格致余论》中的《慈幼论》、《痘疮陈氏方论》、《受胎论》,《金匱钩玄》中的《小儿科》类;《名医类案》和《续名医类案》中许多记载朱震亨关于小儿治疗的病例等。2001年,广西中医学院的黄海波在做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数据库的编校工作时,发现该书中有很多地方“整章整节地引用朱丹溪的医著”,除了《格致余论》、《丹溪心法》、《同方发挥》、《平治荟萃》外,“还有诸本均不见载而已佚的‘朱震亨《幼科全书》’,这真是个意外的发现”^②。黄

① 徐用诚和刘纯之语皆见《玉机微义》卷一五《疮疡门》。

② 黄海波:《朱丹溪 幼科全书 佚文之总汇》,载《广西中医药》2001年第3期。

海波在惊喜之余,对书中的佚文进行了辑录,共辑录《幼科全书》佚文 135 条,其中有《小儿诊视门》13 条、《小儿初生诸疾门》7 条、《小儿诸热门》2 条、《小儿嗽喘门》4 条、《小儿惊痫门》2 条、《小儿吐泻门》7 条、《小儿痢门》2 条、《小儿疳门》2 条、《痘疹门》96 条等。在所有的 135 条中,《痘疹门》即占 96 条,可见朱震亨在治疗小儿痘疮方面的造诣之深。如果说,朱震亨的《活幼便览》这部关于幼儿疾病治疗方面的医著已经散佚的话,黄海波的发现和辑录则可作为其最好的补充。

此外,还有许多托以丹溪之名的医学著作,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上世纪 90 年代,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对朱震亨的部分医学著作进行了辑集、点校和整理,于 1993 年 5 月结集出版,定其名为《丹溪医集》。其中收集



《丹溪医集》照片

资料来源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 李强拍摄

了朱震亨亲自撰写的《格致余论》、《同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等3种,朱震亨门人及私淑者编纂整理的《金匱钩玄》、《丹溪心法》、《丹溪手镜》、《脉因证治》、《丹溪治法心要》等5种。这些书出版之后,在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曾先后获得“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优秀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受到中医药学界的广泛欢迎,至今已经是第五次印刷,仍是供不应求。

2004年,刘时觉、薛轶燕又整理编校了新发现的朱震亨的医学著作《丹溪医按》、《丹溪心法类集》、《小儿治痘要法》等3种,与《风水问答》辑为1部,命名为《丹溪逸书》,已于2005年12月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欢迎。这些医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对于保留朱震亨的医学著作将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祖国医学宝库的繁荣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丹溪逸书》照片

资料来源:(刘时觉、薛轶燕编校)《丹溪逸书》 李强拍摄

第八章

医学思想 深入人心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朱震亨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医学思想和风格。其医学思想不仅在古代被奉为圭臬,即使在今天仍然深入人心,在中医药学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精华。

阳有余而阴不足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是朱震亨医学思想中的最主要的特色,其观点和论述集中体现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是朱震亨援儒入医的具体体现。宋代理学奠基者之一程颢就有“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亏,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亏”之说^①,《内经·素问》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太阴阳明与疾病的关系时说:“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②“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所以治病必须先求根本,善于看病的人,都

^① (宋)杨时编辑《二程粹言》卷下《天地篇》。

^② 《黄帝内经素问》卷八《太阴阳明论》。

是“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①。朱震亨本理学出身,对理学的精奥领会深刻。在学医时又是以《素问》为根本,对理学的精髓和《素问》中的一些说法心领神会。所以他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就是建立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

朱震亨所指的阴阳,首先是人体最基本的结构——气血。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篇中,开篇即开宗明义:“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为了说明问题,他又以天地日月作为对比,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天运行于地之外,地居于天之中,所以天比地大。又以日月为比,说日属阳,运行于月之外,月有圆缺,禀日之光以为明。人身体中的阴阳之气,也和天地日月一样,阳多阴少,阳气常实,而阴气有实有虚。所以形成“阳常有余而阴有不足”的现象。

其次朱震亨以《黄帝内经》中关于男女生育繁衍的基本生理特征来说明问题。他说一般情况下男子16岁而精通,女子14岁而经行。但这时候还不能立即结婚生育,必须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养育成长,使阴气养成之后才可以与阳气交配,然后才能成人之父母。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一般的婚嫁年龄是“必尽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成”。阴气之养成本来就难,但缺失却很容易。“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还说“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这样男子从16岁通精到64岁精绝,共有48年精行时间,而女子从14岁经行到49岁经绝,只有35年行经时间,男女阴阳相抵,相差十三年。说明人体生理本身就存在着“阴血易亏”和“阳有余阴不足”的现象。

^① 《黄帝内经素问》卷二《阴阳应象大论》。

一方面是人体生理上的“阳有余阴不足”，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人之情欲无涯”，这样就使得“此难成易亏之阴气”实在难以满足无涯之情欲的需要。他还说在人的身体中，“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过度的性生活必然会使人体中的“相火”妄动，而“相火”妄动又会使难成易亏之阴气更易亏损，严重者还会危及生命。一年四季中四、五、六三个月分别属巳、属午、属未，均为火旺之时，所以古人提倡夏天独宿素食，以养其阴血之气。而冬天如果不注意节欲以藏精，也会在春天引发温病。因为“十一月属子，正火气潜伏闭藏，以养其本然之真，而为来春发生升动之本。若于此时恣嗜欲以戕贼，至春升之际下无根本，阳气轻浮，必有温热之病”。尽管男欢女爱是人之本性，面对“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的情况^①，一般人都难以控制，但朱震亨还是谆谆告诫人们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一定要节制欲望，以免贪图一时之欢，给身体带来危害。

为了有效防止“阳有余而阴不足”对人体的危害，朱震亨首创了“滋阴降火”的治疗法则，开后世医家治疗阴虚发热类疾病的先河。并且创制了大补阴丸，作为滋阴降火的重要方剂，后此药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朱震亨认为，阴虚病症是比较难治的，通常可用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是食疗，“若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②。小麦、粟米、粳米、蔬菜之类的常用食物，山药、白术、甘

①（元）朱震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

②（元）朱震亨：《格致余论·茹淡论》。

草、地黄、泽泻、五味子、天门冬之类的常用药物,虽味有厚薄之分,但均有补阴精养阴气之功。粮食蔬菜按常法食用,以上药物可作为药膳食用。二是已经生病之后的药物治疗,用四物汤加上炒黄柏,就可以补阴降火。而用龟板补阴,又是阴中之至阴,应当慎用。四物加白马胫骨,降阴中火,可以代替黄连和黄芩。黄连、黄芩、栀子、大黄、黄柏都是降火药物,但如果不是阴中之火就不能用。用生甘草可以缓火邪,木通可以下行泻小肠火。人中白泻肝火,但须风露中二三年的,否则效果不好。人中黄大凉,治疫病须多年者佳。中气不足者,味用甘寒。山栀子仁的降火功能也很好,主要是通过小便泻火,人丝毫不感觉痛苦和不适。

以上滋阴降火的方法也不能一概照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丹溪心法》卷三《补损》条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朱震亨滋阴降火的治疗思想。该卷列举方剂 52 个,其中多为补阴降火之方。如大补丸“去肾经火,燥下焦湿”。补肾丸“治痿厥之重者”。补天丸“治气血俱虚甚者,……多与补肾丸并行”。八味丸“治肾气虚乏,下元冷惫,脐腹疼痛,夜多漩溺,脚膝缓弱,肢体倦怠,面皮萎黄或黧黑,及虚劳不足,渴欲饮水,肿重疼痛,少腹急痛,小便不利”。无比山药丸“治诸虚百损,五劳七伤,肌体消瘦,肤燥脉弱”。补益肝肾丸“治目中焰火,视物昏花,耳聩耳鸣,困倦乏力,寝汗憎风,行步不正,两足欹侧,窝而多惊,脚膝无力,腰下消瘦”。八味定志丸“补益心神,安定魂魄,治痰,去胸中邪热,理肺肾”。十四味建中汤“治荣卫失调,血气不足,积劳虚损,形体羸瘦,短气嗜卧,欲成劳瘵”。人参养荣丸“治积劳虚损,四肢倦怠,

肌肉消瘦 ,面少颜色 ,汲汲短气 ,饮食无味”。^①

此外还有补虚丸、补阴丸、五补丸、补心丸、济阴丸、金匱肾气丸、滋血百补丸、滋肾百补丸、八物肾气丸等等 ,都是滋阴降火方面的重要药物。

程充在辑录编撰《丹溪心法》的时候 ,特别作了说明 ,他说在朱震亨的书中并没有专门的“补损”条 ,而是散见在朱震亨医疗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条目之下 ,为杨楚玉所辑录在一起编为一类。但是朱震亨所谓的“补”都是滋阴益血之药 ,与其他方剂中燥烈壮阳之补药有天壤之别 ,千万不可混为一谈。

和滋阴法相辅相成的是降火法 ,朱震亨认为人体内的“火”可分为“虚”、“实”两种 ,临床上可分别采取“泻实火”和“补虚火”之法。

“泻实火”主要是降肝火 ,调心火。降肝火可用黄连、青黛、龙胆草等 ,调心火主要可用山栀、木通、滑石、灯心草等药物。泻实火 ,除善于导引使之泻出外 ,还要疏通脏腑经络 ,采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朱震亨对泻实火也采取因人、因病而异的做法 ,“火急甚重者 ,必缓之 ,生甘草兼泻兼缓 ,人参、白术亦可”。“人壮气实 ,火盛颠狂者 ,可用正治 ,或硝水、冰水饮之。”“人虚火盛狂者 ,可用生姜汤与之 ,若投以冰水正治 ,立死。”“凡火盛者 ,不可骤用凉药 ,必用温散。”^②

“补虚火”的治法也有多种 ,上述《丹溪心法·补损》条中所列方剂 ,大多为补虚之用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朱震亨补虚火的医疗思想。

对于朱震亨的“阳有余阴不足”之说 ,明代的张介宾则提出

① (明)程充校订 :《丹溪心法》卷三《补损》条。

② 皆见《金匱钩玄》卷一《火》。

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阳气是人体内的元气,对人体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阳强则寿,阳衰则夭”,而人体内的阳气又是难得易失,“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亦惟此阳气”。所以有很多病是因为“阳不足”而导致的,“人生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夫形,阴也;神气,阳也。神气去而形犹存,此正阳常不足之结局也”^①。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张介宾对刘完素、朱震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曩自刘河间出,以暑火立论,端用寒凉伐此阳气,其害已甚。赖东垣先生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然尚未能尽斥一偏之谬。而丹溪复出,又立阴虚火动之论,制补阴大补等丸,俱以黄柏、知母为君,寒凉之弊又复盛行。”^②

仔细分析张介宾对朱震亨的批评,便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即两人对“阳有余阴不足”论的本质认识是不同的,朱震亨是“从理论上阐述了情欲伤阴的机理,并与理学的个人修养和封建道德说教相结合,形成其另一个鲜明特色。这比丹溪前人只作劝诫、立典范,教人如何做而不言所以然来,更加深入,有说服力”。而张介宾“只是一再反复强调真阳之气的重要意义,……却从未分析此论的‘阴’、‘阳’二字的切实含义”。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因而其批评也就失去意义了。^③

其他如明代王纶、孙一奎对朱震亨“阳有余阴不足”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均有从病机论方面认识的因素,和朱震亨的本意有些不符。相比之下,倒是朱震亨的好友戴良对朱震亨的主张理解得比较透彻,他在《丹溪翁传》中说朱震亨的“阳有余阴不足”

① 皆见(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卷二《阳不足再辨二十四》。

② (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卷一《阴阳篇二》。

③ 刘时觉:《丹溪学研究》第四章《理论》。

之说是“远取诸天地日月,近取诸男女之身,曰有余,曰不足。……今欲顺阴阳之理,而为摄养之法”把朱震亨“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的医学观点和日常的养生保健行为结合起来,应该说对朱震亨的意思是心领神会了。

相火论

“相火论”是朱震亨医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亦在《格致余论》中有专章论述。

在《相火论》的开篇中,朱震亨直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也就是说,在五行之中,金、木、水、土四种都只有一个属性,唯独火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君火,一个是相火。如果将天地自然中的五行引申到人的身体之内,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么在人的身体中,“君火”、“相火”是如何区别呢?

《相火论》又云:“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从“名”和“位”的角度来分析君火和相火的特征,和《素问》“君火以明(名),相火以位”的旨意相同。《素问》对此的解释是“君火在相火之右,但立名于君位,不立岁气。故天之六气不偶其气,以行君火之政。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火令尔。以名奉天,故曰君火。以名守位禀命,故云相火以位”^①。这就是说无论是天体中还是人体内的“火”都是由于名位、形气、五行归属

^① 《黄帝内经素问》卷一九《天元纪大论》。

的不同等因素被分为君、相二火的。君火为心,主静,但为物所感则易动。而相火则无一定之形,分属于天体和人体的各个部位。于天体而言,相火“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于人体而言,则“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这种守位禀命分布于自然和人体各个部位的相火,无论是对于天体还是人体,都是非常重要的,“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地孕育万物,昼夜运行不息,无相火不行。人体生生不息,成长发育,也非相火不可。抛开天体不说,仅就人体而言,相火是人体生命的动力,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相火可以保证人的机体不断发展健壮,但也有一定的度,过了这个“度”的限制,则会引发疾病。因为相火是人的生命和动力,而相火活动的物质基础则是人体内的阴精。所以相火之动,一定要动中有节,这样才能有所补益,以为人体生命运动之动力。如果相火无节妄动而失去规律,或是动而不静,就会成为妄动之火,对身体起到伤害作用,疾病也会因此而生发。所以相火又有它相反的一面,相火妄动将成人体元气之贼。

关于“相火为元气之贼”之说,朱震亨之前的李东垣已有过论述,他说:“……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①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对李东垣的说法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君火之气,

① (金)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

《经》以暑与湿言之；相火之气，《经》以火言之。盖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气之贼。”^①朱震亨认为人的五脏均有相火，他说岐伯在《内经》中列举了19条病机，其中关于相火的就有5条，充分说明了相火对于脏腑疾病的作用。他又引用《原病式》的话说“诸风掉眩属于肝火之动也，诸气膈郁病痿属于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属于脾火之胜也，诸痛痒疮疡属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在这里，朱震亨一方面认为相火是生命运动的动力，无之不行。另一方面又引李东垣之说，认为相火是元气之贼。也就是说相火在“生命之动力”和“元气之贼”之间应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不越过这个界限相火正常地“运动”就是生命的动力。如果超越了 this 界限而“妄动”，就会由动力变成“元气之贼”。

朱震亨“相火论”的形成根源，一是来自儒家的“中庸”观，二是受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等各家思想理论的启发，在前人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

为了抑制相火妄动，朱震亨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预防和治疗方法，一种是从思想行为上奉行理学清心寡欲的思想，以“人心听命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要求人们修身养性，尽力克服各种欲望，使心志不妄动，如果作为君火的心志平和而不妄动的话，那么相火就只能禀命守位而已，当然也就不会妄动了。另一种是相火已经妄动，引发疾病，就要采取药物治疗。在治疗方法上，朱震亨比较推崇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的方法，主张降心火，补肾水，使补水泻火成为抑制相火妄动的主要治疗法则。

然而，明代张景岳对“相火为元气之贼”，却和朱震亨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朱震亨所说的妄动之火不应是相火，而应是

^①（元）朱震亨：《格致余论·相火论》。

邪火,因为情欲过度是邪念,邪念之火就是邪气,而君火和相火都是正气。正气于人身而言就应是元气,所以相火应是人体元气的组成部分,而不应当是元气之贼。如将相火指为元气之贼,就失去了圣人君火、相火之说的原意。

张景岳对相火论的补充,说清楚了朱震亨没有彻底界定清楚的一个问题,应该说是朱震亨相火学说的最好补充,使相火说的理论更趋于完善。

重视日常的养生保健

重视日常的养生保健,是朱震亨的医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是《黄帝内经素问》有关论述。文中借岐伯的话,道出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和现时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的不同原因,上古人身体健康的原因是他们的行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而现时人则不同,他们“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所以身体就会过早地衰弱。正因为如此,所以圣人教化人们一定要重视平时的养生,“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①。

接着,文中借岐伯之言又从男女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的

^① 《黄帝内经素问》卷一《上古天真论》。

生理特征及一年四季节令的不同来阐述善于养生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总结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经验和理念。

朱震亨学习医学,始终以《内经》为宗旨,对其中的养生之法尤为关注。所以他在行医治病的同时,始终把养生保健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坚持不懈地贯彻“防病重于治病”的医疗原则。对此,他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断:

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尝谓备土以防水也,苟不以其闭塞其涓涓之流,则滔天之势不能竭;备水以防火也,若不以其扑灭其荧荧之光,则燎原之焰不能止。其水火既盛,尚不能止遏,况病之已成,岂能治欤?故宜夜卧早起于发陈之春,早起夜卧于蕃秀之夏,以之形缓无怒而遂其志,以之食凉食寒而养其阳,圣人春夏治未病者如此。与鸡俱行于容平之秋,必待日光于闭藏之冬,以之敛神匿志而私其意,以之食温食热而养其阴,圣人秋冬治未病者如此。或曰:“见肝之病,先实其脾脏之虚,则木邪不能传;见右颊之赤,先泻其肺经之热,则金邪不能盛,此乃治未病之法。今以顺四时调养神志,而为治未病者,是何意也?”盖保身长全者,所以为圣人之道,治病十全者,所以为上工术。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说,著于《四时调神大论》,厥有旨哉。昔黄帝与天师难疑答问之书,未曾不以摄养为先,始论乎天真,次论乎调神,既以法于阴阳,而继之以调于四气,既曰食欲有节,而又继之以起居有常,谆谆然以养身为急务者,意欲治

未然之病,无使至于有病难图也。厥后秦缓达乎此,见晋侯病在膏肓,语之曰不可为也;扁鹊明乎此,视齐侯至骨髓,断之曰不可救也。噫!惜齐、晋之侯不知治未病之理。^①

在这段话里,朱震亨明确提出,与其在有病之后进行救治,不如在没病之时好好保养。平时不注意保养,病了以后又以药物治疗,就往往成为徒劳之举。养生以防病就和以土防水、以水防火的道理一样:涓涓之流不加堵塞,必发展成为滔天之势;荧荧之火不去扑灭,必发展成燎原之势。萌芽的时候不去防治,等到酿成大祸后悔晚矣。水火如此,人的身体更是这样。所以一定要重视平时的养生保健,千万不要等到酿成疾病再求医治疗。

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又提出了具体的养生保健内容:

其一是善养脾胃,坚持饮食茹淡。朱震亨认为,养生首先要从饮食男女做起,朱震亨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欲,于身尤切”^②。他痛心于世上不少人沉溺于饮食男女之中不能自拔,最后导致身体衰弱,疾病大行,所以专门作了饮食、色欲两篇箴文以告诫世人。在《饮食箴》中,他说:“人身之贵,父母遗体,为口伤身,滔滔皆是。人有此身,饥渴荐兴,乃作饮食,以遂其生。眷彼昧者,因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蜂起。病之生也,其机甚微,馋涎所牵,忽而不思。病之成也,饮食俱废,忧貽父母,医祷百计。”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山野贫贱之人,平时“淡薄是谥,动作不衰”,却能身体强健,神气清爽。所以告诫人们不要贪一时饮食之美,纵口无忌,使身体有亏,悔之晚矣。

① (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

②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饮食色欲箴序》。

朱震亨茹淡以保养脾胃的思想,和理学对人们的要求是一致的,理学家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相互矛盾的,“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这种矛盾表现在人生的方方面面,在饮食方面也不能例外。当朱熹的学生问到在饮食问题上何为天理何为人欲时,朱熹的回答十分简洁:“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①这里“饮食者,天理也”是本于《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意^②。其中所说的“味”指一般自然生成的粮食和蔬菜,具有自然冲和之味,与脾胃的本气相合,能够补充脾胃的清纯冲和之气,故有补阴之功效。人无饮食,则生命无法继续,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事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饮食要求精而美味,就成了超乎天理之外的人欲了。如果在精美的饮食面前不知节制地大纵口欲,就和儒家的冲和甘淡之旨完全背道而驰了。

其二是节制房事,善养其真。朱震亨认为,除饮食以外,养生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节制房事,这样才能使人体内的真阴得到保护。一般来说,人的身体一旦发育成熟,各种欲望就会随之产生,“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③。而理学却要求人们要“遏人欲,存天理”^④、“明天理,灭人欲”^⑤。这和人们正常的欲望就产生了矛盾,正如濂洛理学的奠基者程颐所说的那样,“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⑥。

① 皆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行》。

② 《黄帝内经素问》卷二《阴阳别论》。

③ (宋)杨时:《二程粹言》卷下《心性篇》。

④ (宋)朱熹:《四书或问》卷三《中庸》。

⑤ (宋)黎靖德校编之《朱子语类》卷一二《持守》。

⑥ (宋)朱熹:《二程遗书》卷三《谢显道记忆平日语·伊川先生语》。

人心为物所牵,往往不能不有所动,人心动而五内之火皆动,而相火遂起。“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①。而理学所提倡的节制欲望,保持内心的平静,对于人们身体的保养是极为有利的。所以朱震亨在其养生思想中,把理学静养与节欲的思想引入其中,作为养生的最基本的要求。所谓“静养”,就是节制欲望,面对酒、色、财、气等具有诱惑性的东西,保持内心的平静,不为所动,这样体内的相火也就不会妄动,就能保持人体内阴阳的平衡,自然不会有疾病发生了。

但七情六欲又是人的本能,是人类发展繁衍的需要,人不可能完全没有两性之间的男欢女爱。于是朱震亨根据季节和人体情况的不同,提出了有节制地进行房事活动,使真阴得到保养。具体的做法首先是晚婚,主张按照古人的成规,男子三十、女子二十而进行嫁娶,这样人体发育成熟,真阴也发育饱满,男女交合,有利于气血畅通、子女孕育和后代的健康成长。其次男女成婚以后要有节制地进行房事活动,做到“谨四虚”。谨四虚之一是“年之虚”,即要根据四季时令的不同有选择地进行房事活动:夏季炎热,应养阴气;冬季寒冷,应主闭藏,都要尽量减少或是杜绝房事活动,这样就能保证在春天万物生发之际进行孕育生养了。四虚之二是谨“月之虚”,朱震亨认为,人体血气的虚实也和月之圆缺有关,所以在进行房事活动的时候,要避免“上弦前,下弦后”的月缺不圆之时间,而在月圆的时候进行。其三是要谨“日之虚”,就是气候突变,使人情绪发生波动,生气、恐惧、忧郁等,这种情况下也最好不要有房事活动。其四是要谨“病后之虚”,人在疾病初愈之际,往往身体虚弱,一时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况,这种情况下也最好不要进行房事活动,以免使原本虚弱的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相火论》。

身体更加虚弱,使病情出现反复或引发其他疾病。

其三是对老人和幼儿的保健。以上饮食和节欲都是针对身体强健的青年和壮年而言。此外,对老人和幼儿的保健也是朱震亨养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震亨认为,人到老年之后,身体机能发生变化,一些病症也就自然显现出来了,“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后,精血俱耗,平居无事,已有热证。何者?头昏目眩,肌痒溺数,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聩,健忘眩晕,肠燥面垢,发脱眼花,久坐兀睡,未风先寒,食则易饥,笑则有泪”。凡是人到老年,都会有以上现象,谁也避免不了。出现这些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精血俱耗”所致。所以,越是老人,越是要善于摄生,保养真阴。如果人到老年,阴气和真精都能得到很好的保养,就可以做到延年益寿。他以自己的母亲为例,说母亲平素多痰饮之病,年过七十后再没有发作,自认为是善于养阴的结果。有一次母亲大便干燥秘结,他用了新牛乳、猪油熬成糜粥让母亲服用。母亲服用了以后,虽然当时大便通利,但由于这些东西毕竟过于油腻,有伤脾胃。到第二年夏天就患了痰饮之症,“郁为黏痰,发为胁疮,连日作楚”。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作为儿子兼医生的他真有无地自容之感,于是他苦苦思索,终于想出“节养”之法,同时给母亲服用参术等补胃补血之药,并随着天气的冷热而酌情加减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的精心调护之后,母亲“大腑不燥,面色莹洁”^①,虽然体形瘦弱,但直至终老再没有发生过大的疾病,最后在87岁时无疾而终。

同样,年幼的儿童因身体尚没有发育成熟,脾胃也相对弱些,所以在饮食上也要茹淡少食,不要对孩子溺爱无度,随其所好,饮食不加任何节制,这样也会对孩子的脾胃造成伤害。所以

^① 皆见朱震亨《格致余论·养老论》。

有很多富贵人家的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但却一直多病。就是长大之后,也是“筋骨柔弱,有疾则不能忌口以自养,居丧则不能食素以尽礼,小节不谨大义亦亏”^①。

朱震亨的养生观,不光是在过去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治病必求于本

朱震亨看病必求于本,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医学理论方面以《黄帝内经·素问》、张仲景的《伤寒论》等典籍为本,并对之进行发挥创造,注入新的内容。二是在治疗实践中也是先搞清楚患病的根源,然后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朱震亨在《格致余论》序言中开篇明义即说《素问》是载道之书,而《本草》是立方的根本,中医在诊病治病过程中,“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②。所以,作为医生,一定要精心学习研究《素问》、《本草》及张仲景的《伤寒论》等等,才能从根本上学到医学的真谛。可惜因为这些书的年代都很久远,词语简约含义深刻,加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衍文错简,所以古文根底不深的人根本无法看懂它们,读起来“茫若望洋,淡如嚼蜡”,于是就认为古书不可读,转而以《局方》为学习对象,认为只要会以《局方》为本,对照方书用药,就可以收到治疗效果了。朱震亨认为,根据病情对照《局方》,按照《局方》给病人用药,这样可以不用求医,不用自己制造药剂,确实非常方便,有时也确实可以收到一些效果。但大凡学医,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起,首先要搞清楚《内经》、《伤寒论》等医学典籍的宗旨,才可以在此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慈幼论》。

②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序》。

基础上有所发明创造。因为张仲景的医学典籍“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天地变化无穷，人身之病亦变化无穷。仲景之书，载道者也。医之良者，引例推类，可谓无穷之应用。借令略有加减修合，终难逾越矩度”^①。所以，任何一个有志于中医的人，都不能逾越《黄帝内经》和张仲景的医学著作。如果不是从根本上掌握医学的宗旨和奥妙，只是学习时下流行的一些看似可以治病，而实际却和医学旨意大相径庭的东西，都只能是学到了一些皮毛，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医生。只有把最根本的东西搞清楚了，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

朱震亨在学医过程中，正是遵循了这样一条原则，一开始学医，他即苦读《素问》，后又精读张仲景之《伤寒论》等书，然后对刘、张、李三家的医学主张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这是学习医学的根本所在，也是朱震亨学医从医所走的一条必经之路。

朱震亨不光是在思想理论上提倡治病必求其本，在医疗实践上更是以此为宗旨。如曾经有一个病人，因为劳累过度身体发热，其他医生以为是外感所致，给他服用小柴胡汤、黄连解毒汤和白虎汤等，结果病人的病症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痰气上升，口中狂言不止，神情昏聩，两眼发红，浑身发烫，如同烈火，性命危在旦夕。家人不得已，又请朱震亨诊治。朱震亨诊断以后认为，病人的病症不在外感，困倦发热只是表面现象，最根本的是病人平时中气不足，又食用了一些寒凉之物，才导致困倦发热的。结果医生不察，又服用了那么多的苦寒之药，遂使病人阴盛阳格，才出现了后来的症状。认清了病症的根源，朱震亨就用温

^①（元）朱震亨：《同方发挥》。

补之法,给病人服用了补中益气汤加生姜、附子、大枣等,仅服用了两剂,病人就得到了痊愈。如果不是从根本上认清患病的根源,按照其他医生的方法继续服用苦寒之药,恐怕病人的性命就没有保证了^①。

还有一次,朱震亨治疗一个富家儿子,此子面色萎黄而嗜食,尤其喜欢食用肉类食物,每饭非肉不饱,却又腹泻不止。看了好几个医生,都以为是食肉过多,积食引起的腹泻。但用了好多去积药,不但没有见效,腹泻反而加重。最后家人来请朱震亨诊治。朱震亨看了之后,认为前面的医生对病症的确认并不准确,因为如果是湿热病的话,就应当是食少脾困。但现在这个病人形健多食,而且不渴,说明不是湿热所致。他觉得对于这样的病人,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从根本上认清病源。于是朱震亨仔细询问了病人日常生活习性、嗜好、身体状况,反复思考之后,认为是肚内疳虫作怪。取其大便观察之后,果然是这样。这时朱震亨正好要去另一个地方诊治病人,就开了治虫药,吩咐患者家人给其服用,再三嘱咐一定要禁用去积药,等待他下次诊治了再说。但朱震亨走后,病人并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做,只服用了一两次治虫药,腹泻止了就停止服药了。到了第二年春夏之交,病人的腹泻病又发作了,这次是腹不痛但口干得很厉害。无奈之下再次去请朱震亨,朱震亨说这是去年治虫不彻底的原因。因为疳虫病是一种很顽固的病症,现在的办法只有彻底把腹内的疳虫清理干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重新调整方剂,先下后补,半月之后,身体基本正常。然后又要求他三年之内,禁食肉和甜食。这样,才从根本上得以痊愈^②。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一四《内伤》。

②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四七《小儿疳病》。

看病必求本源,是对医生最基本的要求,为此,朱震亨在他代表性的医学著作《格致余论》中,特别写有一篇《治病必求其本论》。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说道:病有本源,就和草有根是一样的道理。除草不去根,只除去叶子,草很快还会长起来。医生治病,也和除草一样,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病在脏而治腑,病在表而攻里”,不光是不能治病,反而会加重病情,这还叫什么医生呢?接着,他又列举了几个例子,以说明治病求本的重要性。

朱震亨的一个本家叔叔,中气甚壮,形体甚瘦。从夏末患上痢疾,到深秋还不能痊愈,吃了好多药都没有效用。朱震亨在仔细观察了之后,感到病人患病时间很长,但神情清爽;小便虽然涩少但颜色不赤;双手的脉搏均是涩而颇弦。病人自述说最近胸膈发闷,食量微减。朱震亨据所见所闻,突然醒悟到病人肯定是有多年的积食,病在肠胃之中。于是又询问他平时饮食嗜好。病人说平时喜欢吃鲤鱼,近三年来无一日有缺。朱震亨一听,对病人的病源就掌握了十之八九。认为病人是积痰在肺,而肺又是大肠之脏,所以病人是病在大肠、大肠之本不固的原因。治法应当先从本源上入手。于是以“茱萸、陈皮、青葱、藟首根、生姜煎浓汤,和以砂糖,饮一碗许”,然后用手指自探咽喉,半个时辰以后,病人开始呕吐,一下子吐出了半升像胶一样的浓痰。第二天早上,又饮原药,又吐浓痰半升而止。吐过之后,朱震亨又给病人服用平胃饮加白术、黄连,坚持服用一个月,病人的身体完全恢复。

还有一次,东阳的王仲延在路上遇到朱震亨,告诉朱震亨说他每天吃饭下咽时都不顺畅,总觉得食物硬涩,吃后胃部微痛,其他再无任何痛苦,脉搏是右手甚涩而关尤沉,左手却很平和,问朱震亨这是什么原因。朱震亨告诉他说这是污血在胃脘之

口,因此气郁而成痰,这肯定是食物所致,请他能明白告诉自己平时到底吃了什么不合适的东西。但王仲延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吃得合适。于是朱震亨就问他去年腊月吃的什么东西最多?王仲延想了想说,每天早上一定要饮两三杯酒以逼寒气。于是朱震亨给他说了个方子,将韭菜榨成汁,冷饮细呷之,大约饮半斤韭菜叶的汁,病情就可以消退。王仲延听了他的话,回家照办,果然病情痊愈,不再复发。

朱震亨的一个邻人,年纪30多岁,性格狡黠而急躁。平时患有下疳疮症,时好时坏。一年夏初时节,患腹泻,膈上感觉微闷。医生给他服用治中汤,服了两帖之后,病不见轻,反而昏闷如死,过了一会又苏醒过来。朱震亨给他诊脉后感到他的脉象“两手皆濡,重取略弦似数”,认为病人是下疳疮已经很严重了。就给他服用当归龙荟丸去掉麝香,服用了4帖以后,腹泻稍减,又改用小柴胡汤去掉半夏,加上黄连、芍药、川芎、生姜,煎服了五六帖以后,彻底痊愈。

三个例子之后,朱震亨说,这三个人,从脉象上看,都是濡脉,有的弦有的不弦,但治法却各不相同,这都是因为病源不同的缘故。所以朱震亨说面对疾病“不求其本,何以议药”^①?

不泥成方 辨证施治

朱震亨对《局方》的否定,前边已经有了不少叙述。他反对《局方》最根本的就是《局方》不顾现实情况,教条地以对照病症用药,而不弄清楚病和病之间的区别,不同的病症固然有其不同的病因,相同的病症有时也会有其不同的原因。而《局方》不是全面地分析病症的渊源,一味用辛燥热剂补其不足,结果导致有

^① 以上皆见《格致余论·治病必求其本论》。

些病情被延误。更严重的后果是后来的很多人学医不从根本入手，就是照搬《局方》，以症对方，以方治病，死板教条，不知变通，失去古人的本意。结果贻误病情，使许多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有的还死于非命，这是朱震亨最不能容忍的了。其实不光是对《局方》如此，就是对他所尊崇的《素问》及张仲景的书，他也是在实际应用中有所发挥。他所著的《伤寒辨疑》就其题目来看，应该是就《伤寒论》的有关内容提出自己疑问和见解吧。虽然他一直认为，《素问》和仲景之书是医家治病的规矩和准绳，但在实际应用中决不拘泥于成方，都是在这些书中的治法上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取舍的。如在《金匱钩玄》中，他把咳嗽分为风寒、火、劳、肺胀、火郁、痰等几种，按照不同的原因拟出治疗思路：

因风寒导致的咳嗽要行痰开腠理，用二陈汤加麻黄、杏仁、桔梗。

因火导致的咳嗽则首先要降火、清金、化痰。

因过劳导致的咳嗽用四物汤中加竹沥、姜汁，治疗时一定要以补阴为主。

因肺胀引起的咳嗽用诃子、青黛、杏仁，因为诃子能治肺气。

因食积痰咳嗽发热者用半夏、南星为君，瓜蒌、萝卜子为臣，青黛、石碱为使。

因火郁导致的咳嗽用诃子、海石、瓜蒌、青黛、半夏、香附。

因痰引起的咳嗽首先要清痰。

不仅如此，他还对咳嗽的声音、咳嗽时间的长短、咳嗽引起的其他症状、咳嗽的时间等等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法：“咳嗽声嘶者，此血虚受热也，用青黛、蛤粉，蜜调服”。“久嗽风入肺，用鹅管石、雄黄、郁金、款冬花，碾末和艾中，以生姜一片留舌上，灸之，以烟入喉中为度”。“干咳嗽者难治，此系火郁之证。乃痰郁火邪在中，用苦梗以开之下，用补阴降火，不已，则

成劳。倒仓法，此证不得愈者用之”。“嗽而胁痛，宜疏肝气，用青皮等方。在后二陈汤加南星、香附、青黛、姜汁”。“上半日嗽多者，属胃中有火，贝母、石膏能降胃火”。“午后嗽多者，此属阴虚，必用四物汤加知母、黄柏，先降其火”。“五更嗽多者，此胃中有食，积至这时候，流入肺金。知母、地骨皮降肺火”。

对于不同季节的咳嗽也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春天咳嗽是“春升之气，用清药、二陈加薄荆之类”。夏天咳嗽是“火炎上，最重芩连”。秋天咳嗽是“湿热伤肺”。冬天咳嗽是“风寒外来，用药发散之后，以半夏必逐去痰，庶不再来”^①。

泄泻也是一种常见病，朱震亨对其病因和治疗予以密切的关注，将其分为湿、气虚、火、痰、食积等几类，他说一般医生治疗泄泻都是用涩药，这种治法对于泄泻时间长的患者或许可以奏效。但对于初患者，恐怕就未必了，而且还容易引起其他疾病，所以一定要谨慎从事。如朱震亨曾经给一个老人治疗泄泻，这位老人平时奉养太过，饮食伤脾，所以经常泄泻，朱震亨把它归为脾泄。用白术、白芍药、神曲、山楂、半夏、黄芩等药物，研成末，用荷叶包饭为丸食用，老人的泄泻很快痊愈。

还有一位老人，年过七十，面白脉弦数，只有胃脉沉滑，因为饮了白酒，导致腹泻，排泄物血淡水浓。后来又是腹痛，小便不利，里急后重，朱震亨以参、术为君，甘草、滑石、槟榔、木香、苍术为使，每次最少冲服保和丸 25 丸，第二日腹泻及腹痛症状消失，但小便仍不利。又服以益元散，痊愈。

因为泄泻发生率高，又很常见，而在治疗上也往往存在误区，如有人认为泄泻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内伤或外感引起的脾湿，不作具体分析，轻易地得出“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结论。

^① 以上皆见《金匱钩玄》卷一。

因此凡是泄泻,不问患病原因,只知多下淡渗之药利之。泄泻不止,则以为是受寒,再用紧涩药物兜之。朱震亨认为,这种只看一点、不及其余的说法和古方治今病的说法毫无二致,所以专门撰文对之进行了批驳。

朱震亨认为,泄泻的原因最少可以分为五种:

第一是飧泄,因为水谷入口,不曾消化,仍然完整被排出,是湿兼风的缘故。

第二是溏泄,排泄物呈汁积黏垢状,是湿兼热的缘故。

第三是鹜泄,排泄物澄澈清冷,小便清白,是湿兼寒的缘故。

第四是濡泄,体重软弱,泄下多水,是湿到极度的缘故。

第五是滑泄,久下不能禁,是湿胜气脱的缘故。

在泄泻患者有寒热、虚实不同的情况下,治疗是绝对不能只拘泥于一方的。接着,他又举了好多治疗泄泻的不同方法:

有的是以解汗治疗泄泻,这是对因春天伤风导致夏天泄泻者而言的,可以用苍术、麻黄、防风之类的药物。

有的是以“下”而保平安的,就像张仲景所说的“下痢脉滑而数”的那种,还有积食严重的,也可以用“下”的方法。如果“下”了之后,过段时间又复发,那就是没有“下”尽,应继续“下”之使尽。可以用大承气汤加减之剂来治疗。

有的是帮助消化而保平安,就像《格致余论》所说的那样:夏天患了泄泻,百药无效,神情憔悴,小便少而色赤,脉滑而颇弦,食欲不振,是因为积食过久,积湿成痰,留于肺中,使得大肠的功能减弱。对此症状应采取“清其源,则流自清”的治法。以茱萸等作汤,温服一碗多,然后用指探喉使吐之,先吐痰半升后,开始排泄,然后再减一半。第二天早晨再饮,再吐半升而泄泻止。

有的是以补养而痊愈的,像李东垣《脾胃论》所说的脉弦、气弱、自汗、四肢发热、大便泄泻等症状,治法是用黄芪健中汤。有

的是调和脾湿而得泄泻止的，如张元素所说的四肢懒倦、小便不利、大便走泄、沉困、饮食减少等症状，可用白术、芍药、茯苓等加减治疗之。

有的是以升举而平安的，如李东垣《试效方》中所说的胃中湿、脾弱不能运行、食下则为泄等症状，可以助甲胆风胜以克之，升阳之药可用羌活、独活、升麻、防风、炙甘草等等。

有的是以燥治湿而痊愈的，如李东垣《脾胃论》中所说的土湿有余、脉缓、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等症状，可以用平胃散治疗。

有的是用寒凉法治疗痊愈的，如张仲景所说的胁热自利的病人，治法以黄芩汤为主。

当然，也有是以利小便而治愈的，如刘完素所说的湿胜则濡泄、小便不利者，可以分别用五苓散、益元散为主进行治疗。

由于导致泄泻的原因不同，所以治疗的方法也不相同，怎么说只有利小便才可以治湿呢？怎么说凡是泄泻就肯定是由于受寒，一定要用龙骨、石脂等燥毒严重的药物使之涩而止之呢^①？

此外，朱震亨对疟、伤寒、中风等病症都有十分详细而精到的分析，充分说明各种疾病发生的原因都有其不同之处，因此在具体治疗上也一定要因病而异，千万不可拘泥于成方，一概而论。

注重精神治疗

作为医生，朱震亨不光是注重生理疾病的治疗，而且十分注重心理疾病的治疗，这一点也是从老师罗知悌那里得到的启发。

^① 以上皆见《金匱钩玄》附录《泄泻从湿治有多法》。

当朱震亨师从罗知悌学医的时候,罗知悌对四川病僧的治疗过程,使朱震亨终生难忘。当贫病交加的四川籍僧人到罗知悌处求医时,可以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病人,罗知悌不是单纯地诊脉开方,而是首先详细询问了得病的缘由,知是离家日久思念母亲、朝夕悲哀所致。因为这时僧人的病已经十分沉重,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通过药物治疗痊愈的。所以病人一定要安下心来,做好较长时间的思想准备,配合医生治疗。否则,心中犹豫不定,忧愁不解,再高明的医生、再好的药也治不了病。有鉴于此,罗知悌首先从精神上对他进行安慰,使他感到还有见到母亲的希望,树立治疗的信心。然后再对症下药,实施治疗方案:先是让病人住在罗知悌隔壁的房间,每日将牛肉、猪肚等甘肥之物煮得糜烂,让其食用,使身体慢慢得到恢复。因为这个时间比较漫长,最少得要半个月时间,罗知悌怕病人着急,经常解劝安慰,让他安心治疗,并答应病好后送给他路费,让他回家探母,这样母子很快就可以见面了。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持下,僧人一直配合治疗,等元气基本恢复以后,罗知悌又给他服用桃仁承气汤,使大泻数次,排泄物都是血块积痰。泻完之后,又以稀粥进行调养,仍然是不断进行安慰,等身体完全恢复了,罗知悌实践前言,果然给僧人路费,使其回乡探母^①。

罗知悌的一言一行,对朱震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以后长期的行医过程中,他一直把治疗心病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突出了中医心理疗法的重要特色。

因为心理疾病往往是生理疾病的诱因和前导,所以朱震亨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关系,如他说妇女转胞病患者大多是因为患者本身有“禀受弱者,忧闷多者,性急躁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

者,食味厚者”等原因^①。健忘者大多是由于“忧思过度,损其心胞,以致神志不清,遇事多忘,乃思虑过度,病在心脾”^②。妇女患乳岩一般都是“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怒郁闷,听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③。同样男子遗精也和情绪有关,“有用心过度,心不摄肾,以致失精者;有因思色欲不遂,精乃失位,输精而出者;有欲太过,滑泄不禁者;有年高气盛,久无色欲,精气满泄者”^④。还有其他很多病症也都是由于心理原因而导致的,所以朱震亨在治疗过程中也首先是从心理治疗入手。

如朱震亨在为一位60多岁的妇女治疗乳岩的时候,就认为此病是由于长期的思想郁积所致。此病初发,不觉疼痛,只是病人会出现神思恍惚、食欲不振等症状,如不早早治疗,等5年、10年以后再次发作,就有性命之忧了。朱震亨通过询问,知道这位妇女忧郁的原因是年老不得丈夫的喜爱,故而幽怨成疾。于是一面用药物治疗,一面宽慰其心,同时也对她的丈夫进行劝导,让他善待年老多病的妻子。在药物和心理双重治疗作用下,这位妇女的丈夫转变了态度,对妻子呵护有加,妇女的心情慢慢舒缓,病情得到控制,并逐渐痊愈^⑤。

有一位未婚女子,因事不如意,闷在心头,积久成病,郁结在脾,食欲不振,不思饮食,每天只是吃几颗菱角和枣子,眉头稍微舒缓时可吃一小块馒头,但其他粥饭主食、蔬菜类绝难下咽。半年之后,神情倦怠,精神恍惚,身体虚弱,性格也变得更加抑郁,几乎是一天到晚不说话。已经看了好几个医生,都是给一些助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胎妇转胞病论》。

② (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四《健忘六十二》。

③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乳硬论》。

④ (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三《梦遗四十五》。

⑤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五〇《乳》。

消化类的药,吃了当时略有成效,但很快又仍然照旧。朱震亨给她看病的时候,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家人急于要朱震亨开药,使女子尽快进食,以保证身体的维持。朱震亨看了病人的情况,就怀疑是心理疾病所致。于是仔细询问了病人的情况,知道了患病的原因。决定先从劝导入手,同时给家人讲明病人患病的原因,使大家都明白。双方话说开了,事情也就好办了,病人心头的郁积也慢慢得到化解。然后朱震亨考虑到病人脾胃郁积日久,非积实不能散,于是就用了温胆汤(生姜四两、半夏二两洗、橘皮三两、竹筴二两、枳实二枚炙、甘草一两炙)作为主治药物,服药10多帖以后就很快见效。^①

还有一个19岁的女子,也是因为事情不如意,导致胃脘胀满,不思饮食,几个月下来,身体委顿,无力起坐,只能整天卧床不起。每天中午开始发热,夜间稍退,小便频而点滴不净,脉象沉涩而短小,重取皆有,经水不足。很明显是气不顺畅,导致脾胃气郁而虚,中宫空虚,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又使积食而成痰,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问清了女子患病之原因,朱震亨一面用语言疏导,一面施用药物治疗,采取补泻兼用的办法,用参、术、茯苓、红花、陈皮等药物浓煎,饭前热饮之,稍过一会儿,等药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给病人食用少许粥饭。再过一小会,用神佑丸减去轻粉、牵牛(即成小胃丹),研制成如芝麻大小的丸药,以口中津液咽下15丸,一昼一夜,两种药各服4次,病人到第二天开始吃饭,第三天热退,7天以后痊愈。^②

朱震亨重视心理疗法的病例很多,这里仅是简单的几例。更奇妙的还有不用药物,直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案例。

有一个人因为忧愁得病,咳嗽吐血,面色黧黑,吃了好多药

①②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二《郁》。

都没有效果。朱震亨看了以后说,这个人患的是心病,不是药物所能奏效,如果能让他高兴起来,病也就痊愈了。于是他的哥哥给他找了一个衣食充足的地方安置,病人大喜,病症立即减轻,很快面色正常,咳嗽吐血等症也迅速痊愈了^①。

有一个女子,订婚以后,未婚夫外出经商,两年未归,女子生怕有变,又不好对人明言,只好闷在心里,郁积成病。整天不思饮食,只是困倦而卧,神情如醉如痴。此女为父母掌上明珠,请了好几个医生都看不出是什么病。二老束手无策,日夜啼哭。后请朱震亨前来诊治,朱震亨诊脉以后,说病人是气结于胸,非药物可治。又通过询问知道其已婚配及未婚夫日久不归的情况,更加肯定了自己的诊断。于是拟定了心理治疗的方案。就告诉她的父母,女子的病只能从情绪上疏通,让她彻底开心,或是暴怒发作,都会有益于郁气的疏通。因为过思伤脾,脾气结则不食,怒气伤肝,如怒气突发则可以冲开脾胃的郁积。现在既不能有什么事使她大喜,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她大怒,以怒气冲开郁气,所患之病就有治愈的希望。女儿是父母的心头肉,父母怎么也不舍得让她生气。于是朱震亨走进女子住的地方,痛斥女子没有廉耻,不该有外思,思而不见,才郁积成病。女子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又悲又怒,一下就发作起来,大声哭骂,捶胸顿足、涕泪横流。家里人一下子手足无措,朱震亨却安然不动,并不让家人解劝,任其哭骂。一直过了3个多时辰,朱震亨才让人劝慰。女子心情平息以后,只觉得心胸畅通,病去大半,而且还有了饥饿之感,不大一会儿即开始进食。父母见状,喜之不尽。然后朱震亨让其父母假意转告她未婚夫捎口信来,说将在近日回家,女子心头一喜,又觉症状减轻。凑巧的是3个月之后,果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八《血症》。

然未婚夫回来完婚,于是女子的疾病就彻底痊愈了^①。

正因为有了以上成功的范例,所以朱震亨在行医过程中一直非常注重心理疾病的治疗和情绪上的疏通,首先使病人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治疗才能收到成效,否则,诊断再准确,用药再合适,病人心头有解不开的结,药吃得再多也是白费。在《格致余论·养老论》中,他提出对老人的奉养要本着“茹淡”的原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说有好东西不给老人吃,自己心里不得安宁。另外老人心中也会不快,还容易引发其他的疾病。朱震亨说老人不能或少量食用的只是肥厚油腻、难消易积之物,并不是不要给老人好吃的东西。老人的食物只要可口、易于消化就行了。不能食用肥厚油腻之物,但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让老人吃得高兴就行。如果老人吃得高兴,又不会引发疾病,儿女心中还会有什么不能安宁的呢?关于老人的情绪问题,朱震亨提出要善于用“疏导”的办法,就是先给老人讲清楚道理,让老人自己明白有些东西食用后对身体的危害。同时做晚辈的要将老人的生活安排好,不让他们感觉到生活的不足,他们是会理解的。如果因为“茹淡”就只给老人食用粥饭,不佐以其他口味,不能按时给老人吃饭,让他们在十分饥饿的时候,面对美味佳肴而不让他们食用,他们怎么会心里高兴呢?这里朱震亨反复强调的还是心理疏导工作,这是奉养老人的前提,否则仅仅是强调“茹淡”,那是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的。弄不好老人产生了误会,反而会起到反面的作用,那就曲解了朱震亨关于养老的初衷。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二《郁》。

第九章

杂症治疗 成效显著

朱震亨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特别是在杂症的治疗方面,效果更是突出。在他的医学著作及后人对他著作的整理中,到处可以看到他对杂症治疗的思路和成功的案例,故而人有“杂症看丹溪”之说。朱震亨对杂症的治疗,主要体现在气、血、痰、郁的辨证施治方面,由于它能比较确切地反映杂病的病理变化,因而在临床实践中有一定指导作用。

对气血类疾病的治疗

气和血是人体健康的两大最基本的因素,缺一不可。所以朱震亨在行医治病过程中,始终把治疗气血方面的疾病放在首位。

在《格致余论》的《阳有余阴不足论》中朱震亨以“天之阳地之阴”来比喻人体的气与血,认为“天地为万物之母”,换言之,则气血可为人体生存的根本。在《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中说:“血气者,身之神也。”人的身体之内如果没有气和血的存在,人体当然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人体如果气血平衡,运行通畅,人的健康就有保障,否则,就会产生各种疾病。如果“血气两亏,痰客中

焦”就会导致人体的各个部分“各失其职,视听言动,皆有虚妄”^①。对妇女而言,气血两虚可导致不孕不育,怀孕以后气血两虚可导致转胞、难产等等。气、血对于人的身体有如此重大的关系,所以朱震亨在行医实践中十分注意对气、血类疾病的治疗,他认为只要病人气血通畅、虚实适度,其他疾病也就不治而愈了。在治疗气、血类疾病的过程中,他首先分清是虚症还是实症,如是虚症,则一般不出“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之途,如是实症,则在疏导的同时仍要顾及“虚”的问题,坚持“正气须保护”的治疗原则。罗知悌治疗四川病僧是针对其气虚的症状,采取了先行补气,而后行郁的治疗方法。而朱震亨治疗叶仪的方法也完全承袭了罗知悌的做法,先保护正气,然后行郁,最后取得满意的疗效。因为这种方法在朱震亨以后的行医生涯中屡试不爽,所以在治疗气、血类疾病方面,朱震亨一般都是从“虚”着眼,注重“补”的治法。

有一个人中风之后,“口眼歪斜,语言不正,口角涎流,或半身不遂,或全体如是”。朱震亨诊断以后认为病人是在元气虚弱的情况下,又兼有酒色之过,所以出现如此症状,在治疗过程中就用了“人参、防风、麻黄、羌活、升麻、桔梗、石膏、黄芩、荆芥、天麻、南星、薄荷、葛根、赤芍药、杏仁、川归、川芎、白术、细辛、皂角”等补气祛风药物,加葱、姜水,再加竹沥煎服;同时分别在风市、百会、曲池、合绝骨、环跳、肩髃、三里等穴位施之以针灸,服药针灸之后,病人“微汗而愈”^②。

还有一个壮年,身体肥白,因为过劳成病,秋天大发热,他自己以为是感冒,服用了柴胡之类的药物,七八帖之后未曾见效。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

②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一《中风》。

朱震亨诊断以后,觉他两手脉象洪数而实,再看他的体形和脸色,知道不是因为实证,是因为服用了过多的凉药,再加上气虚所致。于是给他用温补之类的药物,如黄芪、附子汤,让他煎好以后放凉而饮。病人服用两帖之后,觉得身体发困,嗜睡,微微出汗,病症有所缓和,脉象也比较正常了。于是再给他用黄芪白术汤,几帖之后病愈^①。

还有一个人,背部发痈疽,其痈疽的直径将近一尺,“穴深而黑”,病人气息奄奄,情况十分危急。朱震亨看了以后觉得病人气虚已到极点,于是给他大量服用参芪归术膏,以补其气,然后再以艾草和川芎汤清洗创面。等病人稍能进饮食的时候,就让人给他做大肉馄饨,仍继续服用参芪归术膏。等到“尽药膏五觔,馄饨三十碗”的时候,病人之痈疽慢慢愈合,身体也渐渐恢复了^②。这个病人的康复完全得力于朱震亨在补气方面的治法,不光是用药物补气,而且以食疗的方法进补,因为大肉和馄饨都是于补气有益的食物。

对于血虚,朱震亨也大多是用“补”的疗法。

有一个妇女,家贫而性急,有一天忽然血下如注,身体十分困倦。朱震亨诊脉以后,觉其脉象“浮、数、重、取大且芤”,分析是阳滞于阴,病虽然来势凶猛而且很严重,但是可以治愈。于是赶快用萱草根熬汤和姜汁掺和饮下,接着用四物汤加香附、侧柏叶煎服。4帖之后,病人感觉口渴不止,就停其他药,只服用四物汤,10余帖之后,身体痊愈^③。

有一个少年,痘疮靥谢后忽然口噤不能说话,四肢僵直,不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二《内伤》。

②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十《背痈疽疮》。

③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八《血症》。

能屈伸，腹部肚脐周围阵发性疼痛。疼痛发作时，冷汗如雨，过去后一切正常。两手之脉弦紧而急。朱震亨根据脉象和症状，分析是过劳导致的血虚，使风寒乘机而入。于是给他用了辛温养血和辛凉散风的药物，以“芍药、当归为君，川芎、青皮、钩藤为臣，白术、甘草、陈皮为佐，桂枝、木香、黄连为使”，再加少量的红花煎服。服用12帖以后，疾病痊愈^①。

还有一个人也是家贫过劳，在深秋季节浑身发热，手足疼痛难忍，昼轻夜重，且气喘严重，不能安睡。请了好几位医生多次诊断，均无效果，“服风药愈痛，气药不效”，病人十分绝望，最后又请朱震亨诊治。朱震亨根据病人的情况，认为是血虚之症，以前又服用了过多的麻黄，导致“阳虚被发动而上奔”的结果。但他没有急于给病人补血，而是先解除他的痛苦，用“苍术、酒黄柏各一钱半，生附一片，生甘草三分，麻黄五分，研桃仁九个”，煎入姜汁，让病人趁辣热的时候服用。服用4帖之后去掉附子加牛膝一钱，原药不动，继续服用。8帖之后，病人气喘稍微平息，疼痛略减，痛苦暂时消除。等病人安定之后，然后用四物汤加入参、五味子煎服，2帖之后，气喘彻底平复。然后再以四物汤加牛膝、参、术、桃仁、陈皮、甘草、槟榔、生姜等继续服用，一直服用50帖以后，身体才彻底恢复^②。

此外还有一个气血俱虚导致遗精的病例，有一个年轻人，学习特别刻苦，每天都苦读到半夜还不安睡，结果就常常遗精，饮食减少，身体困倦。朱震亨分析他遗精的原因是“用心过甚，二火俱起，夜弗就枕，血不归肝，则肾水有亏，火乘阴虚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则精不得聚藏”而导致的，于是在用药上根据不同情

①（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痿》。

②（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喘》。

况做了不同的治疗，“上则补心安神；中则调理脾胃，提掣其阴；下则益津、生阴、固阳”。3个月之后，疾病痊愈。^①

因为气血是身体根本所在，所以治疗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否则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有一个人平时脚自踝以下，常感觉热，冬天也不穿棉鞋棉袜之类的御寒衣物。还经常给人说自己身体好，不怕冷。朱震亨告诉他，那不是身体好，不怕冷，是足三阴虚的缘故，时间长了肯定会出现严重后果。为了对他的身体和生命负责，朱震亨让他暂时断绝房事，服用补血药，以补养阴血，这样就可以免于疾病的困扰，也免得到时候后悔无益。那人不但不听，反而嘲笑朱震亨迂腐。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就患了痿病，四肢萎缩，行动不便。但这时还没有对朱震亨的话有所醒悟，生活行为上仍不太检点。后来这个人的病情越来越重，终于在半年之后不治而死。^②

还有一个人两足痠重，不能行走，一走就肿痛不已。一天，朱震亨在不疼的时候给他诊断，感到他脉象“三部皆大搏”，又观察到他的手如葱管，没有一点力气，上半身体肥，分析是平时膏粱厚味，情欲无穷，所以精血不足，湿热太盛的缘故，就打算用“益精血于其下，清湿热于其上”的治疗方法。但有人却说病人患的是脚气，没有吃补药的道理，所以病人也拒绝服用朱震亨开的方剂。过了3天以后，病人脚疼又发作，又请了其他的医生，有的用南方的治法，给他发汗，没有效果，有的用北方的治法，让他排泄，也没有效果。尽管看了很多医生，吃了许多药，病人身体仍然极端衰弱，委顿不已，几天之后，竟死于溺器之上。^③ 病

①（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五《遗精》。

②（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厥》。

③（明）江瓘：《名医类案》卷六《脚气（附肿病）》。

人患的本来就是虚症,当用补气血之药,而很多医生都是不分虚实,用治疗实证的方法使其出汗或排泄,病人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所以这真是个沉重的教训。假如当初听从朱震亨的话,用他所开的方剂,恐怕就没有这样的灾祸了。

刘时觉在对《名医类案》和《续名医类案》所收的朱震亨的医案进行统计以后,说是两书一共收录病例 344 例,在 169 例指出病机的案例中,气血虚的即占 68 例,占 40% 多。可见气、血疾病的治疗在朱震亨的行医生涯中所占的比重。

对痰症的治疗

痰症有排出体外的有形之痰,也有在体内表现为痰的特异症状。金元以前,治疗痰症基本上不出吐、下、温几种方法,这些方法虽可收效于一时,但时间长了,就会对身体的元气造成损伤。尤其是吐、下两法,一旦施用不当很容易对身体造成损伤,导致脾胃虚弱,反而会更易生痰,是目的与结果背道而驰。朱震亨对痰症的形成作了全面的分析,认为痰症的原因各种各样,“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热而生痰者。有因气而生者,有因风而生者,有因惊而生者,有积饮而生者,有多食而生者,有因暑而生者。有伤冷物而成者,有脾虚而成者,有嗜酒而成者”。原因不同,表现出的症状也不同,“惊痰则成心包痛,颠疾。热痰则成烦躁,头风、烂眼、燥结、怔忡懊悵、惊眩。风痰成瘫痪、大风眩晕、暗风闷乱。饮痰成胁痛,四肢不举,每日呕吐。食痰成疔痢,口出臭气。暑痰中晕眩冒,黄疸、头疼。冷痰骨痹,四肢不举,气刺痛。酒痰饮酒不消,但得酒,次日又吐,脾虚。生痰食不美,反胃呕吐。气痰攻注,走刺不定”^①。所以他主张对痰症要分别对

^①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卷五《痰饮》。

待不可用利药太多,所谓“凡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下虚,则痰反易生多也”^①。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对痰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把痰症大致分为湿痰、热痰、食积痰、风痰、老痰等几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各种治疗方法。如治疗湿痰用苍术、白术,老痰用海石、半夏、瓜蒌子、香附、五倍子,热痰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积痰用神曲、麦芽、山楂子等。

根据痰所在的部位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如痰在肠胃间,可以用下法,使之排泄。而如果是在经络中或在膈上,就一定要用吐法,用下法是不行的。还有,如果是胶稠之痰也必须施用吐法。即使是吐法,也可分为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兼用芽茶、藿水、姜汁、醋少许,瓜蒌散少许,加防风、桔梗,皆升动其气,便吐也”。另一种是“用附子尖、桔梗芦、人参芦、瓜蒂、砒(不甚用)、藜芦、艾叶、末茶”,服之使吐。这两种方剂服用后都可以使患者自行吐出,不须用手指探喉。如不想借助于药物使吐,就要借助其他方法,如让病人在不通风的地方,以布勒于腰间,然后用萝卜子半升,搗成细粉,和以浆水一碗,滤去滓,放入少量的油与蜜,烧到半温时服用,再以鹅翎探喉使吐。所用的鹅翎一定要用桐油浸泡,再用皂角水洗干净,方可使用。还有一种方法是用半斤带壳的虾,加入酱、葱、姜等作料,煮成汁,先吃虾,后饮汁,再用鹅翎探喉使吐。两种方法如何选用,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二陈汤治疗痰症,效果最好,“一身之痰都能管,如在下加下引药,如在上加上引药”。

痰在人体不同的部位,使用的药物也不相同。“痰在肋下,非白芥子不能达”。“痰在皮里膜外者,非姜汁、竹沥不可达”。

^①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一《痰》。

“痰在膈间,使颠狂健忘,宜用竹沥。风痰亦服竹沥,又能养血。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开”。“痰结核在咽喉,燥不能出,入化痰药,加软坚碱药味,杏仁、海石、桔梗、连翘、瓜蒌仁、少佐朴硝,以姜汁蜜调丸,噉化之”^①。

宋代名医庞安常曾说:“人身无倒上之痰,天下无逆流之水。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②朱震亨在痰症的治疗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庞氏的思想,在治痰过程中始终注重于对气的治疗。除上述治法外,他还对很多药物的性能进行研究,分清楚它们在治疗中的作用,在治疗过程中有重点地使用。如“海粉即海石,热痰能降,湿痰能燥,结痰能软,顽痰能消。可入丸子、末子,不可入煎药”。“黄芩治热痰,假以降其热也”。“竹沥可滑痰,非姜汁不能行经络也”。“枳实泻痰,能冲墙壁”。“五倍子能治老痰”等等。

此外他还发明了很多方药,在治疗痰症的时候灵活应用。

如润下丸降痰最妙,用陈皮半斤,去白,以水化盐半两,拌陈皮,令得所煮。候干炒燥。又有一方不去白,用甘草一两,将以上药物,研为末,蒸饼丸绿豆大,每服35丸,温水送下。

油炒半夏大治湿痰,又治喘,止心痛,粥丸,姜汤下30丸。

中和丸可以治湿痰气热,用苍术、黄芩、香附、半夏(各等分),为末粥丸。

痰嗽方用黄芩一两半,酒浸洗,滑石半两、贝母一两、南星一两、风化硝二钱半、白芥子半两去壳,将以上药物研为细末,用汤浸后蒸饼为丸,让病人服用。

导痰汤用半夏四两、南星、橘皮、枳壳、赤茯苓各一两,甘草

① 皆见《金匱钩玄》卷一《痰》。

②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卷五《痰饮》。

半两,用生姜煎服。

黄连下痰汤用黄连一两、陈皮五钱、吴茱萸一钱,用酒浸,半夏一两五钱。以上药物研为末,加入桃仁24个,研成泥,和匀,用神曲糊成绿豆大小的丸子,每次服用100丸,姜汤送下。

清膈化痰丸用黄连、黄芩各一两,黄柏、山梔各半两,香附一两半、苍术二两,以上药物研为末,蒸饼为丸,用白汤冲服。

搜风化痰丸,用人参、槐角子、僵蚕、白矾(去白)、天麻、荆芥各一两,半夏四两,用姜汁炒,辰砂半两(另研)。以上药物研成末后,用姜汁浸泡,蒸饼为丸,辰砂为衣,每次服用40丸,用姜汤冲服。

利膈化痰丸,用南星、蛤粉(细研)一两,半夏、瓜蒌仁、贝母(去心,治胸膈痰气最妙)、香附(童便浸)各一两。以上药物研为末,用猪牙皂角14挺,敲碎之后加一碗水煮到一半,再加进一两去皮后的杏仁同煮,水快干的时候,去掉皂角,将杏仁捣如泥,入于药中,再加入姜汁泡,蒸成如绿豆大小的饼丸,以青黛为衣,每次用姜汤冲服50丸。

清痰丸专门清理中管热痰积,用乌梅、枯矾、黄芩、苍术、陈皮、滑石(炒)、青皮、枳实各半两,南星、半夏、神曲(炒)、山楂、干生姜、香附各一两。以上药物研成末,用汤浸泡,蒸饼为丸,酌量服用^①。

程充编辑修订的《丹溪心法》中有一段对痰症的精辟议论,可看做是朱震亨对治疗痰症的概括和总结。其云:“凡痰之为患,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心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肿痛,为痞隔,为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皆痰饮所致。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

^① 以上见《金匱钩玄》卷一《痰》、《丹溪心法》卷二《痰》。

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又严氏云：‘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古方治痰饮，用汗吐下温之法，愚见不若以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又王隐君论云：‘痰清白者为寒，黄而浊者为热。’殊不知始则清白，久则黄浊，清白稀滑渍于上，黄浊稠粘凝于下。嗽而易出者，清而白也；咳而不能出，则黄浊结滞也。若咯唾日久，湿热所郁，上下凝结也，皆无清白者也。甚至带血，血败则黑，痰为关格异病，人所不识。又清白者气味淡，日久者，渐成恶味，酸、辣、腥、臊、焦枯不一。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凡人身中有结核，不痛不红，不作脓者，皆痰注也。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①

《名医类案》和《续名医类案》也记载了好多朱震亨治疗痰症的成功病例，是他关于痰症治疗理论的实践结果。

朱震亨曾经治疗过一个未出嫁的女子。六月份的时候，女子心情烦闷，身体困惫，不思饮食。诊其脉觉脉象沉细数弱，口渴不止。原先看了几个医生，都以为是暑热病，用了治疗暑热病的药物，哪知吃药以后不但没有收效，反而又增加了新的症状，整日呕吐不止。病人的身体日益消瘦，手心发热，喜欢待在暗处，不喜见人。慢慢地整日思卧，口中妄语不停。朱震亨诊脉之后，认为如果光从脉象上说，按暑热病治疗是可以的，但病人喜欢待在暗处，就是痰症的表现了。于是就使用了《同方》中妙香丸的成分：巴豆、冰片、麝香、牛黄、辰砂、膩粉、金箔、黄蜡等等，和成像芡实大的蜜丸，用井水冲下一丸。约半日的时间，病人开始大便，药出而病症未减。就再用麝香水洗药，以针穿三孔，凉水吞。半日之后，吐出稠痰数升，病情逐渐消失。

还有一个病人，也是患痰症，血滞不行，胸中如有积水。朱

①（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二《痰》。

震亨先给病人服用三四杯韭菜汁,病人胸中烦躁不宁,服药无效。后又用瓜蒌仁一钱、半夏二钱、贝母三钱,研成细末,做成炊饼丸,用麻子生姜汤送下,病人服后痊愈^①。

朱震亨老师许谦的疾病,也是典型的痰症,朱震亨在治疗中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最后才用“倒仓法”治疗成功。

对郁症的治疗

这里所谓的“郁”,就是“忧郁”、“郁积”,是人的情绪或气血循环不畅所导致的疾病。朱震亨认为,都是人身体致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在治疗过程中,他对因郁导致的疾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将其分为气郁、湿郁、痰郁、热郁、血郁、食郁等6种不同的类型,并根据每一种疾病的实际确定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如气郁用香附(童便浸)、苍术(米泔水浸)、川芎;湿郁用苍术、川芎、白芷、茯苓;痰郁用海石、香附、南星(姜制)、瓜蒌;还有一种治法是苍术、川芎、栀子,天南星、瓜蒌。热郁用青黛、香附、苍术、川芎、栀子;血郁用桃仁(去皮)、红花、青黛、川芎(抚芎亦可)、香附;食郁用苍术、香附、山楂、神曲(炒)、针沙(醋炒),研成细末。并且根据季节的不同春天加川芎,夏天加苦参,秋冬加吴茱萸。

另外,他还创制了一种丸药——越鞠丸,专治一般性的郁症。其方是苍术、香附、抚芎、神曲、栀子等5种,各等分,研成细末,用水和成绿豆大的小丸,根据病情的轻重按医生嘱咐服用^②。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痰》。

②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一《六郁》、《丹溪心法》卷三《六郁》。

在郁症的治疗上,除了药物从生理上治疗外,他更侧重于从心理上进行疏通,使病人消除心理障碍,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

本书第九章中“注重精神治疗”所举的朱震亨治疗心理疾病的例子,均属于气郁一类,都是因心中有“怫郁”所导致的疾病,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子比男子更多患有“气郁”方面的疾病,因而朱震亨在治疗妇科疾病的时候,特别注意从气郁入手。但有时气郁和痰郁、食郁等病又有一定联系,治疗时一定要慎重看待。稍微用药有误,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如有一个男子,形体肥实,平时多忧多怒,情绪很不稳定。终于在50岁的这一年春天发病,胸闷痰涌,气短咳嗽,痛苦异常。其他医生诊断之后,认为是虚寒之症,服用了许多燥热香窜之类的药物,没有取得成效。到了四月病情更加严重,“两足弱,气上冲,饮食减”。这时家人赶快请朱震亨前来诊断,朱震亨诊断之后说这是因体内过热而导致的脾虚痿厥之症,最初是由气郁引起的痰郁。病人体形肥实,患此病当不至于死。但由于服用了过多的燥热香窜药物,所以“药邪太盛”,在这火旺的时节,恐怕就要有性命之忧了。当时朱震亨让他服用竹沥和白术膏,服用之后,病人开始进食,但一月以后仍然大汗而死^①。

对于痰郁,如果治疗得当,痊愈起来还是很快的。如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平素经常生气发怒,有一天晚上饮了烧酒,第二天早上就面色浮肿,不思饮食,身体倦怠,卧床不起。朱震亨诊断之后,认为该妇女平时有些积气在胸,引起痰症,饮用烧酒之后,气为痰所隔,不得降,就成了如此模样,应该采取补虚利痰的方法治疗。于是朱震亨给她主要用六君子汤加滚痰丸,每天早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痰》。

上服用一大剂量的二陈汤加参、术,然后用指探喉令吐,然后再服用索矩三和汤三倍加白术。到晚上入睡时,再服神祐丸7粒促痰。这样坚持服用,一月以后病情消失^①。

江瓘《名医类案》卷三《湿》条列举了6例朱震亨治疗湿症的病例,其实也是因湿所导致的郁症。如有一个少年,平时就有湿热症状,加之新婚劳累困倦,感觉胸膈不快,有冷饮积于胸中。朱震亨诊脉时发现他脉象涩大,血气俱衰,就给他用辛温大散药,以苍术、白术、半夏、陈皮各五钱,白芍六钱,龟板七钱半,柏皮、甘草各一钱半,黄芩三钱,宿砂一钱,做成炊饼丸,服用几帖后痊愈^②。

腹内积块也是郁症的一种表现,朱震亨在治疗期间,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有一位妇女,年龄不大,身体消瘦,脸色娇嫩,平时喜欢吃味重的东西。小的时候有一次用火烤湿鞋,结果身体为湿气所侵,经常吐清水吞酸,当时医生给用了许多丁香之类的热药,暂时见效。但后来病情时作时止,反复无常,再后来就感觉块状物积于胸口,疼痛难忍,一吃饭就呕吐不止。听了病人的叙述,又结合对脉象的分析之后,朱震亨让她先用姜汤冲服左金丸,每次24粒,服用30多次以后,病人胸中的积块已经散开,疼痛减轻,但仍不能进食。于是停止服药,只是在病人要喝水的时候给一些热水喝,再适当服用一些青六丸。当时,病人感觉身体十分困倦,整日卧床昏睡,朱震亨就适当给病人服用人参酒芍药汤。约40天后,病人有了食欲,但又苦于便秘。于是朱震亨再用生芍药、陈皮、桃仁、人参等药制成丸药,用蜂蜜水冲服,服了以后,便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三《痰》。

②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二《湿》。

通食进,半月后痊愈。

还有一名妇女,因儿子夭亡,过于悲痛,经常痛哭不止,后来胸口积块如茶杯般大小。慢慢地饮食减少,面色淡黄黧黑,不时发寒发热,身体委顿不堪。朱震亨诊脉以后,感觉她的脉象弦细虚涩,知道病势已经十分危急,就对她采取了补泻兼用的治疗方法:先用补中益气汤随时加减,与李杲创制的痞气丸间隔服用。饭前服汤药,饭后服丸药,每次都是汤药多丸药少。一月以后,身体不再发寒发热,也稍稍能够进食,就让她继续服用前面所开的药剂。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忽然又是大寒大热,直到天明才恢复正常,感觉胸中积块慢慢消散。到了晚上,病人手足下半部开始肿胀,朱震亨让她停止服药,静养将息。又过了几天,病人手足肿胀消失,胸中还略有小块。于是又改为服用二陈汤加白术、桔梗、枳实,半月以后,病人彻底痊愈,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儿子^①。

以上医疗实践中的事例充分说明,在治疗郁症方面,朱震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朱震亨之后,他的弟子们在治疗郁症方面,都能领会和遵循老师的治疗方法,在郁症的治疗上突出自己的特色,收到了良好的疗效。

对火热症的治疗

除气、血、痰、郁之外,朱震亨在治疗火热类、风类、妇科类、儿科类疾病等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也值得加以叙述。

《丹溪心法》分火为实火和虚火两种,在治法上分别采取“泻”和“补”的方法,实火可泻,虚火可补。区分火症的主要标志是气,“凡气有余便是火”,“气从左边起者,乃肝火也;气从脐下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五《积块》。

起者,乃阴火也;气从脚起,入腹为火者,乃虚之极也”^①。火症发作急,情况又十分严重,则不能采取急治的方法,应采用“缓”的方法,用生甘草或者是参、术兼泻兼缓。如果患者体壮气实,可用正治,就是用硝黄冰水之类的药物降火滋阴。但如果患者身体虚弱而又火症严重的,则千万不可用冰水,否则立死无疑。一般性的火症,都不可骤用凉药,一定是温、散兼用,比较妥当。火症也可采取“发”的方法治疗,一是风寒外感,一是因郁而火。此外,治疗火症的方法还有:如人虚之极,气从脚起,则可用附子未津调,塞涌泉穴,然后以四物汤加降火药服之,效果甚好。

治疗火症的药物首推龟板,是阴中之至阴,是降火良药。四物汤加白马胫骨,降阴火,可以代替黄连和黄芩。黄连、黄芩、栀子、大黄、黄柏都有降火功效,但一定是阴中火才可以施用,否则不用。其余还有“生甘草缓火邪,木通下行泻小肠火。人中白泻肝火,须风露中二三年者。人中黄大凉,治疫病须多年者佳。中气不足者,味用甘寒。山栀子仁大能降火,从小便泄去,其性能屈曲下降,人所不知,亦治痞块中火邪”^②。

在治疗火症的成药应用上,朱震亨特别推崇左金丸,认为它治疗肝火最好,其方剂是黄连六两、茱萸一两或半两,研末,用水调和制丸或者蒸饼为丸,每次用白汤冲服50丸。

《丹溪心法》中还有一段附录,专门是对火症的论述,其云:

诸热瞀瘖,暴暗冒昧,躁扰狂越,骂詈惊骇,肘肿疼酸,气逆冲上,禁栗如丧神守,嚏呕,疮疡,喉痹,耳鸣及聋,呕涌溢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眦瘖,暴疡,暴死,五志七情过极,皆属火也。火者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

①② (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一《火》。

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行质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稟明，因动而见，故谓之相。肾肝之阴，悉其相火，东垣曰：相火，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相两立，一胜则一负，然则如之何？则和使之无胜负乎？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谓之动者，即《内经》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君火之气，《经》以暑与热言之，相火之气，《经》以火言之，盖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气之贼。周子又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此善处乎火者，人心听命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将寂然不作，而相火者唯有裨补造化，而为生生不息之运用尔，何贼之有？^①

上举火症的种种表现，总分火症为君火、相火两种，然后予以具体的解释，结论是只要人心听命于道心，以静制动，就可使五火（五脏之火）寂然不作，这样相火就只能对人体有益，不会有害，成为生命运动之动力。

除左金丸外，《丹溪心法》还列举了几个治疗火症的方子，如李东垣的“泻阴火升阳汤”：羌活、甘草（炙）、黄芪、苍术各一两，升麻八钱，柴胡一两半，人参、黄芩各七钱，黄连（酒炒）半两，石膏半两（深秋不用）。以上药物，咀嚼以后水煎^②，每次服用一两

①（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一《火》。

② 原文为“咬咀”，即咀嚼之意，最初在没有铁器的时代，以口将药物咬碎，便于煎熬。

或半两。治疗“肌热颊热，面赤食少，喘咳痰盛”，也可以发脾胃之火，治疗心、胆、肝、肺、膀胱之火，泻阴火，升发阳气，荣养气血。

升阳散火丸：升麻、葛根、独活、羌活各半两，防风二钱半，柴胡八钱、甘草(炙)三钱，人参、白芍各半两，甘草(生)二钱。以上药物咀嚼后水煎，每次服半两或一两。治疗四肢发热、肌热、筋痹热、骨髓中热、发困等症。

地骨皮散：地骨皮、茯苓各半两，柴胡、黄芩、生苈、知母各一两，石膏二两，羌活、麻黄各七钱半。以上药物咀嚼后入姜水煎，每服一两。治疗“浑身发热，脉长而滑，阳毒火炽，发渴”。

黄连解毒汤：黄连、黄柏、黄芩、栀子等分，咀嚼水煎服^①。

在治疗火症的实践中，朱震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很多成功的病例。

有一个妇女，患火症，感觉心中如火烧一样难受，并感觉火一烧就进入小肠，马上就要小便，大便也不能禁止，随小便而出。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有效果，一直拖了3年。后朱震亨为之诊断，觉得她脉滑而数，认为是相火进入小肠的缘故。于是按照《内经》说法，用四物汤加炒连柏、小茴香、木通等煎服，服用4帖之后见效。

还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四月间开始发热，持续不断。朱震亨诊脉以后，感觉其脉浮沉皆有不足，知道不是伤寒。就想着是不是饮酒过量，体内有酒毒，再加上房事劳倦，气血两虚而导致的疾病。经过询问，果然是从正月开始每天饮烧酒，吃狗肉，整整一月，然后就得了此病。于是朱震亨先用补气血的药加干葛以解酒毒，一帖之后，病人微微发汗，但身体依然困倦。就分

① 以上皆见《金匱钩玄》卷一《火》、《丹溪心法》卷一《火》。

析病人是气血皆虚,经不起葛根之散,就改用枸杞与原来的药物一起煎服。几帖之后,病人就痊愈了^①。

还有一个病人,每天夜间五心发热,早晨消退,长期反复不止。朱震亨诊断之后,感到其六脉沉数,认定是郁火所致。就先用升阳散火汤退热,然后用四物汤加知柏佐以干姜调理,不长时间,病情消失。

一个叫施卜年的病人,年龄40,因为平时炙火太多,所以肠内有病,经常大便带血,腹内疼痛。后来疼痛止住,但又时时呕吐清水,不思饮食。朱震亨认为是胃热的缘故,应该先清理胃中的积热。于是用黄芩、甘草、茯苓各五分,陈皮、地黄各一钱,连翘、白术各一钱五分,生姜三片,煎服。病人服用以后,很快痊愈^②。

对风类疾病的治疗

风是百病之源,其致人于病的方式是“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都可因风而导致疾病,“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风入于五脏六腑之俞,称为“脏腑之风”,然后各入其门户,引发各种疾病,“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外在腠理则为

① 以上两例见《名医类案》卷二《火热》。

② 以上两例见(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八《火》。

泄风”^①。所以古人说风是百病之长,而且变化无穷,因此治疗的时候也就没有一定的方子,只能是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朱震亨根据风类疾病的特点,将其分为许多类,如中风、暑风、伤风、头风、痛风、肠风、喉缠风、疔风等,根据不同的症状施以不同的治法。

中风一般有半身不遂、气虚卒倒等症状,原因多是气虚有痰,治疗的方法应以治痰为先。一般半身不遂在左边的,属于死血或无血,治疗上用“四物汤等加桃仁、红花、竹沥、姜汁”;在右边的是属于痰症有热、气虚,治疗时应用“二陈汤、四君子等加竹沥、姜汁”。气虚卒倒时,则要“急掐人中,至醒。然后用去痰药、二陈汤、四物、四君子等汤,加减用”^②。

暑风是指在盛夏暑天突然卒倒、不省人事,有的是因为火,人体中的君、相二火和暑天的天地之火内外相交,所以人会卒倒;有的是因为痰,人体内的痰因为暑气的侵入而鼓动,使心窍堵塞,所以手足不能动而卒倒。治疗的方法可用吐法,因为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实证,用吐法可以发散,吐完之后,再用清剂调治^③。

伤风一般的症状是咳嗽,病多在肺上,宜用辛温或辛凉之剂发散^④。

头风的突出症状就是头疼,有痰者居多,一般左边疼是有风或血虚,治疗方法上有风者可用荆芥、薄荷,血虚者可用“川芎、当归、芍药”等;右边疼痛的是热或痰,治疗时有热用酒芩;有痰

① 《黄帝内经素问》卷十二《风论》。

②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一《中风》。

③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一《暑风》。

④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一《伤风》。

用川芎、南星、苍术。但不管用什么药,都要“察识病情,全在活法出入加减”,不可偏执于一方^①。

肠风主要在胃与大肠,治疗一般用“黄芩、秦艽、槐角、升麻、青黛”;如果治疗肠风下血,可用“滑石、当归、生苳、黄芩、甘草、苍术”;治疗积热便血可用“苍术、陈皮、黄连、黄柏、条芩、连翘”;如果是肠风脱露,可以“车苳鸣五七个,焙干烧灰,醋调搽”,忌食湿面、酒和辛辣之物^②。

疔风就是大风病,之所以叫做疔风,是因为其“酷烈暴悍”,令人可畏的缘故。人受大风,分在上在下,如果在上,可用醉仙散将体内的臭涎恶血从牙缝中挤出来;如果在下边,可用通天再造散从谷道中将体内的恶物陈虫排出。大风病一般是在胃与大肠之中,因为这是食物所进,无物不受的地方。得了疔风病,除医生诊治之外,病人一定要严守禁戒,节制饮食和房事,否则,医生是没有办法的。整理编辑《丹溪心法》的程充说,他曾经治过5个患疔风病的患者,只有1个是彻底痊愈;其他4个都是治好之后,因不守禁忌而复发。而这种病,一旦复发,就很难再治好了。痊愈的这一个是一贫家妇女,平时家境不好,勉强度日,无物可吃。得病以后,又导致血虚,月经不调。在服用了100多帖加减四物汤之后,月经方才正常。然后她听医生的话,严守禁忌,以后才没有反复^③。

缠喉风大多是痰热所致,症状是喉咙内外皆肿胀疼痛。治法可用雄黄解毒丸和润喉散;也可用鹅翎蘸桐油探喉使吐出喉

①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一《头风》、(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四《头风》。

②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二《肠风》、(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二《肠风》。

③ (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四《疔风》。

中的秽物,还可以将远志去心后研成末,用水调拌后敷于颈上,促使病人吐出淤积的秽物^①。

痛风也叫风痹,是人体因受风寒而导致的四肢麻痹、疼痛的疾病。用朱震亨的话来说,就是“四肢百节走痛,风热、风湿、血虚、有痰”。主要的治疗方法是用“苍术、南星、川芎、白芷、当归、酒黄芩”等药物煎服。因为痛风主要是患在四肢,所以有在上在下之分,在上者在前边药方中加羌活、桂枝、桔梗、葳灵仙;在下者在前边药方中加牛膝、防己、木通、黄柏。治疗痛风,首先要分清“痛”的原因:因风而痛,用小续命汤;因湿而痛用苍术、白术之类;因痰而痛用二陈汤加酒炒黄芩、羌活、苍术;因血虚而痛,用川芎之类,佐以红花、桃仁。还有二妙散治因湿热而筋骨疼痛者,趁痛散在痛的时候服用;八珍丸治痛风走注脚疾;四妙散治痛风走注,控涎丹治一身及两胁走痛,痰挟死血者;龙虎丹治走注疼痛,麻木不遂,或半身痛。此外还有舟车丸、导水丸、神芎丸、败毒丸、乳香丸等等也对因各种原因引起的痛风有一定治疗作用^②。

在治疗痛风病的过程中,朱震亨最大的成绩就是把痛风和痿病的区别明确地告诉人们,避免了在治疗方法上风痹、痿症不分的情况。

本来,在《黄帝内经》中,对风痹和痿症各有专论,将风痹和痿症的病因和表征都讲得清清楚楚:痹是因风寒入侵所致,痿是因内热所致;风痹的特点是痛,而痿是不痛而软弱无力,进而萎

^①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二《缠喉风》、(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四《缠喉风》。

^②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二《痛风》、(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四《痛风》。

缩。这样分清楚之后,在辨认上应该不会有歧义了。可是后来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首先是隋代的巢元方在其所著《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中将痿症和痹症都统一于“风病诸候”条下论述,如他说人手足不随是“由体虚,腠理开,风气伤于脾胃之经络”的缘故,“风邪在经络,搏于阳经,气行则迟关以纵,故令身体手足不随也”^①。“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风多者为风痹。风痹之状,肌肤尽痛,诸阳之经,尽起于手足而循行于身体。风寒之客肌肤,初始为痹,后伤阳经,随其虚处而停滞。与血气相搏,血气行则迟缓,使机关弛纵,故风痹而复手足不随也。”^②诸如此类的还有《风半身不随候》、《风湿痹身体手足不随候》、《风四肢拘挛不得屈伸候》、《风不仁候》、《风湿痹候》、《风湿候》、《风痹候》^③、《历节风候》、《风身体疼痛候》等^④,巢元方对病的论述应该说是不错的,但一个明显的失误就是他没有清楚地说明痹症和痿症的区别,而是将两者都统一于“风症”的条目之下,这就给人们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后来的《局方》更是在治疗上将痹症和痿症混为一谈,如《局方》中的至宝丹、灵宝丹、润体圆、龙脑天麻煎等都是不分痹、痿而“治一切风”,更加使人们将痹与痿混在一起,并在治疗上出现误区。有的以痹为痿,有的以痿为痹,还有的干脆痹、痿不分,根据自己的猜测用药,致使很多本来可以治好的疾病被耽误,让病人长时期地遭受病痛的折磨,有的病人还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送了性命。

如有一个人形体肥实,喜食厚味,性格忧愁又经常发怒,春

① (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一《风病诸候上·风身体手足不随候》。

② (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一《风病诸候上·风痹手足不随候》。

③ 皆见《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一《风病诸候上》。

④ 皆见《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二《风病诸候下》。

天的时候患了痰气,医生以为他是血虚,给他服用了燥热香窜之类药物。到了夏天,两足发软,气上冲,食量大减。又请朱震亨前去诊断,朱震亨诊断之后说,这是因热郁脾虚而导致的痿症。本来形肥而脉沉,不是死症,但由于前边服了太多的燥热香窜之药,再加上现在夏天,人火、天火并旺,治疗起来当有一定难度了。于是先给他服用竹沥和白术膏,服用了一段时间后,气降食进,病症有所减轻。但终于因为前面用药失误,这个人在一月之后还是大汗而死^①。

还有一个士大夫,也是两脚发软,请朱震亨前去诊治。朱震亨诊脉以后,感到他两手脉象俱浮洪而又稍鼓,饮食和平常一样,只是问话不说,身上起白屑,如麸片一样。当时正是十一月,朱震亨拟给他当虚症治疗。就向他弟弟询问了这个人的病史,弟弟说此人在半年前背、臂、腿3处曾在夏天至秋天的时间先后生疽,医生给他用过五香连翘汤和十宣散,后来就结痂了。朱震亨根据病人的情况和家人的诉说,给他用了参、芪、白术、当归膏,以二陈汤化饮之。两天以后,白屑减少大半。病人感觉呼吸有力,非常高兴补药收到了效果。但他们又觉得朱震亨给他用的药见效太慢,于是就自作主张,按风病治疗,炼青蒙石两钱半,以青州白丸作料,煎饮之。朱震亨再三劝阻他们都不听,最后终于不可救药而死^②。清代魏之琇说“痿症作风治多死”,所以特意在《续名医类案》中记录了这个病案,以警来者。

为了分清痹、痿,以正视听,朱震亨首先对《同方》中痹、痿不分的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古圣论风(痹)论痿,各有篇目,源流不同,治法亦异”,而今世所谓风病,大都与诸痿证混同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八《痿》。

②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一七《痿》。

论治,这都是因为“《局方》多以治风之药通治诸痿也”。他又举例说《局方》中的至宝丹、灵宝丹、润体丸等 30 多个方子都说是“治诸风”、“治一切风”、“治一应风”、“治男子三十六种风”,其所主治甚为浩博,且寒热虚实判然迥别,一方通治,果合《经》意乎?果能去病乎?既然《局方》中有至宝丹等是治一切风之语,为什么在治风之外,又“历述神魂恍惚,起便须人。手足不随,神志昏愤,瘫痪躄曳,手足筋衰,眩晕倒仆,半身不遂,脚脉缓弱,四肢无力,颠掉拘挛,不语语涩,诸痿等证,悉皆治之”?明明白白地将痹症和痿症混为一起。

为了使人们清楚分清痹症和痿症,朱震亨除了主张痹、痿分开论述外,还在名称上进行了改革。本来,以“痹”作为疾病名称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由于从巢元方之后,人们都是把痹和痿一起混同于“风”类疾病,造成了思想和认识上的误区,所以朱震亨决定以别的名称代替“风痹”之名。因为痹和痿的主要区别在于“痛”与“不痛”,于是朱震亨根据风痹病的这一特点,为风痹病取了另外一个名字——痛风,并在《格致余论》中专门论述。他说:“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也就是说痛风主要是热人突然受寒而得,所以在治法上应该是“以辛热之剂流散寒湿,开发腠理,其血得行,与气相和”这样疾病自然就痊愈了。当然在大前提确定的条件下,治疗时还是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辨证施治。如东阳县有一个叫傅文的人,年纪 60 多岁,平时勤劳而性急,患两腿疼痛,不能活动,一动更加疼痛。朱震亨诊断之后,说是虚症,应当用补血温血治法,于是给他用四物汤加桃仁、陈皮、牛膝、生甘草,煎时再放一些生姜,将潜行散研末,用药冲服。30 多帖后,腿疼痊愈。还有朱家的一个主妇,年纪 30 余岁,喜食厚味,性格

急躁,患痛风,四肢痠挛萎缩了几个月,屢治不好,于是请朱震亨治疗。朱震亨看了之后,说她是挟痰与气症,应该用和血、疏气、导痰的方法,就在潜行散中加入生甘草、牛膝、炒枳壳、通草、陈皮、桃仁、姜汁等药,服用几个月之后,四肢伸缩自如,身体完全恢复。朱震亨的一个邻居,名叫鲍六,20余岁,因患血痢,服用涩药止痢。谁知痢疾好后又患了痛风,整日痛哭号叫,声闻四邻。朱震亨给他诊断以后,说是恶血侵入经络的缘故,因为热血受凉,时间长了必然凝浊,排泄不尽,留于隧道,所以作痛。如果时间长了不治,恐怕成为偏枯。于是给他以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牛膝、黄芩、陈皮、生甘草,煎入生姜,将潜行散研碎加入少量的酒饮用。几十帖以后又在委中穴施以针灸,出了好多黑血,鲍六的疾病就痊愈了^①。

而在痿症的治疗上,朱震亨特别强调“断不可作风治而用风药”,因为痿症患病的主要原因是热,然后又有湿热、湿痰、气虚、血虚、淤血等等,所以在治疗上也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湿热导致的痿症可用李东垣的健步丸加苍术、黄芩、黄柏、牛膝等燥湿降阴火的药物,湿痰导致的痿可用二陈汤加苍术、白术、黄芩、黄柏、竹沥、姜汁等药物,气虚导致的痿用四君子汤加黄芩、黄柏、苍术之类的药物,血虚导致的痿可用四物汤加黄柏、苍术等药物,煎好后冲服补阴丸。还有因为食积、死血妨碍不得下降者,也大多是属于热症,可用参术四物汤和黄柏之类的药物^②。60岁的郑安人有次患了痿症,脉缓,两足发软,朱震亨给他用了半夏麻白术汤、酒黄芩等药,服药以后,不长时间郑安人的病症

① 皆见《格致余论·痛风论》。

② (明)戴原礼辑录《金匱钩玄》卷二《痿》、(明)程充校订《丹溪心法》卷四《痿》。

就消失了^①。

由于朱震亨的努力,人们对痛风和痿症的概念彻底明确,以后的医书都把两者分开论述,一般在治疗上就很少由于误诊而出现差错了。

对妇科疾病的治疗

朱震亨在临床实践中,也很重视对妇科疾病的治疗。他将妇科疾病分为经血、白带、不孕、怀胎分娩等四大类,在此基础上又细分为经水、血崩、带下赤白、子嗣、产前胎动、恶阻、束胎、安胎、胎漏、子肿、难产、产后血晕、泄、恶露不尽、中风、发热发寒等16门,并在《格致余论》中专门撰写了《胎自堕论》、《难产论》、《难产胞损淋漓论》、《胎妇转胞病论》、《乳硬论》、《受胎论》、《经水或紫或黑论》等有关妇科疾病的文章。

月经是妇女很重要的生理现象,妇科的很多病都和月经失调有关,所以朱震亨把月经放在妇科病的首位,对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月经过期而疼是虚中有热,所以作疼,过期是因为血少。治疗可用川芎、当归、人参、白术,再加治痰之药。过期血呈紫黑色并有块者,是血热,肯定会痛,治疗用四物汤加黄连、香附。过期血色淡是痰多,治疗用二陈汤加川芎、当归。时间正常但血色紫而成块者,也是血热,治疗用四物汤加黄连之类。痰多占住血海,行经时目必渐昏,身体肥胖者尤其如此。治疗宜用南星、苍术、香附、川芎,作丸服。身体肥胖,行经提前者是痰多血虚有热,治疗用南星、苍术、香附、川芎、黄连、白术,若血枯经闭者,四物汤加桃仁、红花。

如有一个妇女,40余岁,平时月经不调,行经时腹痛不止,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一七《痿》。

经后又又有三四天淋漓不止。平时口渴面黄,倦怠无力。朱震亨给她用了白术一两、归身尾六钱、陈皮七钱、黄连三钱、木通二钱、生芪、黄芩各二钱、炙甘草一钱,分作8帖,每次饭前冲服五灵脂丸40粒,服完之后,症状消失。

还有一个20岁左右的妇女,体形肥实,胃中痞满不食。有时饮稀粥一碗,饭后必吐酸水半碗,然后仍然卧床不起,月经不通已经3个多月。朱震亨诊断后分析可能和生气有关,就先向病人家属询问,知道果然是“乘怒饮食”而致。于是以白术一两半、厚朴、黄连、枳实各一两,半夏、茯苓、陈皮、山楂、人参、滑石各八钱,砂仁、香附、桃仁各半两,红花二钱,分作10帖,每日服1帖,每入姜汁少许,隔3日再用神祐丸和神秘沉香丸微下之,过了12天,吐止,渐进食。40日以后各种症状消失,身体完全恢复^①。

血崩是妇科的一大疾病,对妇女健康影响极大,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导致失血过多,就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所以朱震亨提出,如血崩突发,可以先治其标,用白芷汤调百草霜先行止血,再作其他治疗。情况严重者,将棕榈皮烧成灰,后用四物汤加干姜调理,病情稳定后再治其本。因为过劳而导致血崩的,用参、芪带升补药,因为受寒而血崩的加干姜,因受热而血崩的加黄芩、参、黄芪。

如有一位妇女,30余岁,堕胎以后血流不止,胸中痞满,情绪烦躁,不思饮食。朱震亨诊脉以后,觉其“脉沉大而数,重取微弦”,认为是怒气伤肝,又影响到胃气,就以二陈汤加川芎、白术、砂仁,服用20帖以后停止出血,其他症状也逐渐消失^②。

① 以上两例见江瓘《名医类案》卷一一《经水》。

②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一一《崩漏》。

白带也是妇科的一大病症，有赤、白二色，色赤和血有关，色白和气有关。无论是色赤色白，治疗都应先以燥湿为先。妇女带下的原因是胃中积痰流下渗入膀胱，应该用升的方法。肥人多是湿痰，用海石、半夏、南星、苍术、川芎、椿皮、黄柏等。瘦人一般少带病，如果有就是血热，用黄柏、滑石、川芎、椿皮、海石等。情况严重者，用吐法以提其气，下用二陈汤加苍术、白术，制丸服用。

还有人说带色赤、白均属热，是出于大肠小肠之分，可用黄荆子炒焦为末，米饮汤下。既治白带也可治心痛。

罗知悌当年治疗白带时曾用过十枣汤、神祐丸、玉烛散等，朱震亨认为这些方法都可以施用，但不可峻攻，实者可用此法，虚者则不宜。

治疗白带也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血虚者用加减四物汤，气虚者可适当加参、术、陈皮，湿甚者用固肠丸，相火动者于诸药中加少量炒柏，滑者加龙骨赤石脂，滞者加葵花，性燥者加黄连，天气寒冷的季节可以加少量的生姜、附子等等。总之是要随机应变，不可拘泥一方。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凡患有白带症，都必须断绝厚味，保持饮食清淡。

转胞是妇女在怀孕期间的一种病症，如果治疗不当，或是得不到及时纠正，就会导致难产，有时甚至危及产妇和婴儿两条生命。所以朱震亨在治疗转胞症方面，一直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有一次，一位年龄40的妇女怀孕后患了转胞症，3日小便不下，病人双足肿胀，形容憔悴，左手脉象稍和，而右手脉象却濡。朱震亨根据脉象分析认为，这肯定是饱食伤胎，系胎弱不能自举，导致胎儿下坠，压迫膀胱，偏在一边，“气急为其所闭，所以水窍不能出也”。在治法上应当采取补血养气的方法，血气一正，系胎自举，这种状况就会得到改变了。于是他给病人用了

参、术、归尾、芍药、带白陈皮、炙甘草、半夏、生姜等药物，浓煎服4帖，任其叫号。第二天早上，又以4帖的药渣合为一起，煎服后一次服下。然后以指探喉使吐，呕吐之后，小便大通，便下全是黑水。最后仍然用这个方子加大腹皮、炒枳壳、青葱叶、砂仁等，分为20帖让其服用，以防产前产后之虚。以后这个产妇果然一直平安无事，分娩以后也是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①。

朱震亨认为，妇女在怀孕期间患转胞症，一般都是体质孱弱，情绪忧闷急躁，或是喜食厚味所致。古代的治法一般都是用滑利疏导之药，很少有收到成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认真分析转胞的原因，不应该一味以古方为是。

妇女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其间辛苦万分，也伴有许多疾病。除上面所说的转胞症以外，还有胎动、胎位不正、难产、产后后遗症等等，朱震亨对之都进行了一一的分析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治疗方法。

如胎动须固胎、安胎，分别用地黄半钱，人参、白芍各一钱，白术一钱半，川芎、归身尾各一钱半，陈皮一钱，甘草二钱，糯米14粒，黄连和黄柏各少量，桑上羊儿藤（须7叶完整者），以上药物咀嚼后煎汤服用。

安胎用白术、黄芩、炒面，熬粥为丸。黄芩安胎，乃上中二焦药，能降火下行，缩砂安胎止痛，是因其能行气的原因。益母草即茺蔚子，能治产前产后各种病症，如行血、养血、难产等。

难产是因为在怀孕八九个月内，行为不谨慎，导致气血双虚。还有的是因为气血凝滞，所以胎儿不能转运。

催生可用白芷灰、滑石、百草霜，将以上3种药物研为末，用芎归汤或姜汁调和服用。

^①（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一一《转胞》。

妇女怀孕分娩难,产后照样有很多疾病,不能掉以轻心。朱震亨于此也给予密切的注意,提出了许多治疗妇女产后疾病的治法:

治疗产后胎衣不下,可用妇人大全方。

治疗产后血晕、虚火载血、渐渐晕来等症,可用鹿角烧灰,出火毒,研为极细之末,用好酒调和灌下,即醒,行血极快也。还可以用韭叶细切,盛于有嘴瓶中,以热醋沃之,急封其口,以嘴塞产妇鼻中,亦可治疗产后眩晕。

治疗产后体虚用人参、白术各二钱,黄芩、陈皮、川芎各半钱,归身尾半钱、甘草(炙)一钱,有热加生姜三钱、茯苓一钱。产后体虚一定要首先大补气血,这时如果还有其他疾病,也要放在次要地位。

治疗产后血块用滑石三钱、没药一钱、麒麟竭一钱,无麒麟竭则用牡丹皮代替,以上药物研为末,用醋调和作丸服用。又有瓦龙子,也能消产后血块。

治疗恶露不尽小腹作痛,用五灵脂、香附末、蛤粉,醋丸(用醋和成丸),情况严重者加桃仁(不去尖)。如恶血不下,可以五灵脂为末,神曲糊丸,白术、陈皮汤冲服。

产后中风,千万不可当作平常中风治疗,不可服用小续命汤,必须大补气血,然后治痰。应当从两手的脉象上分清气血多少,然后施治,口眼喎斜也不可服用小续命汤。

产后发热恶寒都和气血有关,治疗时当分辨清楚,左手脉不足,补血药多于补气药,右手脉不足,补气药多于补血药。恶寒发热腹满者,应当除去恶血。产后不可下白芍,以其酸寒,伐生发之气故也。产后一切病,皆不可发散^①。

^① 以上皆见《金匱钩玄》卷三《妇人科》。

一位年轻的产妇,分娩时难产,折腾了7天婴儿方生出,然后又是大泄,口渴不止,气喘脸红,脸上起紫斑,小腹胀痛,小便不通,情况十分严重。朱震亨细心地分析了病情,给她用了牛膝、桃仁、当归、木通、滑石、甘草、白术、陈皮、茯苓、红花等药物,煎汤调益母膏服用,没有明显效果。后来又将杜牛膝煎成浓汤,饮了满满一碗。到一更天的时候,小便大利,便血一桶,病情好转,不久痊愈^①。

还有一位妇女,产后患乳痈,朱震亨用“香白芷、连翘、甘草节、当归须、赤芍、青皮、荆芥穗各半两,贝母、花粉、桔梗各一钱,瓜蒌半个”作一帖,水煎,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服用,让患者细细呷之。如果有热,加柴胡、黄芩,忌酒肉、椒料;另外用南星、寒水石、皂角、贝母、白芷、草乌、大黄等7味药研末用醋调和成膏,用鹅翎敷于肿痛之处,这样内服和外敷相结合,病人的症状很快消失^②。

朱震亨特别强调的是产后的一些病不能和治疗寻常人的病用一样的方法,应考虑到产妇的特殊性,产后一切病,都不可发散,这是治疗产后病症必须要时时注意的。

对于患不孕症的妇女,朱震亨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说:体形肥胖患不孕症的妇女是身上的脂肪太多,闭塞子宫,所以月经不行,治疗时可用导痰汤之类的药物;而体形瘦怯患不孕症的妇女,一般是子宫无血或血少,精气不能聚集,所以不能怀孕,治疗时可用四物汤等养血养阴之类的药物^③。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三四《产后淤滞》。

②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三五《产后病乳》。

③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三二《求子》。

对儿科疾病的治疗

在多年的行医实践中,朱震亨对儿科疾病也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和造诣。除在《慈幼论》和《痘疮陈氏方论》中有专门论述外,在《金匱钩玄·小儿科》中又将儿科分为吐泻黄疸、急慢惊风、疳病、痘疮、腹胀、夜啼、口糜、脱囊肿大、脱肛、木舌、瘾疹、嗜红、吃泥、痢疾、解颅、蛔虫、口噤、风痰、癩头、赤瘤、鼻赤等 21 门,每门的治法都做了详细的说明。

如治疗小儿吐泻黄疸,可用三棱、莪术、陈皮、青皮、神曲、麦芽、甘草、白术、茯苓、黄连等。将以上药物研成细末,用水调服。因乳积吐泻者加山楂,因时气吐泻者加滑石,发热者加薄荷。

小儿急慢惊风一般有发热、口疮、手心伏热、痰热、痰喘、痰嗽等症,可用通常的治疗方法,病症严重则用瓜蒂散,病症较轻则用苦参和赤小豆末,用酸藿汁调和服用,使吐,然后用通圣散蜜丸服之。惊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热痰主急惊,当直接用泻法;另一种是脾虚,乃为慢惊,患之多不可救,当养脾、补脾,使逐渐恢复。

治疗小儿腹胀用萝卜子(蒸)、紫苏梗、陈皮、干姜各等分,甘草减半。食量减少者加白术煎服。

治疗小儿夜啼用人参一钱半、黄连一钱半(姜汁炒)、甘草半钱、竹叶 20 片,分为 2 帖,加姜一片,煎服。

治疗小儿口糜用江茶、粉草涂抹。还可以用苦参、黄丹、五倍子、青黛各等分,研末制膏搽之。

小儿脱囊肿大下坠,治法可用木通、甘草、黄连、当归、黄芩等煎服;脱囊用紫苏叶为末,用水调成膏状敷之,用荷叶裹住,不使垂下。

小儿木舌即舌头肿硬不软,说话口齿不清,可用百草霜、滑

石、芒硝为末，用酒调敷。

小儿吃泥是胃热所致，用软石膏、甘草、黄芩、陈皮、茯苓、白术等，水煎服。

小儿痢疾多因食积所致，用黄芩、黄连、陈皮、甘草，水煎服。如果痢疾色赤加红花、桃仁，色白加滑石末。

明代的江瓘在《名医类案》中记载了两例朱震亨治疗幼儿胎毒的案例，从中可见朱震亨在治疗幼儿疾病方面的高深造诣。

有一个儿童2岁的时候，忽然满头生疮，过了几天，头疮又全部平复，但又患了痰喘之症，且精神昏倦，十分严重，有的医生主张用解利之药，家里人不放心，又请朱震亨再确认一下。朱震亨先询问了母亲平时的饮食爱好，家属说她一直喜欢吃辛辣食物，朱震亨又看看幼儿的病症，认为幼儿患的是胎毒，不能用解利药，于是他用了人参、连翘、黄连、生甘草、陈皮、川芎、白芍、木通等药，浓煎，再加入竹沥让其服用，几个月之后，小孩病情痊愈。

还有一个妇女，形瘦性急，本身有热，怀孕3个月的时候，正是夏天，经常口渴思水，时常发发小热，朱震亨让她用四物汤加黄芩、陈皮、生甘草、木通等煎服，持续时间稍长一些。结果她只服用了几次，就嫌麻烦没有坚持。后来生了儿子，其子2岁的时候，忽然满身疮斑，过了几天，疮斑平复而又转为疟疾。朱震亨认为这也是一种胎毒，如果当时坚持服一段时间药，将体内的热毒清理干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①。

^① 以上两例皆见《名医类案》卷一二《胎毒》。

第十章

流风余韵 天地永存

理学是医学的指导思想,医学是理学的具体实践,理学和医学的结合,在朱震亨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而丹溪学的形成及丹溪学派的不断发展壮大,使朱震亨的医学思想成为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朱震亨医界宗师的地位得到确认。正因为如此,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朱震亨依然是念念不忘,敬仰有加。朱氏流风余韵,当与天地共存。

援理入医 以医言理

朱震亨医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援理入医,以医言理,使理学和医学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体。所以尽管他是以医出名,但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还是把他列入《北山四先生学案》之中,对他的理学造诣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的成功首先是理学上的成就,而其医学成就则是在理学思想指导之下的成就,这应该是言之有理的。

从青年时期的“任侠仗义”到后来的“归于纯粹”,其转折点是在师从许谦,接受其“开明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的教育之后,而许谦之学则来源于朱熹的再传门人金履祥,当时的浙江金华,朱子之学经过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的传承之后,成

为浙东理学的重镇。而许谦在传承朱子之学上又起到了其他三人未能起到的作用,正如史籍所记载的那样“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适”^①。“自圣贤不作,师道久废。宋初学者有师,始于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业于海陵,号称能以师法终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圣学以淑诸人,朱子又溯流穷源折衷群言而统一其归,使学者有所据以从事,由是师道大备。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传于其高第文肃黄公,而文宪王公于文定则师友之,金先生又学于文宪而及登文定之门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学者推原统绪,必以三先生为朱子之世。适先生出于三先生之乡,而克任其承传之重,遭逢圣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学,卒以大显于世。然则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矣”^②。在朱子理学的传承上,许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浙东学派中理学造诣极深的学者。而朱震亨作为许谦的高第弟子、得意门生,正是从许谦那里得到理学的真谛,又转而以之作为医学的指导思想,援理入医,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朱震亨援理入医的一些主要做法,在他的医学思想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一,“格物致知”和《格致余论》。《格致余论》是朱震亨最重要的医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朱震亨的医学思想,也是他援理入医的最丰硕的成果。朱震亨从事医学的初衷,就是以理学的核心思想“格物致知”为指导思想,来实践其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达到兼济天下苍生的抱负。关于“格物致知”,朱

①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一·许谦传》。

② (元)黄潘:《文献集》卷八下《白云许先生墓志铭》。

子的解释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①。这里的“形而下”指具体的器物，“形而上”指抽象的道理。为了说明问题，朱熹还举了两个极为普通的例子。一个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扇子，他说扇子本身是具体的器物，是形而下的范畴，但就是因为这个扇子，也就有了如何制作和使用扇子的道理，这就是形而上的道。而天地之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很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而这些形而下之器又都有各自的运行活动规律，这规律就是形而上的道。通过具体的器物来穷究其内在的规律，就是“格物致知”的最本质含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②。许谦在理学上完全继承和发挥了朱熹的学说，并且更强调心的认识作用，他说：“《大学》教人以格物致知为始，是《大学》用功起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此正是格物用功处。但只把致格两事统说在里，推极我之心知，在穷究事物之理。格物之理，所以推致我之心知。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穷究，格来格去，忽然贯通。”^③

以上朱熹和许谦等人对“格物致知”的诠释，对朱震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自从师从许谦接触理学之后，也是勤学苦读，在格物致知上苦下工夫，他“日有所悟，心旖融廓”。并在为人处世方面处处以理学为宗。立志学医后，理学也自然成为他医学实践的指导思想，处处以格物致知为是。如最初从医时，他对金代名医张从正所倡导的“攻击”疗法甚为崇拜，对张子和所言的

①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二《中庸一·纲领》。

② (宋)朱熹：《二程遗书》卷二五《畅潜道本》。

③ (元)许谦：《读四书丛说》卷一《传五章》。

“正气不能自病,为邪所客,所以为病也。邪去正气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浅之不同,立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的说法极为赞赏,以为“医之法尽于是矣”。后来又想到《内经》中有“谓之虚者,精气虚也;谓之实者,邪气实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气之虚,然后邪得而客之。苟正气实,邪无自入之理”的记载,正好和张子 and 的说法相矛盾,不觉对张子和的说法产生疑义。后来他又精心钻研《内经》和仲景之学,对《内经》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和张仲景“病当汗解,诊其尺脉,濡当与黄芪健中汤补之,然后汗之”的有关记载反复思考,认定张子和的“攻击”疗法肯定有所缺陷。虽然已经意识到张子和治法上的缺陷,但尚未能彻底明白其根源所在。直到在定城读到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和李东垣的方稿,才知道张子和的说法确实有些孟浪。后来,在师从罗知悌的过程中,目睹了罗知悌对四川病僧治疗的全过程,认识到对病人采取“汗”、“吐”、“下”等治疗方法时,一定要在病人禀质壮实的基础上施行,否则不仅收不到应有的效果,还会使病人元气大伤,甚至导致死亡。于是他又针对张子和“攻击论”的不足写了《张子和攻击注论》的文章。以后在治疗过程中,在对病人施用汗、吐、下之法时,都是先考察病人的禀质,然后对症下药,既收到理想的疗效,又能使病人很好地恢复。

如永康吕汲和朱震亨有亲戚之好,平时形瘦色黑,喜欢喝酒,在生活上也不是很检点,年过半百,还在外面蓄有别室。有一天,突然大寒发战,口渴不止但却不想喝水。朱震亨给他诊脉以后,感到他的脉象“大而弱,惟右关稍实略数,重取则濡”。认定他是因酒发热,体内郁气不能发泄,是表热而不是虚症。就用“黄芪一物,以干葛汤煎与之。尽黄芪二两,干葛一两”。病人服用之后大汗不止,“次早即安”。再如叶仪之病,叶仪所患为滞下

后甚逼迫,应该用承气汤下之。但朱震亨看到叶仪的胃已经十分虚弱,怕贸然用承气汤会使他元气大伤,于是先用参、术、陈皮、芍药等药物补充胃气,尽管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仍坚持不已。3日之后,胃气稍微充足,然后用承气汤下之,仅服用了两剂就转危为安^①。在以上的治疗中,朱震亨正是在对罗知悌治病方法和过程的详细观察中,在对一个一个具体病例的分析中,认识和掌握了一些疾病的根本规律,然后在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加以灵活应用。对张子和的攻击之法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盲目照搬,而是针对病人的实际,有选择、有变革地应用,在不同病情的病人身上都收到良好的疗效。

又如他通过对母亲的护理和奉养,总结出老年人养生一些重要做法。通过对儿童痘疮的治疗,总结出治疗痘疮的经验,对陈师文、裴宗元治疗痘疮方法的纠正等等,都是建立在格物致知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他在医学实践中一直以格物致知作为医学的基本思想,才能使他具有一般医生所不具备的理论思维,因此也就有了一般医生所不具备的理论上的成就和实践上的成功。这也是他比一般医生的高明之处。正因为如此,朱震亨将自己第一部医学著作定名为《格致余论》,应该是大有深意的。

其二,《局方发挥》和宋儒疑经辩经的精神。《局方发挥》是朱震亨又一部重要医学著作,是对北宋政府颁布的在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的官方医书的质疑和挑战。朱震亨的这种精神和勇气,也是他接受理学大家疑经辩经精神、援理入医的结果。宋代是一个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学者的疑古考辨之风颇为盛行的时代,各种对圣贤之书质疑辨析的著作纷至沓来。如北宋庆历时期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敞所著的《七经小传》对汉儒奉为经典的

^① (元)朱震亨:《格致余论·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

《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等7部经书,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考证注释,打破了自汉代以来的专事训诂名物的汉学习气,开始了以己意解经的新风。探求道德性命的“义理之学”,自此流行。要创新经义,便要批判旧经。于是这一时期,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开始了对旧的经书意义的质疑批判。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曾撰文著述,对《春秋》、《诗》、《书》、《孟子》等提出质疑,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连经书都敢于直接议论,更不必说传注了。朱熹作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两宋时期的疑古疑经风潮中自然也不肯落后,他对汉儒造成的经文错乱现象深为不满,专门撰写了《周易本义》、《诗经集传》、《诗序》、《孝经刊误》等著作进行考证辨疑,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朱熹的再传弟子,也是朱震亨三世祖师的王柏继承了朱熹的传统,在精究理学过程中对儒家经典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说:“《诗》三百五篇,岂尽夫子之旧?汉初诸儒,各出所记足之。夫子所删,容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者。”于是以《二南》(《周南》、《召南》)各有11篇,使两两相配。退《何彼秣矣》、《甘棠》于《王风》,而削去《野有死麇》。他还认为《诗经》中有关“郑、卫淫奔诸诗,皆所当删也”^①。他还说:对于圣人的典籍,本来是不该怀疑的,但是经过秦末兵火,典籍散乱,原典多不存,汉儒除了以自己手中所有的书籍补足其数外,还以自己的意志去解释经典,使经典出现了歧义。为了正本清源,他还撰著了《书疑》、《诗辨说》、《读春秋记》、《论语衍义》等专门对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解释,以图恢复圣人之旧。

自宋迄元,尽管学术界的疑古疑经思想已经成为潮流,但在

^①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文宪王鲁斋先生柏》。

医学界却反响甚微。当时在北方,刘完素等人已经对医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见解,但影响不大。而在南方仍是《局方》的一统天下。朱震亨接受了先师的影响,把疑古疑经的精神大胆运用于医学之中,首先是展开对《局方》的怀疑和批判。《局方发挥》的问世,吹响了医界革命的号角,使沉寂多年的医学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不同流派的医学思想纷纷展露,开展相互间的辨析和争论,以至于人们把《局方发挥》作为“医之门户分于宋元”的标志。

除了对《局方》进行质疑批判外,朱震亨还对医界先贤著作的内容提出了辨析,表明自己的观点。如张仲景一向是他尊崇的医界先贤,仲景之书一向被朱震亨奉为圭臬,但他却从不迷信,而是在实践中随时应变。他说:“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然犹设为问难,药作何应,处以何法。”^①对张仲景的《伤寒论》他也是极力推崇的,但仍然写了《伤寒辨疑》辩证其中一些不确切的地方。据戴良《丹溪翁传》记载:金陵医生罗成之到义乌拜访朱震亨,罗成之自以为精通仲景之学,于是和朱震亨就此展开讨论,但朱震亨却对此别有看法。他说现在所见张仲景的医书,已不是仲景的原书,是收拾于残编断简之余,“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编次之脱落,或义例之乖舛”,所以朱震亨说他每次读张仲景书中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有疑惑之处,并当面指出了几条有疑义的地方,但罗成之对此却置之一笑,不以为然。正当两人在看法上相持不下的时候,正好遇一阴虚发热的病人,罗成之根据以往的经验,认定病人所患的是伤寒,但朱震亨却给他服用了益阴补血之剂,仅用3天就痊愈了。罗成之对此大为叹服,他说,如

^① (元)朱震亨:《局方发挥》。

果让他诊断的话,肯定会按照伤寒治疗的,那样岂不是要贻误病情吗?自此以后,罗成之对朱震亨十分佩服,虚心向他学习,领悟并掌握了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后来张士诚占据江南的时候,患了痰气怔忡之症,很多名医束手无策。张士诚听说罗成之精通丹溪医法,派人迎请。罗成之运用了朱震亨的“倒仓法”,使张士诚的病得以痊愈^①。

此外,朱震亨还有《外科精要发挥》,对宋代陈自明的《外科精要》进行考证补充,《本草衍义补遗》对宋代寇宗奭的《本草衍义》进行补充完善,在《格致余论·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辩》中对唐代王冰对《内经》的标点和注释提出质疑,指出其错误所在及其对医家的误导等等。这些也都贯穿了朱震亨一贯的思想,这就是不迷信、不盲从,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应用。

其三,“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参以太极之理”。“太极”是哲学术语,被视为派生万物的本原。《易·系辞上》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宋代理学奠基人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对上述说法又加以发挥,云:“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②和周敦颐同时代的理学家邵雍和张载也对“太极”按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释。邵雍认为“心为太极”,“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③。张载认为“一物两体,气也”;“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欤”^④。到了南宋,朱熹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二—《痰》。

② (宋)周敦颐:《周元公集》卷一《太极图说》。

③ (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一四《观物外篇》。

④ (宋)张载:《横渠易说》卷三《系辞上》。

则对周敦颐等人对“太极”的诠释进行了改造,认为“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①。元代许谦弘扬朱子之学,对其说又有发挥,其云:“太极理也,阴阳气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则形稟是气,而理具于气中,析而言之,则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无别。……太极之中本有阴阳,其动者为阳,静者为阴,生则俱生,非可以先后言也。”^②这样,自宋迄元,“太极”即“理”,“理”即“气”,“气”又分为“阴阳”,可以发育万物,就成为理学家对太极的一个全新的理解。而朱震亨正是在理学的熏陶下,将“太极”的这一道理引用到医学之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医学见解,创造了全新的医学理论的。其“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理论的创立就是“参以太极之理”的直接成果。

在《相火论》中,朱震亨开宗明义就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因为“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所以人体的这种“动”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寻常人体中这种“动”的主宰者,不是其他,“皆相火之为也”。所以说相火是人的生命之火,不可或缺。但这种“动”又应该保持在一定的“度”的控制之中,不动或动之不够,生命就没有活力。而动之太过,则会“煎熬真阴”,真阴受到煎熬,就会病及人体,“阴虚则病,阴绝则死”。要使相火不妄动,就要清心静欲,节制各种欲望,善于养生。

① (宋)黎靖德整理:《御纂朱子全书》卷四九《理气一》。

② (元)许谦:《白云集》卷四《答或人问》。

“阳有余阴不足论”是朱震亨“参以太极之理”所创立的又一医学理论,他说:“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天地阴阳之气对应到人的身上成为气血,是人体生存必须具备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缺一不可。两者平衡,则身体健康,否则就会患病。但人天生就是“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为什么呢?朱震亨曾以自然界的天地、日月和人体的生殖功能做对比,他说天为阳,地主阴,天在地之上,所以天比地大;日为阳,月主阴,日恒圆无缺,月有圆缺,所以日比月大。这样主阳的天和日比主阴的地和月大,阳和阴相比,当然是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了。再以人而比况,男主阳,女主阴,男子16岁而精通,64岁而精绝,有48年的精通时间,女子14岁而经行,49岁而经断,仅有35年的经行时间。男女相比之下,更是阳有余而阴不足了。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保障,而阴缺阳余就会导致百病丛生。正因为如此,朱震亨在医学著述中,多次提醒人们要保护阴精,毋使之煎熬受损,以保障身体的健康。

其四,“人心听命于道心”与茹淡节欲的养生观。“人心”和“道心”也是理学家所着力讨论的一个内容。所谓“人心”即指人欲,“道心”即指天理。两宋之交的理学家张九成曾说:“夫天下无一物之非理,亦无一物之非仁。有己则理暗,无己则理明。己者何也?人欲也。礼者何也?天理也。灭天理,穷人欲,何由而得仁?灭人欲,尽天理,于是乃为仁。”^①南宋朱熹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②到了元代,朱震

① (宋)张九成:《横浦集》卷一九《杂著》。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学六》。

亨的老师许谦在两宋理学的基础上对“天理”、“人欲”之说又有发挥,相对于两宋理学家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许谦的说法更易为人接受。他对“天理”、“人欲”的解释是:“理与气合而生人心,为一身之主宰。……人心发于气,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道心发于理,如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是也。……谓之道,则是天理之公;谓之人,则是我身之私。……大抵人心可善可恶,道心全善而无恶。人心是所欲为之事,道心是发应事之理。人心听命于道心,只是事皆顺理耳。”^①

朱震亨是许谦的学生,对许谦对“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的理解心领神会,自觉地将之引入自己的医学理论中去,针对“天理”、“人欲”的命题,提出“茹淡”、“节欲”的养生观。具体体现在《格致余论》中的《饮食箴》、《茹淡论》、《色欲箴》中。

《饮食箴》中朱震亨说道:人的身体是父母所恩赐,饮食是为了身体发育成长的需要,但很多人因为贪图美味,纵口无度,导致身体患病,不但不能报恩于父母,反而给父母带来不尽的忧愁。正因为如此,朱震亨在《茹淡论》中强调人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一定要注意饮食的摄入。一般应以自然冲和的谷菽菜果为主,因为这些东西有食人补阴之功,这也就是《内经》所谓的“味”,但人们往往在烹调的时候偏爱厚重之味,使本来有“食人补阴之功”的东西产生了“致疾伤命之毒”,长期食用厚重之味,身体当然要受到影响了。所以在饮食上“安于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为安者,欲之纵、火之胜也”。他又引用《内经》“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赋之味乎?阴之五官,伤在五味,非人为之味乎”之言,谆谆告诫人们为了自身身体的健康,一定要注意茹淡食素。朱震亨不光是诲人以理,自己也是身体

^① (元)许谦:《读四书丛说》卷二《中庸丛说》。

力行,宋濂《石表辞》说他“居室垣墉,敦尚俭朴;服御唯大布宽衣,仅取蔽体;藜羹糗饭,安之如八珍”。即使在富豪大姓家中赴宴,面对宴席上琳琅满目的山珍海味,他也是“正襟默坐,未尝下箸”,他的清修苦节“能为人之所不能为,而于世上所悦者,淡然无所嗜”。年过70岁以后,朱震亨对自己的饮食又作了调整,“尽鄙盐醯”(减少盐和醋),身体不但没有受影响,反而是“神茂而色泽”。这也是朱震亨自己对“茹淡”养生最好的理解和实践。

在《色欲箴》中,他说人的生育繁衍和天地的道理是一样的,“坤道成女,乾道成男;配为夫妇,生育攸寄;血气方刚,惟其时矣。成之以时,接之以时,父子之亲,其要在兹”,男女相亲,阴阳结合,是人类繁衍生息和人们正常的生理需要,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或缺的。但是有些人不明白人体之中气阳血阴,“阴平阳秘,我体长春”的道理,纵欲无度,使得阴亏阳燥,身虚致病。如朱震亨曾经治疗过一个病人,其症状“咳嗽、恶寒、胸痞、口干、心口痛,脉浮紧而数,左大于右,盖表盛里虚”,就是因为平时“素嗜酒肉,有积。后因行房涉寒、冒雨、忍饥,继以饱食”而引发的疾病^①。所以古人一般是年尽三十、二十而婚嫁,以保证体内的阴精不要过早地损耗。其中的善于养生者,都是对男女性交之事非常注意,在一年中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尽量不要同房。在一月中的月缺之时也尽量不同房。还有在气候恶劣、情绪低沉的时候,也都要尽量避免房事,因为这些时候进行房事活动,往往就会由于气候、身体、情绪等各方面的不适,而对身体带来影响。

戴良说朱震亨学医时,能对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三家的医学思想及理论“去其短而用其长,又复参以太极之理,《易》、

^① (明)陈楠:《石山医案附录·辨明医杂著忌用参蓍论》。

《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①。所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学风格，出现了很多独创的医学理论。应该说，戴良对朱震亨的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薪火相传 源远流长

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深远，源远流长，这主要表现在丹溪学派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壮大上。

丹溪学派形成之前，北方医学界已有河间、易水之争，河间学派以刘完素为代表，以善治火热病而著名，其医学思想主要是根据北方气候燥热的特点，而主张用寒凉之药，被后世称为寒凉派。刘完素的弟子有黄大穆、荆山浮屠、马宗素等。荆山浮屠传之于罗知悌，罗知悌传之于朱震亨。比刘完素略迟的张从正是刘完素医学主张的积极拥护者，并在刘氏“寒凉”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张从正认为人体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邪气的侵入，所以要治疗疾病，就必须攻击邪气。邪气不作，人体自然安康。在具体治疗上，他采用了“汗”、“吐”、“下”三种攻击邪气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攻邪派”。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其于“五运六气”亦极有研究，但和刘完素的学说又有不同之处。他不是以“亢害承制”为研究运气的中心，而是以其盛衰变化来分析病理反应和研究治疗方法，以脏腑寒热虚实的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张元素的弟子有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其中李杲继承乃师的医学学说而又有所创新，是为该流派的中流砥柱。李杲在张元素“脏腑议病”观点的启发下，别开蹊径，根据《素问》“土者万物生”的理论，创立了“脾胃论”学说，他认为脾胃之病，多由于虚损所致。因此，在病因方面，尤其重视内伤，在临床诊

^①（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〇《丹溪翁传》。

治中,也多运用补中、升阳、益气等方法,最后发展成为“补土”一派。

这样,在朱震亨之前,北方医学界就已经有了河间、易水两大学派和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邪派”和李杲的“补土派”三个大家。

朱震亨比上述三大家晚出,他虽是刘完素的三传弟子,但又不完全继承刘完素的学说,而是以《素问》为本,以《伤寒论》为宗,然后对刘、张、李三家之说认真钻研,精深领会,吸取三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思想和临床治疗特点——以阳有余阴不足和相火论为其理论基础,以保护阴精、保护正气为主要的治疗手段。朱震亨的这一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得到后世医家的普遍认可,被称之为“丹溪学派”。

河间和易水学派虽然在医学发展史上都有一定影响,但比起丹溪学派,却相形见绌。刘时觉在对丹溪学派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将其特点总结为“人数众多,地域广泛”,“地位显赫,人显言重”,“素质精良,著作众多”,“生逢其时,社会安定”,“影响深远,启肇学术”等五点,这些都是河间、易水两个学派所不具备的,所以在丹溪学派形成以后,以无比迅速的发展速度,很快超过它之前的河间、易水学派,成为当时医学界的主要流派。

朱震亨医学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主要继承、弘扬者是朱震亨为数众多的弟子,他们也是丹溪学派队伍的主要组成人员。

丹溪学派的成员们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一是亲自接受朱震亨教诲的入室弟子,如赵道震、赵良本、赵良仁、戴士尧、戴思恭、戴思乐、戴思温、朱玉汝、朱嗣汜、张翼、王履、楼英、徐彦纯、刘叔渊、虞诚斋、楼厘、贾思诚、程常和无师徒之名却有师徒之实的王顺等。

二是没有亲自聆听朱震亨教诲、由朱震亨弟子们教授的弟

子和弟子的弟子,如赵友亨、赵友同、李肃、夏建中、陈有戒、俞仕朝、李萇、仰瞻、朱文樛、朱宗善、冯彦章、袁宝、蒋用文、蒋主善、王彬、王彦昭、楼宗起、楼宗望、祝仲宁、王宾、盛寅、韩叔旻、王观、李懋、盛宏、盛僕、盛伦、盛恺、刘毓、王伯承、沈仲实、沈承先、许湛、陶浩、刘纯、王天荫、王经等。

三是朱震亨的私淑者,如虞抟、王纶(入室弟子鲍恒斋、私淑弟子薛巳)、汪机(弟子周臣、许忠)、王世相等,^①人数众多,难以一一列举。

以上朱震亨的弟子们人数众多,分布于全国各地,活跃于元、明两代300年左右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中医学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刘时觉先生通过对朱震亨弟子们的系统考察,把他们的活动时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大体时间为元仁宗延祐七年至明成祖永乐三年(1320—1405),从朱震亨立志于医至戴原礼逝世止。这一阶段主要以朱震亨及其入室弟子的医事活动为中心,以朱震亨的医学著作《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匱钩玄》、《本草衍义补遗》为标志,其主要的历史贡献在于《局方发挥》的问世打破了《局方》一统天下的局面,活跃了医学界的风气,促进了江南医学的发展。第二阶段从明成祖永乐三年到明英宗正统六年(1405—1441),从盛寅担任太医院使到逝世,以朱震亨的再传和三传弟子的医事活动为中心。第三阶段从明英宗正统七年到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42—1481),以朱震亨的私淑弟子杨珣、王季璠、程充等人整理编撰各种版本的《丹溪心法》为标志。这一时期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和理论通过他们的宣传和实践已经深

^① 刘时觉:《丹溪学研究》第二章《弟子和学派》;(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九《橘泉翁传》及其他相关资料。

入人心,诸多版本的《丹溪心法》的出现,标志着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和理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四阶段是从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到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482—1539),从程充《丹溪心法》成到汪机去世。这一时期仍是以朱震亨私淑弟子王纶、虞抟、汪机等人的医事活动为中心。这一划分标准符合丹溪学派活动的实际,因而是比较客观的。本书将以此为线索进行论述。

朱震亨去世不久,元朝灭亡,明朝建立,他的弟子们开始由乡村走向城市,由江南走向全国,使得朱震亨医学思想和理论的影响迅速扩大。其中最典型的当推早期从朱震亨学医的戴思恭。

戴思恭,字原礼,浦江人。从小受家庭熏陶,精于儒业,后又和父亲戴士尧一起从朱震亨学医,受到朱震亨的赏识和器重。在从朱震亨学习期间,“其用心也笃,故造理为特精;其传授有要,故察证无不中”^①。洪武初年,戴思恭被征召入朝,担任御医,因给燕王朱棣治病灵验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特蒙恩宠。太孙朱允炆即位后,擢为太医院使。永乐初年,思恭以年老请求回乡,得到恩准。永乐三年(1405)夏,思恭以82岁的高龄,又被成祖召入朝廷,受到优厚的待遇。十一月,又请求归乡,朝廷赠与金帛,又派官员专门护送,回家后不久去世。戴思恭为朱震亨诸多弟子中的佼佼者 and 得力助手,朱震亨在世时,他的医名已经著于大江南北。后到京师,又受到各界人士的看重,王公贵戚争相延致。平民百姓,有求必应。直至最后受到皇帝礼遇,位居太医院使之职。戴思恭是朱震亨医学思想和理论的忠实宣传者和实践者,他终生对老师充满敬意,在行医过程中,他对朱震亨的医学实践不断进行总结,整理订正了朱震亨的《金匱钩玄》,还根据

^① (明)宋濂:《文宪集》卷八《送戴原礼还浦阳序》。

朱震亨的思想和实践撰著了《证治要诀》、《证治类元》、《证类用药》等书。可以说,戴思恭的一生,都在一心一意地体会、运用、总结、实践、宣传朱震亨的医学思想,使丹溪学派的影响不断扩大。明人李濂在评价戴思恭对朱震亨医学思想和医学理论的贡献时说:“学贵渊源,道须传授。是故师心自是者术必疏,宗非其人者业斯谬。矧医之为道也,以人命死生为寄而可以苟简草率为哉?原礼之学,得诸朱震亨彦修。而彦修之学,得诸武林罗太无。罗太无得诸荆山浮屠氏,而浮屠氏则刘河间守真之门人也。守真之学实得之于《内经》,寥寥千百年而钱仲阳氏首发其秘,金元之刘、张、李三子益阐其说。丹溪崛起大江之南,又统会而斟酌之,原礼乃其高第弟子也。笃志精思,百发百中,是故声闻四驰,大显其术于本朝,哀然为名医称首。”^①

戴思恭之前,朱震亨和他的弟子们的活动主要是在乡间,地域也仅限于江南。从戴原礼任太医院使开始,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和理论才得以从民间到官方、从江南到全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说戴原礼在继承、传播、弘扬朱震亨思想和理论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洪武四年(1371)朱震亨的入室弟子王履被任命为朱元璋第二个儿子秦王朱棣府良医,随秦王居住于西安秦王府,这是朱震亨医学思想在关中流传的开始。王履,字安道,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也是朱震亨的得意弟子,其最大的成就是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重新进行整理,在对《伤寒论》进行重新整理的同时,王履又“极论内外伤经旨异同,并中风、中暑之辨”,撰成《医经溯洄集》两卷,共21篇,纪晓岚称其“其间阐发明切者,如亢则害承,乃制及四气所伤,皆前人所未及。他若温病热病之分,三阴

^① (明)李濂:《戴思恭传》,见《明文海》卷四一七《传》。

寒热之辨,以及泻南补北诸论,尤确有所见”^①。《医经溯洄集》虽然谈不上是鸿篇巨制之作,但它作为流传至今王履唯一的医学著作,其意义不可低估。

据《明史》记载,除整理《伤寒论》和著《医经溯洄集》以外,王履还著有《百病钩玄》20卷、《医韵统》100卷,均为“医家宗之”的医学经典,惜今不传。此外,王履还“工诗文,兼善绘事”,曾经游览西岳华山之巅,“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②。王履不光是在继承和弘扬朱震亨医学思想和主张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是朱震亨医学思想在关中地区传播的第一人。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震亨的再传弟子刘纯迁居西北,在甘州居住20余年。使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在西北得以广泛流传。刘纯是朱震亨弟子刘叔渊之子,曾和朱震亨的入室弟子徐彦纯一起编辑了医学著作《玉机微义》,至今流传于世,为中国中医药史上的重要著作。

丹溪学派第一时期的医学活动影响深远,成就斐然,著述众多,为丹溪学派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朱震亨的三传弟子盛寅继戴原礼之后出任太医院使,开始了丹溪学派活动的第二阶段。

盛寅,字启东,吴江(今江苏省的最南端,地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的交界处)人,是戴思恭弟子王宾的弟子,为朱震亨三传弟子。盛寅是明成祖永乐初年继戴原礼之后担任太医院使的,在此之前曾因治蛊病有奇效而闻名。据《明史》记载,盛寅在江南行医的时候,有一个从朝廷派往江南的太监患有腹胀之病,

① (清)纪晓岚:《医经溯洄集提要》,见《四库全书·子部五·医家类》。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九九《方伎列传·王履传》。

经盛寅治疗后痊愈。永乐初年盛寅为医学正科,曾因事坐累到天寿山服劳役,当时有一个监工的官员,对盛寅的才能十分赏识,让他负责工地上的书算之事。正好当年被他治好的太监看见了,十分惊讶,说他怎么能在工地上当书算官呢。然后这位太监告诉他,说成祖身边的一个太监患了蛊症,已经濒于死亡,希望盛寅能给他诊治。这位太监服用了盛寅的药,病情很快痊愈,又开始了正常侍奉活动。当成祖看到这位太监又出现在身边的时候,十分惊异地说: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又活了?于是这位太监说了盛寅治病的经过,成祖大为赏识,立即下旨召盛寅入宫担任御医。成祖之后,仁宗即位,盛寅任南京太医院使。宣宗即位,仍召盛寅回北京太医院任职,直至正统六年(1441)去世。盛寅在南、北两京太医院任职时,曾以自己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所以在他逝世以后,南、北两京的太医院都为他立祠祭祀。

盛寅的弟弟盛宏、儿子盛僕、侄子盛伦、孙子盛恺、弟子李懋、刘毓都是盛寅的弟子,也都是当时的名医,李懋在明宪宗成化年间也在太医院任职^①。

和盛寅同时在太医院任职的还有朱震亨的再传弟子袁宝和蒋用文。

袁宝,湖北蕲春(今湖北省蕲春县)人,蒋用文,江苏仪真(今江苏省仪征市)人,两人同于永乐年间在太医院任职。袁宝洪武中随父进京,被选为乐舞生,以学习舞乐为事。朱棣为燕王时,戴原礼被召入京,袁宝奉旨从戴原礼学医,“后从入金华山中,往

^① 以上盛寅事迹见(明)王鏊《姑苏志》卷五六《人物》、《明史》卷二九九《盛寅列传》。

来十余年，遂得丹溪朱彦修之传”^①。成祖即位后，授太医院判，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十二日逝世，时年62岁。蒋用文“洪武中，始受荐入太医院，时朱彦修弟子戴原礼为院使，擅其术，人无不有其意者。见用文，喜曰：‘君儒而为医，昌吾道必矣。’遂言于上，授御医，永乐八年升院判”^②。其在为医过程中，“主李明之、朱彦修，不执古方，而究病所本，自为方”^③。蒋用文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一日去世，和袁宝前后相差3个月。蒋用文去世后，其长子蒋主善继其任，又被任命为太医院判，继续在太医院任职。

在盛寅、袁宝、蒋用文等人在太医院任职的同时，朱震亨的入室弟子赵道震和再传弟子赵友同也同时在京师任职。赵道震在戴原礼去世后的次年，即永乐四年（1406）被征召入京，参加《永乐大典》的修撰，主持其中的“五运六气”部分，书成之后，仍回到家乡以医为业。著有《伤寒类证》，行于当世^④。赵友同永乐初任太医院御医，又从夏原吉到浙西治水，后又担任《永乐大典》的副总裁，参与修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书成之后，当迁翰林，以母丧守制在家去世^⑤。

明代前期，朱震亨医学思想和理论在京师占主要地位的同时，江南民间以朱震亨再传弟子王宾为主的医学活动也十分活跃。

王宾，字仲光，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生幼颖悟，有志

①（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三二《赠太医院使袁君墓表》。

②（明）陈继：《蒋用文传》，见程敏政编《明文衡》卷六一《传》。

③（明）杨士奇：《东里集》卷一六《赠奉议大夫太医院使谥恭靖蒋公墓表》。

④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七一《人物志》。

⑤（明）王鏊：《姑苏志》卷五三《人物十三》；杨士奇：《东里集》卷一八《御医赵彦如墓志铭》。

周孔之道”，7岁入乡学，将冠，“自唐虞三代以降，至于秦、汉、唐、宋及元，上下数百十年间，其中圣经贤传、诸子百家、阴阳历数、山海图志、兵政刑律，与夫稗官小说之书，悉皆览而传记间，无所不知者”；“于医学尤精，用药多神效”。王宾医德高尚，经常是“布衣、芒屨、竹杖”，行走于市井之间，“里巷人贫者及方外人来求医者，即趋往诊视，施与药饵，一不望其报”。性至孝，父早丧，母在堂，王宾侍奉母亲，竭尽孝道，“每日饭必亲煮，羹必亲调，冬寒则温其衾席，夏热则凉其枕簟；日侍左右，不敢远游”^①。王宾学医，最初从戴原礼，以钻研《内经》为主，后又从原礼处得到朱震亨《医按》10卷，用心揣摩，得其真谛，遂以医著名。王宾的医事活动主要在江南苏松一带，和北方京师戴原礼等人的医事活动遥相呼应。王宾终生未娶，临终时以其医术尽传之于盛寅，盛寅又被召去京师，继戴原礼之后继续活跃在国家最高医府，把丹溪学派第二阶段的医事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一阶段丹溪学派的医事活动主要是以实践为主，没有什么特别有分量的医学著作，但南、北两地的朱震亨弟子们的医事活动都非常活跃，取得的实践成果也非常卓著，引起世人关注，为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在全国的普及和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英宗正统七年到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42—1481），是朱震亨的私淑弟子们活动比较活跃的一个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杨珣、王季璪、程充等人整理编撰的各种版本的《丹溪心法》问世。

杨珣，字楚玉，明代西安府长安县（今西安市）人，曾以医名召入太医院任职，后授武功县医学训科，“诊治殊验，所著有《伤

^① 皆见（明）姚广孝《王宾传》，见（明）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四〇《坟墓》。

寒撮要》、《针灸详说》,行于世”^①。《明史》卷九八《艺文志三》亦著录有杨珣《针灸详说》2卷。杨珣私淑朱震亨,于景泰年间刊刻《丹溪心法类集》,流行于陕西一带,是朱震亨医学思想在西北流传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王季璣事迹不详,程充但云“成化初,王季璣附方重梓(《丹溪心法》)于西蜀,志欲广布海内,使家传人颂,不罹夭枉,其用心仁矣”^②。王季璣刊刻的《丹溪心法》流行于四川一带,使朱震亨医学思想在西南广为人知。

作为朱震亨的私淑弟子,杨珣、王季璣的名声并不是太大,但他们的做法使得朱震亨的医学思想、理论及其临床经验在偏僻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得以传播,功莫大焉。

程充,字用光,安徽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生于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闰八月二十八日,卒于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十月八日,从小“天性极开爽,少学于家庭,即知厌口耳之习。思以古人为师,业《春秋》,将出与士角,以亲老弃去。兼业医及星筮、堪舆、数学,悉得肯綮。然所论必主理,从学者日众”^③。“世业儒而好医,其读《素(问)》、《难(经)》、之书甚稔,最喜朱子之说,尝以《丹溪心法》有川、陕二本,妄为世医所增附,深惧上有累于朱氏,乃为之彪分胪列,厘其误而去其复,以还其旧。凡朱氏之有别见者,则以类入之”^④。这说明,程充所修订的《丹溪心法》是在杨、王二家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了杨珣

① (明)康海:《武功县志》卷二《官师志第五》。

② (明)程充:《丹溪先生心法序》,见浙江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校、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之《丹溪医集》本。

③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五《程用光墓志铭》。

④ (明)程敏政:《丹溪心法序》,见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校、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之《丹溪医集》本。

的陕本和王季璠的蜀本,所以程充所修订的《丹溪心法》就被医学界称之为徽本,在3种《丹溪心法》中影响最大。

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到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482—1539),是丹溪学派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其具体内容仍是以朱震亨私淑弟子王纶、虞抟、汪机等人的医事活动为中心。

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浙江慈溪人,约生于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卒于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历任礼部郎中、广东参政、湖广右布政使等。正德中(1506—1521)以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年轻时,曾因父病钻研医学,以后虽在仕途,但仍未中断,政事之余常为人治病。《明史》说他“所在治疾,无不立效”,著有《本草集要》8卷、《明医杂著》6卷,行于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四《医家类》除有上述两种外,还著录有王纶《节斋小儿医书》(无卷数)。王纶的治学主张“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在医理上以《内经》为主,推崇《内经》如儒道之“六经”,并受张仲景及金元四家学说影响,对后世医家有一定影响。王纶于内伤杂病的辨治具有丰富的经验,其治疗方法推崇李东垣、朱震亨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如他有一次治疗一位妇女,这位妇女患胎漏,忽然血崩,眩晕不止。先饮了一点童便,苏醒过来,过一小会又晕。又连忙服用荆芥,也是随醒随晕。服用止血止晕之药,总不见效。接着又呕吐不止。王纶以为是童便和药汁积于胸膈,就用手探其喉,吐出了一碗多药渣、饮食等物。又慢慢询问,知道她是饭后因事生气,怒气动胎,过了一会就血崩不止。于是王纶想到这位妇女是因为在胃气不行的情况下饱食过度,食物不能运化,形成积滞严重,引起血崩,而血崩又有伤胃气,使之更加虚弱;胃气愈虚,消化功能愈差。这样恶性循环,往复不止,当然要血崩、眩晕不止了。于是他采取了调理脾胃的治法,用白术五钱,陈皮、麦芽

各二钱,煎服一帖,晕止;再服,血崩止。接下来就专门调理脾胃,脾胃恢复以后,又加血药服之,病情痊愈。王纶的这种治疗方法和朱震亨“治病必求其本”的思路完全一致,如果不问清楚病人得病的根源,而“专用血崩血晕之药岂不误哉”^①?

王纶虽然没有像戴原礼、盛寅他们那样在太医院任职,但他官居高位,而钟情于医,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弘扬朱震亨医学思想和理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虞抟,字天民,生于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卒于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义乌人。虞抟的曾祖虞诚斋和朱震亨生于同时,是朱震亨的入室弟子,其后以医有名。他的后代也以医为业,并且都是以朱震亨的医学思想为宗。虞抟生而颖异,先习举子业,博览群书,以文词有名。后因母病学医,对《素问》、《难经》精心钻研,“以朱震亨为宗,而参以张机、孙思邈、李杲诸家之说”^②,又得到父亲、兄长的耳提面命,于是医术大进。《名医类案》曾记载这样一例虞抟治疗皮肤皴裂的病例:“虞天民之仲兄年四十五岁,平生瘦弱血少。深秋得燥症,皮肤坼裂,手足枯燥,搔之屑起,血出痛楚,十指中厚皮而莫能搔痒。虞制一方,名生血润肤饮。用归、芪、生熟地、天麦二门冬、五味子、片苓、栝葵仁、桃仁、泥酒、红花、升麻,煎服十数帖,其病如脱”^③。《续名医类案》载“虞天民治一男子四十岁,因感风湿得白虎历节风症,遍身抽掣疼痛,足不能履地者三年,百方不效。身体羸瘦骨立,自分必死。以四物汤加木通服,不效。后以木通二两,锉细,长流水煎汁,顿服。服后一时许,遍身痒甚,上体发红丹,如小豆大

①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一—《经水》。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五《子部十五·医家类存目·(虞抟)医学正传》。

③ (明)江瓘:《名医类案》卷七《皮肤皴裂》。

粒,举家惊惶,随手没去,出汗至腰而止,上体不痛矣。次日又如前煎服,下体又发红丹,方出汗至足底,汗干后通身舒畅而无痛矣。一月后人壮气复,步履如初。后以此法治数人皆验”^①。虞抟私淑朱震亨,但又能对朱震亨的学说有所发挥。如朱震亨提出不以古方治今病,虞抟不仅赞同执行,还反对迷信鬼神之说,认为所谓的“鬼胎”完全是一种骗人的假话,不可据信。巫师和巫婆治病也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不能相信。朱震亨提倡“茹淡”、“节欲”的养生方法,虞抟则以“节嗜欲、戒性气、慎语言、谨服食”作为养生之要义,使朱震亨的养生学说更加全面。虞抟还受朱震亨“相火论”的启发,提出“两肾总号为命门”、“命门为两肾之中枢”之说,被医学界认为的论。

因为虞抟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又和朱震亨同为义乌人,所以《金华府志》记载说:“义乌以医闻名者,代不乏人。丹溪之后,唯虞抟为最。”^② 虞抟居住的地方为义乌花溪,朱震亨住丹溪,近代上海丹溪学社的创办者陈无咎住义乌黄溪,于是义乌人称他们为“义乌三溪”,以为义乌的骄傲。

汪机,字省之,号石山居士,生于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卒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安徽祁门(今安徽省祁门县)人,家中世代行医,祖父汪轮、父亲汪渭均为当代名医。汪机少年时期攻读经史,后因母亲长期患病转而学医。他努力钻研诸家医学经典,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医术日精,很快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治愈了母亲长期头痛呕吐的疾病,且“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明史·方伎列传》把他和当时的名医张颐、李可大、缪希雍并称,说“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

① (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一七《痛痹》。

② 以上虞抟事迹皆见康熙《金华府志》卷二二《方技》。

皆精通医术 ,治病多奇中”^①。被誉为明代医学“四大家”之一 ,徽州新安医学流派的奠基人之一。汪机行医 ,非常注重医德 ,即使在享有盛名以后 ,依然是病家随请随到 ,自己安守穷庐 ,布衣蔬食 ,但对病人却尽心竭力 ,常常免费为穷苦人诊治。汪机一生精研医理 ,以朱震亨《丹溪心法》为本 ,对朱震亨的学说多所继承、发挥。如他曾和其门人陈楠订正刊刻了戴原礼的《推求师意》,“以溯震亨 ,故其持论多主丹溪之法”。但他继承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和理论 ,又能灵活运用 ,不拘泥于一方之偏。他反对有人将朱震亨的思想和学说教条化而不知变通 ,使其他人对朱震亨的医学主张产生疑义。他批评这些人说 :“徒泥陈言 ,而不知变 ,乌足以言 ?”^② 所以他在承继朱震亨学术思想的同时 ,又能发展朱震亨的医学理论 ,纠正后人对朱震亨的误解。汪机一生著述较多 ,有《素问抄》3 卷、《续素问抄》9 卷、《重集脉诀刊误》2 卷、《医学原理》(无卷数)、《针灸问对》2 卷、《伤寒选录》(无卷数)、《外科理例》8 卷、《痘疹理解》2 卷、《运气易览》3 卷^③。除上述外 ,汪机的门人陈楠又收集了汪机临床实践中许多成功的病例 ,编撰《石山医案》一书 ,收入汪机医论 3 篇及诸多医案 ,是新安学派重要的医学论著之一。

除上述外 ,这一阶段还有朱震亨的私淑弟子卢和编撰《丹溪先生医书纂要》,方广编撰《丹溪心法附余》,亦可称为丹溪学派活动中的大事。

王纶、虞抟、汪机之后 ,仍有一些朱震亨的私淑弟子的医事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九九《方伎列传·缪希雍传》。

② 见镜山散人李汛彦夫所著之《石山居士传》,载(明)陈楠《石山医案附录》。

③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四《医家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五《子部十五·医家类存目》。

活动,但距朱震亨时代已经很远,只能作为丹溪学派活动的余波。经过朱震亨众多弟子们的努力,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和理论已经成为中国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丹溪学说已经有机地融合于整个中国医学学术之中,而丹溪学派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同样有机地融合于整个中医学界之中了”^①。

清末民初,义乌黄溪年轻学者陈无咎(1884—1948)师从东阳周庠、永嘉徐定超学习医学,并运用生理解剖原理去解释《内经》、《难经》等典籍理论。他在行医实践中,反对“墨守古方,强符今病”,临床诊治,坚持“按脉探理,因时辨方”,一切从患者及病因的实际出发,所以他为人诊病,往往收到奇效,药到病除。陈无咎学医本朱丹溪之滋阴说,但他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在丹溪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可谓渊博弘深,酌古通今。他崇尚家乡先贤朱震亨和虞抟的医德和医术,时刻以他们为榜样,重实学而不务虚名,在朱震亨和虞抟之后,把义乌中医推上了又一高峰。

1915年,陈无咎到杭州为人治病。本年冬天,又应友人之邀到上海行医,由于他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医名大噪于东南。1919年,陈无咎曾奉孙中山先生之召来到广东,先后担任浙江省长公署咨询顾问、护法浙江军总司令行营机要秘书、鄂东靖国军参赞军务兼秘书长、驻粤代表等职。在护法运动期间奉孙中山之命,在浙江招兵讨伐直系军阀孙传芳。

作为学者和医生,陈无咎对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深恶痛绝,不久即辞官归里,于1921年到上海行医,并创办“丹溪学社”,从事医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当时和他交往的多是爱国名流或有道大儒,如沈钧儒、邵力子、于右任、胡汉民、田桐、经亨颐、张宗祥等,他们对他的医德医术佩服不已,纷纷题词赞颂,如

^① 刘时觉:《丹溪学研究》第二章《弟子和学派》。

于右任为陈无咎的著作题词为“丹溪正传”，田桐赞他“学贯中西”，沈钧儒题赠“尽见五藏”，经亨颐题为“苏沈风流”。就连深谙医道的张宗祥细读陈的著作后，也认为这是“寿世之言”，予以高度评价。

1925年，陈无咎拒绝军阀的邀聘，在上海创办了我国早期的中医学校——“汉医学院”，并任“丹溪医科学社二十代总教”，努力培养中医人才，弘扬中华医学。

1938年，陈无咎出任上海丹溪大学校长，接受名誉医学博士学位，国民政府特授七级嘉禾勋章，奖给“保卫桑梓”匾额。

关于上海“丹溪学社”的创办时间，林乾良先生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发表文章专门对“丹溪学社”进行介绍，他以1924年上海丹溪学社出版的陈无咎《医垒》（第二辑）为证，认为上海“丹溪学社”创办时间应在此之前^①。

上世纪90年代，在义乌市中医学会的发起下，成立了朱丹溪学术思想研究的学术团体，1982年10月，“浙江省第一次丹溪学说学术研讨会”在义乌召开，与会学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和研究资料。1983年6月，“第二次朱丹溪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太平县召开，主要讨论了朱震亨的学术思想和证治方药在临床上的应用。1992年10月，“浙江省第三次丹溪学术交流会”又在朱震亨的故乡义乌召开，代表们对朱震亨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相火论”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著名丹溪学研究者林乾良先生提出建立“丹溪学”的倡议，受到与会学者的赞同，以后，林乾良又先后撰写《丹溪学的建立》、《丹溪学精要》等文，使丹溪学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系统化。

2000年10月，国际丹溪中医药论坛首次会议在丹溪陵园召

^① 林乾良：《丹溪学简介》，《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开,香港国际丹溪中医药研究会会长冷云南题词纪念,其云:“金元时代,是中国医学领域开展学术争鸣极为活跃的时期,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各派学术争鸣的局面。朱丹溪是金元四大家中最为晚出的一家,是中国医学史上有杰出贡献的医学家。他精研岐黄,继承河间学说,吸取从正、东垣之长,融汇新知,求实创新,以临床实践为基础,著书立说,独树一帜,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了空前的突破。其门人众多,在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深远,他的滋阴降火理论,结束了前此单一模式以热药补肾观点,并为后世温病学形成奠定了基石。他精通医术各科,阐明了气血痰郁等病机(称四伤学说),丰富发展了临床医学的内容,其学术思想远播日本。他倡导的四伤学说在日本演变为气血水学说,成为日本汉医病因学支柱。为了开展对丹溪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广泛交流丹溪学术思想的新经验、新发展、新成果,特举办‘国际丹溪中医药论坛首次会议’”^①。以后国家和浙江省还数次召开朱丹溪学术思想学术研讨会,使朱丹溪学术思想研究不断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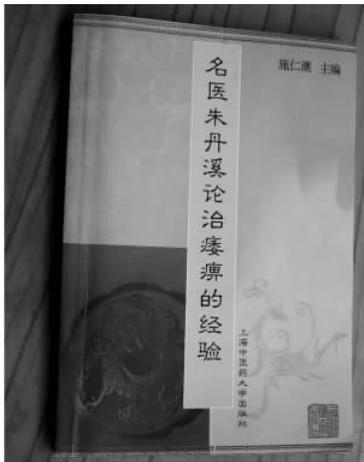
在这一系列学术活动的推动下,国内出现了一批质量颇高的有关朱震亨研究的学术成果:2001年2月,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施仁潮主编,施仁潮、王英、竹剑平、盛增秀、江凌圳编写的《名医朱丹溪论治痿痹的经验》,该书“抓



国际丹溪中医药论坛
李强拍摄

^① 朱丹溪陵园内“国际丹溪中医药论坛首次会议”石刻。

住了能反映朱丹溪特色经验而历史上多混同的痿痹,总结其论治痿症、痹症的规律,介绍其特色经验在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类风湿关节炎等痿痹相关病症中的应用,剖析了丹溪论治思想形成与确立的历史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①,是研究朱震亨临床经验的重要参考书,也是中医药院校学生的重要读物。



《名醫朱丹溪論治痿痹的經驗》

资料来源：(施仁潮等)《名醫朱丹溪論治痿痹的經驗》 李强拍摄

200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时觉、林乾良、杨观虎的《丹溪学研究》,该书以38万字的篇幅“对朱丹溪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对其在医学理论研究、临证医疗经验总结、创新性贡献的分析研究,学说、学派的传承等等,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有系统的论述”^②,是目前所见研究朱震亨最全面的成果。

此外,还有迄今为止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朱震亨研究的文章约100篇左右,从各个方面对朱震亨的医学思想、理论、实践进行研究和分析,为今日中医药学的发展和临床实践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借鉴,其中以冯汉龙、刘时觉、方春阳等人的成果最为突出。

不仅国内对丹溪学的研究非常重视,国际医学界对朱震亨

① 施仁潮等:《名醫朱丹溪論治痿痹的經驗》內容簡介。

② 李经纬:《丹溪學研究序》。

的医学思想和学说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5 世纪初,日本医生月湖曾在中国钱塘学医、行医,著有《类证辨异全》、《济阴方》等书,其医学思想完全源于朱震亨的私淑弟子虞抟。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月湖的学生田代三喜又来华学习中医中药学。当时正是中国医学界研究“金元四大家”理论的高潮,田代三喜最崇尚李东垣、朱丹溪的学说,对之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回国之后,在日本大力倡导李、朱学说,并建立丹溪学社,使得李、朱学说在日本医学界广为流传,并形成了著名的后世学派。

关于丹溪学说在日本的影响,又见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云:“朱丹溪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对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于 15 世纪成立‘丹溪学社’,继承和发扬其学术成就。”^①日本医学博士细川方萤在其《日本传统医学历程·后世派医学之祖——田代三喜》(室町、安土桃山时代——金元医学与道三)中也说:“长享元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公元 1487 年) 22 岁的三喜远渡明国,向居住在钱塘的月湖先生学习在当时被认为天下医学的宗主——金元医学,明应七年(明孝宗弘治



《丹溪学研究》

资料来源:(刘时觉等)《丹溪学研究》 李强拍摄

^①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数字博物馆中外医学交流第三展厅、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四册。

十一年,公元1498年)携带《全九集》等方书回到日本,前后长达12年之久。当时中国医学正处于学术争鸣的时期。三喜的师傅月湖因其所著的《全生集》与丹溪派名医虞抟的《医学正传》很相似,因此可认为月湖的学术思想源于虞抟。虞抟除宗丹溪外,尚折中仲景、孙思邈、东垣等诸家的学术思想。由于当时的日本医学主要模仿宋代医学,《和剂局方》在日本全国处于统治地位,而三喜能抛开《局方》,传播虞抟及李(东垣)与朱(丹溪)的学说,使中国医家的学术争鸣风气也波及日本,开创了新的医学流派。”在另外一篇著作《日医的困惑》中也有“后世派的代表人物曲直濑道三(田代三喜的学生),在学术思想上,他以《内经》为根本,以朱丹(溪)等元朝汉医学家的学说为主导,博取各家之长。……他们注意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对中医药学在日本的全面传播,对中医药学的日本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等论述^①。

大体说来,丹溪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首先应肇始于月湖,发展于田代三喜,弘扬于曲直濑道三,在他们3人的共同努力下,当时朱震亨的学说几乎是遍及日本,引领日本医学潮流达数百年之久。

《杭州志·卫生篇》云:“被称之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创中医滋阴学派的朱丹溪,师承杭州名医罗知悌。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杭州中医陈义都赴日,把朱丹溪学说介绍给日本医界,以后日本遂有丹溪学社的组织。”尽管丹溪学说在日本传播的途径有不同说法,但其在日本的影响是不容否定的。

明清时期,人们以朱震亨和金代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作为其时医学界不同流派的杰出代表,称之为“金元四大家”。今

^① 以上所引细川方萤的两篇文章,均来自“百草庭”网站。

天,人们又将朱震亨和先秦时期的扁鹊,汉代的张仲景,三国时期的华佗,魏晋时期的皇甫谧、葛洪,唐代的孙思邈,宋代的钱乙,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并称为“华夏十大名医”,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他们的事迹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流风余韵 天地永存

虽然朱震亨时代距今已有 800 年左右,但人们对他的纪念活动却从未停止。

朱震亨的家乡义乌县,原来就有祭祀朱震亨祖先朱汛和朱礼的二朱祠,朱震亨逝世之后,又专门修了“朱丹溪祠”,四时祭祀^①,以表示人们对这位名医的怀念和尊重。到了明代,义乌县所隶属的上一级政区金华府也为朱震亨设祠祭祀,并在祭祀典礼上把他和当时著名的大儒黄潛、吴师道、张枢、柳贯并列,以示尊崇。《元史·许谦传》中许谦的弟子仅列名朱震亨一人,言其为许谦之“高第弟子也。其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将他列于《北山四先生学案》中。清代魏源《元史新编》,《艺术》类中仅收李俊民、朱震亨两人,均属成就卓著、品德高洁之人。如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学,金承安中(1196—1200)以经义举进士第一,授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归。以所学授乡里,有不远千里来者。其于理学渊源,冥搜隐索,片字只言,务有根据”。深为元世祖器重,多次征召而不出。逝世之后,谥为“庄靖先生”。其记载朱震亨“天资爽朗,读书即了大义。闻同郡许谦之学,抠衣至门事之,谦

① 嘉庆《义乌县志》卷七《坛庙》。

②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一·许谦传》。

为开明圣贤大旨，震亨心解，抑其豪迈，归于纯粹，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其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士，所至人多化之。……治病多奇效，尝著《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外科精要》、《本草衍义补遗》、《丹溪心法》诸书行世，学者称“丹溪先生”^①。明代的《名医类案》、清代的《续名医类案》收录了许多朱震亨行医治病的案例，明清时期的许多名医在他们的医学著述中也对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和实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深入的研究，朱震亨的名字事迹赖文献的记载而得以世代流传，永垂青史。

朱震亨之墓在义乌市赤岸村东朱山郭头庵，当时修墓之时，朱震亨的次子朱玉汝曾遵从父亲的遗嘱，将父母、兄长葬在一处，还为自己和妻子预留了墓地，全家人葬在一起。并在距墓地不远处修庵，题为“孝友庵”，以供后人洒扫祭祀之用。明成化十一年（1475）朱震亨墓被豪强所侵，县内中书舍人王汶赋诗呈县令吴仲珠，诗云：“丹溪声誉古今闻，道学当年受白云。著述自成千古业，尊崇谁护百年坟？一丘夺去迷荒草，孤鹤归来怨落殒。正果孰云今不遇，贤侯慷慨为斯文。”吴仲珠读诗之后，颇有感触，遂对朱震亨坟墓进行了修复。次年正月竣工，朱震亨坟墓恢复旧观。坟墓修好后，吴仲珠又以文致祭：“先生以纯正之学，发而为葩藻之文。俊登桂籍，志遂青云。乃薄于仕，竟业于医；岐黄独契，神圣其谁？济民仁寿，功泽恢宏，良医良相，宜以并称。呜呼！云山苍苍，高风不磨，世远弥声，仰止者多。”弘治七年（1494），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周木又派遣义乌市吴姓教谕祭奠，其祭文中有“闻墓侵废，曾元告哀，鉴词悲涕，遣祭致诚”之语^②。历明、清两代，孝友庵圯毁。民国23年（1934）东朱村乡民在孝

① 以上李俊民、朱震亨史料见（清）魏源撰《元史新编》卷五三《艺术》。

② 皆见《赤岸朱氏宗谱》，转引自刘时觉《丹溪学研究》第一章《历史》。

友庵遗址旁另修朱丹溪庙,庙内供奉朱震亨塑像,庙后为生产大队所占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丹溪墓被毁,并被集体盗掘。1979年,当地群众又集资另建丹溪墓和丹溪庙。1981年9月丹溪墓竣工,义乌市中医药学会又发起筹建丹溪纪念亭,并组织中医药人员在丹溪墓旁植树,以为纪念。

1992年,义乌市在丹溪墓和丹溪庙的基础上,又集社会各界之力,本着“以医建园,以园宏医”的宗旨集资修建丹溪陵园。现丹溪陵园占地112亩有余,大门为石碑坊,上面大字书写“朱丹溪陵园”五字,庄严肃穆,使人望之仰慕,敬意油然而生。

园内最主要的建筑有丹溪纪念馆和丹溪墓。纪念馆内有1992年12月21日揭幕的朱震亨铜像,像高220厘米,呈坐式,一手按膝,一手执卷,面带微笑,目光和煦,恬淡深远。像前摆满了鲜花,上方有“旷代医宗”四个大字。纪念馆门匾横批为“滋阴大师”,两旁门柱题写着赞颂朱震亨医学思想的楹联:“乔岳雄峙松云万壑能醉月,丹溪长流泉水千钟堪滋阴”,馆内有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接待。

朱震亨墓在纪念馆的左前方不远,为圆形拱顶,朴素大方又不失肃穆,正如朱震亨之品格为人。墓前石碑上所镌刻的“元名医朱丹溪墓”几个大字为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所题,旁边还有一石碑,写有“朱丹溪之墓”,是为标志性建筑。另外还有浙江省人民政府1992年1月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刻标志。



朱丹溪塑像(李强拍摄)



朱丹溪墓(李强拍摄)

1979年当地百姓集资修建的丹溪庙也得到保存,称为“老庙”,位于陵园西南隅。中有天井,副殿墙上有丹溪生平简介,右为药房。

除此之外,园内还有书画馆、鹤望轩、爱仙亭、华丰亭、延年亭、念祖亭、麒麟坛、望塔、百草园、仙井、清仙桥、清心厅、颐寿厅、岁寒三友、滋阴阁(篁园)等。园内树木葱茏,景色幽静肃穆,和朱震亨有关的景物遗迹随处可见。

朱丹溪陵园的建立,恰似一座丰碑,镌刻着朱震亨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记载着朱震亨对祖国医学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黎民百姓的一片赤诚之爱。

为了同时祭奠被称为“义乌三溪”的虞天民和陈无咎,丹溪陵园的设计和建设者特在滋阴阁两边、陵园的一处向阳山坡上,雕塑了“恒德老人”(虞抟)和“黄溪医圣”(陈无咎)塑像,使不同

时代而医学宗旨相通的“义乌三溪”聚居一起，切磋医术，造福后人。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春天，台胞王文仪先生曾三次参观朱丹溪陵园，返台后又与台胞朱遐昌先生等20人，每人各赋诗一首，寄到陵园管理处。陵园管理处负责人朱之江先生特请陵园顾问、名老中医、学者詹瀛生先生为之推敲、润色后，又集资修建了可明廊，将20首诗作镌刻于石碑，成为碑廊，给陵园又添一道风景线。可明廊内的诗作和题词充满了对朱震亨的怀念和敬仰，如杨兴为“朱丹溪陵园”的题词是：“橘井泉香，杏林春暖，陵园露润，丹溪花浓”。朱遐昌的律诗“自古儒医是一家，仁心仁术最堪夸。追求精业行千里，拯救黎民探五车。造福全球人有祀，著书百卷德无涯。同宗同府三生幸，俚句遥呈效献花”。谭建生七绝诗“亘古岐黄无此奇，至今人拜震亨祠。功名度外同尘土，弃却儒冠为习医”等等，充分表达了台湾同胞对朱震亨的敬仰之情。

据丹溪纪念馆李文芝女士介绍，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陵园拜谒求药。每年的清明，前来祭奠的人更多。笔者在丹溪陵园拜谒考察时，就见到好几个来陵园拜谒的人。现园内有工作人员10人左右，都是东朱村的村民，他们的待遇十分微薄，几乎是靠自愿服务。军人出身的退休国家干部朱之江先生更是把自己的余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丹溪陵园的建设和维护。他说朱丹溪是义乌的骄傲，是赤岸的骄傲，更是东朱村人的骄傲，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丹溪陵园的建设和维护奉献自己的力量。我想，丹溪先生如果地下有灵，听见朱之江先生的话，看见东朱村的人民为建设和维护丹溪陵园所做的努力，应该是含笑九泉了。

在浙江省义乌市，有用朱震亨的尊称命名的丹溪路、丹溪大桥、丹溪药房等等。朱震亨因居住丹溪之畔以溪为名被后人敬

重 而丹溪作为一条普通的溪水 ,其名则因朱震亨而得以永恒。
人以溪冠名 ,溪因人永存 ,两两相携 ,相得益彰。

今天 ,朱震亨家乡的乡民们、中国中医药学界的同仁们以及
所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 ,仍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 ,纪念着
自己所敬仰的医界著名历史人物——一代医宗朱震亨 ,让他的
名字与日月同在 ,与天地共存。

置身于朱丹溪陵园 ,徜徉于丹溪路和丹溪大桥 ,流连于丹溪
药房……不觉浮想联翩 ,感慨万千 :一个为历史为人民做了好事
的人 ,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丹溪药房(李强拍摄)

朱震亨大事年表

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1岁

十一月二十八日,朱震亨出生于浙江义乌县赤岸村。父朱元,母戚氏。朱、戚两家在当地均属望族,儒医传家,对朱震亨以后的人生选择影响很大。

《义乌赤岸朱氏宗谱》和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均载丹溪生于“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元辛巳为至元十八年,而该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则为公元1282年1月9日,故如按公历算则应是生于1282年。这里注1281年只是为了和元世祖至元十八年相对应。

1282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2岁

占城既降又叛,元政府在江浙等处征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

1283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 3岁

五月,江南盗贼相继而起,社会动荡不安。

1285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5岁

二月,元政府设置江南行御史台以弥盗。

128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7岁

十一月,有大臣奏: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朝廷下令江南四省大力招捕。

1288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8岁

自幼好学,天资聪敏,读书即了大意。按丹溪祖朱环为乡贡进士,父朱元好学而多病,祖、父两代均对丹溪寄予极大希望,故启蒙学习应从小开始。虽《礼记·曲礼上》谓十岁为幼,但后来幼儿学习大多从七八岁开始,故系于此。

1289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9岁

三月,杨镇龙聚众宁海,号称大兴国,寇东阳、义乌,浙东大震。朝廷令瓮吉带率兵讨伐。四月,禁江南民挟弓矢,犯者籍而为兵。

闰十月,婺州民叶万五率万人寇武义县,杀千户1人,江淮省平章不邻吉带率兵讨伐。以史弼为浙东道宣慰使,讨浙东贼。

十一月,杨镇龙被捕获。朱环为逃亡之奴仆诬陷曾出资资助杨镇龙,史弼怒,必杀之。时朱元病甚,震亨姑朱寿挺身而出,叩法官冯耿贤为父鸣冤,终使全家免遭杀身之祸。

十二月,徙宋赵氏族入于大都,以绝民望。

1290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 10岁

习举子业,日记千言。为声律之赋,刻烛而成,长老咸器之。

三月,杨镇龙余众剽浙东,官府镇压多掳掠良民,计1695人。

五月,浙江永康、东阳、缙云等处吕重二、杨元六等反,浙东宣慰使史弼镇压之。

十二月,命枢密院括江南民间兵器,私藏者籍为兵。

1291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11岁

二月,朝廷派官员到江南理算盐课、酒税者,无不更张变乱,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

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 13岁

二月,严申江南兵器之禁。

四月,命江南毁道观、圣祖天尊祠。

1295年(元元贞元年) 15岁

十月十日,父朱元卒。宗谱载朱元“生宋景定癸亥(南宋理宗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元元贞乙未(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十月十日”。时震亨及其两弟皆幼,尚不能自立,母戚氏上奉公婆,下抚幼子,“时宋亡为元,盗起旁县,焚庐舍剽劫,家单甚。夫人艰勤悲悴,事舅姑无怠容”。时戚氏上有65岁的公公朱环,下有15岁的长子震亨及次子巽亨、三子蒙正。其奉养哺育,皆戚氏一身所承担。

1301年(元大德五年) 21岁

奉母命与朱寿女表姐戚氏成婚。震亨成婚时间,典籍无载,但23岁生长子嗣衍,推测成婚时间当在20—22岁之间,姑系于此。

1302年(元大德六年) 22岁

行侠仗义,因包银之令为民请命。

宋濂云:“包银之令下,州县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间不下数十姓,民莫敢与辨。先生所居里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生,自临之曰:‘此非常法,君不爱头乎?’先生笑曰:‘守为官,头固当惜,民不爱也。此害将毒子孙,必欲多及民,愿倍输吾产当之。’守虽怒,竟不能屈。”

1303年(元大德七年) 23岁

长子嗣衍生。震亨有2子4女,除长子嗣衍生卒年可考外,其他皆不可考。嗣衍早震亨3年而卒,次子玉汝为震亨入室弟子,后以医著名。4女分别嫁于傅似翁、蒋长源、吕文忠、张思忠,事迹不详。又有孙1人,名文楮,亦以医有名。孙女2人,一嫁丁榆,一嫁冯彦章。丁榆事迹不可考,冯彦章为朱玉汝弟子,亦以医名。

1304年(元大德八年) 24岁

弟子赵良本生。宋濂云：“太初子讳良本，字立道。……洪武六年(1373)，太初子卒，年七十。”以此推之，其生年当为本年。

1305年(元大德九年) 25岁

好友葛乾孙生。葛性豪侠，善为医，与朱震亨关系友好，曾共同治病，切磋医术，相交甚欢，其医学深受朱震亨影响。(元)许显《稗史集传》云：“葛乾孙，字可久，平江人。……至正壬辰(至正十二年)徽寇转掠江浙，吴人震恐，乾孙力主坚守，民赖以安。明年癸巳(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与予游开元佛舍。……秋七月沐浴竟，偃然而逝，年四十有九。”据此推算，葛乾生当生于是年。

1307年(元大德十一年) 27岁

江浙一带，水旱相交，百姓饥馑。

八月十九日，弟子戴士尧生。宋濂云：“君讳士尧，其字仲积，婺浦江人。生于大德丁未(大德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卒于至正己丑(元惠宗至正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得年四十有三。”

1308年(元至大元年) 28岁

灾情仍然延续，百姓有因饥饿而死者。六月，瘟疫流行。九月，出现“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的惨象。

1310年(元至大三年) 30岁

母病不愈，因有志于医，始读《素问》。

丹溪自云：“震亨三十岁时，因母之患脾疼，众工束手，由是有志于医，遂取《素问》读之。”

十月十三日，宋濂生。《明史·宋濂传》云：“宋濂(洪武)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其明年(应为十年)致仕，赐《御制文集》及绮帛，问濂年几何，曰：‘六十有八。’……(洪武)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

茂州。其明年(当为洪武十四年),卒于夔,年七十二。”据此推之,宋濂生年当为元武宗至大三年。

1313年(元皇庆二年) 33岁

继续攻读《素问》等医术,学有所得。

从祖朱叔麒卒。叔麒医德人品兼优,对丹溪影响甚大。

十一月,诏行科举。《元史·选举志一》云:“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上奏请行科举以选拔天下贤才。……十一月,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云云。’

1314年(元延祐元年) 34岁

八月,恢复科举制度,举行元朝立国以来首次科举考试。

《元史·选举志》云:“其以皇庆三年八月^①,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

1315年(元延祐二年) 35岁

震亨以己所学,治愈母病。《格致余论》云:“震亨三十岁时,……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病以药而安。”

十二月初八日,弟子赵良仁生。《浦阳赵氏宗谱》谓(良仁)生于延祐乙卯年(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十二月初八日。

1316年(元延祐三年) 36岁

震亨赴八华山,师从许谦学习考亭朱子之学,时许谦47岁。

^① 元仁宗皇庆只有二年,第三年元月起即为延祐元年。此诏书为皇庆二年十一月发布,其时尚无改元之说,故云“皇庆三年”,实际施行时间为延祐元年。

宋濂《石表辞》云：“公（许谦）为开明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先生闻之，自悔昔之沉冥颠隤，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旃融廓，体肤如觉增长。每宵挟册坐至四鼓，潜验默察，必欲见诸实践。抑其疏豪，归于粹夷。理欲之关，诚伪之限，严辨确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胡翰《忆丹溪先生哀辞》云：“（丹溪）年逾三十，更感发为学，从文懿许先生游，讲学八华山中，理义大有得焉。于是向之杰然，一变而为粹然也。”最终成为许谦的高第弟子。

1317年（元延祐四年） 37岁

五月十三日，好友戴良生。《九灵山房集·年谱》载戴良生于元仁宗延祐四年丁巳五月十三日丑时，卒于洪武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八月，震亨乡试失利。

祖父朱环卒。朱环字君玉，号存斋，宋宝祐戊午（南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乡试第二十八名。

1320年（元延祐七年） 40岁

八月，震亨再应乡试，仍不利。于是绝意仕进，立志学医。宋濂《石表辞》云：“岁当宾兴，先生应书秋闱，幸沾一命，以验其所施，再往再不利。”戴良《丹溪翁传》云：“一日，文懿谓曰：‘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翁以母病脾，于医亦粗习。及闻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

又修朱氏祭田，并为之作《记》。

1321年（元至治元年） 41岁

参与修订朱氏宗谱，并为《和西轩公诗》。诗云：“汰为瓦砾筛为糠，多羨幽兰涧谷香。地接桃溪闻北阮，谱传槐里到东阳。

未逢骥驥先求骨，堪作参苓处在囊。棣萼翩翩荆树老，稳教人唤郑公乡。”西轩公诗为：“蝉联槐里世多良，湖海知君姓氏香。谁道少微明午夜，只缘丹凤在朝阳。汪洋性理言盈耳，拯济岐编药在囊。一自东阳传谱后，蒲墟源接义和乡。”

七月，开始为许谦治病，病稍退，略思谷，然两足难移，计无所出。

1322年(元至治二年) 42岁

三月，以“倒仓法”为许谦治病，收奇效，“节节如应，因得为全人”。

1323年(元至治三年) 43岁

六月十二日，妻戚氏卒，享年45岁。宋濂《石表辞》云：“(震亨)娶戚氏，道一书院山长象祖之女，先三十五年卒。”

从子嗣汜生。嗣汜为震亨入室弟子，后以医著名。

1324年(元帝泰定元年) 44岁

弟子戴思恭生。《明史·方伎传》云：“(思恭)永乐初，以年老乞归。三年夏，复征入，免其拜，特召乃进见。其年冬，复乞骸骨，遣官护送，赉金帛，逾月而卒，年八十有二。”以此推之，则思恭生年当为本年。

1325年(元泰定二年) 45岁

震亨千里访求名师，途经定城，始得观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与李东垣方稿。夏，赴杭州拜谒罗知悌，至秋，方得拜师学医。戴良《丹溪翁传》云：“(震亨拜谒罗知悌)凡数往返，不与接，已而求见愈笃。罗乃进之曰：‘子非朱彦修乎？’时翁已有医名，罗故知之。翁既得见，遂北面再拜以谒，受其所教。罗遇翁亦甚欢，即授以刘、张、李诸书，为之敷扬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宋濂《石表辞》云：“(震亨谒罗知悌)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坚，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或告罗曰：‘此朱彦修也，君居江南，

而失此士，人将议君后矣。’罗遽修容见之，一见如故交”。震亨自己也在《格致余论序》中说：“泰定乙丑夏，始得闻罗太无于陈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骂者五七次，赳赳三阅月，始得降接。”
1326年(元泰定三年) 46岁

震亨继续随罗知悌学医。时罗知悌年事已高，赖震亨为辅。震亨《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云在随罗知悌学医之时，“每日有求医者来，(罗)必令某(震亨自谓)诊视脉状回禀，罗但卧听口授。用某药治某病，以某药监某药，以某药为引经。往来一年半，并无一定之方。至于一方之中，自有攻补兼用者，亦有先攻后补者，有先补后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随时取中，其此之谓乎！”

1327年(元泰定四年) 47岁

罗知悌卒，震亨为之营葬，“尽得其学以归”。

返乡途中，路经绍兴，与项昕谈医论道，相互切磋。

1328年(元泰定五年) 48岁

震亨行医于乡间，为众医所服。宋濂《石表辞》云：“学成而归，乡之诸医始皆大惊，中而笑，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愿为弟子。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

1329年(元天历二年) 49岁

继续于乡间行医。

宋濂与朱震亨为忘年交。宋濂在《石表辞》中说自己自从“加布于首，辄相亲于几杖间，订义质疑，而求古人精神心术之所寓。先生不以濂为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极言而无所隐。故知先生之深者，无踰于濂也”。

八月，吕权卒。吕权与朱震亨既有亲戚之谊，又同时师从许谦，有同窗之好，关系甚笃。

1331年(元至顺二年) 51岁

震亨主持修葺朱氏祠堂,并为文以记之。

1332年(元至顺三年) 52岁

弟子王履生,据1979年版《辞海》。弟子楼英生,据《明代医家楼英年表》。

1333年(元元统元年) 53岁

震亨客居金华,八月,为叶仪治病。

又为梅溪楼氏始祖竹山公题像赞。文为“天福有德,克巩克昌。子子孙孙,勿替引长”。

1336年(元至元二年) 56岁

震亨至浦江麟溪,为浦江郑氏纂定家范。

1337年(元至元三年) 57岁

许谦病重,震亨侍奉身边。十月,许谦卒。黄潜《白云许先生墓志铭》云:“(至元)三年冬十月,疾复作。谓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与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于母,友于弟。元复请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训尔多矣,至此复何言!’门人朱震亨进曰:‘先生视稍偏矣。’先生更肃容端视,顷之视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

1338年(元至元四年) 58岁

震亨赴九灵山,为戴士尧母亲治病。

杭州痘疮流行,幼儿多死。段天祐《哭女丑(哥)行》诗言家居杭州,至元四年痘疮大行,爱女丑哥5岁,因感染痘疮而亡。诗云:“至元戊寅月既穷,江上奇寒寒堕指。家家儿女病痘疮,十家之中九家死。”

1342年(元至正二年) 62岁

正月,震亨主持更定朱氏家族祭祀礼。

1343年(元至正三年) 63岁

戴士尧、戴思恭、戴思温、戴思乐等受业于朱震亨。

1344年(元至正四年) 64岁

正月,乡间痘疮盛行。朱震亨《格致余论·痘疮陈氏方论》云:“至正甲申(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春,阳气早动。正月间,邑间痘疮不越一家。卒投陈氏方,童幼死者百余人。”

夏,大水,蜀墅塘堤堰冲毁,震亨倡议修筑,并为之筹划、准备。

本年水灾,朱氏宗族祭田亦被冲毁,震亨修筑祭田并作文记之。

1345年(元至正五年) 65岁

八月,蜀墅塘工程动工,至十一月竣工,乡人德之,委宋濂为文记之。

1346年(元至正六年) 66岁

五月九日,震亨母戚氏卒,享年87岁。宋濂《故朱夫人戚氏墓铭》云:“(朱母戚氏)述寿八十有七,犹康强不衰。旦起盥栉,召子孙来前,曰:‘吾殆死矣。’就枕熟寐,日晡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

1347年(元至正七年) 67岁

《格致余论》成,宋濂为之序。宋濂《格致余论序》后署时间为“至正七年冬十有一月”。

1349年(元至正九年) 69岁

十一月十三日,戴士尧卒,年43岁。宋濂《戴仲积墓志铭》云:“君讳士尧,其字仲积,婺浦江人。生于大德丁未(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八月十九日,卒于至正己丑(至正九年,1349年)十一月十三日,得年四十有三。”

1350年(元至正十年) 70岁

震亨有《上余金事书》、《与处州路学录楼厘书》。

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 72岁

正月,震亨撰《清德里记》。秋,赴金华为张君治病。宋濂《赠贾思诚序》云:“壬辰之秋,兵发中原,大江之南,所在皆驿骚。……(张君被委以职)不惮昼夜而勤行之,以酬公知遇之万一。……日积月深,以劳而致疾。……闻丹溪朱先生彦修,以医名四方,亟延治之。”

1353年(元至正十三年) 73岁

七月,同道友葛乾孙卒。据许显《稗史集传》。

十一月十三日,戚崇僧卒于永康太平山,十二月十一日,葬于义乌双林乡。黄潘《戚君墓志铭》云:“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君(崇僧)以疾卒于太平。其年十二月十一日葬于义乌双林乡下顿后祝之原。”崇僧为震亨姑朱寿子,曾和震亨一起师从许谦于八华山学习。

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 74岁

震亨撰《风水问答》成,胡翰为之序。其云:“君(朱震亨)之医遂名海右。又以阴阳家多忌讳,不知稽诸古也。复著书数千言,曰《风水问答》。书成,示余双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谓至矣。”

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 75岁

蜀墅塘堤堰再次被山水冲毁,震亨命其侄朱漳主持修复。震亨初次倡议修筑蜀墅塘堤堰在至正四年,五年八月动工,十一月竣工。宋濂《石表辞》云:“……后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坏。先生命再从子漳,力任其事,以嗣其成。”

震亨长子嗣衍卒。宋濂《石表辞》云震亨有“子男二,嗣衍、玉汝,嗣衍亦先三年卒”。

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 76岁

震亨著《宋论》成。

张士诚占据吴中,弟子赵良仁返浙,问以太极之旨,震亨“以阴阳造化之精微,与医道相出入者论之”,良仁遂悟医易之理。

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 78岁

六月二十四日,震亨逝世,享年78岁。十一月,葬于东朱山郭头庵。宋濂《石表辞》云:“先生生于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至正戊戌六月二十四日。濒卒,无他言,独呼嗣汜谓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讫,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其年十一月,始葬先生于某山之原,卒后之五月也。”

参考文献

朱震亨著作

《格致余论》,四库全书本,浙江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校《丹溪医集》本。

《局方发挥》,四库全书本,浙江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校《丹溪医集》本。

《本草衍义补遗》,浙江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校《丹溪医集》本;刘时觉、薛轶燕编校《丹溪逸书》本。

《金匱钩玄》,四库全书本,浙江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校《丹溪医集》本。

《丹溪心法》,浙江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校《丹溪医集》本;王英、竹剑平、江凌圳整理本。

《丹溪医按》,四库全书本;刘时觉、薛轶燕编校《丹溪逸书》本。

《丹溪心法类集》,刘时觉、薛轶燕编校《丹溪逸书》本。

《丹溪治痘要法》,刘时觉、薛轶燕编校《丹溪逸书》本。

《风水问答》,刘时觉、薛轶燕编校《丹溪逸书》本。

古籍书目

- 《汉书》(汉)班固,中华书局点校本。
- 《异苑》(南朝宋)刘敬叔,四库全书本。
-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隋)巢元方,四库全书本。
- 《黄帝内经素问》(唐)王冰注、(宋)林亿等校正,四库全书本。
- 《隋书》(唐)魏徵等,中华书局点校本。
- 《二程外书》(宋)朱熹,四库全书本。
- 《皇极经世书》(宋)邵雍,四库全书本。
- 《鲁斋集》(宋)王柏,四库全书本。
- 《二程粹言》(宋)杨时,四库全书本。
- 《二程遗书》(宋)朱熹,四库全书本。
- 《四书或问》(宋)朱熹,四库全书本。
- 《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四库全书本。
- 《御纂朱子全书》(宋)黎靖德编,四库全书本。
- 《二程文集》(宋)程颢、程颐,四库全书本。
- 《论语集说》(宋)朱熹,四库全书本。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陈师文等,四库全书本。
- 《学易集》(宋)刘跂,四库全书本。
- 《伤寒总病论》(宋)庞安时,四库全书本。
- 《类证普济本事方》(宋)许叔微,四库全书本。
- 《直斋书录解题》(宋)陈振孙,四库全书本。
- 《周元公集》(宋)周敦颐,四库全书本。
- 《横渠易说》(宋)张载,四库全书本。
-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中华书局点校本。
- 《横浦集》(宋)张九成,四库全书本。

- 《小儿药证直诀》(宋)钱乙, 百度网站下载。
- 《儒门事亲》(金)张子和, 四库全书本。
- 《素问玄机原病式》(金)刘完素, 四库全书本。
- 《伤寒论注释》(金)成无己注, 四库全书本。
- 《医经溯洄集》(元)王履, 四库全书本。
- 《文献集》(元)黄潛, 四库全书本。
- 《九灵山房集》(元)戴良, 四库全书本。
- 《白云集》(元)许谦, 四库全书本。
- 《读四书丛说》(元)许谦, 四库全书本。
- 《脾胃论》(元)李杲, 四库全书本。
- 《兰轩集》(元)王旭, 四库全书本。
- 《麟原后集》(元)王礼, 四库全书本。
- 《宋史》(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点校本)。
- 《稗史集传》(元)徐显,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文宪集》(明)宋濂, 四库全书本。
- 《元史》(明)宋濂, 中华书局点校本。
- 《医旨绪余》(明)孙一奎, 四库全书本。
- 《赤水元珠》(明)孙一奎, 四库全书本。
- 《元儒考略》(明)冯从吾, 四库全书本。
- 《逊志斋集》(明)方孝孺, 四库全书本。
- 《胡仲子集》(明)胡翰, 四库全书本。
- 《明文衡》(明)程敏政, 四库全书本。
- 《推求师意》(明)汪机, 四库全书本。
- 《证治准绳》(明)王肯堂, 四库全书本。
- 《薛氏医案》(明)薛己, 四库全书本。
- 《王常宗集》(明)王彝, 四库全书本。
- 《半轩集》(明)王行, 四库全书本。

-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四库全书本。
- 《玉机微义》,(明)徐用诚、刘纯,四库全书本。
- 《景岳全书》,(明)张介宾,四库全书本。
- 《乾坤清气》,(明)偶桓,四库全书本。
- 《南园漫录》,(明)张志淳,四库全书本。
- 《篁墩文集》,(明)程敏政,四库全书本。
- 《石山医案》,(明)陈楠,四库全书本。
- 《东里集》、《东里集续集》,(明)杨士奇,四库全书本。
- 《吴都文粹续集》,(明)钱谷,四库全书本。
- 《名医类案》,(明)江瓘,四库全书本。
- 《姑苏志》,(明)王鏊,四库全书本。
- 《医史》,(明)李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武功县志》,(明)康海,四库全书本。
- 《清江文集》,(明)贝琼,四库全书本。
- 《元史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四库全书本。
- 《续名医类案》,(清)魏之琇,四库全书本。
- 《词林典故》,(清)张廷玉等,四库全书本。
- 《明文海》,(清)黄宗羲,四库全书本。
- 《千顷堂书目》,(清)黄虞稷,四库全书本。
- 《尚论篇》,(清)喻昌,四库全书本。
- 《诗传名物集览》,(清)陈大章,四库全书本。
- 《诗经稗疏》,(清)王夫之,四库全书本。
- 《明史》,(清)张廷玉等,中华书局点校本。
- 《宋元学案》,(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本。
- 《元史新编》,(清)魏源,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本。
- 乾隆《浙江通志》,四库全书本。

《水经注》(北朝)酈道元 四库全书本。

万历《金华府志》,(明)王懋德等修、陆凤仪等纂,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嘉庆《义乌县志》,(清)诸自谷等修、程瑜等纂,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0 年版。

康熙《金华县志》,(清)王治国原纂、赵泰牲增修,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康熙《永康县志》,(清)沈藻等修、朱瑾等纂,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道光《定远县志》,(清)杨慧、孔传庆修、朱昆玉纂,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其他研究成果

《名医朱丹溪论治痿痹的经验》,施仁潮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2 月版。

《丹溪学研究》,刘时觉,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版。

《丹溪医集》,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校,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

《丹溪心法》,王英、竹剑平、江凌圳编校,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

《丹溪逸书》,刘时觉、薛轶燕编校,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版。

各种关于朱震亨研究的文章约 100 篇左右,兹不一一列举。

后 记

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学家朱震亨是浙江义乌人,他的医学思想和实践一直为全国和浙江医学界的学者所关注。冯汉龙、林乾良、盛增秀、方春阳、刘时觉、王英、竹剑平等诸位先生,在研究和运用朱震亨医学思想和实践经验方面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这些学者们不仅是研究朱震亨医学思想和实践方面成绩卓著的学者,而且也都是中医学界的佼佼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非中医专业的人要来承担朱震亨传的撰写工作,无疑有班门弄斧之嫌,难度的确是太大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分头拜访了这些在朱震亨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虚心向他们请教。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因我的卑陋无知而讪笑,也没有因为我非专业人士而见弃。一个个满腔热情,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盛增秀、王英、刘时觉先生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赠送给我,王英先生还给我复印了一些不能借出的资料。方春阳先生热情地向我讲述了有关朱震亨的一些史实,并提醒我写作时要注意的地方。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义乌市丹溪药房的朱智彪先生、朱丹溪陵园的负责人朱之江先生、陵园工作人员李文芝女士都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不仅对朱震亨获得了初步的感性认识,而且其形象也在我的心目中渐渐地丰满起来。虽因林乾良先生

年事已高,我没有登门拜访,但他的研究成果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起到了开启思路的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把握好时机,错过了拜访冯汉龙先生的机会。冯先生是义乌市的名老中医,多年来一直从事朱震亨的研究,手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知道《义乌赤岸朱氏宗谱》的下落。《赤岸朱氏宗谱》是撰写朱震亨传至关重要的资料,义乌市图书馆、博物馆及各地各高校图书馆都没有保存,上述所有的研究者也未曾见到,只有冯先生一人知道下落。今年3月,我给冯先生打电话联系,他很高兴,让我到义乌去,说只要他带我去找持有《宗谱》的人,还是可以见到的。当时我因有事脱不开身,就耽误了一个月。等到五一,想利用假期去一趟义乌时,再次打电话联系,得到的却是先生已于四月初去世的消息。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实在想不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和冯先生家人联系,家人可能是怕触景伤情,再三劝告我不要造访。为了尊重家人的意愿,我只好放弃了这一次的义乌之行。先生去世,《宗谱》下落无人知晓,《宗谱》中一些宝贵的资料也没有能被引入本书,如朱震亨为朱氏祠堂所写的《铭文》及《序》,为清德里所写的《记》,以及胡翰为朱震亨所写的《哀辞》等等,都无法再见到,给本书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

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没有因我是外校老师就拒之门外,在我查阅资料阶段,他们给我提供了热情周到的服务,使我的资料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

书稿撰写过程中,儿子李强一直是我不可或缺的助手,一起陪同考察、摄影,调制电脑,安装软件,搜集资料。如果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书稿的完成可能要拖后好长时间。爱人李友英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工作,尽最大努力地承担家务,让我得以有充足的时间安心从事本书的撰写。

书稿写成后,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的盛增秀老师对之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尤其是在专业用语和药物名称的辨析上,真是细致入微,就连标点符号上的错误也不轻易放过,有了盛老师的严格把关,我的心里才踏实一些。审稿结束后,盛老师根据书中的不足,还热情提供了有关朱震亨的重要图片资料,对书名进行了认真的推敲,将原来拟定的“儒医名家”改为“一代医宗”,更加贴切地表达了朱震亨在医学史上的地位。最后,盛老师又不惮烦劳,为之赐序,对本书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的竹剑平、胡森先生作为盛先生的助手,为本书稿的完成作了许多努力。

浙江省社科院越文化研究所的卢敦基先生,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关注。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李育智先生,和我曾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李先生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及敬业精神,使本书又减少了许多可能出现的失误。

值此小书将要和读者见面之际,我由衷地向以上曾经给我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向已故朱震亨研究专家冯汉龙先生表示我的歉意和哀悼!

但愿这本小书能为丹溪学研究的园地增添一点绿色。

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和本人才能的疏浅,书中的错误和遗漏肯定不少,诚恳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是专业医务工作者对之多加指正,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作者

2006年8月于秋实斋